

军学奇才——

# 蒋百里

李娟丽 包东波

兰州大学出版社

军学奇才——蒋百里

李娟丽 包东波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375

---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32 千字 印数:1—6000 册

---

ISBN7-311-01331-3/K·60 定价:13.00 元

# 前 言

## —

还是在1990年与学友合著《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一书时就有心将蒋百里先生的事迹撰著成书。因为戴季陶作为国民党的理论家，而蒋百里作为南京政府的军事顾问，对于研究民国史的初学者来说，都颇具吸引力。当即便将此设想述与友人，竟然得到了众人的鼓励。于是，不揣浅陋，妄自开笔，计划一两年成稿。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如此，热情只占成功的很少一份。动笔后不久就发现困难重重：首先是由于笔者学识不丰，能力有限，颇有勉为其难之感。其次是有关蒋百里的资料奇缺，尽管有湖北省图书馆为后盾，但仍觉得星星点点、难觅全貌。在整个写作过程中，笔者曾数度辍笔而专力于资料收集，遍访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不期所获颇丰，经过几年的努力，书稿终成。

蒋百里的一生在1948年就有著名报人陶菊隐先生所写《蒋百里先生传》，之后于60年代有曹聚仁先生的《蒋百里评传》和李吾先生连载于《春秋》上的《蒋百里先生的生平》。笔者寡闻，在大陆只见到陶先生的《蒋百里先生传》，且在数十年间，似乎大陆学者基本上没有研究蒋百里的专门成果。从目前手头上掌握的蒋百里的资料来看，蒋百里的著作、文章集中在三个时期：第一是在日本创办《浙江潮》时期；第二是在随梁启超先生游欧归来后

的几年，重点是在主编《改造》杂志时期；第三是在全面抗战开始后直至去世。

经过一番周折，目前基本上收集到了蒋百里各个时期的文章和著作，计有专著《裁兵计划书》、《国防论》、《欧洲文艺复兴史》、《蒋百里先生文选》、《蒋百里先生抗战论集》以及译著《职分论》、《近世“我”之自觉史》等，另有各期《浙江潮》、《改造》和陶菊隐先生的《蒋百里先生传》。相比较而言，台湾方面总结研究蒋百里的成果要丰富得多。1970年，薛光前与百里先生的女儿、侄子共同努力编辑有《蒋百里全集》共六册，结集他各个时期的文章和著作以及学生门徒的纪念文章。1979年，又有朱传誉先生主编的《蒋百里传记资料》三册出版。这三册传记资料的觅得，极大地丰富了撰写素材，避免了因资料缺乏而造成的尴尬局面。

## 二

“一个真正懂得自己民族，同时又真正了解别人国家，这不只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战略家，而是‘知人则哲，知己则明’的思想家。百里先生真正知道东方，也真正了解西方；既知今（现代）又知古（古代）”。这是蒋百里去世后，当时国民党的军界人士对他的评价。

一般来说，人们习惯地认为蒋百里是个军事思想家（包括本书亦随大流），但实际上他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百里先生博古通今，融会中西文化，功底深厚，他在很多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比如国防建设、军事思想、经济、外交等。但作为学习军事出身，他毕生都格外注重军事理论和实践，随时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归纳，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著作。而在其它方面，他更多的是表现在行动上，文字上记载很少。另外，蒋百里一生没有在政坛取得

显赫的功名，终其身仅得“顾问”、“参议员”之类的空衔，仅有二星上将的军衔给他头顶罩上了一抹光晕。所以至今人们总是将他定位为军事思想家，冠以军学权威的美誉。

蒋百里先生的思想突出的特色是始终贯彻着爱国主义，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他能为国人所景仰。在内难外患并重的旧中国，蒋百里先生没有因为个人境遇的坎坷而怨天尤人，他总是以满腔的爱国热情投入政治、军事实践之中，试图以先进的理论和学识去影响国人，改造社会，促进民族前进。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国际环境最为险恶的时期，他远渡重洋，出访欧洲，在法西斯主义兴风作浪最为猖狂的德国、意大利以和平正义主张与战争恶魔周旋。尽管外交成果不大，但他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把民族气节昭示于天下。在南京政府迁到武汉后，中国的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蒋百里先生更是殚精竭虑地宣传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号召国人与日寇血战到底，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停止。可以说，宣传抗战必胜，蒋百里先生为功最殊。他的许多文章都成为激励人们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的兴邦之言。在他身上，较为集中地表现出了上下五千年的民族魂，他与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抗战英烈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挺直不屈的脊梁。

在军事领域，蒋百里先生较早地把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介绍到中国来，并且试图促进中西军事思想的融合。在保定时期的军事活动，尽管受到了北洋军阀的种种羁绊，且时间短暂、壮志未酬，但他的尝试无疑给落后的中国军事带来了一股清风。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蒋百里先生奔走呼号，力主废除军阀专制。他从裁减军队、建立新的国防体制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基本上顺应了广大民众的呼声。尽管在这一段时期，他曾在吴佩孚、孙传芳等北洋军阀头子的幕府中做过参谋之类的工作，但他是怀着改造旧军阀的落后思想、促使其顺应时代潮流而去的，丝毫不

夹杂个人的私心杂念。当他终于发现军阀之不可谋如同谋虎不食肉时，便毅然远离而去，目睹其被时代的战车轰然碾碎，表现出他的历史正义感。随着世界政治、军事的不断发展，蒋百里先生在后期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军事理论，比之于南京政府诸多军事家、战略家的种种主张，蒋百里先生的军事思想既不落后于世界军事思想的发展步伐，又切合中国国情和军情，更对中华民族抵御外族入侵有实际的指导意义，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只可惜的是他的军事思想没能得到全面的贯彻实施，更堪顿足的是他的英年早逝。

### 三

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蒋百里先生的一生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少有所得志的时候”，人们总是以命运不济、生不逢时来概括他的一生。

的确，他早年留学日本、德国，专攻军事，在日本和德国军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学成归国后，在袁世凯、段祺瑞时期就开始步入政坛，直到他1938年病逝广西宜山，他多数时间都在担任国事顾问、军事顾问等虚职，还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较为具体一点的职务是袁世凯时期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和抗战时期执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这两次担任实职的时间加起来不足一年。第一次为军阀内部的派系斗争所累，导致他仅视事半年就以自杀警世而告结束；第二次则时间更短，任职只有两个来月，就因心脏病突发而演成出师未捷身先死之憾。

但仅用命运不济、生不逢时来总括蒋百里先生的一生，似乎过于简单。笔者撰着这本书，通过真实地记述蒋百里先生的一生，想对其一生的是非功过进行总结，希冀得出一些对研究蒋百里先生的人生历程有帮助的东西来。

多少年后我们再来审视蒋百里先生的一生，就会发现一个极其值得探究的问题，这就是每当历史发生剧变的时刻，他总是与历史的机遇擦身而过。例如：辛亥革命前，蒋百里先生就曾极力鼓吹过革命，有《浙江潮》可证；但他虽然早早就变成了革命军的盟友，却未投身于推翻清王朝的战场。武昌起义之时，他远在东北，把自己的副手派往南方，到黄兴身边工作，可他自己却未行动起来。护国讨袁运动获得较大成功，作为这场政治、军事运动的策划者之一，他功不可没，但正当他和蔡锷、梁启超等大展宏图的机遇再现之时，蔡锷将军却因喉疾倒在疆场，蒋百里先生则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次政治机遇，陪同蔡锷去日本疗疾。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可惜蒋百里先生与梁启超等正在欧洲游览，他只是从媒体上和人们的口述中得到一些感受；尽管他也参加了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但他已成为梁启超沙龙中的重要一员，而此时梁任公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却正为时代所扬弃。席卷南北的北伐战争是国共两党联合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国内革命战争，在这场打击旧军阀的革命运动中，蒋百里先生却不幸身处吴佩孚、孙传芳的阵营中；最终，他企图改造旧军阀的美好幻想彻底破灭，但给世人的感觉却是他帮助了革命的敌人，并且错过了投身革命洪流的时机。到南京政府成立时，在封官进爵的微妙关头，蒋百里先生比之于整天将“革命”二字挂在口边的阴谋家们，显然已无任何光辉可言了。凡此种种，使蒋百里先生走出了一条奇特的人生轨迹，这也导致了他在国家的政治舞台上无法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要角。后来他甚至成为一个无党派人士，与蒋介石国民党只保持了朋友关系。

自然，我们也应该从蒋百里先生的人格品性上加以分析。百里先生的弟子、台湾军界元勋万耀煌先生曾有一段评说，笔者以为颇有道理。他说：“大凡一位非凡的人物，他的性格，必与普通一般人不同。由于特异的性格，反射到生活上，表现在行为上，也

往往不落恒蹊，放出一种不寻常的光彩，就人生意义来说，则可能是悲剧性的。百里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以他的才学和抱负，应该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就说他一生的遭遇，也不算蹭蹬。但他的名位，一直在若隐若现之间。……百里先生的性格，可以简括为‘真、善、美’三个字。而美与善者，自然是由真字出发。以他的学养、才略、阅历，应该是世故很深，工于顺应。而他一生所如辄迁，甚至于予人不易了解的印象。这原因，就在于他一任纯真，所以往往与现实格不相入。人生毕竟太神秘，国家社会种种现象，尤不单纯。是否一个真字可以了却一切，这诚然是很难说的。”由此而论，我们不得不承认，蒋百里先生毕其一生，追求人生的真、善、美，他未尝不也是个成功者呢！

不管怎么说，蒋百里先生一生的不得志的确是个悲剧。对于国家来说，人才难得；对于他个人来讲，失去了更多的报效祖国的机会，二者都是极大的损失。对此，百里先生自己也有评价，他说“我之不得志，无待人言，自己也明白，不但一时，恐将终世。……与其谓蒋百里不得志，毋宁谓用蒋百里者不得时。”他引用了颜回评价孔子的一句话来评论：“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之丑也。”现在看来，诚哉斯言！

回过头来再看，百里先生没有在日益走向腐败堕落的政府中“得志”，使得他的军事思想长期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没有走向为军阀、专制、独裁服务的反动的方向，这未免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完成这部书稿，恰值蒋百里先生逝世59周年的祭日，谨以此书记念这位著名的爱国军事思想家！

著 者

1997年11月4日于武昌

#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少年时期	(1)
一、大家族的苦孩子	(1)
二、割臂疗母	(3)
三、初知国事	(4)
四、硖石才子	(6)
第二章 名扬东瀛	(10)
一、创办《浙江潮》	(10)
二、结识梁启超、蔡锷	(19)
三、“中国三杰”	(21)
第三章 初入宦海	(27)
一、二十五岁的总参议	(27)
二、东方将星	(30)
三、再赴东北	(34)
四、辛亥风云	(37)
第四章 奋起倒袁	(41)
一、保定军校校长	(41)
二、生命与爱情	(48)
三、讨袁内幕	(54)
四、痛失挚友	(57)
第五章 “回头做我们的学问”	(61)
一、淡泊度日	(61)

二、远离宦海·····	(64)
三、游历欧洲·····	(67)
四、共学社的主谋·····	(72)
五、温馨的松坡图书馆·····	(75)
六、《改造》主编·····	(78)
七、孤独苦旅·····	(82)
<b>第六章 在军阀混战中沉浮</b> ·····	(89)
一、极力推行联省自治·····	(89)
二、重入军界·····	(91)
三、众醉独醒·····	(96)
四、初见蒋介石·····	(101)
<b>第七章 翻云覆雨荣辱间</b> ·····	(105)
一、梦断孙吴·····	(105)
二、倚剑独彷徨·····	(108)
三、身陷囹圄·····	(114)
四、狱中岁月·····	(118)
五、恶梦醒来·····	(122)
<b>第八章 国难伊始</b> ·····	(127)
一、淞沪抗战·····	(127)
二、位卑更忧国·····	(131)
三、长女惜逝·····	(133)
四、闲云野鹤·····	(138)
<b>第九章 战争前夜</b> ·····	(143)
一、浪漫海上旅途·····	(143)
二、父爱殷殷·····	(146)
三、新大陆之旅·····	(151)
四、亲历西安事变·····	(154)
五、张学良求教·····	(159)

六、和平解决的谋士 .....	(162)
<b>第十章 再访欧洲</b> .....	(171)
一、意大利顾问 .....	(171)
二、西湖论酒 .....	(174)
三、巡视全国 .....	(178)
四、战火燃起 .....	(184)
五、在战争狂人间周旋 .....	(188)
六、滞留欧洲 .....	(201)
<b>第十一章 笔挟风雷振国威</b> .....	(207)
一、委员长顾问 .....	(207)
二、不息的号角 .....	(210)
三、繁忙的社会活动 .....	(217)
四、兴邦之言 .....	(226)
<b>第十二章 英年早逝</b> .....	(235)
一、国际问题专家 .....	(235)
二、重任在肩 .....	(242)
三、执掌陆军大学 .....	(246)
四、出师未捷身先死 .....	(252)
五、和美家庭 .....	(261)
<b>第十三章 军事思想</b> .....	(268)
一、辛亥革命前后到北伐战争 .....	(269)
二、全面抗战时期 .....	(276)

# 第一章 少年时期

## 一、大家族的苦孩子

杭嘉湖平原有个重镇，这就是浙江省海宁县（今海宁市）硖石镇。海宁北接嘉兴到上海，南连余杭通杭州，扼杭州湾，交通便利，物产富饶。后来的沪杭铁路就斜穿海宁境内。或许很多人对海宁是陌生的，但言及名扬天下的钱塘观潮，则是鲜有不知者。海宁在民国史上出了两个著名人物，一是名扬中外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一是现代诗人徐志摩，他俩还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清朝末年，蒋氏家族是硖石镇唯一的大户。蒋家祖居江苏宜兴，“三迁而至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以懋迁获丰”。<sup>①</sup>所谓“懋迁”，就是专做贩运买卖。蒋氏祖上没有读书人，到了蒋百里的祖父蒋光煦这一代才门风大变。光煦公酷爱读书而疏于贾业，他学识渊博，家中富藏典籍，曾辑家藏刻有《别下斋丛书》。光煦公还是有个有福之人，多子多女。众多子女中，他最疼爱第五子，可不幸的是幼子早殇，令其心痛不已。入葬时，光煦公特在幼子左臂用朱笔写了一句佛语，希望菩萨渡他早日转世。

也是老天有眼，光煦公不久即得一晚年子，这可真乐坏了老人家。特别是新添之子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竟与亡兄十分相似，就更得老人家的宠爱，不管有多少烦恼事，只要见到小儿便全都

烟消云散。小儿取名学焯，他就是蒋百里的父亲。

学焯幼时，举家疼爱自不需多述。但年及髫龄则开始遭到老父的冷眼。原来学焯自幼营养不良，因缺钙患上了软骨病，右臂无法伸舒，形同残疾。身为男儿，必将肩负济家举业之大任，如今尚未长成即变成废人，光煦公对他的爱顿时降至冰点，于是蒋门上下莫不歧视身有残疾的蒋学焯。失去父母之爱，更没了家庭的温暖，他度日如年，只得一头扎进书屋，昼夜读书以避免家人冷漠的目光。

太平天国起义之后，在兵荒马乱的年月，以贩运买卖赚钱难以维继，蒋氏家道中落，又逢父亡，蒋家兄弟便析产自立。学焯在析产中再遭欺负，他自觉看破红尘，毅然离家出走，准备遁入空门，苦度余生。

学焯只身一人出走更是举步维艰，好在天不绝人，在途中他遇到了一位姓杨的行医老者，杨老伯对他温语慰导，关爱备至，终于打消了他出家做和尚的念头，并一同到了老人家中。从此，蒋学焯重获父爱，并且跟随老人学习医术，杨老伯则毫不保留地授以治病救人之术。而聪颖的学焯更是兢兢业业不敢有一丝马虎，很快就学得一手好医术。渐渐地，杨老伯一家老少全都喜欢上了学焯，特别是老人的一个女儿。

杨老伯年纪大了，无法再出门行医，全靠学焯一人支撑家计。杨老伯见他老实能干，便把女儿嫁给了他。从此，蒋学焯成家立业，风里来雨里去往返于海宁、海盐之间，悬壶济世，解人疾苦。以他的勤劳肯干和高明的医术，倒也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闲时就以读书为乐，并著有《泄怀集》三卷。

光绪八年农历九月初二（1882年10月13日）蒋百里出生，取名方震，字百里。

## 二、割臂疗母

蒋百里两岁时，父亲在海盐租了几间房，全家搬到了海盐城。4岁时，母亲开始教百里识字，到5岁时论孟唐诗已琅琅上口，过目不忘。

光靠父亲行医持家，日子过得实在辛苦，加之父亲以曾遭受创伤的心灵去为人疗疾，自然是恻隐之心当头，为穷人治病往往是减免诊费之外还可赊账，时间长了，收入自然微薄，母亲经常不得不编竹织布辅佐生计。除操持饮食浆洗外，蒋夫人最大的喜好是课子读书。她自己也时常读一些野史演义之类的书，封神、西游就常常挂在口边。百里最爱听故事，常与母亲嬉戏模仿。

蒋百里8岁那年，因家境贫寒请不起塾师，便到镇上张冷生先生家为其子伴读。时有张先生的世交查芸孙先生造访，他只见了蒋百里一面便惊呼神童，随即造访蒋家，要把次女许配给百里，于是便引出一门娃娃亲来。

百里渐渐长大，不能总做伴读。11岁那年，经与硤石同族商量，父亲命百里返回故里就读于同族家塾。塾师倪勤叔叔非常喜欢聪慧的小百里，并且免了其束修之礼。以蒋百里的天资，四书五经自然背得滚瓜烂熟，他还随倪先生学得一手漂亮的小楷，婉秀有致，人皆称道。

在家读书期间，蒋百里结识了一位好友张宗祥。蒋张二氏本为世亲，说来有趣，张宗祥受祖传习颜体，专攻正楷。起初相见多论书法，两个小伙伴总是争得面红耳赤。后来则结伴到镇上茶馆模仿说书人为茶客们讲姜子牙、孙行者的故事，小辫子一甩总能把茶客们逗得前仰后翻。他们更多的是召集童年伙伴们做行军打仗的游戏，每每都是蒋百里做指挥官。此时，硤石镇上有清兵

驻守，蒋百里时常和小朋友们去看队伍操练。他后来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那年秋天，我的先生回家去了。所以我常到教场里去看。这件事情顶好玩的，看他们一对一对的舞刀，还看他们射箭。箭靶子是三个红星，射中了有人打鼓的……我还看见过操步枪的，我们顶喜欢看的是操藤牌”。<sup>⑤</sup>

1894年是蒋百里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年他13岁。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举国震惊。岁末，父亲又染疾病逝于海盐，随即，孤儿寡母扶棺归籍。靠族人相助，蒋百里才没有辍学。他“十三岁时就把中国的历史读得烂熟了”，他时常对别人说：“做个中国人应该清楚中国的历史。”<sup>⑥</sup>也就是在这一年，蒋百里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萌芽。

次年，一衣数补缀、数月不食肉的蒋夫人亦染疾卧床。医生没少请，药也没少吃，可病就是久治不愈。爱母心切的蒋百里竟然效仿古人割股疗亲之举来行孝道，他偷偷从左臂上割下一块肉来，忍着剧痛，将臂肉和药熬汤，进奉母亲。紧接着，他的胳膊因未医治而很快就发炎溃烂了。但百里一声不吭，依然担水做饭、熬药煮汤伺候母亲。这事毕竟瞒不了太久，细心的母亲发现儿子每次端饭送药到床前时总能闻到一股腐臭味，便强拉过儿子，一查手臂，只见脓血败絮紧紧裹在一起。问明原委，母亲不由得抱儿痛哭。后经延医治疗，蒋百里的臂伤才慢慢愈合。

### 三、初知国事

1894年的清政府已进入风烛残年，反动统治摇摇欲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失败的消息引起举国哗然，各大报纸纷纷发文抨击朝政。

一件很偶然的事使得蒋百里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他有一个

堂兄要参加乡试，其中第三场是考策论。堂兄不通时政，就托蒋百里代为作论，还请他用小楷誊正后供他夹带进考场作弊。多少年后，蒋百里回忆此事还历历在目，他说：“（我）去向街上的钱庄里边借了一张《申报》来，因为有些消息可参看，同时又可抄点论说，预备对策时的论文。我记得中间有一篇大骂李鸿章的文章，……这就是甲午战争，从此刺激了我的新知识，我学会了看报。”<sup>④</sup>

然而碛石毕竟是个小地方，读书看报并不方便，张宗祥回忆说：“甲午后愤朝政不纲，汲汲然口思致用之学，苦书不可得”。<sup>⑤</sup>但蒋百里是个有心机的人，他四处觅书讨报，时刻关注甲午战事，没多久他就把这民族大耻牢记在心中了。“从此，平壤、牙山、大东沟、九连城、威海卫、刘公岛等地名就时常挂在嘴边。”

1895年4月，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派李鸿章赴日签定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件事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三项主张，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当时蒋百里有个伯伯去考进士，不知何故没有参加殿试就回了乡，到这年又赴京补朝考，他写信回来介绍了北京的形势和“公车上书”一事。信是寄给蒋百里的老师的，不久，老师的书案上又有了《公车上书记》和《普天忠愤录》两书。

那时候蒋百里他们依旧学的是四书五经，桌上的书也只有《小题镇鹄》、《诗韵》之类的书，因此，《公车上书记》等书对蒋百里诱惑特别大，他便乘先生不在时去偷偷地翻阅。

1898年戊戌变法后，碛石镇有了一座双山书院，书院中藏有许多新书籍，如《格致书院课本》、《日本国志》、《普天忠愤录》、《经世文编》等等。蒋百里与同学相约“散学即会于书院，阅诸书。……皆欣然成诵，日至天黑难辨，方各回家，院中无第三人也”。<sup>⑥</sup>这一时期，蒋百里扎扎实实读了一阵子新书籍。

陶菊隐先生在《蒋百里先生传》中称他此时“阅《普天忠愤录》，常中夜呜呜，矢为国自效”<sup>⑦</sup>。对自幼便阅世事，年已16、初识国事的蒋百里来说，这样的评价应为合情合理。

#### 四、硖石才子

18岁那年，蒋百里参加了科举考试，历经州府院八试，均名列前茅，一举考中秀才。中了秀才便可以做塾师，百里应聘于距硖石五里外的伊桥镇孙家。

一天，蒋百里到桐乡去拜访同在做塾师的族人，同乡正巧替人忙丧事，无暇顾及百里，百里独坐书房捧书便读。无意中他翻出了桐乡新任县令方雨亭所出的“观风卷”。所谓“观风卷”是清朝习俗，新官上任即出作文题命学子士人作答，以求发现人才。方雨亭的“观风卷”“计列三十，文体虽仍为制艺、诗赋、策问、论说等项，而题意革新，均关实学，非博通载籍、洞悉时事者不能措一词，限一月缴卷”。<sup>⑧</sup>蒋百里对作文题颇感兴趣，他抄下题目即刻返回伊桥。

以蒋百里的才学，他一月之内便洋洋洒洒书成十数万言的答卷，到了方县令的手中，这份文采飞扬的答卷令他大为吃惊，他圈点不及，做了数十条眉批，还在卷尾总批数百言，不由得感叹到“此真为我国之宝也！”<sup>⑨</sup>结果蒋百里所答的“观风卷”被评为超一等奖，方县令破例发给蒋百里奖金三十两银子，这比起书院士子惯例的三千文奖金不知多了多少倍。随即，方县令点名召见蒋百里。消息传开，引起硖石、伊桥两镇轰动。

方雨亭是个开明人士，接见蒋百里时他特地除去朝服身着便服相见，以示器重。他深为蒋百里因家境贫寒而陷入谋生求存的困境而惋惜，决定资助蒋百里到杭州求是书院学习，一切费用均

由他一手负担。这无疑是在蒋百里人生的又一个重要转折点。

求是书院分内外两院，内院收中英文双优生，共有三十余人。蒋百里从未学过英文，只得进入外院，外院也只有百十来人。入院不久，书院就进行了两次考试，第一次考试题为“殷书顽民颂”，百里仿《离骚》体行文；第二次考试题为“汉晋士风不同说”。蒋百里两试皆名列全院之冠，一时名声大噪，人称“破石才子”。

刚入书院时，书院的监院（即院长）姓陈名汉第，字仲恕。他是杭州大名鼎鼎的翰林陈豪的长子，而他和弟弟陈敬第也先后被皇帝钦点为翰林，遂成为著名的“一门三翰林”。陈仲恕是接替前任监院陆懋勋之职，陆懋勋则在戊戌年间被点了翰林去了北京。陈仲恕对蒋百里可谓关怀备至，他特别喜欢这个血气方刚、聪颖伶俐的年青人，加之方雨亭和杭州知府林迪臣是同乡好友，方雨亭每次到杭州公干必到书院探望他保送来的几个学生。在他的几个得意弟子中，他最欣赏蒋百里，而与陈监院谈的最多的也是蒋百里。

陆懋勋在北京没呆上两年，1900年他又回到了杭州，还想继续主持求是书院。这下可真让林太守作难了，翰林公可是朝廷里来的人物，哪能由知府委派？无奈，林太守只好特聘陆翰林为求是书院的总理，这可不是委任职务，基本上算是一项荣誉称号。可陆翰林偏偏要一手遮天，事无巨细一概总理，陈仲恕的监院就相当于现在的教务主任了。

陆总理首先命学生抄习楷书，每月至少得交卷一次，这大概是因为历朝翰林都是最考究书法的缘故。蒋百里哪愿做个写字匠，他心机一动，抄了一份“求是章程”，字写的倒是十分工整，但他故意把“求是”全抄成了“求字”其讽刺之意不言而喻。浙江方言“是”“字”几乎同音，同学们看了，无不拍手称快，纷纷抄写起“求字章程”来。陆总理不得已，只得停了写字课。从此，他

对蒋百里既另眼相看又怀恨在心了

1900年前后的中国，经过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内外矛盾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更加激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志士奔走呼号于海内外，反清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知识界也开始了从改良主义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转变。杭州城是个大码头，对于求知若渴的蒋百里来说，求是书院的生活让他全方位地感触到了时代潮流的澎湃激昂。尽管他对改良和革命还没有深刻的认识，但他可以自由地阅读抨击时政和宣扬革命的文章，在主观上民族爱国主义思想不断强化。当时求是书院的学子们秘密成立了“励志社”，开会演说十分活跃，血气方刚的蒋百里自然是励志社的骨干之一。为此，陈监院特地召见他，以关怀爱护的口吻告诫他“救国不可以空谈而召实祸”。<sup>⑩</sup>

1900年8月，以“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为旗号的维新派湖南人唐才常在武汉设自立军机关，准备联络长江沿岸会党起义，事未果而遭湖广总督张之洞镇压牺牲。消息传到杭州，对此事早有耳闻的求是书院的学子们无不仰天长叹，蒋百里在激动中做了一首哀悼唐才常的诗，这首诗在学生中广为流传，自然也传到了对蒋百里怀恨在心的陆懋勋耳中。

本来对革命就不满的陆翰林当即决定要将蒋百里开除出求是书院。蒋百里的恩师陈仲恕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按书院的章程，成绩最差的学生才除名，而蒋百里是求是书院的高才生，岂能因区区一首“感时应景”的诗作将他开除，此事完全不必小题大作。

学籍自然是保住了，但陈先生认为陆总理对蒋百里已怀恨在心，这样发展下去终究还会风波再起。于是他将此事报告了林太守，并建议将蒋百里派往日本留学，专攻军事。

就这样，蒋百里结束了他短暂的求是书院的生活，东渡日本，迈开了他人生的重要的一步。在涉世之初，蒋百里遇到了方雨亭、林迪臣、陈仲恕三位爱才如命的恩师，且这几个人又都是“浙江

文化之启迪与民族意识之发展”的推动者<sup>①</sup>，真可谓他人生的第一大幸运。

**注释：**

①蒋复璁：《痛苦中之追忆》，载《蒋百里全集》（六）纪念文，第208页。

②①⑥⑦蒋百里口述、张禾草笔录：《蒋百里自传遗稿》，载黄萍荪、张禾草编《蒋百里抗战论集》，浙江金华，新阵地图书社，1939年4月。

③张禾草《蒋百里先生的一点小事》，载《蒋百里抗战论集》。

⑤⑧张宗祥：《述蒋君百里》，载《蒋百里抗战论集》。

⑨⑩⑪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9、10页，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4月。

## 第二章 名扬东瀛

### 一、创办《浙江潮》

蒋百里出国之时，国人留学的风气尚未大开，况且百里家中贫穷，这一走，只剩下疾病缠身、孤苦无依的老母亲苦度日月。因此，蒋百里此行引起族人的强烈不满，非议之声四起，好在他的母亲知书达礼，这才了却了他东渡求学的心愿。

中国历来流行着重文轻武的旧观念，士为四民之首，当兵者被认为是市井无赖、无能之辈。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不绝，在甲午战争中，尽管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英勇奋战，但因清政府腐败无能，最终惨败。1895 年 4 月 17 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之后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它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根据条约规定，日本割占中国大片领土，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日本侵略者通过这个条约，勒索的战争赔款和辽东半岛的赎款，高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清政府为了还清巨额赔款，大举借债，使得帝国主义列强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条约规定允许日本人在中国投资设厂，其他各国依据最惠国待遇，也取得了在中国设厂的特权，使得外国的侵略势力进一步向我国的内地渗透。这种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侵略行径合法化，

沉重地打击了刚刚起步的中国民族工业。

《马关条约》是帝国主义列强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枷锁，标志着他们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此，各国列强在中国展开了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角逐，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而我国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变革现状发起的变法维新运动被清政府扼杀，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也被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联合八国联军血腥镇压。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淫威，签订了丧权卖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是中国主权的大拍卖，封建统治阶级完全投靠了帝国主义，它们之间的主奴关系以条约的形势确定下来，清廷成了“洋人的朝廷”。中国从此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民族的耻辱，教育了蒋百里，三寸毛锥不能救国，要想挽救中国，只有投笔从戎。1901年，蒋百里在恩师陈仲恕、林太守的帮助下，自费进入东京陆军成城学校学习。

当时的日本军校分三级：陆军预科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校。陆军大学校是高级军事学府，隶属于日军参谋本部，专为培养陆军将佐和参谋人员。陆军士官学校是初级学校，专为培养部队尉官（士官）而设。成城学校是士官学校的预科，功课大体如普通中学，但偏重于兵操、体操训练，学生在此校毕业后，入联队（团）实习名曰入伍生，日本人叫做士官候补生，实习期在一年左右，充当下等兵至下士的角色；期满后以下士资格入士官学校，经一年或一年以上毕业后，仍返联队实习，约三至六月，期满后以少尉任用。

成城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该校特为中国留学生编著日语、日文教科书。一般到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都要先入此校或振武学校，振武学校是因中国留学生弃文习武之风大盛后而增设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普遍发动，给了

正在迅速增多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很大的影响。而这一不同于旧式封建士人的知识分子群的涌现，又给近代中国的革命事业提供了一支新的力量，并使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中的进步分子，则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主要是和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的形成相联系的；同时，也和严重的民族危机的煎迫，清政府的“变法新政”的推行有关。培养出这一新的知识阶层的途径，不外乎是兴办学堂和奖励留学。在这方面，清朝统治者、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基于各自的需要而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在革命派所办的学校里，读的、谈的、议的、干的都离不开革命。就是在清政府的官办学堂里，尽管学校当局对学生诱以官禄，并用种种禁律进行约束，但也无法阻挡学生思想的日趋革命化。因为民族要独立，人民要民主已经成为历史的潮流，而先进思想的传播，又是无法通过国界、省界来限制的。这使封建统治者发出无可奈何的哀叹：“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阶。”<sup>①</sup>“疾矢离弦，悔之何及。”<sup>②</sup>中外反动派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中国造成了数十万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培养出了自己的掘墓人。

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数趋向革命化的岁月里，留学国外比在国内所受到的政治迫害要少一些。因此，留学生运动就比国内的学生运动更早地活跃起来。留学生的爱国活动，是从组织爱国团体开始的。在东京，热爱乡土的各省留日学生，开始筹设同乡会之类的组织他们的活动，在反帝爱国斗争中起过一定作用，如1900年留日学生一百多人在东京创立的励志会等等。1903年春，蒋百里在东京学习期间，将在东京的留日浙江学生35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浙江同乡会”，该组织以留学生为主，还有旅日华侨参加。他们认为，国家的存亡，以能否结成团体为决定

因素，而要结大群，又必先结小群以相联结。凡言爱国，必自爱乡始。同乡会设立出版、教育、实业、调查四部，用以向本省传播海外文明、变易思想、刷新道德、振兴实业、调查省内利弊。可见，这种以爱乡相标榜的结社活动，是从爱国的立场出发的，因而具有积极意义。

“浙江同乡会”成立后，蒋百里又着手创办刊物，他亲自草拟了社章及办刊方针，经过精心筹备，《浙江潮》于1903年在日本东京正式创刊。蒋百里自任第一届主编，编辑兼发行者有孙翼中、王嘉矩、蒋智由、马君武等人。主要撰稿者，除了上述人员外，还有陈威、沈沂、鲁迅等人。

《浙江潮》定期于阴历每月二十发行。总共发刊近一年，共出12期，现在能看到的仅有10期<sup>③</sup>。第1期发刊于1903年2月17日，第10期发刊于同年12月8日，共10册。每册60余页，约18万字，所载包括社说、论说、学术、大势、时评、杂录、文苑等门类，每册卷首均有一幅彩色地图和浙江名人胜景插图三四页。刊载这些彩色地图及插图的目的，据该刊《发刊词》说：“非徒供阅者悦目怡魂”，主要是为了“增长知识，激发志气”。

刊物命名为《浙江潮》，是用来“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sup>④</sup>。蒋百里在《发刊词》中写道：“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而独留此一纪念物，挟其无穷之恨，以为吾后人鉴。……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月激刺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一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世界者乎！……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吾愿吾杂志亦如之，因以名，以为鉴，且以为人鉴，且以自警。”

后来的事实证明，《浙江潮》的气魄和声誉确实无愧于它的名称，它在当时的影响是较大的。杂志发刊以后，很快风行国内外。

据统计，它每期都印有 5000 册，而且有几期重印过多次。

为了唤起民众，使中国免于危亡，“发达吾民之爱国心”“与异族抗”<sup>⑤</sup>，《浙江潮》的作者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

《浙江潮》认为帝国主义是使世界不得安宁的总祸根。“近顷以来，无论天之涯地之角，有一事之起，则无不是帝国主义者为之根。”<sup>⑥</sup>这一论断在当时对于纠正某些人对列强的错误认识，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促进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救亡运动，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在分析了造成帝国主义侵略的基本原因和直接原因后，《浙江潮》认为它们已把中国作为主要的侵略目标了，并进一步指出列强对中国侵略的重点在经济上。他们认为列强这种“易其政治之侵略而为经济之侵略”的险恶行径，“其祸乃更毒”。“譬是犹人也，朝割其一手，夕割其一足，其人必痛，而其警醒也易，而其反抗之力大，而其人犹可以复生也。若举全身之精血而吸之，其犹茫然皇然莫知其由，未几乃病瘵以死矣”。<sup>⑦</sup>这些论述，入木三分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杀人不见血的罪恶行径。

由此可见，《浙江潮》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与揭露，反映了当时的中国青年学生对造成中国空前严重民族危机的根源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刊物从经济上去分析帝国主义，显然是受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人的影响。这种思想在内容上比早期单纯的排外思想是广泛和深入得多了，使它的爱国救亡宣传具有了更大的号召力和说服力。

《浙江潮》不仅指出了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而且还为人们提出了一条救国救民的民族主义建国道路。蒋百里在《浙江潮》上写的第一篇文章《民族主义论》就是提倡民族主义建国的洋洋巨著。何为民族主义，蒋百里作了这样的解释，他说，民族主义系 19 世纪的产物。19 世纪的一些大的历史事件，如：爱尔兰自治、日本明治维新、义和团运动、……等等，无一不是由民族

主义磅礴冲击而成。现在欧美列强以民族主义为立国之本，它们能够以民族主义建立自己的国家，又能以民族主义灭亡他人的国家。以民族主义亡他人之国的策略有二：一是“以战斗力直接而亡”，二是“以同化力间接而亡”。现在正处于民族竞争激烈的时代，欧美列强的竞争目标已集注于中国了。因此，今日“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中国，则吾中国乃真亡矣。”

为了论证民族主义建国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蒋百里在文章中，从18世纪的西方革命潮说到中国近代史，指出中国目前之所以处于危在旦夕的境地，从内因来说，是“专制政治的结果”。他认为，民族主义与民权自由是紧密相连的，言民族主义“必推源于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虽未明言民族主义，而其根柢见焉，故曰民权之进一步，即为民族主义，而民权未发达，则民族主义必不能行。”“既言自由，而民族主义之根蒂生也。”因此，民族主义与专制政体不能相容。“民族主义之大目的，在统一同族以立国。然兹所谓统一云者，志意的统一，非腕力的统一也；共同的统一，非服从的统一也。”这种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这种统一，最能“发挥其本族的特性”，最能“合其权以为权，合其志以为志，合其力以为力。”而中国的所谓统一却迥然不同，它是专制政体的统一，出自于专制独裁者一人，靠的是兵力、强权和高压，“人民皆推其国为政府所有，而不与闻其戚也。”因之这种统一并不是真正的统一，它所建立的国家也不是民族的国家，严格说来，他根本“不得谓之为国”，他的命运必然是陷于分裂，被人民所“委弃”。由此他得出结论说：“是国也，必不能存于大地者也。未有国民皆委弃其责任于一人，而一人乃能保其国者也”<sup>⑥</sup>故中国欲自存于民族竞争之世界，“则当以建民族的国家为独一无二”。

《浙江潮》上登载的《国魂篇》也喊出了民族建国的响亮口号。民族建国问题者何？曰：凡同种之人，务独立自治、联合统一，

以组织完全之国家是也。”作者在扼要地介绍了“民族建国”的涵义后接着指出，要建立民族的国家，按中国目前的情形，关键的所在是要通过教育来迅速改变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民德卑，民力弱，民智塞”、“坐井观天而不自知其愚”、“保守而不知之”的可怕现状。作者还谈到祖国主义，指出“祖国主义者何？根于既往之感情，发于将来的希望，而昭于民族之自觉心”。因此提高民族自觉心，对于复兴祖国具有重要意义。<sup>⑩</sup>

《盎格鲁索逊人种之教育并中国今日教育之方针》、《教育学》和《铁血主义之教育》等论文一致强调了教育在实现民族主义建国中所占地位的重要性，指出：“教育者，保国之物也”。<sup>⑪</sup>若不忍中国沦亡于激烈的民族竞争之中，“舍教育为下手点，其谁与归？”他们的根据是：“国之所与立者，国民也。造国民者，教育也。”他们说，中国自古以来有句名言：“民为邦本”。“今之所谓本也者，对于外而言也。本而能优也则存，本而劣也则亡。”“夫民族竞争之世界，其本优则兴，本劣则亡。”<sup>⑫</sup>现在这个“本”的状况又是怎样呢？用他们的话来说，是“精神上常有朝不保夕、颓然自丧自悲之一种苦痛在”，<sup>⑬</sup>“坐井观天而不自知其愚”，“守旧”而“不知进取”，“保守而不知之”。<sup>⑭</sup>他们认为，这种由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最可痛可畏之现象”，<sup>⑮</sup>若不迅速改变，“举全国之民而悉教之”，<sup>⑯</sup>“去其旧染”，“则中国终万劫不复长此沦胥者也”。<sup>⑰</sup>为此他们建议多派“青年子弟出洋留学”，<sup>⑱</sup>在中国“普施教育”，<sup>⑲</sup>“使之爱种爱国”，“抖擞精神”，“为新中国立根基”<sup>⑳</sup>。

《浙江潮》在阐明民族主义建国的同时，也抨击了封建专制统治。如果说这本刊物在前几期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攻击还较为温和的话，随着1903年4月发生的拒俄、拒法运动的不断深入，从第4期起，它的矛头就直接指向清政府了。1903年，为了反对俄国拒不从中国撤军，法国强占广西的铁路、矿山权，东京中国留日学生在留学生会馆召开全体会议，学生们纷纷上台演讲，说者声

色惨裂，听者凄然泪下。会后，学生们组织了拒俄义勇队，旋即改名为军国民会，参加者 300 余人，日日操练，准备开赴抗俄前线。学生们还写信给清朝统治当局，反对将广西的铁路、矿山权让给法国。拒俄、拒法运动发生后，清朝政府又于 1903 年 6 月下令逮捕参加运动的爱国学生。血的事实教育了他们，使广大留学生进一步认识到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中国于危亡，重建民族地位，就必须首先反对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这样《浙江潮》的救亡主张就和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的言论相一致了，这表明它的革命倾向已很鲜明。

《浙江潮》是一个革命刊物，这不仅表现在它反对外来侵略和清朝统治方面，而且在它发表的一些学术和文学作品中也表现出了进步的思想观念。

在《浙江潮》的学术栏里，包括了哲理、教育、历史、传记等，这里发表了很多哲学论文，如《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续无鬼论》、《哲学纲领》、《斯宾塞快乐派伦理学说》等。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陈晃在 1、2、3 期连载的《续无鬼论》一文。陈晃在论证了宗教迷信的起源后，认为鬼神是不存在的，“谚云疑心生暗鬼，暗鬼生疑心。今之所谓鬼神者，扶其弊实不过疑心暗鬼之因依。”“观民族国家兴亡之故，知其与鬼神祸福之说，大有关系”，“信鬼神则危亡”<sup>②</sup>，并对偶像、魂魄、符咒、方位等迷信说法一一进行了分析批判，强调全国同胞必须抛弃鬼神迷信观念，奋发有为，起而救亡。

《浙江潮》还刊载了一些文艺作品，有描写美国南北战争的《少年军》，描写俄国专制统治的《专制虎》，描写法国大革命中女英雄的《血痕花》。这些作品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反对专制，主张自由，宣传民族主义和爱国思想。如《血痕花》叙述了法国革命的史实，从 1789 年攻破巴士底狱起，到 1793 年杀路易十四止。作者在第一回借女英雄的出场发了一大段议论，指出：我同胞女子

要晓得男女平权，不受人压制，第一要把家族上的压制打破，第二要把社会上的压制打破，第三要把国家的压制打破。这就需要做一些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中国的专制政府不但对内倒行逆施，实行种种虐政，而且为保一己之安乐，牺牲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你看东割一地，西让一城，朝送一路，暮奉一矿，竟是把我们的生命财产当作邀请外人残虐我们的聘金、酬劳外人杀害我们的礼物。”所以，要爱国救国，就必须效法法国革命，将这专制政府打破。作者还批驳了那种认为今天若讲革命，各国必来干预，恐怕革命没有成功，倒把自己的国送掉了的错误观点。他认为，现在我们多数人仍旧服从这少数的政府，所以外人利用这政府来压迫我们；要是我们果真一心一意不承认这“病国殃民的政府”，那时谅外人也断不会帮了少数的政府来与我们多数的国民为敌。作者还批驳反对暴动、主张和平“劝化政府”的观点，指出我们的同胞若想做一个完全的国民，就不能赞成“和平立宪”，而应当自主自立，用革命暴动去破坏这专制政体。“你看各国的革命，要不是……把这铜墙铁壁的专制政体打破，后来的人，又哪里有这和平幸福享受呀。”<sup>④</sup>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曾用笔名自树、索子、庚辰等在该刊发表了五篇译作，其中《斯巴达之魂》是鲁迅以斯巴达的故事来激励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用以反抗外来侵略。

《浙江潮》是一个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刊物，在1903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对立中，《浙江潮》明显地倾向于革命派一方。它的反侵略、反清思想和要求建立民族主义国家的主张在新学界、学生中广为流传<sup>⑤</sup>，这无疑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为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和1905至1907年彻底摧毁改良派的思想作出了的贡献。由于《浙江潮》的革命性，它曾于1904年4月被清政府列为查禁书刊。<sup>⑥</sup>

但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浙江潮》也不

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弱点，如错误地看轻人民群众的力量，过分地夸大自己的作用；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足以及主张建立大汉族帝国等。

## 二、结识梁启超、蔡锷

蒋百里在东京还结识了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光辉一页的护国英雄蔡锷。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光绪八年（1882年12月8日）出生于湖南宝庆县亲睦乡的一个农民家庭。蔡家世代为农，家境贫寒。蔡锷自小勤奋刻苦，聪颖好学，13岁中秀才，16岁由家乡徒步数百里到长沙，考入著名的湖南时务学堂。这是一所由维新派梁启超创办并担任讲学、专门培养维新变法人才的新式学堂。由于蔡锷刻苦学习，成绩很好，深得梁启超的喜爱。在这种维新氛围的熏陶下，他萌发了革新政治的思想，确立了变法救国、改良图强的志向，并与梁启超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维新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被迫解散，蔡锷在老师梁启超的帮助下东渡日本求学，并加入唐才常保国保种的“自立会”。其时在我国北方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吸引了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注意力，南方空虚，蔡锷与唐才常等人于是趁机回国发动反清起义，但起义因消息泄露而失败，唐才常等多人牺牲，蔡锷因被唐才常派往湖南联络，幸免于难，后再赴日本求学。

经自立军起义事变，蔡锷又一次目睹山河破碎、国势危亡的景况，便下决心投笔从戎，闯出一条救国救民的新路来。在恩师梁启超的帮助下，他自费进入东京陆军成城学校学习。在这里蒋百里与蔡锷不期而遇。他们俩有许多共同点，同龄、出身清贫又都中过秀才，投笔从戎的动机也相同。蔡锷在长沙时务学堂得名

师梁启超的器重，和蒋百里在杭州求事书院受林、方、陈三位的器重是一样的；蔡锷所说的“要革命笔杆不如枪杆”的见解和蒋百里的国防思想也如出一辙。以至于后来蔡锷受知于云贵总督李经义，与蒋百里受知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都成为新军干部人才也基本相同。如此多的共同点，使他们俩很快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在成城学校的留日学生中，蒋百里、蔡锷都属于年龄较小的，都不过19岁，但他们的思想格外活跃，社会活动面相当广泛。1901年，蔡锷与旅日湖南同乡成立了校友会，创办了“湖南编译社”、“游学编译社”等组织，以改良政治、建设新国家为宗旨。校友会时常组织湖南同学集会，议论国事，抒发抱负。作为好朋友，蒋百里也常常参加他们的活动。无疑，蒋百里深受蔡锷的影响，他于两年后也组织成立了“浙江同乡会”，并创办了著名的革命刊物《浙江潮》。

当时的东京，早已成为中国各种政治思潮展演的大舞台。留日的中国学生中，政治上的主张基本分为三派：一派是主张先推翻清王朝，再进行国家建设的激进革命派；一派是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根本是因为教育落后，主张先教育国民，提高民族文化的教育救国派；第三派主张军事救国，必须先掌握实权，然后再寻求救国之道。蒋百里初期和蔡锷的思想一样，都属于第三派，但随后不久，他的思想就更趋向激进革命派，这一点在《浙江潮》中表现得尤为充分。

在蔡锷的介绍下，蒋百里结识了维新名士、“笔端常带魅力”的梁启超。在以后的岁月里梁启超与百里保持着师友关系，而百里则终身敬之如师长，直至1929年梁启超逝世。1902年，蒋百里、蔡锷等毕业于成城学校。按日本陆军省规定，凡陆军预科学校毕业生必须入兵营实习半年到一年后，方可报考士官学校。蔡锷于这一年8月到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当了一名入伍生。而蒋百里

从成城学校毕业后，就遇到相当棘手的问题。因为，当时日本士官学校，限制甚严，必须政府保送始可，自费生是不准随便进入的。蒋百里一时陷入苦恼之中。

这道难关还是梁启超费了很大气力才代他打通的。梁启超其时结识蒋百里不久，交往尚不深厚。正巧蒋百里的同乡好友蒋尊簋的父亲观云先生在日本，他交游颇广，在当时的东京名气很大。他颇为欣赏蒋百里，听说蒋百里求学之路遇到坎坷，便带着百里及尊簋拜见梁启超，请梁公设法介绍，使他们能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梁启超颇费周折地找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福冈，再通过校长大隈与该校通融，使蒋百里得以顺利地进入士官学校。百里对此感激不尽，也对梁启超的感情更加深厚了。<sup>④</sup>

### 三、“中国三杰”

蒋百里在日本求学期间，也不忘写作，常向《译学汇编》投稿，并将稿费用来买书。《译学汇编》是各省留日学生组织的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目的的刊物，也是励志会的机关刊物。在他们看来，只有取法泰西，仿行日本，中国才能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解救出来。因此他们用很大力量翻译和编译了欧美日本许多名人的著述，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公理》，英国斯宾塞的《政治哲学》等。因而《译书汇编》成为较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学的新学刊物之一，在新思想启蒙运动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蒋百里此时的正义、直言也在留日学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留日学生有这样一个惯例，一年一度要召开一次全体大会。1902 年终举行大会时，任大会干事的是以后五四运动时期的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他们在向大会报告一年的会务经过时，座中

有人质问：“卖国公使蔡和甫（名钧）驱逐吴敬恒（稚晖）回国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接下来有人大呼：“曹汝霖是留学界的奸细！曹汝霖面不改色镇静自若地为自己辩护，他的口才颇精，经他一解释，很多人已相信他不是蔡公时的“第五纵队”。在改选干事时，大家还是准备让曹汝霖、章宗祥继任干事，只有一人力阻会员投曹汝霖、章宗祥的票，他就是蒋百里。他那终身未变的破石口音和坚定有力的话语在每个留学生的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帝国主义列强在订立《辛丑条约》中，暂时表现了它们为侵略中国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一致性，但这种一致性很快就为互相倾轧和冲突所代替。《辛丑条约》订立后四年发生的日俄战争（1904—1905）就是例证。这次战争是日俄两国争夺在中国东北地区权利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揭露沙皇政府：“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呢？为了我们掠夺成性的沙皇政府从中国夺来的满洲”<sup>⑤</sup>。对沙俄武装占领东北，腐败的清政府采取的是逆来顺受的态度，只是依靠其他列强的反对来和俄国协商，希望它逐步撤兵。其中有些官员主张联合日本，对俄作战，但清政府既没有对外作战的力量和决心，而日本又不愿意中国参战，因此日本政府就以“清朝财政现状，到底不许与外国战争；不宁惟是，倘中国人民于战争中，对一般外国人开始排外运动，殊有遗祸日本之虞”为借口，劝告清廷，在东三省以外地区严守中立，并以全力维持国内安宁。就是说，要清朝政府让出东北做战场，坐视日俄在中国境内厮杀。1904年2月，日俄战争开始后清朝政府果然宣布把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严守中立，连抗议都不敢提。

由于日俄战争的爆发，日本士官生提前入伍，因而该校停办一年。针对日俄的侵略暴行和清政府的软弱态度，中国留学生几次开大会商讨应付办法，蒋百里与汪精卫、胡汉民以干事身份做大会的主持人。会议推选汤尔和、钮永建为回国代表，向袁世凯请愿不要将东北做为外国人的战场。这是留学生为了维护国家主

权而打响的第一炮，也是学生爱国运动的先声。

滑稽的是，清政府一听说留学生的名字，就把他们当做红眉绿眼的革命党，把学生的请愿当做闹风潮，而这时候被留学生寄予厚望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正在施展奸诈投机之术谋取个人的权势，并不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上。因而，从东京回国请愿的学生只能无功而返。出人意料的是，请愿的失败使得许多原不准备革命的留学生不得不下决心参加革命，于是迅速造就出许多革命派来，这是值得一提的。

士官学校早期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是从士兵中挑选出来的，其中比较知名的，第一期有哈汉章，第二期有蒋雁行、王廷祯等。蒋雁行和蒋百里后来都曾做过吴佩孚的参谋长，蒋雁行虽然是一介老军务，但他的军事学识不太深，因为他做过吴佩孚的老师，所以做学生的吴佩孚还是很支持他，曾经推荐他担任过陆军总长，比起蒋百里来，蒋雁行的运气要好得多了。直到第三期才有大批的文人学生参加，著名的除蒋百里与蔡锷之外，还有李烈钧和后来任民盟主席的张澜等，第三期的日本学生也涌现出了几个后来叱咤风云的人物，如荒木桢夫、小矶国昭等。蒋百里入学那年是甲辰年，即光绪三十年（1904年），也就是日俄战争结束后士官学校重开之年。

蒋百里来到士官学校后，很注意锻炼身体。一天他的老友钱均甫先生（他是1902年留学日本专攻教育学）来访，远远地钱先生就看到有一个体貌清癯的年轻人正在操场上的一个铁杠子上翻筋斗，当他走近一看，才知道原来是蒋百里正在专心致志地练习器械兵操呢。蒋百里很自负地向他说：“我每晨锻炼体格，你看我不是比以前的身体结实多了吗？”<sup>③</sup>蒋百里虽是步兵科学生，但对骑术也颇有研究，在士官学校有“喜骑者”之名。他对骑术还有一番独到的见解，他说：“要做到马上无人，跨下无马，人与马浑然一体，才可以与言骑。”<sup>④</sup>他还颇有感触地谈到步兵与骑兵苦乐

的不同时说：“我们步兵以行军时为最苦，除攀山越岭之外，身上还系着粮袋、水瓶和弹药，但到了站头，我们就苦尽甘来了。反之骑兵行军时最乐，到站后还得伺候马，替它擦汗，喂它草料，是他们最苦的时候”。

1905年，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士官学校毕业。在日本人看来，这可是了不得的事，因为按惯例，日本天皇要向历届士官学校第一名赐刀，日本人向来以能得到天皇的赐刀引以为殊荣。如今这一殊荣居然被一个名叫蒋百里的中国人得到，日本学生无不认为这是奇耻大辱。由于这一次的教训，士官学校从第四期起，若干课程中日两国学生分开来授课，以便阻止中国学生再夺锦标。

百里毕业的那一天，他的老师陈仲恕也在东京参加了毕业典礼。陈先生年长百里八岁，在国内也已有办学十年的经验，但他这次是以学生的身份来日本读书的，他就读于日本的法政大学，一年多以后回国了。百里毕业后以少尉资格回联队服务，后又曾入经理学校（就像现在的后勤学院）实习，与宁调元、张孝准同居一处。

由于在学习成绩上出类拔萃，蒋百里、蔡锷和张孝准在日本有“中国三杰”的美称。蔡锷与张孝准同为湖南人，前者对建立共和有再造之功，他虽不幸在34岁时病故，然已名垂青史了；后者则用非所长，曾一度出任湘省政要，中年因脑溢血突发而逝世。蒋百里和蒋尊簋还被章太炎赞誉为“浙江二蒋，倾国倾城”。蒋百里与蒋尊簋同为浙江人，一习步兵，一习骑兵，人们都把他们两位看成是难兄难弟，事实上他俩同姓不同宗。

士官学校从第四期起，前来投考的中国学生更多，仅百里原来读书的求是书院的同学就有十多个。过去百里上学是靠别人的帮助才得以如愿的，现在他也想帮助陷入困境的留学生，为中国建军输入干部人才打开道路。于是百里与投考的学生商量，办了

一所临时的士官预备班，蒋百里自任老师。预备班设在士官学校对面的一个名叫小田园的日本老妇人家里。在此，百里租赁了老妇人的一间房屋，每逢星期日租用半天，茶水由房东供应，租房子的费用则由听课的学生分摊。百里很守时，按时到堂给学生上课，讲解“入学须知”和日本的军事情况，内容包括日军的编制、动员法、军人精神教育，排、连、营、团长选任与升迁。他的讲义资料一来源于他平时所学习的课本，二来源于他在日本军队中见习的经验。他的口才极佳，深受学生的喜爱，任何枯燥的材料，他都能够讲得生动活泼，紧紧地抓住听众的心灵，这功夫一直到老年都是一样的。到他私设的士官预备班听课的还有一位特殊的学生，他就是蒋百里的老友钱均甫先生。有趣的是，钱先生来上课的目的不在于学军事，而是为了欣赏蒋百里的口才。

#### 注释：

①《光绪朝东华录》（五），总 5676 页。

②《清朝续文献通考》“学校”十、十一，第 8619 页。

③据广告还有第 11、12 期合刊，但只见目录，未见此合刊。

④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 13 页。

⑤⑥《国魂篇》，载《浙江潮》第 1 期，第 5~6、14 页。

⑦飞生：《俄人之东亚新政策》，载《浙江潮》第 1 期，第 86~87 页。

⑧蒋百里：《民族主义论》，载《浙江潮》第 2 期，第 17~18 页。

⑨飞生：《国魂篇》，载《浙江潮》第 3 期，第 20 页。

⑩霖苍：《铁血主义之教育》，载《浙江潮》第 10 期，第 67 页。

⑪⑫⑬不难子：《教育学》，载《浙江潮》第 2 期，第 49~50 页。

⑭⑮⑯毅居：《盎格鲁索逊人种之教育并中国今日教育之方针》，载《浙江潮》第 4 期，第 42 页。

⑰《国魂篇》，载《浙江潮》第 1 期，第 12、16 页。

⑱《敬上乡先生请令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载《浙江潮》第 7 期，第 2 页。

- ⑮ 不难子：《教育学》，载《浙江潮》第6期，第16页。
- ⑯ 陈晃：《续无鬼论》，载《浙江潮》第1期，第56、57页。
- ⑰ 蕊卿：《血痕花》，载《浙江潮》第4期，第147~155页。
- ⑱⑲ 章开源：《辛亥革命史》上册，第243、433页。
- ⑳ 李永久：《记兵学大师蒋百里》，载台湾《艺文志》第151期。
- ㉑ 列宁《五一节》，载《列宁全集》第8卷，第319页。
- ㉒⑳ 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16页。

## 第三章 初入宦海

### 一、二十五岁的总参议

1906年，蒋百里回到故里，拜见了阔别六年的白发老母。他以士官学校第一名的身份归来，身着笔挺的军服，腰悬日本天皇所赠的佩刀，马靴锃亮，英姿勃勃。碛石镇上从没有出过如此人物，左邻右舍纷纷前来探望，啧啧赞叹不已。

辉煌只有短短几天，碛石镇很快就平静下来，蒋百里开始考虑今后的去向。一道出国的留日士官生都被各路诸侯迎去，好友蔡锷在广西出任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在日本与他们并称“中国三杰”的张孝准去了东北。浙江抚台有意聘请蒋百里教练浙江军队并委以第二标统一职，蒋百里婉言谢绝，推荐了朋友蒋尊簋出任此职。

蒋百里的恩师陈仲恕一直在关注着他，此时陈仲恕在东北出任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幕僚。经陈仲恕介绍，蒋百里再次辞别母亲，辗转来到东北。赵尔巽非常器重蒋百里，委任他为东三省督练公所总参议。

腐败的清政府经过义和团运动的打击后，已经无法照老样子继续下去了。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清政府于1901年宣布“变法自强”，从1902年开始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废科举、改学堂等。

军队是维护统治的支柱，清政府最重视的就是练兵，鉴于绿营防勇腐败不堪，朝廷下令各省裁汰旧军，在原有各营中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一律操习新式枪炮。同时还通令各省设武备学堂，培养将才。到1903年，清政府又鉴于当时军队的领导不统一、装备不齐整，平时缺乏集中训练、战时不能有效指挥等诸多问题，决定在北京设立练兵处，要求“各省督抚认真讲求训练，以期画一”，并“于京师特设总汇之处，随时考查督练，以期整齐。”<sup>①</sup>此时以镇压义和团有功而攀升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把持了清政府的练兵处，准备统一全国新军的编制番号、制定章则法令，以集中统一军权。各省练兵事务，归各省督练公所主管，一般由督抚或将军督统。第二年，清政府提出在全国扩编新军36镇的整编计划，逐步扩充新军，最后以新军代替旧军。新军的编练工作由于饷需不济，大多数省份没有按照预定的期限（2—5年）练成。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时，全国建制完备的新军只有16镇，其余只有一协或者不满一协。

当时的东三省早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权夺利的斗鸡场，可作为身处国防第一线的赵尔巽手中的军队却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货色都有。1905年，袁世凯借清政府的整编计划拼凑了北洋军六镇，经过训练倒有了一些模样。为了炫耀武力，他于1905年9月在直隶河间搞了一次秋季会操，广邀各省200多人前来观操。北洋军计有40000余人、马5000匹、车1500辆参加了演习，时间持续两天之久，场面壮观。在演习后，袁世凯宴请中外观操人员，他自吹一通云：“仿列邦之成规，创中国所未有”，“风声所树，耸动环球”。<sup>②</sup>

河间观操给包括赵尔巽在内的各省掌权者震动不小。为了整编东北军，增强实力，赵尔巽经过一番酝酿后设立了两个军事机关：一个是负责训练新军的督练公所，一个是负责整顿地方旧军的巡防营务处。年方25岁的蒋百里出任了督练公所的总参议，巡

防营务处的总办则由绿林出身的张锡奎出任。张锡奎将东三省各路旧军编成了八路巡防队，提升同样是绿林就抚的张作霖出任前路统领。后来率“辫军”闯入北京大搞复辟闹剧的“辫帅”张勋此时也调到奉天任奉军辽北统领一职，而张勋此前一直在北京充任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扈从。面对这样一群派系纷争、如同散沙一般的旧军，蒋百里真是无从下手。况且，淘汰旧军、建立新式军队本身就是向他们实施开膛破肚的手术，蒋百里处处受到张作霖、张勋等人的梗阻，日子稍长，竟然被他们视为仇敌。因此，蒋百里视事三个月，竟一事无成，且不说大施拳脚，连比划一下都没有就遭到冷眼。包括宁调元、张孝准在内的从日本归来的士官生在东北都没有得到好的境遇。

还是陈仲恕先生看得明白，他深知张作霖、张勋等人奸险凶顽，25岁的蒋百里还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悄悄地劝蒋百里：奉军各派相互争斗，新旧体制水火不容，蒋百里若长留在东北将不会有任何作为，不如趁年轻到德国去深造，或许前程会更远大。蒋百里听从了老师的劝告，以在日本所学为初级军事、不适应国防为由，请求赵尔巽派他到德国去留学。

赵尔巽正为整编军队成效不大、手下各部矛盾日益激增而犯愁，蒋百里有意辞职，他也就顺水推舟了。他同意派蒋百里、张孝准、宁调元等赴德国学习军事，不过得等到朝廷秋季在河南漳德举行的南北新军演习结束后才能动身。

漳德会操也由袁世凯一手把持，参加演习的北军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第三镇统制段祺瑞部，南军是驻防湖北的第八镇统制张彪部，两军对垒，演习一个星期。清政府派袁世凯、铁良任阅兵大臣，还设立了中央、北军、南军审判官，以各省来观操的代表一律为审判官。

漳德会操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军界精英的一次大聚会，蒋百里和他的好友蔡锷及许多留日同学会面了。四川来的李华英（字小

川)毕业于四川武备学校,当时年仅18岁,是个才华横溢的少年,他深得北军审判官良弼的赏识,良弼特委任他为此次会操间的随员。在清人之中,良弼是个思想较为开放,并且对世界形势了解相当清楚的官员。他和蒋百里关系甚为密切,此前,他曾派李华英到日本考察军事,并指名道姓地让李华英到东京找蒋百里求教,可惜当时蒋百里已经回国而未得相见。这次观操,两人终于有了机会会面,良弼特将李华英赴日一事告知蒋百里。

蒋百里后来与李华英作了一次彻夜长谈,颇为投机。他也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聪颖的小伙子。在随后留学德国的旅途中,蒋百里曾给李华英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阁下以明敏之姿,又复富于研究,务望扩其眼界而坚其志向……到东(指日本,蒋百里是转道日本赴德国)后,公如有志再往西留学,尽以书来,一切事当为君任之。”<sup>③</sup>在以后的岁月里,李华英一直视蒋百里为师,他曾跟随蒋百里在东北工作过,又听从蒋百里的安排到黄兴身边工作,也曾追随蔡锷出任四川军署副官长。当蒋百里逝世后,民国报人陶菊隐先生为撰写《蒋百里先生传》时专访过李华英,他写道“李现在也是幡然一老了,言念及此,还忍不住泪乘于睫呢。……百里也不过长他七八岁的青年,其留心国事关心人才的精神,不但受其知的人为之感泣,我想看这段故事的人也当为之感泣吧。”<sup>④</sup>

漳德秋操一结束,蒋百里即买舟东渡,经日本去了德国。25岁的他卸下了督练公所总参议一职,这也是蒋百里首入宦海,首度受挫。

## 二、东方将星

1907年,蒋百里转道来到德国,在德军第七军担任见习连长。

刚入德军，德国人谁也瞧不起这个来自东方弱国的文弱书生。倒是有个德军军官慧眼识才，他一见双腿略显罗圈的蒋百里走路的姿态就断定蒋百里是个马背上的高手。众人皆不相信这位军官的断言，有个士兵当即牵来一匹烈马，众人料定有笑话可看了。蒋百里面对身高体壮的德国人鄙视的目光，当即接过缰绳，信心十足地翻身上马。马儿一路狂奔回来，蒋百里面不改色气不喘，不由得让众德国官兵大惊失色，敬佩之情油然而升。他们哪里知道，蒋百里在留学日本的时候就以善骑而被人送以“喜骑者”的美称。

由于蒋百里是赵尔巽保送的，费用定期汇至，他不愁吃穿，只是如饥似渴地一头扎进学习之中。除军事知识外，他所购买文学方面的书比军事方面的书更多，有《歌德集》、德文本《莎士比亚全集》、《席勒集》、但丁《神曲》等。<sup>⑤</sup>他还喜欢旅游，利用空闲时间游遍了欧洲，特别是意大利这一冲破中世纪的黑暗、掀起了改变欧洲历史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文明古国，更是让蒋百里流连忘返。孜孜不倦的学习和知识的广泛涉猎，使蒋百里积累了渊博的学识，他以文武兼备、才华横溢及风度翩翩很快就赢得了德国人的尊敬。

德军第七军的最高统帅是举世闻名的兴登堡元帅，蒋百里所在的德军驻防在柏林近郊。在一次重大演习中，由于蒋百里杰出的指挥才能，引起了兴登堡元帅对这个东方人的注目。演习结束后，兴登堡元帅特地召见了蒋百里。经过一番深谈，兴登堡对蒋百里大为赏识，他说：“拿破仑生前曾经说过，东方文化悠久，虽然目前军事孱弱，将来会产生一位伟大的将星，看来此话会应在你的身上。”<sup>⑥</sup>此番褒扬一经传出，蒋百里顿时声名大噪，成了社交界的名人。以至1935年蒋百里奉命访欧考察、重游德国时，他早年的德文教师阿斯特夫人还对他的两个女儿说：“你们的父亲年轻时是顶漂亮的，会跳舞，参加跳舞竞赛会，以华尔兹舞得第一名奖。德国名媛都很注意这个年轻漂亮的中国军官。”<sup>⑦</sup>

蒋百里在柏林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与德国军事家老将军伯

庐麦的侄子交往最密，两人无话不谈。伯庐麦将军在普法战争时期就已扬名，他所著的《战略论》一书已流播全世界，蒋百里在日本留学时就拜读过该书的日译本，他对伯庐麦将军仰慕不已。1910年，通过伯庐麦将军的侄子介绍，蒋百里在柏林南郊的一栋别墅拜见了年已七旬的老将军伯庐麦。以后蒋百里回忆当时情景，历历在目，他说“入其室，绿荫满窗，群书纵横案壁间，时时露其璀璨之金光，而此皤皤老翁，据案作书，墨迹尤未干也”。伯庐麦将军亲切地接见了蒋百里，“以各种材料见示，并述《五十年战略战术变迁》之大纲，许余以照片一、《战略论》新版者一，及其翻译权。”长谈之后，蒋百里告辞欲退，将军以手抚其肩说：“好为之矣，愿子之诚有所贯彻也，拿破仑有言：‘百年后，东方将有兵略家出，以继承其古昔教训之原则，为欧人之大敌也’。子好为之矣！”<sup>⑧</sup>老将军一番诚恳的言辞使蒋百里受到巨大的鼓舞，为此，他后来特地撰写了《孙子新释》，以详细解释伯庐麦将军所说的“古昔教训”。

那时的德国在欧洲的政治、军事、经济舞台上都是唱主角的，唯有英国可与之抗衡，特别是英日作为同盟国，其海上势力不容小看。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到20世纪初，德国工业总产量已超过英法，但它所占据的殖民地与其他欧洲列强相比则少得多，因而后起的德国帝国主义决心从英法那里夺取更多的殖民地。也因此，在重新瓜分世界的争斗中，德国表现得特别疯狂。它最早扩军备战，加速发展军事工业和建立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很快便拥有了一支在数量上仅次于俄国而在质量上优于俄国的庞大的军队。在俾斯麦下台前（1890年），德国推行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巩固和扩大德国在欧洲大陆优势的“大陆政策”。随着德国经济和军事势力的急速膨胀和对外掠夺的需要，德国对外政策的重点逐渐转向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上来。

德皇威廉二世继位后，不再满足于“大陆政策”，提出了向全

世界扩张的新的“世界政策”——建立一个从北海、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从柏林到巴格达的“大德意志帝国”或“中欧帝国”。此外还要打垮英国在海上的垄断地位，并在非洲、太平洋和南美洲地区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德国的争霸野心使它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冲突，特别是和头号殖民帝国英国的矛盾迅速尖锐化，为了孤立英日同盟，德皇威廉二世有个设想：欧洲德国最强，亚洲中国最大，美洲美国最富，如果三者结为盟国，必定压倒英日同盟。为此他特地召见了清政府驻德大使孙宝琦，孙宝琦立刻把这个意图报告给了慈禧太后，没想到一直患有“恐英症”的慈禧太后竟冷冷地说：偌大的问题，怎没有英国加入呢？于是此事便告搁浅。

1909年，孙宝琦的继任、留德出身的荫昌（他也是蒋百里的老师之一）到了柏林，结盟之事再次提起。威廉二世与荫昌及前来考察德国陆军的载涛密谈了三刻钟。事后，荫昌把密谈的内容告诉了蒋百里。针对英国海军少将到日本作亲善访问一事，德国也决定派皇太子访问中国。作为德中美三国结盟的第一步，初定访问时间在1910年冬或1911年春，并请中方立即派特使赴美商定此事。荫昌将此迅速电奏朝廷，随即携蒋百里乘欧亚列车经西伯利亚返国，时为1910年。

就这样，蒋百里提前结束了三年的留德生涯。回到国内，清政府组成了专门班子准备迎接德国皇太子访华，并指定施肇基和蒋百里为文武官筹备接待工作。清政府还在北京新建了摄政王邸作为德皇太子的行馆，在杭州西湖畔修缮了杭州行宫。“那时候百里真够忙，行宫的电灯电话和一切设备都是他亲自来料理的。”<sup>⑧</sup>可惜的是当清朝赴美特使赶到美国的时候，已是星移斗换，一贯奉行扩张主义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已经下台，继任者塔夫脱总统对德中美三国联盟兴趣很冷淡。而对于德国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即，欧洲大陆风云变幻，德皇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欧洲，加

之中美两国对结盟一事久无回音，太子访华一事自然退居次要以至告吹，蒋百里白忙乎了一阵。

事过 60 年后，有人在研究此事时做了这样一番评论：“抚时感事，不无令人扼腕兴叹，……当年威廉二世的中美德三国联盟之计或可得售，而半世纪来之世界大势亦必为改观，甚至 191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否会发生，而发生后双方阵线究竟怎么结合，今天回想起来，实在都是很微妙的问题。”<sup>⑧</sup>事情或尽可推测，但历史毕竟已成为定局，不由后人再作演绎。察观当时的中国，满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已是岌岌可危，清政府在国际上几乎没什么地位可言，所以与中国结盟与否，在列强那里只是一时兴起或者只有在需要拿中国当做筹码之时方才会有人提起，事态发展的主动权全然不在中国人手上，换句话说就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根本没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所以我们今天静心论之，对当时的中美德联盟流产一事大可不必“扼腕兴叹”了！

### 三、再赴东北

袁世凯两次秋操，大肆炫耀北洋军阀集团的武力，立即招致了满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在中国真正指挥军队的不是朝廷，而是袁世凯。于是，军机大臣瞿鸿禨迎合满族亲贵的猜忌心理，建议朝廷将北洋新军的统帅权收归中央。1910 年九十月间，清政府合兵部、练兵处与太仆寺为一，设立了陆军部，负责全国练兵事宜，使“所有各省新军，均归该部统辖”。<sup>⑨</sup>这是清政府在中央机构的一次改革，同时也打击了袁世凯的权势。

随着那段外交游戏灰飞烟灭后，蒋百里就一直住在良弼家。在袁世凯移权后，良弼出任了禁卫军训练大臣，他数请蒋百里出任禁卫军的标统，但蒋百里力辞不就，他认为自己应该一步一个脚

印地干起来。在日本他当过排长，在德国他任过连长，因此目前最多只宜为管带（相当于营长）一阶。良弼被这个谦逊的年青人所感动，就依了他，但良弼事无巨细都咨询蒋百里。已在云南讲武学堂任总教官的李华英就是在此时经蒋百里推荐给良弼的，良弼召李华英进京供职于军学司，筹备永平秋操。

1911年，赵尔巽转任两湖、川督后又调回奉天任东三省总督，他立即奏调蒋百里回督练公所担任总参议原职。但此时蒋百里官阶只是管带，一下子擢升总督的左右手，显然不符合程序和仪制，但经朝廷合议，特派陆军留学生蒋百里以二品顶戴任用，这在当时是极其罕见的。听说长官要走，蒋百里所带的全营官兵全都舍不得他走，短短几个月，广大官兵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大家围住他叫着嚷着，要求他留下来。“结果还是良弼替他解围，用梯子从后楼把他偷接下，当天就离开北京。”<sup>②</sup>

清朝向来把东三省看作它的“发祥之地”，定为特别地区，禁止汉人自由移住，因此关内各地百姓只能偷偷违禁“闯关东”。但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无法保护“发祥之地”不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所践踏，致使觊觎东北已久的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在东北争斗得天昏地暗。日俄战争虽然最后以沙俄的失败而告终，但沙俄帝国主义从未放弃过“在满洲成立‘黄俄罗斯’的计划”<sup>③</sup>，日本则从沙俄手中夺得了大片的势力范围。到1907年7月，日俄又签订了一个划分两国在东北三省势力范围的协定，日本承认满洲北部、黑龙江全部和吉林省大部是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承认满洲南部、辽宁省全部和吉林省的一部分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从此，两个强盗开始合伙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打劫。在这种形势下，赵尔巽的东三省总督委实难当，尤其是他手下的军队更是让他头疼不已。由于他在军事上不是很在行，故而对蒋百里的建议言听计从。

蒋百里走马上任后，认真分析了东三省的防务形势，作为边

疆重地，国防首当其冲。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他知道的清清楚楚，他后来在写《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书中把日本人刻划得入木三分：“他得了朝鲜不够还想南满，得了南满不够，更想满蒙全部，更想中国北部……要以有限的能力来满足无限的欲望。”<sup>④</sup>俄国对蒋百里印象，除了从德国回国时在欧亚列车上经西伯利亚铁路隔窗观景所见外，蒋百里的确知道的不多，要把它当做国防的重点，就必须对其有一个深入全面的了解。有鉴于此，他请赵尔巽将在北京的李华英调到奉天，出任东三省军事参议，并准备随即派李华英赴俄国，以留学名义考察俄国国情，为制定东北对俄国的防务计划提供情报。

当时东北地区有新军和旧军两种武装势力。新军是1906年徐世昌担任首任东三省总督时由调去的一部分北洋军扩建而成，在吉林布置有一镇、黑龙江有一混成协、奉天有一镇和一混成协。旧军原有步兵八路共计四十个营，分由张作霖、冯德麟、吴俊升、马龙谭等担任统领。这些旧军多由马贼招安，割据一方，作奸犯科不断，火拼的事时有发生。在蒋百里看来，要建立强大的国防，必须像德国、日本那样建立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他十分注重官兵现代化军事思想和各种知识的学习，而对那些绿林招抚的旧军根本不予理睬，他认为这些皆属淘汰之列。平时与蒋百里结交较多的都是新军中的长官，如曾留学日本并在1903年担任拒俄义勇队队长的蓝天蔚，多年以来一直与革命党人保持密切联系后因“倒袁”而被刺杀的吴禄贞等。

如此一来，张作霖、冯德麟等人就对蒋百里恨之人骨了，这又使蒋百里的整顿军队的计划如前次一样，依旧难以施行。

## 四、辛亥风云

正当蒋百里与张作霖等人的矛盾日益加深而使他难有作为的时候，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了。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北挺进，各省响应武昌义军纷纷独立。消息传到东北，满汉各族人民兴奋异常，“人们预感到清王朝的末日已经到来，因而到处拒用清朝官办银行、银号发行的钞票。”<sup>⑥</sup>一时间，社会动荡不安。

实际上，东北三省的革命风云远不如大江南北那样来的猛烈。在1910年前后，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一直没有放松在东北宣传和发动革命。从1906年开始，宋教仁、吴昆、林伯渠、商震、宁武等人就一直在东北活动，但由于反动当局的迫害和革命党人工作上的缺陷，使得东北三省没有掀起革命浪潮。到1910年春，奉天的革命党人仅“有青年知识分子百余人，大部分在教育界和军政界”，吉、黑两省革命党人则很少。<sup>⑦</sup>从革命最为发达的湖北从事革命活动的李培基于1909年转至奉天后，感触更深，他发觉“北方的军队士兵与湖北军队士兵大有不同，识字的人不多，也不谈革命的事情，更谈不到帮会与同盟会的往来。”<sup>⑧</sup>尽管如此，经革命人士的艰苦努力，他们还是联合了一批有革命倾向的力量，“在辽东半岛的联庄会，有俄式步枪四千余支；在辽西绿林中有枪马近七百之数；在辽北有绿林以于春圃为首的近百人马。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三部新军约有三万余众。”<sup>⑨</sup>此外还有冯玉祥等以武学研究会为中心团结的一批官兵。但总体上由于东北三省的军队基础不同，成分复杂，很少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大多数人都对革命抱抵制和反对态度。

武昌起义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和有革命倾向的军人

们，冯玉祥等人“兴奋的坐立不安”，纷纷到各营鼓动，“乘机向官兵们宣传革命的道理”，并印发传单向各营和社会宣传南方省份胜利的消息。<sup>89</sup>革命党人百余人则分头秘密集议，决定乘此有利时机，“共谋起义，促动关外三省独立。”<sup>90</sup>革命浪潮开始汹涌，军中革命派和反动派剑拔弩张，形势十分紧张。蒋百里从心底里是倾向革命的，但偏居东北远离革命中心，各种消息纷乱传来，叫人莫衷一是，所以蒋百里没有表现出象早年在日本办《浙江潮》时那样的激情。但他悄悄对李华英：“革命早晚必成，你出国已成泡影，也无庸出关了，我看你还是南下参加革命为上策。”李华英听从了蒋百里的规劝，迅速南下参加了革命，在黄兴的陆军部供职。

做为东北三省总督赵尔巽是坚决抵制革命的，但时局的演变使他无所适从，或者宣布独立与清脱离关系，或者继续效忠清朝，镇压革命。就在他迟疑不决的时候，东北的形势已对他十分不利了。首先，革命党人计划“逼清督赵尔巽出走，然后举天蔚为关外都督，……宣布独立，则东三省革命可不血刃而成功。”<sup>91</sup>而以张作霖为首的旧军则趁新军大部分调往关里，手握兵权为所欲为了。赵尔巽与蒋百里一番长谈后，劝蒋百里趁早离开东北，若再晚了，恐怕难保不出问题，并送了一笔路费给蒋百里。

蒋百里此时也早生去意，他告知几个密友后，便悄然登上了南下的列车。

张作霖到底还是得到了蒋百里出走的消息，此时他正率领军警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大概在他的计划表中，蒋百里也是捕杀对象之一，因此他匆匆率兵赶到了火车站。关于张作霖追杀蒋百里这一史实，早已为学术界所证实，但各种细节记载最清楚的是下面这段内容：“张作霖带了二十名卫士赶到火车站，问车中的服务人员蒋百里到了未。他们都说未到。张作霖不信，从头到尾搜查一遍，果然车中没有蒋百里，便以为他不是搭这一班车，带齐兵马走了。其实蒋百里的的确确在车上，原来他一上车，忽然要大

便，叫服务员开了厕所的门让他进去。火车的规则未开车是不开厕所门的。但那个服务员见是蒋总参议，不敢违命，开门让他进去，又怕别人跟着会进去，索性下了锁。张作霖登车时，恰值那个服务员走开了，其他诸人不知蒋百里在厕所里，否则张作霖一定把他抓去枪毙的。”<sup>②</sup>

侥幸逃生的蒋百里径直南下到了上海，他原本想参加起义军的，但不知何人在何处散布出一个谬论，说蒋百里曾为满人良弼服务过，因而革命军不能用这样的人。这一谬论使得蒋百里在早已成为起义军的天下的上海颇难立足，以至于黄兴曾“特电沪军都督陈英士（其美），百里过沪时请予以维护。”<sup>③</sup>这大概是李华英在黄兴身边做了工作的缘故。

蒋百里到杭州时，早经他推荐入政坛的同学蒋尊簋刚任浙江都督，他便在都署谋了一个参谋长的职位。

#### 注释：

①《德宗实录》卷五二二。

②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稿》第5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11月第1版。

③⑩⑫李吾：《蒋百里先生的生平》（一），载《春秋》卷12，第2期，转引自台湾天一出版社《蒋百里传记资料》（一）。

④⑤⑦⑨⑲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22、24、23、27、23页。

⑥孙震：《怀蒋百里师》，载台湾《蒋百里全集》第六集，第276页。

⑧以上均见蒋百里：《孙子新释》，载黄萍荪编《蒋百里先生文选》第104页，福建，新阵地图书社，1944年1月4版。

⑪《光绪朝东华录》第5600页。

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1949年中文版，第75页。

⑭蒋百里：《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第36页。

⑮张开源、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第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

⑩⑪宁武：《东北辛亥革命简述》，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五），第541、543页。

⑫李培基：《同盟会与帮会的关系杂忆》，载《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84页。

⑬冯玉祥：《我的生活》（一），第110页。

⑭李培基：《辛亥关外革命始末纪》，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

⑮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篇，第962页。

⑯许金城：《民国野史》，台北，文海出版社。

## 第四章 奋起倒袁

### 一、保定军校校长

辛亥革命的烽火迅速燃遍全中国，到 1911 年底，清政府所统辖的 24 个省，已有 15 个省宣布独立，满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在即。1912 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了中华民国。民国的建立，标志着统治中国 260 多年的清王朝的灭亡和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结束。

武昌起义和南京临时政府都处在英美等帝国主义重点控制的地区，直接涉及到他们在华利益之所在，因而帝国主义各国一方面对孙中山的临时政府采取了不承认、不贷款的态度，甚至动用军舰到长江上进行武力威胁，另一方面积极扶植袁世凯作为他们新的代理人，以绞杀中国革命。在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夹攻下，孙中山为了彻底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全面实行共和，他向袁世凯妥协了：只要清帝退位，宣布共和，临时大总统可由袁世凯出任。

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在得到大总统的保证后，于 1912 年 2 月以优厚的待遇逼迫宣统皇帝退位，并立刻宣布拥护共和。几天后，袁世凯终于窃取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随后继续实施两面派手腕，于 4 月将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迁到了北京，彻底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

袁世凯窃取政权后，立刻着手编织他的网络。在他组阁的成员中，有两个人是愉快地踏上去北京的旅途的，这两人就是在东南的蒋百里和在西南的蔡锷。蔡锷此时被任命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总统府军事处参议，但是，袁世凯对蔡锷防范颇深，他曾向亲信曹汝霖说：“松坡这个人，有才干，但有阴谋。”“我早已防他，故调来京。”<sup>①</sup>对蒋百里他是加以利用的，在“他（袁世凯）心目中的军事新人物，……训练军事人才以百里为唯一的能手”。<sup>②</sup>袁世凯准备请蒋百里出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在民国早期的军事家中，蒋百里和蔡锷两人是非常单纯的，他们有着较为高深的军事理论造诣，有着强烈的兴军报国心，但却缺乏政治家的敏锐，甚至可以说是近乎天真。梁启超说蔡锷此时根本没有从拥袁的梦幻中清醒过来，还“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sup>③</sup>蒋百里本来准备应邀到云南去担任民政长的，但段祺瑞已得知袁世凯有启用蒋百里的意图，在蒋百里去向他辞行的时候，他向蒋百里谈起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因管理不善，难以维系，陆军部准备解散军校的消息，并假惺惺地以惋惜的口吻透露了袁世凯欲任用蒋百里的意图。他料定蒋百里不会放弃云南的肥缺，可没想到蒋百里不假思索的说：“这是建军基础，万万不可解散。总长如果要我当校长，我就不去云南也好。”<sup>④</sup>段祺瑞原准备任用自己一派的人到保定去的，没料到蒋百里就此应允下来，他只得尴尬地顺势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一职给了蒋百里。从此，蒋百里在段祺瑞心中种下了恶恨，他单纯的一面可见一斑。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于1912年10月20日正式开课。这所军官学校是从晚清到民国成立为止，仿效日本、德国的军事教育建立的第一所比较完善的军事学校。学校建在保定市城东北约两公里的原保定军官学堂旧址，校舍坐东朝西，长方形校园四面是青砖围墙，护墙壕环绕一圈，绿荫荫的杨柳倒映水面，颇显幽静。由

学校西大门进入校园，迎面就是四四方方的“尚武堂”，这是校长、教育长、校副官的办公室和住所。尚武堂东面是军校的大操场，操场中央有两棵参天古柏。在学校北边围墙外还有一个数千平方米的外操场，军校的马场就设在此处。操场的东头有一个检阅军队的演武厅，那时极为少见的无线电在这里显得格外突出，尤其是高高立于林子上空的天线杆。

首任校长赵理泰于10月5日到任，他是段祺瑞的亲信，到任前是北洋军的一名老军官。赵理泰“官僚习气很深，能力薄弱，又嗜吸鸦片”，“校内干部不强，教官中大多是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本身只受过一年半的军事教育，学术水平一般，还不及陆军中学毕业的学生。……而另有一部分醉生梦死的学生，则在校内赌博、喝酒，任意破坏学校纪律。学校当局听任胡闹，学风大坏。外界舆论颇多指责”。<sup>⑤</sup>举一个例子就可看出校风败坏的程度：当时保定府仿效北京有名的烟花巷八大胡同也开设了个“八条胡同”，胡同内娼妓云集，南方班子、北方班子都有。娼妓们的主要“朋友”是军校的学生、教官和职员。有个叫艳卿的妓女在军校中的“朋友”达百余人之多，“每逢节假日的夜晚，‘打茶围’的军校学生熙熙攘攘，出入于八条胡同，真是车如流水马如龙，仿佛要同北京八大胡同的花花世界比赛一番似的。象这样的腐朽生活，军校中各类学生都很少例外。”<sup>⑥</sup>

总之，在赵理泰执掌军校的几个月时间里，学校是炮队没有炮，马棚没有马，操场上的杂草深可没膝。学生终于忍耐不住不满现状的情绪，向陆军部请愿撤换校长。随即，军校学生又闹了一次“以希望受到最完善的军事教育为前提”的风潮，赵理泰不久就引咎辞职了。<sup>⑦</sup>

1912年12月15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发布命令，任命蒋百里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百里走马上任，接下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这个烂摊子，实际上，袁世凯对蒋百里也是戒备颇深，

“怀疑他与国民党有关系，从不授与军队。此次被任命为军官学校校长，便是出于袁世凯的这种心理。”蒋百里满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梦想以军事教育发扬尚武精神来拯救中国。为此，他“提出了练兵雪耻的条陈，主张改变以往小站练兵的老办法，实行改革，采用德国的军事教育方法，而不用日本的方法。”蒋百里的主张受到了以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为首的德国派的赞赏，袁世凯也对此十分满意，经他首肯，由统率办事处批准了蒋百里的方案。<sup>⑧</sup>

蒋百里到任第一天，给学生们的训话是简短而掷地有声的：“今世之谈陆军者，不曰德国，即曰日本。这两国我都到过。其军队我也深入考察过。他们的人并不是三头六臂；他们的办法，也没有什么玄妙出奇。不过他们能本着爱国精神，上下一心，不断的努力，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我相信我们的智慧能力，我更不相信我们的国家终于贫弱、我们的军队终不如人。我此次奉命来长本校，一定要使本校成为最完整的军校，使在学诸君成为最优秀的军官，将来治军，能训练出最精锐良好的军队。我必当献身于这一任务，实践我的话。万一不效，当自戕以谢天下。”<sup>⑨</sup>

蒋百里首先请来服装师为每个学生量体裁衣，从军帽到马靴均焕然一新，凡遇见学生帽子戴歪、钮扣未扣或皮带松垮，他都亲自予以纠正。他坚持每日巡视厨房，注意食物营养搭配，还仿德日两国的成规，定期举行师生大会餐，亲自与师生同桌共餐，以相互促进情感交流。他还对师资力量和人事方面也进行了相当大的调整：“将原有教官和队长中资历不足、学识浅薄、能力较差而不孚众望者，大部撤换，改聘德、日留学生和资历、学识较优的人继任。”<sup>⑩</sup>“学校编制和课程都仿照德、日，同时向陆军部建议充实学校设备，增拨军械、马匹等等。”<sup>⑪</sup>教育长毛继承精力不济，蒋百里出面将他与陆军部的参事张耀庭对调。如遇教官请假，蒋百里便亲自代课，他广征博引、口若悬河的讲解深深地吸引着同学

们，以至于学生们都希望教官请假校长代讲。每逢星期六下午，他必集合全体教官和学生举行讲演会，讲述古今中外军事名人的事迹，以提倡精神教育，提高军事品质修养。蒋百里还购来梁启超所著的《掌管之武士道》一书，亲自签名赠送每个学生一册，让他们学习历代军人忠于国家、忠于职守的嘉言懿行。总之，事无巨细，蒋百里无不躬亲。

骑兵科一马术教官整日吊儿郎当，工作极其不负责任，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学校的马匹死了近三分之一。蒋百里知道后大为恼火，并严厉地批评了这位教官，可这位教官不但不认错，反而公开向蒋百里行贿，送上银元500块，并散布说没有见钱不开眼的官儿。马术教官挑衅性的行为遭到了蒋百里愤怒的申斥，于是这位教官干脆不再到校，一连旷职两月不归，蒋百里立刻上报陆军部，请求将其治罪。步兵三连排长刘克厚原来是速成学堂毕业生，后留学日本振武学校，他虽然不是士官出身，但工作一向积极，踏实肯干。蒋百里对他颇为欣赏，并不因为刘克厚的学历不高而歧视。由于奖惩分明，蒋百里在学校的改革得到了广大师生的拥护和积极配合。

1912年的冬天静静地来到保定，一场大雪把华北大地装扮得分外素雅。由于心情格外好，蒋百里传令全校师生都到操场上来，看着众人迷惑的面容，蒋百里乐了，他抓起一捧雪，宣布全校学生分队打雪仗。顿时，欢声笑语在军校上空回响，经久不息。

蒋百里身体力行，学校风貌焕然一新，蒋百里受到了全校师生的一致爱戴。视事三个月后，蒋百里依次举办了野外、课堂、内务、人事管理等各种检阅，学校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了显著改观。为了把军校建成一流的学校，蒋百里还有一揽子计划，他的远大抱负可以说是刚刚开始。

但蒋百里的确太单纯，对宦海之深，人心之险太缺乏了解。民国初年，各派政治势力明争暗斗，仅在军界内就有北洋武备派、北

洋速成派、日本士官派、德国派等派系角逐。蒋百里的建校方针很快就遭到了北洋速成派的嫉恨和日本士官派的反对，这两派的力量正控制着北洋政府大权，他们攻击蒋百里的改革方案，对军校所提的要求一律不予理睬，而为首的就是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魏宗瀚，他出生于北洋速成武备学堂，是段祺瑞的心腹，军学司的一切行为都是秉承段祺瑞的旨意行事。

蒋百里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得罪了掌管陆军部的段祺瑞。“蒋对段原非有意识的反对，但因被撤换的人员中，多数是段的陆军速成学堂和北洋军旧部，段对保定军校本有操纵的野心，今见自己的私人势力被大部调走，心中十分不快。再加这批人被调走以后，纷纷向段陈诉，说蒋有拢德、日留学生排除国内毕业生的企图，段乃暗示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魏宗瀚，处处加以留难。”<sup>⑧</sup>于是，陆军部开始对军校一切冷淡下来，“对本校一切人事措施、教育方案，无不尽量敷衍。”<sup>⑨</sup>魏宗瀚则利用手中的职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千方百计破坏蒋百里的改革计划。有时陆军部已经批准的军需物质，魏宗瀚总是托词拖延不发，甚至急需的军械、马匹等，也叫蒋百里就近向驻防保定的陆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商借。

军学司的种种不义之举激起了军校正义职员的愤怒，他们集体上书陆军部，上告军学司种种不正常的情况。比如上面提到的那位死掉了军校近三分之一马匹、旷职达两个月之久的马术教官，军学司不但没有将其治罪，反而以此人很能干、有水平为由进行了嘉奖。又如深得蒋百里赏识的步兵三连排长刘克厚，军学司不管其工作业绩如何，以他没有人过士官为借口，直接将其撤职，并开除了军校。

尽管如此，蒋百里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深深地陷入袁世凯政府中党同伐异、新旧人物相忌相争的政治旋涡之中。他依旧以满腔热情努力工作，但终因内有速成系的消极抵抗，外有陆军部魏宗瀚等人的故意刁难，校事严重受阻。他无数次地催要经费、上

报改革方案，但这一切无人理睬，致使他的宏图大略渐成泡影。他为此曾电告北京辞职不干，但袁世凯没有批准。

1913年6月17日，蒋百里再次进京到陆军部交涉催款未果，他心境渺茫地回到保定。当晚，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彻夜未眠，一连喝下两瓶啤酒，写下了遗书。

第二天清早，他通知侍从传令全校集合。教官、学生近二千人集合到尚武堂前，恭听校长训话。只见蒋百里衣着整齐，腰悬佩刀，声音低沉地说：“我到本校曾经教训过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要我做的事，我同样也要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要责罚我自己。现在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不能尽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众人对校长一番自责皆觉意外。蒋百里接着说：“事情办不好应该辞职。但中国的事到处都是一样，这儿办不好，那儿也未必行得通。你们不许动，不要灰心，要鼓起精神来担当中华民国未来的大任！”<sup>④</sup>

蒋百里说完，用深情的目光向学生巡视一遍，说了一声：“立正不要动！”缓缓转身向办公室走去。随后就听得办公室内“啪”的一声，全体学生都惊住了，接着看见蒋校长从办公室踉跄着走出来，端端正正站在石阶上，目光直射学生，整个身躯靠双手拄着指挥刀才没有倒下，指挥刀都被压弯了。只见他的胸部军装被鲜血浸透了，脸色惨白。

站在前排的湖北籍学生刘文岛一声惊呼：“校长自杀了！”众人便连忙上前去搭救他们的校长，慌着一团。整个军校校园内“哭声一片，屋瓦震惊”。<sup>⑤</sup>

蒋百里的自杀，固然有其社会和政治原因，但从蒋百里个人的性格来分析，事情发生的必然性也可觅得点滴原委。曾在当时目睹校长自杀、后在国民党军界享有较高威望的万耀煌先生作文分析说：“大凡一位非常的人物，他的性格，必与普通一般人不同。

由于特异的性格，反射到生活上，表现在行为上，也往往不落恒蹊，放出一种不寻常的光彩。但这种光彩，就人生意义来说，则可能是悲剧性的。百里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人物，……以他的学养、才略、阅历，应该是世故很深，工于顺应。而他一生所如辄迁，甚至于予人以不易了解的印象。这原因，就在于他一任纯真，所以往往与现实格不相入。……那时候他才是二十九岁的青年，他的抱负，是出全力办好这个作育将才的学校，实现他建军建国的大愿。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人事背景，不容许他这样做。照常情况，他即问心无愧，至多是知难而退，辞职也就够了，但他基于一种对国家、对学校、对学生的责任感，使他决心采取殉职明志的举动。…自杀并不一定是值的效法的行为。但当民国初元，枭豪在位，风教未澄的时候，百里先生的自杀，确实是发于死以殉道的动机，也确实起了振启人心的作用……”<sup>⑧</sup>

勃朗宁清脆的枪声划破保定军校宁静的上空，也击碎了二千多名师生的心。

## 二、生命与爱情

在蒋校长的办公桌上，人们发现了他前夜写下的几封遗书。致军校教育长张承礼的信中称：“耀庭吾兄鉴之：仆于校事，不能尽责，今以身殉道。所有后事，处置如左：对于总长处，望即以告学之语告之。惟有一事不能不加入者，对于军事，非有一至善之目的不能达到，勿以彼善于此之言聊以自慰也。……家母处，望告以仆之死为殉职、殉国，善为劝解为祷。家中薄田数亩，老母寡妻，尚能度日。如能时常询问，聊慰高堂之寂寞也。……”另一封致教育官张翼鹏并转诸教官的信，内容称：“半年以来，诸君之惠我者至矣！仆实不德，今以身殉职，是别无他法也，欲以此

尊重职守之观念也。……”<sup>⑧</sup>

催人泪下的遗书迅速在校园内被师生们传诵，并且被军校通电向全国发表。大多数学生悲愤万分，如丧考妣。各科都推举代表，组成了军校代表团。代表团通电各省，指责魏宗瀚等人任用私人，破坏军事教育，准备上京请愿。

蒋百里自杀的枪声震惊朝野。蔡锷首先发难，质问北京政府，要求查明事由，追究责任；各省区都督或将领纷纷发来慰问电，鄂都黎元洪特派代表到保定慰问蒋校长和学生们，直督冯国璋派出了自己的军医前往保定；湖南名流熊希龄发出“此案如不得水落石出，誓不干休”呼喊。全国各大报纸纷纷发布消息，刊登各省谴责政府的电报。

事发那天晚上，蒋百里的老师陈仲恕（他当时是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得到消息后，连夜叫醒袁世凯，汇报了此事。袁世凯不愧为政治枭雄，他连连跺着脚说：“你快快打电话给交通总长曹汝霖，叫他快快到日本公使馆找日本好外科医生到保定，看看还有救否？”他同时下达两道命令：令保定军校教育长张耀庭暂代校长；令参谋总长荫昌组成调查组赴保定调查事实真相。陈仲恕心急火燎，迅速落实医生，不到一刻钟，由日本公使馆派出的医疗专家乘坐专车从前门外车站出发直奔保定。

第二天一早，陆军总长段祺瑞急匆匆赶到公府向袁世凯报告他的调查结果。他是来推卸责任的，他说：“据部中调查，蒋校长自戕另有原因，非关学校的事。”此时，保定军校方已发通电呼吁，学生们推举的以陈铭枢、刘文岛、龚浩等人为首的请愿团马上就要到北京，袁世凯还得应付全国各界的质询，心中正窝着火，他当着陈仲恕等人的面，没好气地对段祺瑞说：“你陆军部莫管这件事，你莫听你手下人的话。”<sup>⑨</sup>

日本公使馆派出的是军医平户和护士左藤梅子小姐。他们乘坐火车风驰电掣般地赶到保定车站，又被校长车接往军校。到了

军校后，平户和左藤梅子直奔校长室，看到蒋百里正躺在铁架床上，脸上煞白，殷红的血正从他的口中、鼻中向外流淌，染红了洁白的床单和毛毯，显然伤得不轻。这时候代理校长张耀庭声音低沉地告诉他们刚才已给蒋校长打了一针强心针，情况似乎还好。平户医生一把脉，知道不会有生命危险，他再解开蒋百里的衣服看伤口，发现前后有两口，子弹由两道肋骨呈波纹状穿出来，心脏小叶尖被擦伤，血流到腹腔，腹腔内积血很多。平户医生松了口气，庆幸地向张耀庭说：“这是一个奇迹，不幸中之大幸。子弹已穿出，手术是不必要的了；现在如抽出血水，恐影响心脏，不如留待自干。病人照目前诊断起来无危险，却也需要长期的休养，不让他再消极，精神的慰安比药物的治疗更重要”。确实，蒋百里是命大之人，当他在办公室举起勃郎宁手枪对准胸部射击时，恰巧军校的役工站在他的身旁。役工见蒋校长欲自戕，慌忙上去阻拦，就在一刹那，他碰动了蒋百里持枪的右手。这轻微的碰动，使枪口稍移，子弹偏离了心脏由肺叶中间穿过，蒋百里得以大难不死。

蒋百里无生命危险的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放了心，否则舆论对他会很不利。蒋百里的好朋友蔡锷、恩师陈仲恕也都长舒了一口气，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平户医生在蒋百里的枕头下面发现了很多安眠药，估计是蒋百里平日积攒下的。他担心蒋百里精神不稳定，说不定还会再生不测，他吩咐左藤梅子：蒋百里校长命不该绝，但他的情绪很不稳定，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卸掉他的精神负担，这点，你的责任比我的重。正好这时袁世凯传出话来，至少留一名医生在保定照顾蒋百里，平户医生就让左藤梅子小姐留了下来。

左藤梅子是日本北海道人，明治二十三年（1890年）出生，她有姊妹五人。日本素来重男轻女，女人生来就是侍候男人的，婚后就要辞去工作，回家相夫教子。左藤梅子是一个有志的日本女

青年，她不甘心就这样庸庸碌碌过一辈子，决心做一名对社会有贡献的职业女性，因此在她读完了十年基本教育后，没有走日本妇女结婚生子的老路，而是进入日本护士助生专门学校学习。在那里毕业后，她又到了日本帝国大学产科实习。五年后，她被派来中国，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服务。<sup>⑧</sup>她做梦也不会想到，一踏上中国这块土地，她的生活从此彻底改变，这儿最后成了她一辈子的家，她的青春、爱情之花在这里绽放、她的梦想在这里得以实现。经过几年系统的专业学习和训练，梅子小姐对消毒和手术助理都有很好的经验，因此当袁世凯命令请求日本大使馆派最好的医生和助手来保定时，梅子自然被选中了。

左藤梅子此时芳龄 22，尚未论嫁。北海道是日本著名的美人之乡，湿润的海洋气候和日本极富营养的饮食造就了梅子的可爱容貌。她不但长相艳若桃李，而且又有着日本女性所特有的优良传统美德：温柔体贴，有着一付极好的心肠。可谓集美丽温柔贤惠于一身。

在保定的两个星期，左藤小姐每天准时到军校来为蒋百里送药把脉，测量体温，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她还主动把饮食之类的生活也揽了过来，为蒋百里精心的调配饮食，饭菜丰富多样，十分可口。蒋百里很感激她，慢慢地他们有了交谈，左藤小姐虽然不会说中国话，但蒋百里曾留学日本，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因此在他们中间没有什么语言障碍，两人在一起完全用日语交谈，根本不需要借助翻译。左藤小姐以她善良仁慈的心劝蒋校长应该鼓起做人的勇气，重新振作起来，和恶劣的环境作斗争，只要意志坚强，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在病床上的蒋百里面对于左藤小姐的温柔体贴和为病人服务的热忱尽职，异常感动。左藤小姐也从与蒋校长的言谈间发现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军官，内心由衷钦佩。但日本女子也和中国的女子一样，感情深藏心底，不轻易外露。<sup>⑨</sup>

两个星期很快过去了，在梅子小姐的精心调理下，蒋百里的身体也奇迹般地复原了。精神上也完全摆脱了当初自杀的阴影，他的心境就象蓝蓝的天空一样，明朗敞亮，往日的消沉、沮丧一扫而尽，脸上有了笑容，话也多了起来。爱情也悄悄地走进了蒋百里的心田。

因日本天皇的弟媳分娩在即，日本公使馆电召学习产科专业的左藤小姐速回北京，在梅子小姐要回北京的前夕，百里先生向她倾诉了他心中的爱慕：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她的话，再不敢轻生自杀了，只是以后若遇有生死难关，哪里去找你这样的人，来陪伴来提携呢。左藤小姐听了这几句很含蓄的情话后，低头不语，但她的芳心早已被打动了。不过她并没有立即回应蒋百里的求爱，而是应召回了北京。

就在此时，政府对蒋百里自戕案的调查已有了初步结果，但由于陆军总长段祺瑞百般袒护魏宗瀚，将蒋百里和他的矛盾说成是“私嫌”。于是，经过一番貌似公允的调查之后，陆军部并没有处分魏宗瀚，仅仅是将其调离军学司而已。陆军部的挟私曲断，令蒋百里心灰意冷，待枪伤好转后，他也不想再呆在保定。9月，他通电袁世凯辞去了保定陆军学校校长的职务，随即赴天津疗养去了。

在天津疗养了三个月后，蒋百里被袁世凯任命为公府军事处参议，月薪300银元。因公府军事处处长是段祺瑞兼职，袁世凯怕蒋百里再受委屈，就让他继续养伤，暂时不必到公府办公。蒋百里回到北京，便时常去看望左藤小姐，左藤梅子也很喜欢这位心地善良又有才气的中国小伙子，不久双双坠入了爱河。但等到蒋百里正式向她求婚时，她却犹豫不决了。左藤小姐心想中日两国之间矛盾重重，她如果嫁给一个中国人，万一将来两国兵戎相见，她怎么办？于是她不由得退却了。为了躲避百里的追求，左藤小姐假托母亲生病，辞职回国在故乡做了一名助产士。谁知蒋

百里早在闲聊时暗中记住了左藤家的通信地址。于是，缠绵悱恻的情书一封封飞向日本。

蒋百里文才很好，日文的造诣又很深，因此他用日文写的情书，深深打动了左藤小姐的心。她终于鼓起勇气，向父母提出了嫁给蒋百里的要求，但遭到父母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日本不是没有好青年，何必一定要嫁给一个曾受过枪伤的中国人呢。左藤小姐出于孝心，复信回绝了蒋百里。

左藤的父母看见女儿心事重重，连忙托亲友给她介绍男朋友，可是梅子小姐始终不肯答应，看来她心里只有蒋百里而容不下其他人了。这时远在万里之遥的蒋百里一点也没灰心，情书越写越多，最后的一封信如同通谍一般，他在信里说：“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我决定马上到日本，要死就死在你家里。”<sup>④</sup>这几句将生命和爱情捆绑在一起的宣言，终于攻破了左藤小姐心灵上的最后一道防线，完全征服了远在东洋的的红颜淑女。左藤小姐读完这封信，泪水像决堤的河水一样喷涌而出。她向父母最后摊牌：“除了嫁给百里以外，别无选择。”

母亲被说服后，母女俩一起苦苦哀求父亲。开始他老是不说什么，但慢慢从他和善的眼光中看得出来，他已不反对女儿的选择了。最后他终于爱怜地对女儿说：“你结婚后如果受不了委屈，随时可以回国来，我将你应得的一份产业留下来给你享用。”

百里终于如愿以偿了。他托在东京的士官同学周赤忱护送左藤小姐回国，船在塘沽靠岸，百里早已春风满面地站在码头上来恭迎。接着他们在天津的德国饭店举行了婚礼，周赤忱做了他们的月下老人。蒋百里是个办事缜密、心细之人，左藤小姐的中西服装他早就准备妥当，不长不短正合身。

婚礼后他们返回北京，在这里，太夫人设宴款待了亲朋好友。婚后他们居住的是一所西式房屋，里面布置得很考究，也是蒋百里一手操办的。百里生平最喜爱梅花，因此他给爱妻起了一个漂

亮的中文名字左梅。他俩的这段爱情奇缘在民国史上被传为一段佳话。

### 三、讨袁内幕

在北京，除了公府的工作外，蒋百里与蔡锷、阎锡山、张绍曾等人发起成立了军事研究会，其宗旨是研究国防和军队建设，讨论军事教育和学术问题。蒋百里和蔡锷这对好友便时常在一起了。

自从到了袁世凯的军事处后，蒋百里鉴于中国军事理论动辄论以“曾胡治兵”，显得十分落后，很想写一本介绍基本军事常识的书，向大众普及军事知识，但一直不知从何入手。他把这一设想告诉了蔡锷。蔡锷向他讲述了西南地区的军政情况，并倾吐了自己对国家军队和国防的改革设想。蒋百里听后大受启发，立刻伏案振笔，对国家军事问题进行了一番系统的研究，著就《军事常识》一书。在书中，蒋百里详细论述了战争基础理论、武器与兵力的关系，以及兵役制度、军队编制、教育与训练、管理等基本军事问题，系统阐述了改革民国军队，加强国防建设的设想。这本书成为民国初年影响较深的军事理论著作，堪称是近代兵书中的一部杰作。<sup>②</sup>

在北京公府任职的这段日子是蒋百里早年春风得意之时，但这段美好时光并没持续多久就被袁世凯卖国求荣的倒行逆施行为所打断。

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做起了皇帝梦，并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复辟封建帝制的活动。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违临时参议院“先定宪法，后选总统”的规定，迫使国会先选总统，后定宪法。议员们在数千名便衣军警的逼迫下，忍饥挨饿，被迫投票三次，终于凑足了袁世凯当正式大总统的票数。这样，从临

时大总统到正式大总统，成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第一步。他当上正式大总统后，认为临时参议院不再有用，立即下令解散国民党、撤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开会。1914年1月，国会正式宣告解散。5月1日，袁世凯宣布废除《临时约法》，公布袁记《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集内外大权于一身。12月又抛出《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连任无限制，总统继任人也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样，从正式大总统到终身大总统，成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第二步。至此，袁世凯不仅成了终身大总统，而且还可以将大总统宝座传给子孙，中华民国已“名存实亡”。

从终身大总统到洪宪帝制，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第三步。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凯派使团到处与帝国主义国家秘密谈判定约，出卖国家主权。1915年1月，日本乘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独夫民贼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他复辟帝制的支持，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于5月9日几乎全部接受了日本旨在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

袁世凯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后，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他授意一批政客组织“筹安会”鼓吹帝制；怂恿心腹组织形形色色的恢复帝制的“请愿团”；指使爪牙于1915年10月25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进行团体投票，一致“拥戴”袁世凯为“中华帝国大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宣布1916年为“洪宪元年”，袁世凯准备于元旦登基。

袁世凯的卖国行径使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蔡锷和蒋百里开始从梦幻中清醒过来。这时，远在东京的孙中山和黄兴与张孝准等人秘密商定，派人回国策动蔡锷、蒋百里等发起讨袁革命。黄兴决定派在身边工作的曾拜蒋百里为师的李华英回国执行此项任务。

1915年8月，李华英持张孝准的密函回到北京，见到了蒋百

里告知来意。经蒋百里介绍，他又密见了蔡锷，蔡锷看了张孝准的信后说：“你回去告诉润农（张孝准字润农），他所谈的事我全明白了。”此后，蔡锷常与蒋百里策划有关事宜。为了迷惑袁世凯，蔡锷首先演出了一段与名妓小凤仙的风流韵事。11月，蔡锷以喉疾加重为由，向袁世凯请假，要求赴天津医治伤病。袁世凯不知是计，准假放行。这样蔡锷从容地离开了北京，一到天津，他便以养病为由，函电袁世凯辞职，与袁世凯分道扬镳。

据左梅回忆，“蔡松坡是他们家中常来的客人。一次谈到深夜，彼此关起门来切切私语，从此便不再见他的面了。”<sup>②5</sup>袁世凯为了继续控制蔡锷，特派蒋百里赴天津劝蔡锷回京，百里将计就计，奉命前往。百里“到津后，在得意旅馆和蔡谈了一整夜关于讨袁军事的计划，蔡请他仍回北京探听袁的虚实”。<sup>②6</sup>蒋百里回到北京后，报告给袁世凯的只有一句话：“松坡未知去向，在津未曾找到。”

袁世凯此时开始疑心大生。走了蔡松坡，不能再放走蒋百里，于是，袁世凯派了许多特务暗中监视蒋百里的行动。随着帝制闹剧逐步推向高潮，蒋百里的师友门人纷纷离开北京，与袁世凯一刀两断。蒋百里知道袁世凯的末日为期不远了，他也开始安排自己的出路。一天，蒋百里很晚才回家，在书桌前边喝啤酒边写信，他一连写了五封信，直到深夜，才上床睡觉。左梅从不过问蒋百里政治和工作方面的事，她只是预感将会有事发生，彻夜未眠。一大早，蒋百里将五封信交给夫人说：“我到南京就有电报来，那时候，我已脱离险境了，北京倘有乱事，你不妨到东交民巷暂避，随身细软早点准备好，我留下二百元作为家用。”<sup>②7</sup>说罢，左梅在晨雾中把蒋百里送出了家门。天亮后，人们都来问蒋百里的行踪，左梅淡淡地说：“他和朋友一大早就逛十三陵去了”。

蒋百里马不停蹄，从廊坊乘火车到天津，再从天津南下到南京，随即，他给夫人发出了报平安的电报。左梅接到电报后按约定将蒋百里临走前写的信分别寄给了袁世凯、徐世昌、段祺瑞等。

在信中，蒋百里劝袁世凯悬崖勒马，取消帝制，劝徐世昌、段祺瑞等勿助纣为虐。此时的袁世凯早已被皇帝梦冲昏了头脑，他根本没把蒋百里的忠言放在心上，也就在此时，蔡锷、唐继尧等爱国军人在云南举起了武装讨袁的大旗。

#### 四、痛失挚友

袁世凯终究没听蒋百里的劝告，于1916年元旦登基穿上了龙袍。他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各阶层人民，反袁护国斗争在全国展开。在这次反袁斗争中，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是最先、最坚决地揭起反袁旗帜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认识到辛亥革命的失败“乃同党人心之涣散”所致，决心重组一个具有同盟会初期精神的政党。1914年7月8日，他在东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宣布“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再度举起民主革命的大旗。中华革命党虽然比国民党前进了一步，但仍然没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组织上又规定立誓约、按手印以表示对孙中山的绝对服从，这种封建办法遭致黄兴等人的坚决反对。因此，中华革命党成了脱离群众的秘密团体，未能在国内政治风云中发挥较大的作用。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宣布独立，并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军。护国军的斗争得到全国各地的热烈响应，反袁斗争进入高潮。

蒋百里在沪上，数次接蔡锷来电，请他入川共谋川局事宜。为了一心一意协助蔡锷讨袁，他干脆派人把左梅从北京接到了上海，找朋友借了4000元钱让左梅买些钻戒等物品后回日本娘家去了。开往东京的轮船一离港，心急火燎的蒋百里立即化装成商人由长江入川。这一路上的辛苦无法形容，“有时坐拉纤的小木船逆流而上，有时坐着山轿打着火把夜里赶着黑路，常常坠落在田坑，备

受一路的辛苦。”<sup>④</sup>蔡锷得到蒋百里的消息，亲自出成都在龙泉驿迎接他，两位好友再次见面，距天津得意旅馆一别已有半年之久。

此时袁世凯的复辟闹剧已唱到了尽头。帝国主义列强看到袁世凯的大势已去，放弃了对他的支持。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仅有83天的皇帝梦就这样破灭了。但袁世凯仍想依靠北洋军队保持总统权位，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袁世凯的爪牙也各谋出路，袁世凯成了孤家寡人。最终，他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郁而死，原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早在同年4月，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的时候，看到袁世凯的心腹段祺瑞之流正在取而代之，护国运动有重蹈辛亥革命覆辙的危险。他在《讨袁宣言》中指出：护国战争的目的应该是“除恶务尽”，“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但形势的发展已非孙中山所能左右，护国战争只是打倒了一个袁世凯，取而代之的仍是独裁专制的统治。

黎元洪继任总统后，于7月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此时已是疾病缠身，他想请蒋百里任参谋总长代行督军兼理川务，可蒋百里却深为挚友的疾病担心。因此他坚决不愿为官，只愿陪着朋友去养病。他深知，“蔡的病象已深，这位手扶民国的伟人随时都有好花凋谢的可能”。<sup>⑤</sup>

8月底，蔡锷、蒋百里一行抵达上海，下榻于哈同花园。他们又与老师梁启超见面了，几人面对，唏嘘不已。曾几何时，他们站在了中国革命的风头浪尖上，讨袁的枪炮声还在耳边未绝，身上的征尘尚未洗净。今日相见沪上，刹那间一切又风消云散，还回几个真真切切的师友来。好在梁启超他们早在天津就有约在先，此次讨袁，“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失败呢，就死，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sup>⑥</sup>现在成功了，他们的确什么地位都没要，但蔡锷此时已经病得连话都讲不出了，却又不能不是一个天大的遗憾。

9月9日，蒋百里扶蔡锷东渡日本，住进日本福冈医院。刚开始，情况还好，蔡锷便催促蒋百里快去与夫人相聚。于是，正在新泻县附近避暑的左梅赶到东京，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丈夫。

随着蔡锷病情的日益加重，蒋百里和左梅为了更好地照顾蔡锷，从东京搬到了福冈附近。这时，他们成了日本新闻记者追踪的热点，探询蔡锷病情，了解中国时事政治等等。左梅还是老性格，从不过问丈夫的事，每遇到记者干脆避而不见。

1916年11月8日，蔡锷终因喉病恶化，医治无效，病逝于福冈医院，年仅34岁。蔡锷临终前，一再叮嘱：“身为军人，未能死向疆场，必薄葬减我过。”<sup>④</sup>蒋百里含泪为蔡锷代写完遗电后，蔡锷就溘然长逝。蒋百里在蔡锷的遗电后附加按语说：“一年以来，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犹未能裹尸为憾，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sup>⑤</sup>蒋百里一直在病榻前陪着挚友，护送他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巨星陨落，痛失挚友，蒋百里的心都碎了。

回国后，蒋百里即忙于蔡锷的葬礼。12月21日，黎元洪下令“对陆军上将蔡锷应予国葬”。<sup>⑥</sup>1917年2月，蒋百里长女蒋昭出生，为了挚友的丧葬事宜，他顾不得女儿出生仅两天，便乘车直奔长沙，与湘督谭延闿亲自踏勘岳麓山，选定了蔡锷的墓址。1917年4月12日，在蒋百里等人的操持下，蔡锷的国葬典礼在长沙隆重举行，一代英灵，终得魂归故里。

#### 注释：

①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4页。

②①④⑧⑨⑫⑰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35、37、40~43、58、60页。

③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载《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十九，第88页。

⑤⑩⑪⑫⑬杜伟：《保定军校二三事》，载《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123、124、30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

⑭⑮⑯刘莘园：《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载《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97、102、104~105页。

⑰张力云：《从北洋武备学堂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载《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25~26页。

⑱谭慧生：《蒋百里》，载《民国伟人传记》第301页。转引自《蒋百里传记资料》第一册，台北，天一出版社。

⑲孙震：《怀蒋百里师》，台湾《蒋百里全集》第六辑，第277页。

⑳《众议员关于蒋校长自戕之质问书》，载《大公报》。

㉑见《蒋百里先生文选文集各版本序言》，载台湾《蒋百里全集》第六辑，第370~372页。

㉒余初觉：《蒋百里与左梅夫人的缘遇》，原载《艺文志》第93期，转引自《蒋百里传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

㉓王康：《蒋百里自戕浴爱河》，载《中外人物专辑》第一辑，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1年4月。

㉔以上参见毛振发：《蔡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4月第1版。另据毛先生考证：1941年刘达武编纂《蔡松坡先生遗集》时，把《军事常识》改名为《军事计划》作为蔡锷的军事著作收入《遗集》中。此后，刘氏此举被传讹因循。毛先生曾专门撰文《军事计划》一书作者辨析发表于《历史教学》1987年第6期。本书从毛说。

㉕②⑤李吾：《蒋百里先生的生平》（三）。

㉖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载云南省社科院编《护国文献》上，第307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㉗蔡锷：《梁启超致黎元洪电》，载曾业英编《蔡松坡集》，第14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㉘《民国高级将领传》（三），第478页。

㉙刘达武等编《蔡松坡先生遗集》之末，第34页，1943年刊行。

## 第五章 “回头做我们的学问”

### 一、淡泊度日

护国战争胜利的取得，与蔡锷、梁启超等人的运筹帷幄、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密不可分。如今蔡锷以身殉国，梁启超便成盖世功臣了。新上任的黎元洪大总统电邀梁启超进京，委以总统府秘书长要职，他“甚至不惜以总统身份，恭维梁启超是泰山北斗、人伦楷模，希望他能应其所请。”<sup>①</sup>梁启超与蔡锷、蒋百里早就有约，决不为官。因而他回电婉辞，并且还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宣布脱离政治。对此，蒋百里大为感动，他也下定决心远离北京。为了完成蔡锷未尽事业，按当初的约定直奔四川而去。早在他护送蔡锷东去治病的时候，代掌川务的蔡锷的密友戴勘及蒋百里的好友张耀庭就在一起商量过，一旦蒋百里能脱开身来就请速回四川，共商大计。

蒋百里在长沙和地方政要定下了蔡锷的莹地后便准备转道入川，可是湘军将领中蒋百里的士官同学以及保定学生说什么都不让他立刻就走，坚持留他小住一些时日。无奈蒋百里只得在长沙住了几天，谁也没想到他这小住数日竟然让他躲过了一次灭顶之灾！

蒋百里由汉口转道往重庆，和去年进川到成都与蔡锷会面时

走着一样的路线，但他此刻的心情却大不相同。去年是满怀壮志豪情，可今年却是故友撒手人寰，自己前程凶吉难卜。一过重庆，蒋百里就改乘滑杆夜以继日西行。没料到刚到山阴镇，蒋百里迎面看见了化妆成乞丐的学生李拯中。李告诉他成都目前一片混乱，川军起难，代省长戴勘和参谋长张耀庭全被川军刘存厚部所杀。蒋百里一听此消息，如雷灌顶，不由得仰天长叹，此真乃天不助人！

袁世凯下台后的北京政府也一天没有安宁过。大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的权力之争日趋加剧，最后就中国是否对德宣战问题彻底闹翻。黎元洪解除了段祺瑞总理的职务，而段祺瑞则准备以武力逼黎退位。黎元洪在急切中不辨人鬼，把“辫帅”张勋请进北京搞调停。张勋是清室的忠实拥护者，他挽起辫子冲进北京就要复辟清王朝。6月8日至13日，张勋在天津逼迫黎元洪解散了国会，次日，他率部进京把溥仪请了出来，上演了复辟的丑剧。一时间，“辫军”在北京城里抢夺车站、占领邮局，把黎元洪大总统都逼得躲进了日本使馆避难。张勋的倒行逆施自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段祺瑞一马当先与梁启超、冯国璋组成了“讨逆军”，于7月12日攻入北京和“辫军”打了起来。

京城内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左梅抱着三个月的女儿避难到了天津。丈夫赴川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消息了，她深为担心。

一天，蒋百里的几个好友林长民等人聚集在一起，面色惨然，见到左梅皆口舌喏喏。左梅急了，一再追问，林长民才低声说到：川乱大作，戴勘、张耀亭都被川军所杀。左梅一听此恶讯，料定蒋百里亦绝命于川乱，不由得一声悲恸，昏死过去。

其时蒋百里已发了报平安的电报，只不过是发到梁启超处了，而梁启超此时正忙于协助段祺瑞讨伐张勋，并出任讨逆军总司令部参赞，隔了数日才将平安电告知左梅。一连几天茶饭不思的左梅方才放下心来，不过从此还在哺乳期的她因急火攻心而奶水告断，可怜还在襁褓之中的蒋昭只得吃牛乳。转了一圈，蒋百里还

是回到了北京，此时的北京又是段氏政府。护国战争告诉段祺瑞，象蒋百里这一类人绝不能放手任其自由飞翔，一定得做一只金丝笼将其束缚住，否则必定会出乱子。于是，段祺瑞摆出一副不计前嫌的高姿态，聘请蒋百里为总统府顾问，并加封为陆军中将。为了生计，为了夫人和孩子，蒋百里也只得应承下来。

1917年，南北奔波多年的蒋百里终于在北京安家落户，有了自己的家，这当然还得感谢他的贤妻左梅。

当初，蒋百里借了4000元钱让左梅买些钻戒细软之类回日本娘家省亲，可左梅一文没动。现在，她提议用这笔钱购买一所房子，以作长久之计。作为一个日本女子，左梅在中国无亲无故，除了北京略微熟悉一点，其它地方寸步难行，加之孩子一天一天大了起来，离不开父亲，因此她实在不希望丈夫东奔西走。蒋百里不是不理解左梅的心事，只是眼下一时倒也无个好去处，他同意夫人的建议，决定购买房屋。于是，他们在北京北新桥锅烧胡同有了一个固定的家。房子买下来，4000元只剩了50元，蒋百里自我解嘲说：“我现在居然也是个有产阶级了”，夫人左梅则不无浪漫地说：“古人有金屋，我们这屋子可名曰金钢钻屋”。<sup>②</sup>

家是有了，可债也欠下了。在日本，人们通常都认为中国留学生回国后都是做大官、赚大钱的，蒋百里曾就此和左梅谈过一次。的确，蒋百里的同学中也有不少升官发财的，但蒋百里不是个随遇而安、庸碌无志之人，左梅对此是再了解不过了。因此她对欠债既不感到意外也没有因此而失去信心，她主张分期付还。作为总统府顾问，蒋百里月薪400元，他依旧例交给夫人200元持家，再往浙江母亲处寄50元，余下的作为他自己的交际费用。左梅把200元分成柴米油盐水电等各项，分袋存放，该用什么钱就解哪个袋，余款作为杂用。由于她精心计划，节俭开支，每月费用勉强够用，唯一招架不住的是怕客人来得太多，而蒋百里恰恰又是个广交天下朋友的人，因而寅吃卯粮之事也时常有之。每当

捉襟见肘之时，左梅就来个高挂免战牌，客人来了不见，电话响了不接，实在躲不过，见面就是一句“下月再见”，余下就是一通日本话，让对方不明究里。好在大家也都能理解。

蒋百里毕竟是总统府顾问，也时常出席一些社交场面，每每和达官贵妇交往时，简朴的蒋百里夫妇与那些满手金银、满头珠翠的显贵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次，有位次长夫人悄声问左梅说：“蒋嫂子，你的先生做的是什么官？”左梅淡然一笑，告之对方蒋百里什么官都没做。那位次长夫人立刻高声说道：“好嫂子，不做官怎样过日子呢？我家先生当次长还不够我们的开销呢！”左梅听了，对这位次长夫人的浅薄鄙视不已。旁边一位大员过来解了围，他请次长夫人回去问问自家先生就知道蒋百里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次长夫人回家还果真问了，得到的回答是总统和总长们都很敬重蒋百里，他根本不愁没大官做。等次长夫人再见到左梅时，态度大变，牵手执臂，问寒嘘暖，弄得左梅哭笑不得。

日子虽然过得清苦，但左梅总能寻找到开心的事儿，她最喜欢的就是到东安市场去听梅兰芳的戏。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蒋百里踏上了他漫漫淡泊的人生之路。

## 二、远离宦海

引狼入室的黎元洪被迫下台，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7月14日段祺瑞进京又坐上了总理宝座。在段祺瑞内阁中，蒋百里是混得较差的，恐怕周围一班朋友中也只有蒋百里是在混差事。他的老师梁启超当初信誓旦旦地宣布脱离政治，现在却以再造共和有功而重登政坛，做了他梦寐以求的财政总长。另一位老师陈仲恕做了财政部秘书长，常来常往的朋友如林长民做了司法总长，范源濂做了教育总长等等。梁启超见蒋百里日子过得实在不宽裕，便

准备给他安排一个肥缺。可此时的蒋百里对升官发财毫无兴趣，他推荐了早年在日本的士官生同学林摄去填了塞北关监督这一肥缺，并把学生刘文岛、李拯中介绍去关署任职。

居闲曹，啜冷羹，梦中都知身是客。蒋百里深知以目前的形势他在政治上是很难有所作为的，只要段氏政府不倒，摆在他面前的路将是越来越窄。他索性断了仕途宦海之路，埋头做起学问来，这正好应了梁任公去年在天津所说的那句话：“成功呢，什么地位也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不过此时梁公的财政总长做得倒是挺自在（这可是他宦途上的高峰），而蔡将军英年早逝，唯有蒋百里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蒋百里针对世风不古、道德日衰的时政和社会，想在文字上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于是他远离了原来的本行，重新开始新的研究探索，逐渐从治军转上了治学为文的新路。到1920年时，他已在新文化运动中做了不少工作，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甚至忘记了蒋百里是留学日、德的军事高才生。

1917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蒋百里翻译的英国学者斯迈尔斯的《职分论》一书。蒋百里为了译这本书，又通读了该书的德文本和日文本，最后据德文本译成。

斯迈尔斯在《职分论》中广证博引，以西方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学术、宗教的杰出人物之言行史实来论证人类在社会上应遵循的规范和应尽的职责，形成立志修身、谋福社会的教科书。其中心思想为：“富贵贫贱所勿论，苟同是生存于斯世也，则必各有其不可不尽之职分，何则人生云者？……而至高至善之人，则决不以此区区一身之幸福名誉为其一生之目的。彼之生也，固别有其至强之动力，即导源于众善所归之事业是也。”“至高至善之人，必须为其家庭、社会、国家乃至全世界之人类谋福祉，乃为人生之职分。”蒋百里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将其精辟概括为“身修

而齐家，家齐而后国治；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sup>③</sup>

在《职分论》中，蒋百里以其生花之笔，译出许多警世之言，仅举其在“行为上之职分”一章中有关“意志”的译文为例：“意志有静动之别。当其静也，不过现固执不挠之情状；及其动也，则必慎择其方向。方向一误，则意志力虽强，转足助长其为恶。彼虐政家，宁牺牲其无数之生命，以厌其一人之欲而不悔者，皆是也。”“若夫意志薄弱，或完全无意志者，则为无品性之人，无论何时，均依外界之刺激而动。其立于世也，若浮萍、若细草，以宝贵之人生，随波逐流，为万众之奴隶，与草木同其朽腐，呜呼，岂不大可哀耶！”“是故吾侪必竭尽全力以养成强固之意志。志不立，则气节堕，而道德失其光，真理失其力，终必为悖德。”<sup>④</sup>

翻译《职分论》与此时蒋百里的处境不无关系，因而，在译本中他也寄托了自己的意志和情操，同时也确实实将醒世劝人之旨寓于书中。1917年的中国政坛可谓多事之秋，军阀混战，百姓涂炭，外患不已，大有世风日颓之势，《职分论》的出版应该说起到了针贬时政的作用，一时间颇受亲睐。后人评论他翻译此书的目的是“介绍此种学说于人欲横流罪恶滔滔之世，正以箴规时俗，指引迷津，以济人心邪僻之穷也……当时之介绍新思潮，乃是引导国人奋发向上，以达于至善至美之境域”。<sup>⑤</sup>

译完《职分论》后，蒋百里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许，他深受鼓舞，决定担起教化之责，就像1903年在日本创办《浙江潮》那样，从精神思想上来感化教育民众，他甚至希望能对拄着屠刀的军阀政客们有所规劝。针对兵祸不已、内战连年的状况，蒋百里萌发了裁减军队的设想，他开始作系统研究，不久就出版了颇受欢迎的小册子《军事常识》，这是他在研究的基础上专门论述国防方面的文章，他后来在《国防论》一书中称之为“二十年前之国防论”<sup>⑥</sup>。针对学术界思想纷繁复杂，人心混乱的状态，蒋百里结合自己在欧洲学习期间对欧洲文艺复兴史的了解，决心将欧

洲文艺复兴史介绍给国人，以唤起民众从思想上冲破黑暗，推陈出新。总之，蒋百里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较大的“回头做我们的学问”的计划。他开始广泛涉猎先进发达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立志站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前沿。

### 三、游历欧洲

梁启超上任财政总长后所做的头一件事并不是关于财政方面的。在他的极力主张下，段祺瑞政府于8月14日发布了对德、奥宣战的公告，出自梁启超之手笔的公告称：“所有以前我国与德、奥两国订立之合同协约，及其他国际条款国际协议属于中德、中奥关系者，悉依据国际公法及惯例一律废止。”<sup>⑦</sup>应该指出的是，梁启超力促此事的确是以为中国在世界上争得一席国际地位为目的的。中国的参战以及公告本身姑且不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出席巴黎和会却惨败而归，进而引发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的爆发，这倒确实使参战产生了深远无比的历史意义。

段祺瑞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后，便是“一手遮天，目无余子。”<sup>⑧</sup>他嫌国会组成人员中心腹知己太少，唱反调的太多，于是开始了取消原由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的进程，准备召集由他一手控制的新国会。独裁者的行径自然遭到了共和创始人孙中山的极力反对，他于1917年8月在广东召开了讨段护法的非常国会，并亲自出任大元帅，成立了护法军政府。大旗一竖，许多当年在南方与蔡锷一起参加讨袁护国的军政要员都归到了孙中山的麾下。消息传到蒋百里的府上，蒋百里也曾激动过，可惜的是他此时潜心做学问，激动之后就又埋头书斋了。

不久，段祺瑞与冯国璋的矛盾激化，段祺瑞于11月15日来

了个引咎辞职，步履艰难的财政总长梁启超也顺势和全体内阁成员集体辞职。当初梁启超踌躇满志宣布就任财政总长时，蒋百里心里还颇有些想法，但转念一想，梁先生对经济学原理及中国财政问题的研究在民国尚无二人，可以说是近代财政学的鼻祖，出任财政总长应该是圆了他多年的梦想。没想到，梁先生一场春梦仅仅四个月，留下的只是满怀遗憾和惆怅。蒋百里不由得对政坛宦海嗤鄙起来。疏远了官场，梁启超又回头治学，潜心著述，偶尔与蒋百里、张东荪、张君勱等一班学人朋友小聚。其乐融融之中，梁启超又产生了脱离政坛之意。1918年10月，在对新闻界的一次谈话中，梁先生宣称：“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愿略酬，决不更为政治活动。”<sup>⑨</sup>

军人出身的蒋百里在这一时期除了潜心做学问外，他更多的是关心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此时的战事已定结局，到1918年底，德奥同盟国宣布战败投降。随即，在美、英、法、日、意等五国操纵下举行了“巴黎和会”。中国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了巴黎和会，北京政府和广州护法军政府共同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有王正廷、顾维钧等人参加的五人代表团出席和会。北京政府考虑到梁启超当初“赞成参战之劳绩”，拨出六万元经费，让梁启超赴欧洲作舆论鼓吹。梁启超认为巴黎和会是实现中国收回主权的大好时机，因此欣然领命，还通过故旧又筹集了四万元的经费，并很快成立了以梁启超为团长的欧洲考察团，考察团的成员皆为一时名流：军事蒋百里、外交刘崇杰、政治张君勱、工业丁文江、经济徐新六等等。“其实，这个考察团就是中国出席和会代表团的咨询机构，表面上没有正式宣布而已。”<sup>⑩</sup>

考察团于12月28日乘日本横滨号轮船出洋，梁启超请蒋百里负责考察团的日常事务。说来也巧，在倒袁运动时，蒋百里为助蔡锷南下一直羁留北京，而梁启超则为了躲避袁世凯的搜捕潜

身横滨号，藏在煤仓中去了香港。<sup>⑪</sup>如今煤仓已改为理发室，梁启超特地拉着同伴们到理发室去感慨唏嘘了好一阵子。梁启超和蒋百里感情不同一般，因此他们俩人同住一舱，每日海阔天空地交谈。横滨号从太平洋到印度洋，再向西一路摇晃而去。等他们抵达巴黎时，巴黎和会开幕已整整一个月了。“他们在巴黎住在中国使馆附近的先生街，每晚必举行餐谈会讨论中国应当提出和会的各种问题，以备中国代表团参考。”<sup>⑫</sup>

对巴黎和会，国内知识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人们皆以为能够以此为契机争取到中国在国际上的独立平等地位，讨回本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合法权益，包括梁启超、蒋百里等许多人都抱有这样的美好愿望。因此，早在出发前，梁启超在上海发表了一个争取中国关税自主权的声明，呼吁实现民族独立的原则。他说：“以此为目的战争显然已经打响了”。<sup>⑬</sup>而且，梁启超还曾专门会见日本驻华代理公使芳泽，梁启超明确表示中德条约废止后，日本不应该主张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芳泽对此予以拒绝。梁启超愤怒地说：“中日亲善的口头禅，已讲了好些年，我以为要亲善就今日是个机会，我很盼日本当局要了解中国国民心理，不然，恐怕往后连这点口头禅也拉倒了。”<sup>⑭</sup>

受到国内日趋高涨的爱国热情的鼓舞，和会正式代表顾维钧、王正廷等人于1月28日在和会上阐明了胶州租界和胶济铁路以及德国在华一切权益应归还中国的观点，提请和会讨论决定。显然，这一立场直接触动日本在山东半岛的利益，“使得日本委员狼狈不堪”<sup>⑮</sup>。与此同时，考察团在会场外向欧洲新闻界进一步阐述这一观点，梁启超为发言人，“他认为，对于中国这种毫无希望的状况，外国干涉负有责任，他责备日本作为一个‘抢劫的邻居’是罪魁祸首，他要求外国归还其在中国的租借地，解除庚子赔款的义务，废除治外法权和外国人在华的其它特权，实行铁路联合，并废除在胁迫和勾结的条件下产生的条约。”<sup>⑯</sup>考察团的观点立刻见

诸各大新闻媒介并引起强烈反响。经过缜密商定，最后，中国代表团共提出四点要求：一、收回战前德国在山东半岛的一切利益，这些权益不得由日本继承；二、取消1915年袁世凯政府对日本承认的“二十一条”；三、取消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殊利益，包括领事裁判权、租界、租借地、势力范围等；四、结束德奥等战败国在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上的所有利益。

中国代表团和欧洲考察团的一系列声明直接触动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在华利益，可以说是数十年以来中国人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出的一次最强烈的呼喊。之所以中国代表团能在和会上表现出如此强硬的态度，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重重，美国为了抑制日益强大的日本，从而更多地抢夺在华利益，私下对中国代表团作出了一些承诺；第二，梁启超、蒋百里等人抱着满腔希望和幻想，以强烈的爱国心积极出谋划策，直接影响了顾维钧等谈判代表的心态，使之产生共鸣。但是，中国代表团的正义立场，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帝国主义列强的震惊和恐慌，他们一方面勾结在一起，在会内会外公开或密谋牺牲中国的利益，同时采取恫吓威胁北洋政府的卑劣手段。卖国的北洋政府终于在段祺瑞的操纵下奉送了山东，并强行要求在巴黎的谈判代表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最终，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一无所获并且任由强盗们重新宰割了一番。

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迅速传回国内，惨痛的事实再次教育了原来抱有幻想的人们，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在1919年“五四”前夕愤怒地指出：“巴黎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利益。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他号召说“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sup>[47]</sup>。巴黎和会的惨败还直接导致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们率先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喊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这一声响亮的春雷立即震动了黑沉沉的中国大地，全国各地

各界纷纷行动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界罢市，规模空前。这一全国性的爱国运动迫使北京政府于6月10日改组了内阁。巴黎和会一直开到了6月28日，考察团也在法国驻留了五个月。在巴黎，梁启超、蒋百里等人广交朋友，会见了法国社会各界名士。梁启超在他的《欧游心影录》中戏称：“法国方面之名士，已见者殆十之七八”，“若再淹留半年，恐全巴黎之书呆子皆成知己矣”。在和会间隙，法国政府邀请考察团于3月6日至17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西部战场进行了考察。这次考察活动由法国政府提供经费，陆军部和外交部陪同。法国陆军部的陪同听说蒋百里早年曾在德国陆军任见习连长，而且还得到过兴登堡元帅的接见，对他非常尊敬。考察团有梁启超、蒋百里、刘子楷、杨甫鼎等人同行。历时12天的考察，他们经马仑河、凡尔登到洛林和亚尔萨斯州，再到莱茵河左岸联军阵地，进入比利时沿缪司河穿过兴登堡一带后南下返回巴黎。他们所到之处，皆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在成千上万的坟墓和一座座毁于战火的城市中穿行，简直让人毛骨悚然。在比利时，考察团还受到了比利时国王的接见，比利时外交部设宴招待了来自东方的客人。

蒋百里对欧洲军事作了全面考察后，写下了数万字的考察日记，“这次参观，对百里先生的思想，发生极大的变化，他早年留学日、德，醉心于当时的军国主义。自从实地考察战后欧洲后，深深体验到‘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必陷于犹柔而自亡。’”<sup>⑧</sup>于是他萌发了“寓兵于农，战斗与生活一致”的设想，而且特别“服膺瑞士的民兵制”。<sup>⑨</sup>梁启超曾感慨不已，他说：“比起破坏的程度来，反觉自然界的暴力，远不如人类，野蛮人的暴力，又远不及文明人。……真不料最可宝贵的科学发明给这班野兽一般的人拿起来戕杀生灵荒秽土地。”这次考察对蒋百里、梁启超的思想触动很大，使他们过去对欧洲政治文化的认识和看法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可以说是他们对西方文明的一次再认识。回国后两

人分别著成了《欧洲文艺复兴史》和《欧游心影录》。

考察团在欧洲游历一年零三个月后，于1920年1月23日在马赛港乘法国邮轮踏上归国的航程。40天后，考察团抵达上海。

欧游归来，蒋百里又回到了锅烧胡同温馨的家中，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夫人和两个爱女。他用在欧洲节省下来的生活费将家好好整修了一番，铺了木地板，装了暖气，还专门辟出一间房子做浴室。房子一经整修，焕然一新，就像他在欧洲时住的旅馆一样，这大概是为了弥补他长期不能在妻子左右的歉疚之情吧。

梁启超经常过来看看蒋百里一家，顺便打上八圈“卫生牌”，不管手气旺闭，他只打八圈，决不恋战。打牌时，“倘逢三缺一，梁便请出‘女将军’来凑一角，梁呼左梅‘女将军’。……百里遇事有兴趣，恐怕打牌是他兴趣最少的一件事，虽偶一为之，无非‘陪太子读文章’而已。”<sup>⑥</sup>

#### 四、共学社的主谋

北京的四月，春天踏着湿漉漉的步子扑向大地。在五四运动一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思想界更是春潮澎湃。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震荡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马克思主义被十月的金风送到了中国思想界。先进的知识分子发出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强烈呼喊，他们积极探讨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追求和传播各种新思想。一时间，新思潮新知识纷纷涌现，人们动不动就把“主义”二字挂在嘴边。孙中山在1920年1月的一封信中描述思想界的动态云：“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命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

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发。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极大之影响。……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sup>②1</sup>

在孙中山所称的各界舆论中，影响较大的有由梁启超牵头、蒋百里等人主谋而进行的一系列文化活动，他们“有感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颇想一面整理国学，一面灌输西洋新思想及新学识，融合起来，以确定中国的文化路线”。<sup>②2</sup>早在欧洲游历之时，梁启超就与蒋百里、张东荪商定，回国后要创办一所大学，他们亲自去传道授业，要组织学会、出版杂志，向社会传播新知识。此外，为保证文化教育事业的顺利开展，还必需兴办一个实业机构。宣布脱离政治的梁启超一到北京就立即开始实施他一揽子计划。蒋百里也毫不犹豫地加入进来，并称梁启超组织的这一行动为“新文化运动”。<sup>②3</sup>

此时的蒋百里对思想文化的研究远远超出对军事理论的研究。在1919年前后，他朝夕与共的朋友梁启超、张君勱、张东荪、丁文江、林志钧以及后来的徐志摩、蹇念益等皆为思想学术界的名士，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之精深、宣传介绍西方政治思想文化之努力，可以说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从清末至今，梁启超在思想文化界中一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述诸君由于对他渊博学识的景仰和非凡经历的敬佩，无不自觉地归在这面大旗之下。在梁启超的背后，蒋百里起着组织、策划和维系梁氏沙龙的作用。有人研究说：“对梁最有帮助而颇有影响的，是几个执弟子礼或界于师友之间的后起之秀。第一位是蒋方震。”<sup>②4</sup>梁启超总结他和蒋百里的关系时动情地说：“启超与方震交逾二十年，居同学，出同游，天下事则同患难。”<sup>②5</sup>由于他们之间密切的关系以及早年并肩作战的经历，梁启超有什么事皆愿咨询于蒋百里。

很快，一个以“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sup>②6</sup>为

宗旨的共学社成立，社址设在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梁启超自然是共学社的负责人，蒋百里、张君勱、张东荪等为主要骨干。共学社的成立立刻得到了思想学术界的支持和参与，社会名流蔡元培、王敬芳、蒋梦麟、赵元任、张謇、张元济、丁文江、胡汝麟、蹇念益等等皆为发起人。为了筹措经费，大家纷纷解囊捐款。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拨出两万元作为共学社的译书经费，梁启超也曾把他著《欧游心影录》的润笔之资四千元捐出。此外，实业家穆藕初、聂云台等也献巨资赞助。<sup>④</sup>

共学社成立的准确日期今已难考，但从社员吴统续 1920 年 5 月 5 日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谈及共学社已开会两次，可以推断共学社是在 4 月成立无疑。众多学者会聚一起，使得石达子庙成了学术的殿堂。在蒋百里的策划下，共学社准备从如下几个方面开展活动：编译新书、奖励名著、出版杂志、选送留学生。

由于有张元济和他的商务印书馆作后盾，共学社编译新书的计划实施得最为完美。为了保证译书的质量，社里专设了“评议会”，译书的标准“以浅近简明为主”，“有特别需要之名著”经评议会决定后提请社员翻译。商务印书馆特开《共学社丛书》一目，下设《马克思研究丛书》、《时代丛书》、《史学丛书》、《社会经济丛书》、《文学丛书》等 16 个子目，涉及政治、哲学、经济、科学、历史、文学等诸多方面。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勱、张东荪等人实际上还司编辑之职，所以在《共学社丛书》百多部译著中，出自他们之手的只有寥寥几部。在众多译著中，以《马克思经济学说》、《马克思派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互助论》、《清代学术概论》、《欧洲文艺复兴史》、《相对论浅释》以及罗素、杜威、托尔斯泰、易卜生等哲学、文学大家的专著等最为有影响。从 1920 年 9 月开始出版，短短几年时间，共学社共翻译出版各类图书 100 余种，产生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丛书中的许多译著被多次再版，比如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首版于 1921 年 4 月，

到1927年1月又出了第5版。

关于选派留学生的活动，蒋百里是积极推行者，以其自身数次留学受益的经历，他是非常赞同走出国门看世界、培养世界性人才的。当时国内兴起出洋勤工俭学风，首倡者李石曾先后组织七百余人赴欧美勤工俭学，影响面相当大。勤工俭学还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后来成为高级领导人的周恩来、邓小平等皆曾赴欧勤工俭学。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勱他们没有用这种方式来组织留学，而是筹集了一笔“补助同人留学费”，采取资助经费的办法来选派留学生。由于当时留存的资料失散，今已难考资助留学生的详尽情况，从零散材料来看，杨维新、石陶钧、吴统续、毛以亨等人皆受资助而留学，其中石陶钧还身任共学社德国留学生的监督人。以此推断，受资助的留学生数量还是不小，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学成归国，成为国家急需的杰出人才。值得一提的是，共学社派出的留学生还有不少人赴社会主义大本营苏联去留学。据张君勱云，一部分人到了苏俄旋即离去，一部分后来变成了马列主义者。<sup>⑧</sup>这对于创办了《解放与改造》杂志并在这一刊物上极力抵制和反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张君勱、张东荪等人来说，无疑是始料不及之事。由于共学社自身经费紧缺，资助留学生的计划不久即告终结。

## 五、温馨的松坡图书馆

早在1916年蔡锷病逝时，蒋百里扶灵柩从日本归抵上海，上海各界曾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到年底，梁启超率蔡锷将军的遗孀及子女到上海，在哈同花园设宴答谢社会各界对蔡锷及其家属的关心和爱护。梁启超在与商学界名流共同缅怀蔡锷护国功绩时，发起了建立一所图书馆以纪念蔡锷的倡议，当即得到各界名流的

响应，图书馆定名“松社”。之后不久，著名学者黄炎培先生发起为松社捐书的活动，上海民众踊跃捐赠，松社很快便形成规模。<sup>⑧</sup>

共学社成立后，各项学术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但社里的同仁对资料缺乏、读书困难颇有意见，纷纷建议在社里设立图书馆。此项建议自然得到梁启超、蒋百里等众人的赞同。于是，梁启超决定在北京设立松坡图书馆。他把上海松社房产变卖后全投进了北京松坡图书馆，又以十万元巨款购买了著名学者杨守敬先生的藏书，充入其中。<sup>⑨</sup>他还将自己从欧洲考察时所买的英、法、德文图书一万多册个人藏书也毫无保留地捐了出来。一时间，松坡图书馆颇具规模。

松坡图书馆分设二馆，第一馆馆址在北海快雪堂，第二馆馆址在离东交民巷不远的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石虎胡同七号，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院子中央立着一棵饱经沧桑的百年老槐，四周是叶绿花红的海棠树，整洁幽静又不失浪漫。当人们回头来看这座院子和院子里的一群人时，就会惊奇地发现二者默默辉映、互为写照：梁启超恰如那棵饱经沧桑的老槐，蒋百里、徐志摩、张君勱等正象那些艳光毕射的海棠围绕在梁启超周围。他们在离东交民巷这个外国人集中居住地不远的一座封闭的院落里，抱守着他们的理想、追求和梦幻，默默地耕耘着。

以学问和资历，松坡图书馆馆长一职自然由梁启超担任。图书馆设总务部和图书部，蹇念益出任总务部负责人，蒋百里出任图书部负责人。图书部主要负责图书编目整理工作，下设编辑干事等职，徐志摩、陈博生、林志钧、杨维新、蒋复璁、李藻荪等人均曾担任此职。

由于每天都有具体实事，因此各位社员时时相聚一堂，文人学者的浪漫使他们歌哭与共，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全都在石虎胡同倾泄出来。徐志摩是从国外才回来不久的

青年诗人，到松坡图书馆来时他还沉浸在欧风美雨的氛围之中，尤其是西方社会繁华的社交聚会更是让他觉得国内的空气使人窒息。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在他的发动下，一帮子年青人在石虎胡同七号也搞起了社交聚会。以他们的声名，自然吸引了不少的人士来参加。更让人惊奇的是，徐志摩以其翩翩风度还请来了不少名门闺秀，使得聚会更具罗曼谛克。梁启超、蒋百里也常常参加聚会。蒋百里和徐志摩都是浙江海宁人，但仅小四岁的徐志摩比起蒋百里来说，其浪漫气质无人可比。大概是他此时已开始写诗的缘故，所以石虎胡同的聚会办的特别吸引人，请来的淑女闺秀特别多。这在受封建礼教桎梏数千年的中国，徐志摩的聚会确实是个大胆之举。此时的石虎胡同充满温馨和浪漫，后来在南京出任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到台湾后出任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的蒋复璁先生在1966年曾专门撰文《石虎旧梦记》，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那一段温馨旧梦的怀念。

图书部的编辑干事们个个都是学富五车之人，区区图书编目之事自然难不倒他们，更无须蒋百里亲自督阵，因此他把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交给了自己的侄子蒋复璁，他自己则埋头做起学问来。后来成为蒋百里的亲家的钱均甫先生评价蒋百里说：“他一生不停地读（吸收），不停地思（理解），不停地写（发挥），无论政治、文艺无不所好”。张君勱说：“百里的治事的精神我知道的不多。其治学精神我所佩服的是他读书必有新见解，且能得其要点，非过目不忘的人所能及”。<sup>⑤</sup>曾有人谈起《莎士比亚全集》，认为德文本比英文原著好，蒋百里便立即借回一套德文本《莎士比亚全集》，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一口气读完。蒋百里文笔隽秀，才思敏捷，所出文章各家报刊皆愿刊登，“百里收入稿费每月约达百余元”，<sup>⑥</sup>由此可见其勤奋之一斑。

松坡图书馆很快取代了石达子庙的地位，共学社的读书俱乐部就从石达子庙搬了过来。丁文江、梁启超是俱乐部的干事，蒋

百里则仍做主谋。读书会座谈心得、介绍新书、开办学术讲座极其活跃，成为北京地区的一大文化活动中心，特别是松坡图书馆的图书不仅仅是共学社同仁可以借阅，对外也是热情开放，并且还有专门为留学生预备的留学读物。由于松坡图书馆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引来许多团体登门，如财政金融讨论会、国民外交协会等均将会址设在松坡图书馆内。松坡图书馆还附设有招待所，从外地进京的学人常常下榻于此。张君勱、张东荪等后期把共学社事务全交给了蒋百里，他们多数时间皆南下上海活动，每至北京，均以招待所为下榻处。

尽管有梁启超这面大旗，尽管有蒋百里等为松坡图书馆前后奔波，但由于梁启超当初兴办实业的计划一直是空头帐单，所以仅靠社会涓细支助和社内同仁点滴认捐，实在难以维持松坡图书馆日益庞大的开支。很快，松坡图书馆便陷入经济窘困，到1924年时已是捉襟见肘，梁启超不得不以鬻字来筹措经费，丁文江在编撰梁启超先生的年谱时曾两次记录此事。1929年梁启超先生去世后，丁文江接任馆长，没过几年，丁文江去任民国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从此，“松馆就此默默无闻了”。<sup>69</sup>

松坡图书馆由兴至衰的历程实在是太短暂了，一代名流创立的事业没能被后人继承堪称遗憾，但松坡图书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确实尽到了它的责任，完成了它的使命。

松坡图书馆，一个温馨的梦，永远留在了蒋百里和许多人的记忆中。

## 六、《改造》主编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改造》杂志是颇值一书的。

《改造》的前身是《解放与改造》，由张东荪、俞颂华、张君

勋等于1919年9月创办的，以北平新学会的名义出版。创刊之时，正值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掀起高潮，所以张东荪等人在《解放与改造》上也大量刊登了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和译文，客观上传播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形成了拥护和宣传社会主义的假象。但实际上张东荪、张君勱等发表的文章从各方面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歪曲了十月革命和新生的苏维埃，宣扬了修正主义和别的反马克思主义。

到1920年9月，由于张东荪、张君勱经常到上海活动，杂志的编辑工作无暇顾及，梁启超和蒋百里便接管了《解放与改造》，将其改组为《改造》月刊。

在《发刊词》中，梁启超述说了他们的宗旨，《发刊词》首先强调《改造》的“精神则犹前志也”，但他们“所鼓吹在使文化运动向实际的方面进行”。接下来，梁启超简明扼要地宣布了他们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民族之不振由于思想不进与制度不良，而不良制度尤为不良之思想所维持，故以为非先思想革命不能颠覆制度。”因此一定要先进行思想革命；第二，关于政治体制，主张地方自治。“政治改造，首在打破旧式的代议政治，故主张国民总须得有组织的自决权”，“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故主张中央权限当减至必要范围为止”，“主张各地方皆宜自动的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国家须加以承认”；第三，在军事上主张裁减军队，实行兵民合一。“军事上消极自卫主义，为我国民特性”，“故主张无设立国军之必要，但采兵民合一制度，以自图抵抗强暴”；第四，在经济制度上，谋求改良和互相中和，进行调节。“经济改造在使人人由劳动而得生存权为最低限度，同时对于自由竞争应有最高之限制”，“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第五，在思想文化方面，强调“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应加以“整顿和发扬”，但同时认为“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无论是否

为同人所信服，皆采取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别择。”<sup>④</sup>

《发刊词》所宣布的一系列主张，有两个基本点值得指出。首先，在政治、经济、思想上和《解放与改造》是一脉相承的。《改造》在很多方面把原《解放与改造》中较为抽象、隐晦和零散的论点具体化、明朗化和系统化了。比如，以反对思想统一否定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以倡导劳动神圣、分配平均强调对阶级矛盾进行调和；谋求对社会和政治体制实施改良等等皆属其类。其次，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和蒋百里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比如改良主义思想、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实行地方自治、裁减军队以及主张兵民和一等。应该说，《改造》月刊的确对其前身实施了一些改造，但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将其改造向革命的道路。

《解放与改造》从第3卷（1920年9月）起更名为《改造》，由原来的32开本改为16开本，每月1期，每卷12期，出至4卷10期停刊（1922年9月）。主要撰稿人有梁启超、蒋百里、张东荪、张君勱以及丁文江、瞿秋白、沈雁冰、徐志摩、郑振铎等。和以前相比，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减少，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内容增加，每期均开设一个研究专辑，如“新思潮研究”（3卷1号）、“废兵问题研究”（3号）、“自治问题研究”（4号）、“联邦研究”（5号）、“社会主义研究”（6号）、“教育问题研究”（7号）、“军事问题研究”（9号）、“制定省宪问题”（12号）等。除研究专辑外，每期还编发一些讨论中国政治、军事、经济问题的文章，此外还有关于历史文化及文学方面的文章。

之所以说《改造》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值得一书，是因为在1920年下半年到1921年初，《改造》发起了一场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1920年11月间，张东荪借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的机会，在他的《时事新报》和副刊《学灯》上发表了《内地旅行之又一教训》等多篇文章，公开宣称救中国的路不是社会主

义，而是资本主义。这篇文章的出台正值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向深入发展之时，它的发表，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向社会主义阵营公开宣战的信号。受到篇幅的限制，《时事新报》不可能刊登大块文章，于是《改造》就担负起了系统论证所谓社会主义在中国行不通的任务。其中以张东荪在3卷4期发表的《现在与将来》、6期的“社会主义研究”专辑中张东荪的《一个申说》、梁启超的《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彭一湖的《我对张东荪和陈独秀两先生所争论的意见》等文章为重要。他们举起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旗帜，以研究社会主义为名，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借口中国产业落后，说中国还没有形成工业劳动者阶级，因此不可能创造真正的工人政党，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故中国当务之急是要发展实业，走资本主义道路。很显然，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越来越普及的时候，他们极力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是为了阻止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

当时的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人纷纷著文对张东荪、梁启超的论调进行批判和斗争。《新青年》、《共产党》、《民国日报》等报刊与《改造》针锋相对。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章以大量的材料论证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针锋相对地指出，所谓先发展资本主义再谈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质在于帮助资本主义，取消社会主义。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工人只能永远做资本家的奴隶，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这场论战围绕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展开，极大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帮助中国的思想界、知识界提高了在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流派面前辨别真伪的能力。

蒋百里也参加了这场论战，他在《改造》第3卷第6期的“社会主义研究”专辑中发表了《我的社会主义讨论》一文。在文

章起始他就声明说“我对于经济问题及社会主义问题，从前根本没有研究过，现在正在探讨之中，这篇也不过是探讨时代一种杂乱的思想罢了，这就是说我并不是批评人，是要发表我自己的所见。”确如其言，蒋百里的这篇文章，无论是其论点的尖锐性，还是思想上的深度，与《改造》发表的其它反对社会主义的文章相比，都显得平实了许多。蒋百里的基本观点是：“救中国，只有一个我——就是各人就自己的眼光所看得到的、能力所做得到的、地位本分上所应当做的切切实实去做去”，“社会主义的运动，是一件急做慢成功的事。急做是理想上的进行，慢成功是事实上的趋势。”尽管蒋百里的态度比较温和，而且他在文章中对反社会主义的激进者有所劝导，但从他在文章中对张东荪给予的极高的评价还是不难看出他的思想倾向。他这样评价张东荪：“东荪从《旅行内地所出教训》起到《现在与将来》止，中间许多文章好象是一种极冷静的理性文章，其实中间有一个澈切的感情的冲动。这种感情是从空变实、从他到我、从外张变为内向。我于他文章的论断未尽可同意，可是他文章的动机是极可尊贵的。”<sup>⑥</sup>

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依托《改造》而发起的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正面论战，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化的标志。尽管在政治上主张并不是很多的蒋百里没有直接参与同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但作为《改造》杂志的主编之一，他又是在另一个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应该指出的是，张东荪、梁启超等和《改造》杂志在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实施的同时，他们从本质上已背叛了民主革命。

## 七、孤独苦旅

蒋百里是个极其勤奋的人，他在做编辑工作的同时，还写出

了大量的文章，仅发表于《改造》上的文章就有二十多篇，每篇都是重要之作，此外还有许多没署名的文章。这些文章涉及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文学等诸多方面，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世界军事大势与中国国情》、《论军民分治》、《裁兵计划书》、《如何是义务民兵制》等，这些文章代表了蒋百里早期的军事理论和思想。另外代表他的政治主张的文章有《同一湖谈自治的一封信》、《联省自治辨惑》等，他在以后的一段时期里，积极投身于推行联省自治，再次在政治舞台上显露身手。

蒋百里此时做学问取得的最大的成果是他完成了《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他早年留学德国、战后遍游欧洲，对西方文明有着较为深刻的感触。结合欧洲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联系到近几年来中国思想学术界的风云震荡，蒋百里产生了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完整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的念头。于是，他立即开始了《欧洲文艺复兴史》的著述，一直堆积在心中的感慨奔泄而出。

此时梁启超也进入了他一生中讲学著书最繁忙的时期，有时为了轻松轻松，他就会约上几位朋友到锅烧胡同来。左梅夫人得信后，早早沏茶备烟，很快，八圈卫生麻将开战。在牌桌上，蒋百里和梁启超谈的事多是他即将完成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他请梁启超为他的新著作序，梁启超慨然应允。

1920年12月，北京的雪下得特别早，就在瑞雪初飘的冬夜，蒋百里终于完成了他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他立即敦请梁启超拿出早已应允的序文。

梁启超认为欧洲文艺复兴史可与清朝中国文化作一比较研究，于是准备从论述清代学术的角度为蒋百里的著作作序。从这样一个角度作序与蒋百里著书的本意不谋而合，他自然赞同。梁启超“下笔不能自休”，不出一个星期写就长达六万言的序文。蒋百里、梁启超看了，都不觉哑然失笑，原来序文的篇幅超过了正文的长度，连梁启超自己都承认“天下固无此序体”，<sup>⑥</sup>梁公只好又

重新作一短序。倒是他把洋洋洒洒的原序修改后著成《清代学术概论》一书，请蒋百里为他作序后出版了。

蒋百里在《欧洲文艺复兴史》导言中叙说了他著此书的目的：“以中国今日之地位言，则社会蝉蜕之情状实与当时欧洲有无数共同之点：……一则新理性藉复古之潮流，而方向日见其开展；……一则旧社会依个性之发展，而组织日见其弛缓；……其间冲突傲扰之现象，与夫发扬蹈厉之精神，实与当时有声气相求、歌哭与共之致。察往以知来、规人以律己，则可知文化运动之来源有所自，而现状纷纭之不可免，且不足悲也。此则自反省方面有特殊之必要。”<sup>②7</sup>蒋百里以其睿智称赞欧洲文艺复兴“实为人类精神界之春雷，一震之下，万卉齐开。”他精辟地总结这场文化运动的成果主要有两点：“一曰人之发现；一曰世界之发现。”<sup>②8</sup>因而，他真诚地希望著述《欧洲文艺复兴史》能对“今日之所谓文化运动者，有一得之助。”<sup>②9</sup>

梁启超是个观察力特别细致的人，他在为蒋百里的书所作的序文中记述了他们当初启程赴欧洲时的一件小事。蒋百里曾对同伴说“吾此行将求曙光”，到欧洲后，同行者总是问蒋百里“曙光已得乎？”回答是“未也”。待即将归国时，又有人戏问蒋百里，蒋百里正色言曰“得之矣”。梁启超说他不敢断定《欧洲文艺复兴史》就是蒋百里所说的“曙光”，但他肯定地说这本书“皆百里自抒其心得。吾证其为极有价值之作。”<sup>③0</sup>《欧洲文艺复兴史》于1921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收入《共学社丛书》中，很快，初版告罄，不得不很快再版，到1927年该书发行了第五版。商务印书馆刊登广告称：“此书为蒋百里先生游欧时所著，叙论西洋文化之来源，简要精警，梁任公先生甚重其书，谓为求曙光之路，其价值可知。”<sup>③1</sup>

从1917年到1922年，中国政坛风云变幻，学习军事出身的蒋百里由于密友蔡锷的突然去世，使他在政治上站住脚根并准备

大展宏图的计划嘎然中止。尽管他还是从革命最发达的南方回到了北京，但他早就把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看透，再也不愿与之伍。毫无疑问，段祺瑞等对蒋百里是笑在脸上恨在心里。他游离于宦海之外，让过去的激情冷却下来，把追求和幻想暂时放在了一边，开始了淡泊而又不丧志的生活。

为了争权夺利，军阀们连年混战，甚至连政府都成其手中玩偶，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变做赌博的筹码。险恶的环境让他报国无门，使得在政治上相当单纯的蒋百里不可能继续幼稚下去，他开始走向成熟，军事救国的理想埋在了心底。在梁启超等师友的引导下，他弃武从文，走上治学之路，开始了一个全新生活。

尽管这一时期蒋百里在思想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工作对社会发展还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裁减军队、反对军阀政治以及在文化方面的工作等等。但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审慎地察看蒋百里这一时期的活动时，我们会非常遗憾地发现蒋百里没有把握住时代的脉搏。这个缺憾的产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蒋百里因师长和战友的缘分，自觉地成为了梁启超这一特殊的文化群体中的一个分子，甚至在这个沙龙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于在政治上很不成熟的他来说，自然是唯梁公大旗是瞻，而梁启超先生此时在政治上已落伍于时代为众所周知。第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之时，蒋百里正在欧洲考察，这次考察持续整整一年之久。对于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民主主义者来说，与五四运动失之交臂，无疑会在其主观思想上生成空白或断层，造成认识和行动上的滞后甚至掉队。

在此，我们有必要对蒋百里数十年来折历程作一个回顾，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现象，即每当社会或政治处于一次重大变革时，蒋百里总是与历史机遇擦肩而过。1903年的东京成为中国革命志士反清的大本营时，蒋百里在东京创办了《浙江

潮》，成为最具革命性的刊物，《浙江潮》鼓舞了万千仁人志士走上革命道路，可蒋百里鼓吹革命一年左右就没有再继续下去，他最终成为革命者的盟友。辛亥革命时，蒋百里也颇具革命思想，他甚至把在手下工作的李华英送到了黄兴的身边，可他却一直滞留东北和北京，没有毅然决然地投身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护国倒袁应该说是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作为倒袁的策划者之一，蒋百里功不可没，他们本还有一系列计划准备实施，可由于蔡锷将军的病逝，政局骤变，蒋百里的宏伟蓝图无法付诸实践。五四运动时，蒋百里随梁启超远行欧洲，错过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尽管他积极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但在政治主张上脉承了梁启超的思想，使得他不可能跟上时代的步伐。也就在《改造》大肆攻击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时，中国现代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一件伟大事件发生，这就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蒋百里此时的思想境界和生活空间来言，他不可能与中国共产党这个新兴的政治力量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唱一个曲目，更谈不上同声同调了。

凡此数次，蒋百里均与历史机遇失之交臂，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人生历程。在以后的民国史上，蒋百里成为一个著名的无党派人士，他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也只是保持了党友关系。

蒋百里朋友很多，但他的内心总是处在孤独寂寞中。

#### 注释：

①⑨杨天宏：《新民之梦——梁启超传》，第267、2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②⑫⑳㉑㉒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65、74、76、67、65页。

③④蒋百里译《职分论》，第1、20～2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6月。

⑤徐培根：《蒋百里先生之思想与著述》，载《传记文学》第20卷，第2期。

⑥蒋方震：《国防论》，上海，大公报代办部，第73页。

⑦《申报》1917年8月17日

⑧《北洋系最近分裂状况》，载《戊午周报》第18期。

⑩李吾：《蒋百里先生的生平》（四），载《春秋》卷12。

⑪目前所见材料多记述梁启超、蒋百里等人是乘日轮“横滨丸”赴欧，另有一说为“丸善丸”。据杨天宏《新民之梦——梁启超传》第286页记述：“因船位紧张，梁启超的另外三位随员乘别的船前往。梁一行所乘之船为‘丸善丸’而非‘横滨丸’，毛以亨《一代新锐梁任公》有明确说明。毛氏时赴欧留学，恰好与梁启超同乘一船”。本书从前者。有资料表明，共学社成立后毛氏得到资助而留学欧洲，见本章“共学社主谋”一节。

⑬⑭（美）约瑟夫·阿·勒文森著、刘伟等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259、260页，原注：材料出自《中国档案》7卷24期，第75~77、143~144页。

⑭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载《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

⑯美国国会图书馆制：《日本外务省档案》P51卷，转引自来新夏主编《北洋军阀史稿》第242页。

⑰见《每周评论》第20期《随感录》。

⑱薛光前：《蒋百里先生的军事思想》，载《传记文学》第15卷第2期。

⑲李永久：《记兵学大师蒋百里》，载《艺文志》第151期，1978年4月。

⑳孙中山：《关于五四运动》，载《孙中山选集》，第482页。

㉑金典戎：《军学泰斗蒋百里外传》，载《艺文志》第105期，1974年6月。

㉒海外有学者称蒋百里所言“新文化运动”是为五四运动首下评语者，见Chow Tse—tsung：《The May Fourth Movement》（Stanford, 1960）Introduction & Passim。实则不然，孙中山先生在《关于五四运动》中早有定论（引文参见本节），其界定应更准确于百里先生，但百里先生在文章及著作中也曾多次论及“新文化运动”（如《欧洲文艺复兴史》），亦是其睿智所现。

㉓张朋园：《梁启超民国初年的师友关系》，载《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3期，转引自台北天一出版社《梁启超传记资料》。

㉔梁启超：《蒋母杨太夫人墓志铭》，载《饮冰室文集》卷四十四。

㉕丁文江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台北，1958年。

㉖均见《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

⑳ Carson Chang: 《The Third Force in China》P64。转引自张朋园《梁启超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原载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馆刊》新6卷第1期。

㉑ 见《时报》1916年12月18日、1917年2月11日。

㉒ 关于北京松坡图书馆购买杨守敬先生藏书款数额有多种说法，陶著《蒋百里先生传》云该馆“以十万元购杨守敬藏书为基本藏书”，本书从陶说。

㉓ 蒋复璁：《石虎旧梦记》，载台湾《自由谈》15卷第5期，1966年5月。

㉔ 《发刊词》，载《改造》第3卷第1号。

㉕ 以上均见蒋百里《我的社会主义讨论》，《改造》第3卷第6号。

㉖ ㉗ ㉘ ㉙ 《欧洲文艺复兴史》梁序、第6、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4月初版。

㉚ 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第2~3页。

㉛ 见《欧洲文艺复兴史》封底广告页。

## 第六章 在军阀混战中沉浮

### 一、极力推行联省自治

在1921年前后，梁启超、蒋百里在政治方面的实践主要是极力推行联省自治。梁启超早就宣布脱离政治舞台的，蒋百里也宣称他因不愿做“走狗”或“买办”而“不为政治运动矣”<sup>①</sup>。实际上他们只是不再谋求官职，对中国政治时局的发展则一直十分关注，人称他们是议政官场之外。在社会主义论战开展的同时，另一种政治思潮悄然传播开来，这就是地方自治思潮。梁启超、蒋百里、章太炎、胡适、高一涵等都曾极力鼓吹和宣传地方自治，蒋百里和梁启超更是积极投身于具体推行之中，由此激发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联省自治”运动。

所谓“联省自治”是中国走西方联邦制国家的道路，各省实行自治，然后召开联省会议，成立联省自治政府，最终建成联邦制国家。其产生的背景主要是由于直系军阀吴佩孚凭借英、美列强的支持，企图以武力统一各省，使得内战规模日趋扩大，结果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一方面各省遭受军阀战争痛苦最深的工商市民与地主绅士要求地方和平，另一方面哪些缺乏依附、地位动摇的地方军阀要求加强割据。”<sup>②</sup>于是，各省军阀为了保全自己的势力范围、抵制直系军阀和外省军队的侵占，纷纷打出了“联省

自治”的旗号，从而在客观上为梁启超、蒋百里等人推行地方自治提供了较好的政治土壤。

从欧洲游历归来后，蒋百里特别推崇瑞士的政治、军事制度。他说瑞士“好像上帝特地造他出来，给二十世纪欧洲各国，做政治上军事上的模范似的。”在同好友湖南人彭一湖探讨自治问题时，他表示“湖南很有可以做瑞士的资格，所以我对于湖南的自治运动，特别感觉得有兴致。”他还认为，自治不管如何进行，“第一要事就从人民生活安全上的必要着想”。<sup>③</sup>的确，自治运动首发于湖南，鉴于湖南多少年来一直是南北军阀冲突的主战场，湘省人民饱受蹂躏之苦，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提出了“湘人治湘”的口号，以自治来抵制外省军阀的侵入。蒋百里、梁启超一直关注着湖南的自治，应湖南名流熊希龄、范源濂等人之请，梁启超为他们草拟了《湖南省自治法》等参考材料。蒋百里则应湖南省政府邀请，数至长沙，在岳麓山举行的“名流演讲会”上发表演讲，并直接参加了湖南省宪的制定工作。前后奔波一年之久，1922年新年到来之际，湖南省宪热热闹闹地公布。在湖南宣布“湘人治湘”后，1921年6月，浙江军督卢永祥通电主张各省制定省宪，实行地方自治，然后组成联省自治政府。卢永祥组织了省宪法会议，并不在浙江的蒋百里当选为制宪议员，一时间，蒋百里穿梭于北京、杭州之间，参加了浙江省宪的制定。梁启超在京曾集陶诗作联赠他：“相期各努力，别后辄相思。”

联省自治在南方一些省份确实红火过几天，如四川、湖北、广东、广西、云南等都先后都公布了省宪法，“在这时期，省宪成了最时髦的玩意儿，”甚至梁启超还为正在准备穷兵黩武的吴佩孚也起草了一份《联省会议宣言书》。自然，吴佩孚从未想到过将这份宣言书付诸实施。联省自治本来就是武夫们的政治幌子，以自治之名，行割据之实。正如平心先生所言：“在军阀的枪刺下，所谓省宪运动只不过是飘荡于空中的肥皂泡”<sup>④</sup>。1922年6月，中国共

产党发表了对时局的主张，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联省自治不但不能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并且是明目张胆地为提倡武力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总之封建式的军阀不消灭，行中央集权制，便造成袁世凯式的皇帝总统；行地方分权制，便造成一般武人割据的诸侯，那里能够解决时局？”<sup>⑤</sup>

梁启超、蒋百里等一批主张“联省自治”的知识分子出于对政局前途和人民生活的考虑，针对中国政治动乱、内战连绵的局面，认为军阀相互斗争企图控制中央政权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因而提出效法西方联邦政治体制，以联省自治虚化中央政府的改良措施。作为蒋百里等个人毫无所求，他们寄托的希望之大、行动上用心之良苦，的确令人感叹。无奈赳赳武夫只是借助名流们的声望，大行割据之实，一旦其地盘扎牢固了，宪法也好，自治也罢。一旦战火燃起，野心膨胀之下，谁都不愿让宪法给自己拴上一根绊脚索，因之联省自治立刻流产。

## 二、重入军界

“联省自治”前后闹腾了两年左右，蒋百里也就奔波了两年。1923年心力交瘁的蒋百里回到北京后再也不想东奔西走了，此时他的五女出生，蒋百里自觉心中有愧，便准备好好陪陪夫人。他建议全家到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西山去住一段时间，一来夫人可以静养复元，二来他也可做做文章。可左梅因刚出月子，不想大动，再说郊区总比不上市内方便。但在蒋百里的一再劝导下，他们还是去了西山。

一上西山，左梅就后悔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他们要居住的房子蛛网尘封，潮气霉味扑面而来，令人不愿进门。一番清洁之后，勉强住了下来。不久，左梅就病倒了，她得的是产后病。蒋

百里端水送药，问暖嘘寒，一时顾不上写作。眼看西山确实不能再住下去了，蒋百里夫妇只得下山。刚到锅烧胡同，就见长女蒋昭双眼含泪扑了过来。原来蒋百里的母亲仙逝于浙江老家，丧电刚到。蒋百里自幼就十分孝敬母亲，与母亲相依为命数十载，曾有割臂疗母的孝举，感情无比深厚，因而，母亲的逝世使他十分悲伤。他把左梅安排到北京的德国医院去疗养，自己当天就南下奔丧。梁启超得知消息后，曾撰写了《杨太夫人墓志铭》。蒋百里在硃石治丧七七四十九天，方才返京。

1923年北京一直是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等人的戏台。还是在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吴佩孚在冯玉祥的支援下打败了张作霖，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方的局面。曹锟为了早日当上总统，准备驱逐由皖系支持的总统徐世昌，吴佩孚则主张把黎元洪从天津请到北京复位，过渡一下后，再选曹锟出任总统。由于吴佩孚和冯玉祥此时联合紧密，力量雄厚，曹锟不得已同意了吴佩孚的主张。

黎元洪本已息影津门无所事事，突然间又当上了总统，深感意外亦格外来劲，他准备一口气当到1925年9月方为任职期满，并要先制定宪法后选下届总统。曹锟哪里等得到那一天，他放出风来：1923年必选新总统。果然，曹锟施展手腕开始逼黎退位。1923年6月间，曹锟及其手下的表演达到高潮，先是曹锟雇佣所谓“公民团”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要求黎元洪下台；接着内阁又集体辞职；随后冯玉祥、王怀庆的部下百余名中级军官径直闯进黎府索要军饷；再往后围困黎宅、停电断水等等诸多手段全都用上了。这种种手段把黎元洪整得无法正常生活，无奈之中他只得交出总统宝座，再返天津，方才得到安宁。然而他窃喜的是他凭空又多做了一年的总统。

冯玉祥的地盘原本在陕西，因助吴佩孚打东北军而到了河南，张作霖被赶走后，他就坐上了河南督军的位置，驻扎在开封。冯

玉祥对蒋百里敬慕已久，他曾编辑了一本古今军事名人治军格言，小册子中把“蒋方震曰”同“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等名人名句相并列，发给他的部下将领人手一册。为了训练部队，他特地把蒋百里请到开封，给官兵们讲课。这可是蒋百里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首次接触军事和军界，因而他欣然前往。冯玉祥本想长期聘请蒋百里的，可是盘踞洛阳的吴佩孚对卧榻之侧盯得十分紧，不可能让冯玉祥在河南发展。他略施计谋，把冯玉祥保举到北京做了陆军检阅使。冯玉祥明知这是明升暗降，也明白这是势力范围之争的结果，然而面对势头日升的吴佩孚，他只得忍了下来。

到了北京，冯玉祥根本就没去当那个官，而是把手下拉到南苑埋头练兵。这样，他请蒋百里为官兵讲课就更加便利了。冯玉祥回忆说：“远在逊清光绪三十年，我在天津就买到一本百里先生的著作，那本书便立刻变成我的好朋友，每天都抽出功夫来读几段。民国十二三年，在南苑练兵的时候，我特敦请百里先生来对营长以上的官长讲战术，百里先生对我直接间接的帮助很不少，从这里可以看出。”<sup>⑩</sup>冯玉祥有心请蒋百里出任他的参谋长，但蒋百里一直犹豫未决。他浙江葬母回京后，冯玉祥的五个旅长联名宴请蒋百里，为他压惊接风。席间，旅长们把冯玉祥的意图再次提出来，蒋百里还是岔开了话题。此时的冯玉祥正与曹锟一起在大行逼黎让位的手段，蒋百里从心底不愿搅和进去。

与冯玉祥断绝来往是由一件很偶然的事引发的。6月13日这一天，蒋百里按约来到南苑张之江旅部，准备讲课。突然电话铃急响不停，当时室内别无他人，蒋百里就接了电话，只听对方兴高采烈地报告：事情已经办好，黎老头儿已经出京了！蒋百里刚放下电话，张旅长急匆匆进了屋子，蒋百里将电话一事告诉了他，张旅长颇觉尴尬地征询蒋百里的意见。蒋百里正色道：“总统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总之应求政治解决，军人不应该有这样的动

作。”<sup>⑦</sup>

蒋百里一向主张军队应独立于政治之外，对于军队参与政治纷争并且还逼总统下台，他自然不与苟同。此后，他再也未到冯军中去讲课。

蒋百里和吴佩孚从未有过交往，但就黎元洪出任总统一事，蒋百里将曹锟与之对比，他还是颇觉吴佩孚有些正义之气。吴佩孚的臂膀之一张志潭是蒋百里的好友，他向吴佩孚推荐了蒋百里。吴佩孚听说蒋百里曾经自杀一事便颇不以为然，他说：“蒋某不算汉子，古今英雄，设均一死了之，还能成就什么事业？”不过在张志潭介绍了蒋百里的军事才能后，旧式军人出身的吴佩孚道：“世界兵书，莫过于孙吴、春秋、左传，今人数典忘祖，曷胜浩叹！不过蒋某若愿来此，未尝不可斟酌。”<sup>⑧</sup>这是吴佩孚第一次比较详细地了解蒋百里的情况。随着蒋百里的事情不断地从部下口中讲出，刚愎自用的吴佩孚彻底改变了对蒋百里的看法，他有心想把蒋百里拉入帐下。

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大战败退东北后，一直耿耿于怀，企图寻机复仇。就在黎元洪被逼退位后，曹锟于10月采取贿赂等卑劣手段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他的这一丑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孙中山率国民革命军在广东下令讨伐曹锟，张作霖也通电反对，并且准备出兵关里，第二次直奉大战在即。

为了应付不测，曹锟于1924年9月12日召吴佩孚进京，主持讨奉战役。吴佩孚进京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在四照堂威风八面地点将，命彭寿辛、王怀庆、冯玉祥为讨奉一、二、三路军，准备出兵东北。点将之后，吴佩孚立即于17日秘密会见了蒋百里。吴佩孚自有其用意，蒋百里曾在东北训练新军、建设边防，此次攻打张作霖，如果能请蒋百里出山助一臂之力，那这仗就好打多了，况且蒋百里与张作霖还有一笔生死账未了。因此，吴佩孚满脸客气、满怀谦逊地说：“您在东北多年，那边的情形很熟悉，我

想请您同去辛苦一趟。”蒋百里从心底里是赞成出兵东北的，姑且不论张作霖曾有追杀他的举动，就论他们绿林响马的出身，蒋百里也觉得应该将这些旧军全部淘汰。但蒋百里婉言谢绝了吴佩孚的邀请，大概仍然是他不愿陷入政治纷争之中的缘故吧。

吴佩孚对蒋百里的谢绝颇感意外，因为在人欲横流的乱世，像蒋百里这样苦守淡泊的人还真不多见。吴佩孚不愿失去蒋百里这样一个军事人才，便转而请蒋百里在他出兵东北时负责安定南方的局面，他准备划拨两个师给蒋百里，让他坐镇湖南。<sup>⑥</sup>蒋百里对湖南相当有感情，好友蔡锷长眠于长沙，近几年每到岳麓枫红之时他均到湖南祭奠亡友，时任湘军总司令的老同学赵恒惕总是亲自陪同。另外，驻防湖南南大门的大将唐生智更是蒋百里的得意门生，湖南军界中蒋百里的保定弟子最多且都为手握兵权的将领。如果真让蒋百里率军驻扎湖南，相信绝非难事。吴佩孚所谓南方的安定问题，无非是提防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把湖南作为保护直系地盘的第一战场。上述方方面面的情况，吴佩孚心中清楚，蒋百里心里也明白。应该说，吴佩孚不愧为一代枭雄，他两请蒋百里出山所选择的切入点都恰到好处。但蒋百里既不愿搅进东北战事，更不愿成为南北战争的梗阻，他同样谢绝了为吴佩孚带兵南征的请求。

虽然如此，但是面对吴佩孚推心置腹的请教和军事上的倚重，蒋百里大受感动。要知道他和吴佩孚无任何渊源，完全是个局外人。

第二次直奉战争双方各投入 25 万兵力，可仗并没有大打起来。10 月中旬，山海关一仗，直军节节败退，尽管吴佩孚亲临督战，也未能抵挡住奉军的进攻，一时间军心大乱。冯玉祥率军在喜峰口一带一直没有大动，他见直军败象毕露，决心倒戈。10 月 23 日，冯玉祥由热河前线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致使直奉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冯玉祥逼迫曹锟下令解除吴佩

孚的职务，并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决定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暂请段祺瑞出面改组政府，维持时局；将自己所率各部改称国民军。大势已去的吴佩孚于11月5日带残部南下湖北，曹锟同时下了停战令和罪己令，第二次直奉战争即告结束。

### 三、众醉独醒

就在冯玉祥出兵喜峰口时，蒋百里还去为他送行，可没想到冯玉祥突然倒戈，北京城顿成冯氏的天下。而吴佩孚一夜之间，血本亏空。蒋百里念及吴佩孚对自己的诚恳相待，当他得知吴佩孚尚在秦皇岛一带时，他立即决定去看望吴大帅。

就在冯玉祥倒戈的当天，京津交通已经中断，蒋百里急匆匆赶到北京饭店，找到了住在饭店的友人王赓。经王赓介绍，蒋百里搭乘美国大使馆的车到了天津，随即赶往秦皇岛。蒋百里原以为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吴佩孚一定情绪低落。但当他见到吴佩孚后才发现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吴佩孚毫无沮丧，依旧大模大样地入座，大口大气地讲话。他一会儿和蒋百里论谈《易经》，一会儿又挥毫习字，四照堂点将的威风依旧不减。吴佩孚根本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他认为实力尚存，只要把部队集结起来，别说是冯玉祥，就是张作霖和南方革命军联合起来也经不住他的一击，冯玉祥的倒戈仅仅是延缓了他胜利步伐而已。蒋百里谈了许多军事战略方面的问题，但刚愎自用的吴佩孚全都听不进去。蒋百里决定自己去想办法帮吴大帅一把。

蒋百里从天津径直南下到上海，在慕尔鸣路租了一所房子，又派人把左梅母女们从北京接到了上海。一切安定后，蒋百里去了杭州，恰巧蒋百里在好友张宗祥家里遇见了孙传芳，一番密谈之后，孙传芳如获至宝地把蒋百里请去，任命为总参议。孙传芳此

时已是直系中雄起的一大巨头，独镇东南。经与孙传芳密谋，蒋百里请孙传芳团结直系的残余力量，然后由蒋百里负责与广东国民革命军联系，共同对付张作霖的奉军。孙传芳对蒋百里的计划十分赞同，但他认为直系重新团结起来后，还是应由吴佩孚来主持大计，参谋长则应由蒋百里出任，否则仍将前景难卜。是否当参谋长，蒋百里倒没有去考虑，他首先派学生刘文岛、李拯中赴广州。

1925年10月，孙传芳宣布起兵讨奉。此时张作霖又与冯玉祥发生了冲突，吴佩孚趁机以汉口为根据地，掀起了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的旗号。孙传芳首战攻打由奉系杨宇霆任都督的江苏。杨宇霆是比蒋百里稍晚一点的士官同学，此时，蒋百里是孙传芳的幕府，时常到南京来访问，从蒋百里的口中杨宇霆对孙传芳的动态多少也知道一些。本来，杨宇霆到江苏来任职时一兵一卒都没带，根本就没准备在江苏久留。风向稍有不对，他便乘座早已准备好的车往北而去。这样，孙传芳的部队只是放了几排冷枪就占领了六朝古都南京，接管了江苏地盘。

按蒋百里的计划，孙传芳立即敦请吴佩孚到南京来。可吴佩孚此时不敢从湖北抽身，因为原本是他的嫡系身任鄂督的萧耀南对日暮西山的吴佩孚到湖北来建根据地颇怀不满，吴佩孚无可奈何，不敢贸然离开湖北。孙传芳开始还力请吴佩孚速下金陵，可等他的部队北上打了几个大胜仗，将上海、淞江、徐州等地占领后，他又不愿吴佩孚来江苏坐享其成了，吴佩孚迟迟不来，他也就不再催了。到11月，孙传芳在南京成立了浙、苏、闽、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

孙传芳的地盘愈来愈大，可人也变得越来越奸诈难处。蒋百里原本对孙传芳期望颇高，希望他能与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联合。可孙传芳此时已非往日可比，他自恃兵多地阔，对蒋百里的劝言毫不放在心上。终于，蒋百里决定与孙传芳分手了。事情的起因是

一次秘密会议，当时孙传芳密召蒋百里和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江苏省长陈陶遗商讨与南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蒋百里与陈仪均主张与南方革命军合作讨伐奉系军阀，蒋百里还提出了具体计划：由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沿津浦线向北进攻，革命军则沿京汉线向北出击，两军齐头并进，会师京津，最后完成统一全国的目标。此时，蒋介石的代表张群也秘密来到了南京，争取孙传芳的合作。对蒋百里的建议，孙传芳有些动心了，他决定召开军事会议，公开征求五省将领的意见。于是密谈在非常和谐的气氛中结束。不料，在五省将领的军事会议上，苏军将领陈调元突然站出来主动请缨，要与革命军决一死战，号称“讨赤”。向以口舌圆滑而著称的陈调元慷慨陈词，把各省将领说得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孙传芳一见本不是自己嫡系且向来以害怕冒险牺牲的陈调元决心尚且如此之大，顿觉五省联军大有可为，当即拍板：与南方革命军决一雌雄！

蒋百里和陈仪见状，知道孙传芳变卦了，连忙将其劝入密室作最后的规劝，蒋百里说：“雪轩（陈调元字）的话是靠不住的，你莫上他的当。”孙传芳当即表示：“我一定不会打，你们不要不相信我。”可是，在拍胸发誓的同时，孙传芳已经向江西前线增派兵力。蒋百里顿觉孙传芳不可与谋。后来的事实证明蒋百里对形势的判断极为准确，五省联军中，陈调元是第一个起兵响应南方革命军的。

想着四照堂与吴佩孚的密谈，对比此次与孙传芳的密谈，蒋百里总觉得他应该去帮助吴佩孚重整河山。于是，他离开了孙传芳，偕夫人左梅化装西行到汉口去见吴佩孚。吴佩孚对蒋百里的到来非常欢迎，他立即聘请蒋百里出任讨贼联军总参谋长。<sup>⑧</sup>这时，由于萧耀南急病去世使得吴佩孚在湖北占稳了脚根（萧耀南实际上是被吴佩孚派人毒死的）。从冯玉祥倒戈反吴以来，经过一连串的挫折，吴佩孚对蒋百里比以前更加佩服了，虽然他依旧盛气凌人，但对蒋百里却恭敬备至，言必称先生，见面必离座相迎。

当了总参谋长，蒋百里和左梅的生活还是一如往日简朴。1926年阴历三月初七是吴佩孚52岁的寿日。头天夜里，吴夫人请了几位高级将领的夫人在大帅私邸搓麻将，为吴大帅暖寿。左梅对第二天的拜寿不感兴趣，心直口快的她便在众夫人面前向大帅夫人告假，她说自己没有礼服，而且也穿不惯礼服。吴夫人平素就与左梅很要好，她坚持要左梅出席明天的寿宴，并且嘱咐吴佩孚手下大将靳云鹗的夫人明天给左梅送一套礼服去。

第二天一大早，靳夫人果然拿着礼服来请左梅，左梅推辞半天，就是不愿去，弄得靳夫人左右为难。后来还是蒋百里固请，左梅才穿上礼服跟靳夫人去了吴府。这一天，达官贵人、爱将重臣全都汇集汉口巴黎街吴府，为吴佩孚贺寿。男人们都在客厅寒暄应酬，夫人们则在吴佩孚的书房、内室开起了雀战。淡雅简约的左梅与珠光宝气的夫人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若是别的俗气之人，恐怕早就呆不住了，可左梅却坦然处之，显得落落大方。寿宴开始，蒋百里等一些作为最受尊敬或与吴佩孚最亲近的宾客被安排在大帅卧室里一席。席间，蒋百里开怀豪饮，谈笑古今，风采令众人倾倒。

与吴佩孚相处不久，蒋百里再次感到吴佩孚在军事上的不可取和不足谋。蒋百里为他设计的蓝图是：联合南方国民革命军，紧密依靠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把力量团结起来对付张作霖。在当时的形势下，蒋百里的计划是非常正确的，特别是与广东联合具有积极的革命意义。他派往广东的学生刘文岛已被广东军政府委为驻湖南唐生智部的党代表，唐生智也加入了广东国民革命军。李拯中则在广东革命大本营做了陈铭枢的副长官，而陈铭枢亦是蒋百里执掌保定军校时的得意门生。有如此良机，若是吴佩孚听从蒋百里的言计，那么他的发展定将是另外一个结局。可惜吴佩孚死活听不进蒋百里的劝告，他一门心思要打败冯玉祥，消灭张作霖，去掉唐生智，然后扫荡广东，武力统一全中国，全然没有意

识到他已成为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头号敌人，并且处在广东和冯玉祥的夹击之下。为了能打掉冯玉祥，吴佩孚又暗地与张作霖勾结，成立所谓“反赤联合战线”，以期对冯玉祥进行南北夹击，并且吩咐不许让蒋百里知道这一切。见此情形，蒋百里深感呆在吴佩孚幕府已无多大意义，他顿生去意。

蒋百里立即和夫人回到上海慕尔鸣路住所，连军饷都没有索要。到沪上，他就通电吴佩孚辞职。吴佩孚见了蒋百里的明码电报，心里老大不高兴。他想，人已离去，何苦要让满天下都知道呢！没过多久，不识时务的吴佩孚便成了历史的绊脚石，冯玉祥仇视他，孙传芳回避他，张作霖也看不起他，关键的是广东国民革命军已经开始准备北伐了。成为局外人的蒋百里把形势看得更加明了，他深知吴大帅往日常胜不败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但他不忍看见吴佩孚最终落到身败名裂的惨境，便密电吴佩孚，劝他隐退归山，或能保全身名。<sup>①</sup>吴佩孚错把好心当恶意，觉得蒋百里是落井下石，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蒋百里在上海的生活比在北京更为困难，若不是有朋友从中接济，日子简直没法过。在上海，徐志摩经常过来看望蒋百里夫妇，蹇念益更是住在他家，蒋百里把他当初在秦皇岛与吴佩孚的谈话记录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发现那时蒋百里对时局的分析和预测惊人的准确，深叹吴佩孚没有听从蒋百里的计谋。徐志摩把这份记录手稿讨了去，他要长期保存。

唐天如是经蒋百里介绍而成为吴佩孚的副秘书长的。一天，他和吴佩孚夫妇共同进餐，在席间，唐天如偶然谈到蒋百里近况，说：“他近来更穷。大帅虽和他意见不合，老朋友毕竟是老朋友。我想到上海看他一趟。”吴佩孚听了，不觉心中一震，他转身找夫人拿了800元钱，300元作为唐天如的旅费，500元指名赠与蒋百里补贴生活。唐天如到了上海，劝蒋百里回汉口和吴佩孚见一面，以弥补当初不辞而别的遗憾，唐天如这样评价吴佩孚：“他既不贪财，

又不惜死，毕竟还算得上磊落光明的旧式军人。思想落伍是时代铸就了的，五十以上的人要改变也改变不了。”蒋百里对唐天如的一番话颇有同感，更为吴佩孚的胸怀所感动，便决定到汉口一趟，他邀请唐天如一道同往，但唐天如已决意离吴佩孚而去，他回绝了蒋百里的邀请，到香港做隐士去了。

蒋百里溯江而上，到汉口和吴佩孚见了面，他们在一起客气无比地吃了几顿饭，聊了几次天，绝口不谈军事和政治。吴佩孚对蒋百里当初不辞而别以及后来的几封电报都没往心里去，大概他此时已彻底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不得不承认蒋百里的正确判断，再说他也不是那种记仇结恨之人，因此前嫌尽弃。

蒋百里和吴佩孚黯然分手后直奔长沙，他在那里和唐生智、陈铭枢都见了面，了解了国民革命军的基本战略，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由于他和吴佩孚情到义尽，尽管吴佩孚已是覆巢危卵，他也无能为力，小住数日后，他径直回了上海。

#### 四、初见蒋介石

1926年5月，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进入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在湖南的唐生智立即率部改称国民革命军，加入到北伐战争中来。7月，国民革命军八个军约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指挥北伐。由于湖南唐生智早已加入革命，因此叶挺独立团顺利进入长沙。8月底，独立团打到鄂南，在汀泗桥、贺胜桥与吴佩孚的主力展开两场激战，打得吴佩孚元气大伤。随后，叶挺率部乘胜向武汉进军，迅速占领汉阳和汉口。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吴佩孚的主力基本被消灭。

吴佩孚的失败已在蒋百里的意料之中。孙传芳见蒋百里逗留

沪上无用武之地，便请丁文江出面劝蒋百里就任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参谋长。丁文江此时所任淞沪督办还是蒋百里转荐的，他们有着数十年的深交，蒋百里碍不过老友的情面，只好到了孙传芳的幕府。当孙传芳求教于他的时候，他坚决主张孙传芳联合国民革命军，甚至可以将孙部纳入国民革命军的统一指挥之下，让孙传芳的部队从津浦线、国民革命军从平汉线齐头并进，最后会师北平，完成统一大业。这个主张是拯救孙传芳的唯一可行之策，但孙传芳恃兵强马壮，听不进蒋百里的良言。孙传芳与北伐军顽固对抗一阵后，于11月8日丢掉了南昌，主力被歼，自己仓皇逃回南京，再步吴佩孚的后尘。

蒋百里先后出助吴佩孚、孙传芳两个握有重兵的军事大户，却两次看着他们走向失败，他这个军事顾问简直就是摆设。台湾有学者评得好：“识者以为孙氏不如吴氏甚远，此番辅佐，何能有所为？不过军阀一时高兴，徒藉先生之名，虚张声势而已，先生一世英名，因而大减。”<sup>⑩</sup>

随着北伐战争的不断胜利，全国革命的中心已从南方转移到长江流域。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1927年2月21日，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办公。3月24日，在蒋介石的指挥下，北伐军攻占南京，打下了孙传芳的大本营。然而不幸的是，北伐战争的胜利，只不过为蒋介石发家创造了条件，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他到处收编旧军阀部队，势力不断扩充，革命胜利的果实被剽窃殆尽。

进南京城后，蒋介石就命刘文岛派专车迎蒋百里到南京，他对蒋百里也是恭敬有加，和吴佩孚一样，言必称“百里先生”。早在刘文岛受蒋百里之命初赴广东时，蒋介石就希望蒋百里能加入国民革命军，那时广东方面正处在筹划北伐的关键时期，蒋介石对刘文岛说：“百里先生如肯参加革命，对革命事业的进展必然大有帮助。他是老成持重的稳健派，稳健派参加革命，能使国人更

加认识革命的重要性，具有提高士气和转国际观感的双重作用。”<sup>⑤</sup>

在南京三元巷总部，蒋介石和蒋百里多次会谈，所谈内容涉及军事方面很少，主要是对时局和外交形势进行分析。蒋百里认为，国民党统一中国只是时间问题，今后的主要问题是在外交方面，“特别是日本，如果日本对中国的革命军有所疑虑，必然会引起无穷的纠纷。革命军在对内打倒军阀的这一个阶段内，断无对外打倒帝国主义的双重力量。估计当前形势，对日本宜采缓兵之计，使之孤立。而不和国内残余军阀发生勾结；等全国统一完成国防建设后，再和日本清算不迟。”<sup>⑥</sup>蒋百里的指导思想是集中力量打击军阀，消灭武装割据，建立统一的革命政权，然后再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蒋介石对蒋百里的分析深为满意，因为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准备背叛革命，独吞革命胜利的果实了，所以他急需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

就在此时，由于受国民党反革命右派的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出现了裂痕。4月12日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清党运动”，大肆杀害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随后，武汉政府在汪精卫的把持下迅速右倾，于7月15日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在“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大屠杀。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破裂，国民革命宣告失败。

在反共上的一致并不能代表蒋介石和汪精卫等人在私利上的没有冲突。旧军阀被打倒了，新军阀又生成了。国民党各派的纷争突出表现为宁汉对立，蒋介石、汪精卫双方都想把国民党中央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蒋介石以“反共先锋”自居，汪精卫则称自己是孙文主义的“正统”。为了打击蒋介石挟持党军，实行个人独裁，汪精卫策动唐生智准备东征蒋介石，他同时还暗中活动南京政府中的李宗仁等桂系倒蒋。一时间，蒋介石处境颇不好受，他干脆宣布下野。汪精卫乃踌躇满志地赴南京主持党政大权，可桂

系和胡汉民等人横空出世，认为汪精卫过去与共产党联系紧密且反共又晚，不能进中央，要他引咎辞职。汪精卫快快回汉，与唐生智等成立了武汉政治分会。此举更是激起了由桂系把持的南京政权的愤怒，10月，李宗仁率军攻打唐生智，唐生智大败后放弃武汉，退守湖南，本人宣告下野。

军阀纷争固是其本性所致，实不足赘述。但这其中有位人物以后的沉浮直接影响到了蒋百里的命运，他就是在这一时期红火了一阵子的唐生智。

#### 注释：

①见《改造》第3卷第1号，第103页。

②①平心：《中国现代史初编》，第262、265页。香港，国泰出版社，1940年8月初版。

③以上均见蒋百里：《同一湖谈自治的一封信》，载《改造》第3卷第4号。

⑤《先驱》第9号。

⑥冯玉祥：《我与蒋百里先生》，载《蒋百里抗战论集》，浙江金华，新阵地图书社，1939年4月。

⑦①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85、95页。

⑧②李永久：《记兵学大师蒋百里》，载《艺文志》第151期，1978年4月。

⑨参见李吾：《蒋百里先生的生平》（五），载《春秋》卷12第6期。

⑩蒋复璁：《先叔百里公年表》，载《蒋百里全集》（六）第41页。

⑬王成斌等主编《民国高级将领传》（三），第482～48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⑭谭慧生：《蒋百里》，载《民国伟人传记》，第304～305页。

## 第七章 翻云覆雨荣辱间

### 一、梦断孙吴

吴佩孚、孙传芳接连被北伐军打败，蒋百里尽全力挽辔拉缰亦未能阻止住这两位驭着瞎马的盲人。他们的失败实际上证明了蒋百里军事战略方针的正确，但这以无数的生命和鲜血得到的证明令蒋百里悲叹不已。每天都坚持读报的他可以说是以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的角度和感情目睹了两个巨头的轰然倒下。

这两位曾傲视群雄的军阀的失败还击碎了另外一个时刻注视着他们的人的一系列梦幻，这个人就是在政坛沉寂已久的梁启超。

孙中山先生和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充满生机的合作，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蓬蓬勃勃兴起，使得南方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广东成为中国政治上生命力的源泉。在新的历史潮流中梁启超固守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不变，很快他就被时代所超越，原有的政治思想界旗手的桂冠不再闪烁出奕奕光彩，他已开始了悲剧性地退出政治思想舞台的历程。

但梁启超时刻不能忘怀昔日的辉煌，尽管他正在被时代潮流所扬弃，但他本人则从未曾有过老马失途的感觉。在他过去的政治生涯中，有数次功亏一溃而令他扼腕长叹的时刻，其中最令他遗憾的就是护国战争时期，他与蔡锷、蒋百里导演的推倒袁世凯

的那一幕。蔡锷、蒋百里既是他的学生，又是他生活中的朋友，在政治主张上他们还是盟友，是这两位军事奇才直接启发了梁启超建立军队、拓展地盘的战略思想。护国战争一起，西南三省就在蔡锷的控制之下，广东、广西也经他努力和护国军结为盟友。在强大的护国运动面前，袁世凯不堪一击，很快倒下台来。他们都成了手扶民国的伟人，政治前景无比光明。可惜蔡锷不待革命彻底成功便一病不起，本可继而为之的蒋百里为了朋友又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个机会。等蒋百里再行入川时已是星移斗换，彻底失去了掌握兵柄的机会。梁启超的计划也就随之破灭。现在由于蒋百里在军界中的一系列活动使得梁启超再起勃勃雄心，他时刻准备着再次登上政治舞台。

还是蒋百里在孙传芳幕府之时，梁启超就极为关注他。当孙传芳起兵伐奉时，他就认为这是他个人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在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梁启超满怀激动地说：“百里现在长江一带。军界势力日益膨胀，日内若有战事，他便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因此牵率老夫之处亦不少。他若败，当然无话可说，若胜，恐怕我们的政治生涯不能不复活。”<sup>①</sup>但蒋百里与孙传芳并不投机，他转而成了吴佩孚的参谋长，这使得梁启超空为欢喜，不过他仍旧相信蒋百里会为他带来新的转机。当吴佩孚败象已显时，蒋百里又从武汉回到上海，由于丁文江的固请，他再次成为孙传芳的幕府中人，梁启超也再次寄以厚望。这时北伐的号角已经吹响，叶挺、唐生智率军直扑武汉，而孙传芳还想安坐江东观两湖，期收渔利。

北伐战争的打响，翻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重要的一页。梁启超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和蒋百里的行踪，但他由于政治思想上的落伍，对这场战争的认识产生极大的谬误，他在写给子女的信中说：“时局的变化积剧，极重要，他（指蒋百里，著者注）最得力的几个学生都在南边，蒋介石三番四覆罗致他，而孙传芳又卑礼

厚币要仗他做握鹅毛扇的人。蒋、孙间所以久未决裂，都是由他斡旋。但蒋军侵入江西，逼人太甚（俄国人逼他如此），孙为自卫不得不决裂。我们的熟人如丁在君、张君勱、刘厚生等都在孙幕，参与密切，他们都主战，百里亦不能立异。现在他已和孙往前敌去了。……这几天江西的战争关系真重大，若孙败以后，黄河以南便全是赤俄势力；（百里当然跟着毁了）若孙胜蒋介石败，以后便看百里手腕如何。百里的计划是要把蒋介石与唐生智分开，蒋介石败后，谋孙、唐联合。果能办到此者，便当开一崭新局面。国事大有可为，不能不付诸气数了。”<sup>②</sup>显然，梁启超对蒋百里抱着相当大的梦幻，他甚至立刻就想到了要“开一崭新局面”，可惜他对时局的期望只是一厢情愿。孙传芳重走吴佩孚的覆辙，使梁启超所图顿成泡影。

孙传芳行将走入末途时蒋百里已离他而去，这时蒋介石已请刘文岛带言给他，“颇欲任方震为总参谋长”，<sup>③</sup>刘文岛得此言后，立即分访国府要人，“都以百里的名望太高，想请他负责比较实际的责任。……百里如到广州，大家想借重他担任革命军的总参谋长。”<sup>④</sup>可此时的蒋百里对所谓的参谋、顾问之类的事兴趣尽丧，另外他对南方革命实在太缺乏了解，且从思想基础还没有更多的共同点，所以南下广东一直没有在他的计划之中。

1926年秋雁南飞之时，狷介自持的蒋百里不仅没往南边去，反而北上参加了胡适、徐志摩等人组织的“新月社”，他似乎萌生了隐退之意。蒋百里的侄子蒋复璁当时做了梁启超的助手，协助他编撰《图书大词典》。正是为了早日完成这部词典，梁启超积劳成疾住进了协和医院。蒋百里赶到医院，在病榻前陪老师聊了好半天。

尽管希望一再落空，但梁启超仍关心着时政，不停地在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座标。对时局的发展感慨万分的他看着蒋百里如此这般两手空空地回到他的身边，最终没有给他带来政治上的

“复活”，他不禁问道：“我们这批人太闲了，怎么办？”蒋百里分析说：“青天白日旗非挂出来不可。国民党统一中国无问题，问题在统一之后。尤其重要的是外交问题。”吴佩孚、孙传芳的失败使梁启超对形势的认识明智了许多，他赞同蒋百里的分析说：“你的观察很对。共和成立后打了十几年的内战，中国应该统一了。希望这次革命成功，大家洗心革面，不要再打无意义的内战，才可以进行你终身引为职志的国防建设。”<sup>⑤</sup>

这次会面之后，梁启超拟写一篇关于“革命必先革心论”，但往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一直受病魔的困扰，以至这篇宏论终究没能完成。更令蒋百里没有意料到的是，协和医院的这次会面竟然是他和梁启超先生的最后一面，在以后的几年中，他总未得机遇与他的师长谋面，直到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溘然长逝。

## 二、倚剑独彷徨

1928年下半年，国民革命军对北洋旧军阀的作战基本取得了胜利，国民党政权暂时取得了对全国的“统一”。1928年8月，在蒋介石的操办下，国民党五中全会召开。会议鉴于新军阀们各自为政、划地自守的混乱局面，决定取消各地政治分会，全国军政号令统一于国民党中央。不久，蒋介石又公布了“训政大纲”和“国民政府组织法”；他“依法”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

唐生智下野后，到日本去住养了一段时期。他的地盘尽由李宗仁所接管，两湖两广以及平汉、平津各线全在桂系的控制之下。地盘一大，腰杆就硬，李宗仁、白崇禧的手就伸得更远。正好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搞了一系列为己所用的决议，把桂系等各路军阀置于不利地位。1929年3月，终于爆发了

以权利之争为主要内容的蒋桂战争。蒋桂战争的打响使得唐生智得以重出江湖。

蒋介石能再次启用唐生智，蒋百里为功尤甚。以资历和军事思想来说，蒋百里在国民党军界中无疑有着相当高的威望，特别是在这一段时期，黄埔军校的学员在军中尚属于初露头角，掌有军权的实力派主要是保定军校培养出来的一批军人，特别是蒋百里任校长时的军校士官。由于蒋百里在保定军校的崇高威望，“只要谈起蒋百里先生，无人不敬重，无人不景仰。其实他只任保定军校第一期的校长，受他亲身训练过的只限于第一期的学生。但是很奇特，几乎所有的保定军校的学生，不论前期后期，都是一致爱护他，所有‘蒋老师’三字，成为保定生对他的普遍称呼”<sup>⑥</sup>，即一般军界后辈，亦莫不从而师之”<sup>⑦</sup>。

但蒋百里在过去几十年所走过的历程实在是无太多的光辉可言，特别是近数年来，他或为吴佩孚的参谋长，或为孙传芳的座上客，这些人在刚刚散却的硝烟中是被视做敌人的，比之一直把“革命”二字挂在嘴边的蒋介石诸辈来说，他可倚重的资本奇缺。因此南京政府在去年双十节前夕给各实力派加官进爵，党政军界的要员们皆各有所获，但任职名单中唯独没有蒋百里的名字。蒋百里倚剑独彷徨，但不愿就此默默无闻。在他的得意门徒中，感情上与他最为亲近的唐生智此时也因与桂系一役而禁声蛰伏。但当桂系成为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的敌人后，唐生智便有了东山再起的可能。这一点，作为一名军事家，蒋百里看得清清楚楚，所谓只待风云上九重。他要为门生一鼓风云，助一臂之力。

对蒋介石来说，蒋桂战争并不是很好打的一场大战，因为桂系的领导人们个个精于战术和策略，而且掌握着23万军队。在打桂系的同时，蒋介石还必须重点提防冯玉祥，因为他也很有可能参加反叛，而其手中的22万兵力绝对是蒋介石强悍的对手。蒋介石略施手腕，答应冯玉祥在控制甘肃、陕西、河南的基础上，再

把山东也划归冯玉祥的势力范围，他还给冯玉祥送去了200万元的军费，把冯玉祥买通了。<sup>⑨</sup>单是桂系军队就好打了。桂系兵力，由北平到广东，一字长蛇摆开，点多面广战线长，两翼暴露无屏，各部联系松散。中央军集中兵力猛攻中路，于4月5日占领武汉后，桂系军队首尾不能相顾，很快就溃败。李宗仁和白崇禧在两湖、河北的统治顷刻土崩瓦解，他们匆匆败退广西老巢。

为了尽可能快地结束战事，蒋介石决定派出第五路军赴北方对平津一带的桂军作战，在派谁去的问题上，蒋介石有点拿不定主意。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唐生智的转机出现。首先，平津一带的驻军实际上全都是湖南兵，当初唐生智宣布下野后，白崇禧就将原班人马接管过来，只是把高级军官作了些调整，剩下的连编制都没动。比如在唐山的驻军，白崇禧只是把军长换成了广西人，其他一概照旧，师长以下全为湖南人。如果唐生智率军打到平津，他的旧部拔旗易帜岂不易如翻掌。其次，蒋百里和中央军方要人何成浚、朱绍良等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和唐生智的师徒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央要员们对唐生智的好恶。恰巧中央又任命何成浚为北平行营主任，这是中央政府在北方的一个中枢分支，负责控制华北的军事、政治秩序，如果唐生智能去接管旧部，稳定局面定是易事。在蒋百里、何成浚等人的推荐、劝说下，蒋介石决定重新启用唐生智，任命他为第五路军总指挥。这实际上是蒋介石巧妙地利用了唐生智与桂系的矛盾。善于玩弄手腕的他并不急于召见唐生智，而是派人广泛传播唐生智即将复职的消息，使得唐生智在上海跃跃欲试，不得不主动向蒋介石表白忠心。于是蒋介石顺水推舟授以军权、赏以巨款，促其立即北上平津，收回旧部。

唐生智丝毫没有征战劳累的感觉，他一路春风地到了唐山，随后又进入北平，将总部设在顺王府，原本属于他的各部立刻反正归到他的大旗下，白崇禧逼迫离开唐山，桂系的长蛇阵顿时断了

头。唐生智再次拥兵自傲，在华北呼风唤雨。他念念不忘恩师蒋百里为他复出所做的一切，待形势稍微安定后，他立即派人南下，把蒋百里夫妇接到北平，把锡拉胡同他们原来的旧居重新用心布置一番。

蒋百里在北平受到了唐生智的隆重礼遇，唐生智手下的高级军官也大多都是保定军校出身，有的还聆听过蒋百里的教诲，他们对蒋百里更是尊敬无比。看着弟子们展翅翱翔，蒋百里满脸自豪，成就感油然而生。唐生智也确实费尽了心机，这锡拉胡同旧居是蒋百里和左梅当年百年和好的新婚洞房，重温旧梦，蒋百里感慨万分。一事顺，百喜至。唐生智坐镇北平后不久，适逢其老父60大寿华诞，唐生智为其父举办了盛大的寿宴。蒋百里自然是以贵宾身份入上座，他特书一联作为贺彩，其中有“北方大将，西域奇才”的字句，颇令唐生智得意。

当年在梁启超带领下一起赴欧洲考察的徐新六此时在浙江兴业银行担任总负责人，他和蒋百里交往甚密。蒋百里原本住在上海慕尔鸣路，后因经济拮据，为了节省开支，他们搬到了极司菲尔路的一所小房子里。徐新六对好友的境况非常同情，可蒋百里却颇不以为然地笑道：他们夫妇在北平锅烧胡同还有一座“金刚钻屋”呢！徐新六当下就劝蒋百里定居上海，其时国富门路十号正好有一幢西式洋房要拍卖，百里夫妇将北平的“金刚钻屋”卖掉，获7500元，又从徐新六的银行贷了一笔款子，把这幢小洋房买了下来（实际上是唐生智为报师恩出的资），于是，蒋百里定居上海了。这一段时期，蒋百里主要往返于京沪之间，指导唐生智内外理政。

蒋百里也时常往南京跑跑，但他从未向国民政府求过一官半职。唐生智的大红大紫也没有给蒋百里的政治生涯带来功利上的好处，包括蒋介石在内，人人都敬重他，但政府就是没有重用他的意图。当年护国战争推翻袁世凯后，蒋百里回到北京，在段祺

瑞政府中居闲曹、啜冷羹，好歹还有一个空衔。如今蒋百里连“闲曹”都没有占上，这的确让他失望，但他是一个个性非常强且书生气十足的人，宁可居无瓦、食无肉、出无车，亦不愿伸手嗟乞。不过有一件事他还是向政府提出了请求，有人告诉他中华民国驻瑞士公使陆征祥准备辞职，外交部正在物色新的人选，蒋百里得知此事不禁怦然动心，一直在国内沉浮的他非常想出国游访，于是他正式向南京方面提出了出任瑞士公使的请求。谁知这一请求竟然是入海泥牛，久久不见回复。细一打听，才知是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早已内定有人，对蒋百里的请求他根本没有提交政务会议讨论。蒋百里只得继续闲着。此时唐生智已从北平调回南京任军事参议院长，表面上似乎他调升了，实际上这是南京方面对唐生智缺乏信任的结果。尽管他第五路军总指挥的职务未免，但他已属被羁留南京，与部队隔离开了。

在桂系败后仅仅一个月之后，冯玉祥于1929年5月起兵反蒋，战事起因是蒋介石违背当初所许的宏愿，没有把山东交给冯玉祥控制。此时，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中央军兵力匮乏，各路诸侯反蒋情绪日益高涨，若非蒋介石挟中央而令地方的话，内战狼烟早就冲天而起。

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想到了蒋百里，他欲请蒋百里代替唐生智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率部对冯玉祥作战。经蒋介石反复电请，蒋百里于8月应召到了南京。当时蒋介石不知出于何种心理给蒋百里以盛大的欢迎礼仪，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蒋介石对唐生智是极其不信任的。南京城内从下关到新街口一带，沿途高挂“欢迎军界泰斗蒋百里先生”的横幅。蒋百里刚一下车，蒋介石就备下盛宴为他洗尘，国府文武大员全部出席作陪。宴会之后，蒋介石在密室和蒋百里私谈，他表示希望蒋百里能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军讨冯。蒋百里沉思半晌，回绝了蒋介石的美意，他不愿以老师的身份去抢夺弟子的席位。他说：第五路军中的第八军

与唐生智历来关系紧密，如果临阵易帅督上前线，不可能有良好的士气，此其一；第二，第五路军的精锐主力均是湖南人，而本人是浙江人，用浙江人去领导湘军，即使将领不反对，士兵也可能怀疑，无法指挥。

见蒋百里讲得颇在道理，蒋介石不便强压，聘请蒋百里出任第五路军总指挥一事只得作罢。看着蒋介石眉头紧锁，蒋百里向他保荐了唐生智。他认为，首先唐生智不会与冯玉祥联合，如果蒋介石不对唐生智过多地怀疑，放手让他去与冯玉祥一搏，形势定会好转。此时蒋介石手上已没有可调之兵，经再三思考，蒋介石接受了蒋百里的建议，决定放唐生智回到军中，立即展开对冯作战。

9月，唐生智部移防津浦线上的兖州，成功地把冯玉祥在山东的部队赶走，他随即再扑向河南，与冯玉祥展开了正面交锋。唐生智的胜利，使在极端困苦之中的蒋介石长嘘一口气。10月，蒋介石把唐生智召回南京，在军事会议上再次委以重任。他下令前方各军全归唐生智指挥，并且说“即本司令亦惟唐总指挥的意见是从”。唐生智得此令，手脚全无束缚，不由得有点飘忽起来。蒋百里亲自把唐生智送出南京城，万千叮嘱，要唐生智随时将战事向他报告，并满怀希望地说：“你要插一面‘民众先锋’的旗帜于西安的城楼上。”众人听了皆点头称赞。为便于和唐生智保持联络，蒋百里还在上海住宅专门设了一座无线电台。

唐生智与冯玉祥之战，与北伐战争时期打击旧军阀的旧式军队毫无共通之处，双方都是训练有素的现代军队。说来也巧，双方的军官还都受过蒋百里的训导。唐生智从河南把冯玉祥一直朝西紧逼，节节推进。蒋介石也用大把大把的金元诱使冯玉祥部近十万人突然间投降了中央政府。冯玉祥见形势于己不利，便退守豫西，保全陕西大本营。唐生智又指挥劲旅在黑石关与冯玉祥血战一场后，将冯部赶到了潼关以西。于是唐生智接替冯玉祥做了

洛阳王，屯兵洛阳开始观望形势的发展。

随着冯玉祥的连连败退和唐生智的节节胜利，蒋介石终于舒缓了紧绷的心。实际上，蒋百里是最为担心唐生智的成败的，当初送唐生智出南京城后他就回到上海家中，李华英连夜赶到他府上，深为担忧地说：唐生智已失败过一次，此次可不能再失败了！后来唐生智报捷的电报频频传到，压在蒋百里心头上的那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他知道唐生智此仗的胜利也意味着他这个老师的成功。

### 三、身陷囹圄

1929年是个多灾之年，灾难依旧是连绵不断的内战。起因在于1月召开的全国编遣会议。在会上，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提出了一个裁减中国武装力量的计划。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都同意将全国军队整编成80万人。但在整编的原则上分歧出现了，蒋介石提出缺乏实力的部队应该首先裁减，而他的军队都是由训练有素、指挥有方的黄埔系率领，毫无疑问不属于整编对象。各省军阀顿时感到蒋介石是利用裁减军队来确立对他们的战争优势。所以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整编方案。1月底，会议不欢而散，以武力反蒋的种子埋下了。

从3月开始，先后有了蒋介石讨伐李宗仁和白崇禧的讨桂战役、讨伐张发奎战役、讨伐俞作柏和李明瑞的新桂系战役、讨伐冯玉祥战役、讨伐阎锡山战役等等。虽然这些战役都以蒋介石集团取胜而告终，但反蒋浪潮从未停止。这一年下半年，汪精卫又从国外秘密返回香港，于是，当年宁汉分流的阴影顿时弥漫开来，无形之中，唐生智也被推到前台。

唐生智讨伐冯玉祥的胜利依旧没给蒋百里带来什么好处，但

给唐生智本人却带来了军事实力上的急剧膨胀，他坐镇中原，连接南北，扼守东西，地位十分显赫。蒋介石对他的猜忌和不信任使他一直耿耿于怀，种种传言把他推到了与蒋介石抗衡的对立面。作为唐生智来说，他最希望的还是要保全他的军队和势力范围。就在此时蒋介石于8月1日在南京召开了编遣实施会议，这次会议共开了六天，所有文件决议都是按照蒋介石授意事先写好的，各地代表只许举手通过，没有讨论的余地。会议“通过”实施编遣宣言，蒋介石把各地实力派裁军与否作为“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如此一来，摆在地方实力派面前的就只有一条出路：交出军队，归附蒋介石。否则就是反革命，将遭致武力讨伐。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等本已归附蒋介石的几个人物见此方案都觉如坐针毡，且不论其他正与蒋介石闹着别扭的实力派了。唐生智决定另谋出路。

12月4日，唐生智联名众多实力派将领通电蒋介石，劝其下野，否则将以刀枪相见！他同时宣布参加“护党救国军”反蒋拥汪。在汪精卫的“护党救国”同盟中，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等人的加入显得格外突出，因为他们昨天还与蒋介石同在一条壕沟中。唐生智的那封电报无疑是入冬以来最大的一股“寒流”，蒋百里得此消息，如同霹雳一声当头响起。他急发密电给自己的学生，提出了“东不如西”的建议，他想劝导唐生智学习清朝左宗棠的战略，离开内地的军阀混战，致力与西北国防建设。

由于蒋百里被在“通电报章，首揭其名”<sup>⑥</sup>，使他的生活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蒋介石自然是不可能下野的，他开始还想再用老办法来处理唐生智。在1930年新年前夕，上海国富门路蒋宅来了个意想不到的“拜年”客，他便是在少年时期与蒋百里在上海经济学堂同学过几天的邵力子。几乎没有寒暄，邵力子就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调唐生智回南京任军政部长，请蒋百里电征唐生智的意见。蒋百里心中一惊：蒋介石已知道他家有电台了！蒋

百里没有答应邵力子的要求，他认为如此一来，便是明确表示对唐生智的不信任。蒋介石应以诚待人，事到关头再抱佛脚挽回了局面。<sup>⑩</sup>蒋百里还为唐生智讲了不少开脱责任的话，但他的态度已十分明朗，邵力子无功而返。

1930年1月，唐生智挥师攻打蒋介石的计划立即付诸实施，但老天不助，他的部队行进到漯河时遇上了满天大雪，无法动弹一步。这个天赐良机给蒋介石以备战的时间，他迅速调集兵力，在漯河一带形成了包围圈，天一放晴杨虎城派兵突袭唐生智大本营，令唐生智措手不及，唐生智乔装改扮由陇海线转道到了天津，他的部队全军缴械投降。

唐生智的反叛就象一把尖刀刺向了蒋介石的心口，要置他于死地。尽管他又一次度过了难关，但他念念不忘要把唐生智及其同谋斩草除根。得空之后的蒋介石立即腾出手来，以举兵谋反的罪名清理唐生智在各处的同谋。蒋百里的国富门路住宅被特务翻了个底朝天，他们搜出了蒋百里与唐生智联络的电台，还查获蒋百里亲笔所写的一叠电稿，其中一封电文上写有“东不如西”的句子。这些全成了证据，无疑，蒋百里被视为唐生智的同谋。

1930年元旦，蒋百里足不出户，也无人登门贺岁，与往年的景象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偶有人来，都是充当说客，众多政府要员想请蒋百里出国小憩以避风头，但蒋百里均予谢绝。他的爱徒刘文岛也来了，劝告蒋百里已有五万元路费，请蒋百里尽早成行，若再拖延下去，恐怕夜长梦多。蒋百里听了，怒不可遏地说：“我没有刮地皮，没有钱出国。别人的钱我不要。我不会走开。”<sup>⑪</sup>刘文岛陪着老师半晌无语，他深知此时不走，往后就难预料了。不久，上海治安机构就对蒋百里实行了监视居住，便衣警察一下子来了六名，住进了蒋宅的汽车间，出入必随，形影不离。

蒋百里的情绪一落千丈，脾气也坏起来，他每天每餐必饮酒，超量饮酒后脾气更暴躁。左梅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可家里人谁

也不敢去劝说他。任上海市长的张群不知出于何种考虑，亲自登门蒋宅，劝蒋百里离开上海，到杭州去休养一段时期，散散心。蒋百里听从了这一劝告，先在硖石老家住了一夜，随后到了杭州。刚在一家旅馆住下，早已等候着的浙江省政府的官员就礼貌地请蒋百里移住到西湖湖心岛上的别墅——杨庄。上海的便衣警察与浙江的一个军官办了交接手续后礼貌地与蒋百里告别。

在孤岛上的杨庄，蒋百里与孤舟寒鸟做伴，看着与他寸步不离的那个下级军官及几个随从，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散散心”竟然成了阶下囚。夫人和孩子们肯定不知道他被软禁在了西湖，他急于把实情告诉家人，可除了厨师每天驾舟离岛采买外，再无任何人 与外界联系，更不见官方有人上岛。蒋百里心急如焚，北风呼啸中的杨庄，万物萧瑟，酒不准喝，蒋百里只有靠香烟来消愁。

千方百计寻到岛上来的的是他的侄子蒋复璁。叔侄二人相见，缄默无语。见蒋百里一切尚好，蒋复璁也就放心了，回去向左梅有个好交代。他把自己在湖滨小店里看到的一幅对联说给蒋百里听，希望叔叔不要沉沦，对联云：“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蒋百里只是“嗯嗯”了几声，再也没多的话。

在杨庄住了几日后，一天晚上，那个军官突然备了整整一桌好酒好菜请蒋百里对酌。作为犯人，突然被允许喝酒，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情，蒋百里是个喜爱杯中之物的人，好长一段时期滴酒未沾，此刻蒋百里顾不得许多，他开怀畅饮起来。

夜深了，那个军官环顾四周后，突然对蒋百里说：“我手下的人都睡熟了，小舟系在湖边，先生如果肯走，这就是时候了。”蒋百里当下一楞，问道：“那么，你的责任呢？”答曰：“我是一个无名小卒，您不必顾虑。”蒋百里深吸了一口烟，弹弹烟灰，慢条斯理地说：“我要走，早在上海就出国去了，何必自投罗网来，我不能连累你，你的善意我心领！”那个军官瞪着眼睛说：“可是，明天天就得提解到南京，前途吉凶难说呀！”蒋百里这才明白了这桌

酒菜后面的含义，他干脆地答道：“那就听天由命了！”<sup>⑧</sup>不知何故，从40年代陶菊隐先生记载这段史实，直到当代台湾学者的研究，都认为那位军官是在演一套“捉放曹”的把戏。如今史料奇缺，无法深探，只得因循，但蒋百里当时却是表现出铮铮铁骨的气概来。

果然没过两天，蒋百里被押解到南京，关押在三元巷军法处候审。蒋百里第一次到三元巷来的时候，是蒋介石命刘文岛用专车接来的，当时蒋介石对他可是言必称先生、见面必离座相迎的。今天再到三元巷，虽然也是专车，但和昔日相比有着天壤之别，这次的专车是专门押送犯人的囚车。

昔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

#### 四、狱中岁月

自从唐生智事发，蒋百里亦被冤遭禁，左梅就心急如焚，特别是看到蒋百里狂饮烈酒，学医出身的她心里就更担忧。多少年来蒋百里在生活上毫无节制，若非左梅悉心调养，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她既要照管五个女儿，又要设法宽慰郁闷愤懑的丈夫，没多久，她就卧病不起。蒋百里从上海到杭州后，左梅病情加剧住进了医院，幸亏有家人老姚在里外奔波，才把个家勉强维持下来。后来蒋百里一去音信全无，左梅多方打听竟然一点消息都没有，她惊恐万分，生怕发生不测。还是侄子蒋复璁带回了蒋百里平安的音讯，她才放下了一颗高悬的心。

按当时处置唐生智其他同谋的做法，蒋百里应该立即问罪定刑，可蒋介石碍于蒋百里的声望，没有立即开堂。负责蒋百里一案的军政部次长陈仪是蒋百里的士官生同学，在袁世凯时期，蒋百里在保定军校自戕后转入公府任参议，在八个参议中，陈仪与蒋百里关系最为密切。<sup>⑨</sup>陈仪想将此案多拖阵子，使之淡化一些，

这样，军法会审蒋百里就一直延期未办。在陈仪的关照下，蒋百里每日好菜好饭，住的房间也由看守打扫得整整齐齐。

一天，李华英来探望恩师，他见狱卒对蒋百里恭恭敬敬，住所也与众不同，生怕如此优待会给蒋百里带来反面影响，便劝蒋百里更换环境，与普通犯人同等待遇。蒋百里听从了他的话，换到了一个阴暗潮湿的小间里。左梅出院后，八方奔走求援，呼吁当局放过蒋百里，但有消息说蒋百里所犯属死罪，“如果军法会审一开庭，他的罪案就成立，而判刑的结果必然是死刑。”<sup>④</sup>左梅竟然不敢再有多的举动了，她只得把精力放在安慰丈夫身上，她把中外古今名人身陷囹圄志犹不丧的事迹抄录下来寄给丈夫，鼓舞他的意志。蒋百里对夫人深为感激也十分明了她的心思，他做好了把牢底坐穿的准备，并开始细细品玩侄子在杭州送给他的那幅对联了：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忌是庸才。

1930年四五月间，南京政府对蒋百里的态度开始有所缓和，并且允许家属探监。左梅即刻飞奔南京，见到了身陷狱中的丈夫。尽管他们这次分手并不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可个中内容与以前大不相同，在左梅看来真有生离死别之感，她强忍满眶热泪，依旧轻声问候夫君，看到蒋百里镇静若定的神态，左梅方才放下心来。又过了不久，左梅接到了可以每天探望家属的通知，她把三个大女儿寄宿在她们的母校上海中西女学，自己带着七岁的蒋华和五岁的蒋和来到南京，在三元巷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住下，这样他们一家日日可得相见。

最开始，左梅母女去送饭总有一个卫兵跟随监视，时间长了，监狱里的人个个都认识了她们。每天早上6点，母女三人捧着早点盒子准时来到监狱大门口，卫兵老远就和她们打招呼，招呼打过，直接放行，这就算是检查过了。蒋百里吃罢早点，第一件事就是练太极拳，每天半小时，绝不间断，晴天在院井里练，下雨就在室内练，五岁的蒋和总是在父亲身后踉跄学步。练拳结束，蒋

华就端来了早已冲好的牛奶。左梅见蒋百里身体太虚弱，特地买来了补血针剂，每天给他注射一次，一直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

在监狱里，蒋百里有了时间陪女儿，这倒弥补了这些年来他东奔西走无法顾家的缺憾。他教女儿背诵唐诗，讲三国、西游、水浒，以他的文彩和口才，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和深入浅出的讲解，使两个女儿听得连眼睛都不眨。他还教女儿打桥牌，和她们做游戏。一次，他让蒋华扮武松、蒋和扮老虎，演武松打虎那一段。蒋百里自己爬在地上，先给她们演示一扑、二扑、一躲、一闪，然后让两个女儿听他的号令表演。一扑、二扑逗得蒋百里忍俊不住哈哈大笑，不料，蒋和第三扑撞倒了开水壶，把小脚烫起一个大泡，疼得蒋和放声大哭起来。蒋百里一把抱住女儿，心疼得连连自责：“这是爸爸害了你！”边说着边为女儿敷药、揉腿、吹气，旁人看了深受感动。蒋百里还向看守主管申请，特许蒋和在狱中住了一夜。

由于蒋百里被禁锢监牢，家中便断了经济来源。左梅的生活已经十分俭朴，但依然是捉襟见肘。按说蒋百里的学生中此时飞黄腾达的大有人在，但很少有人记得在南京的监狱中还关押着他们当年的校长。也有良心未泯者，但不揣当局意图而不敢与蒋百里及左梅发生联系，唯一有来往的还只有李华英、徐志摩等数十年的深交。遭此一难，左梅算是真正看见了所谓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但她不愿把家里经济拮据的境况告诉丈夫，让他徒增烦恼。由于还有三个女儿在上海寄宿，左梅一有空就得往上海跑，去关照她们的生活。家中实在没钱了，就得厚着脸面找人借钱，有时不等左梅开口，对方就诉苦叫穷起来，弄得她满脸尴尬，只得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左梅也偶尔到证券交易所去做做股票投资，赚点小钱补贴生活，但股票不是总可赚钱，实在没办法了，左梅就变卖家中值钱物品。她咬紧牙关挺着，相信丈夫总有重获自由的那一天。

转眼间，1930年过去了，新的一年又来到。南京城内庆贺新年的鞭炮声此起彼伏，蒋百里和妻子女儿在监狱中冷冷清清。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送走了好几个狱友，可就是不知道自己何时能还自由身。他的三个大女儿所在的上海中西女校离上海南站非常近，每当凛冽的寒风传来阵阵汽笛声，瘦弱的孩子们不禁潸然泪下，她们不知道哪一天火车才能把父亲送回来。

狱中的生活依旧，可左梅的经济愈来愈困难，她快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卖光了，她真不知道象这样的日子还要熬多久。好几次她都觉得自己再也支撑不住了，要不是看到丈夫坚毅和渴求自由的目光、看到孩子们盼望的眼神，她也许真的一头倒下去就不会再起来了。蒋华和蒋和虽然只有八岁和六岁，可艰难困苦的现实使这两个本该是骄纵天真的儿童过早成熟。左梅节衣缩食，依旧给蒋百里送来丰美的饭菜。蒋百里总是问女儿，家里的钱的来源，两个女儿早编好了应付之词：是母亲做股票赚的钱。

也不是没人在朝中替蒋百里说情，张一麟、李根源等人鉴于日本人在华北和东北屡屡作奸犯科，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们联名上书，请求当局释放蒋百里，在请求书中，他们发出了“外侮亟，将才少”的呼吁。蒋介石看了这份呈文，提笔批了“照准”二字，将呈文发还回去，他并没有多的言语，神态是未置可否状。军政部的官员们拿了这“照准”二字，想想上峰没有表情的脸，真不知照哪一个“准”，于是就把释放蒋百里一事搁置起来了。

1931年8月，蒋百里来了个新狱友，他就是反蒋斗士邓演达。邓演达是保定军校第六期的毕业生，他对蒋百里也是尊称先生。他有着辉煌过去：黄埔军校首任训练部副主任、教育长；因敏锐揭露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的反革命性质而一度遭到拘禁，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他流亡苏联、德国，与宋庆龄等人一起在莫斯科坚持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1930年回国后，正式成立了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进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斗争。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派出特务四处搜捕达一年之久，终于在上海将他秘密逮捕。

蒋百里的两个女儿非常喜欢邓叔叔，每当父亲打坐休息的时候，她们就跑到对面邓叔叔的房间踢毽子，或者缠着邓叔叔讲故事。邓演达的夫人很少来探望他，比之蒋百里与夫人和女儿在一起乐融融的情状，他更显得形单影孤，因此他也格外喜欢蒋华、蒋和。按规定，狱犯之间不许交谈，可邓演达非常愿意与蒋百里谈心，蒋百里也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外界的形势，特别是关于日本人在东北的一系列侵略行径，让蒋百里愤怒万分，他过去许多关于日本与中国关系问题的预言，不幸一一应验。大敌当前，蒋百里却身陷绝境，不能报效自己的祖国，他痛苦不已。只要父亲和邓叔叔一开始谈话，机敏的蒋华、蒋和就在院子里东游西逛替他们望风，如有看守巡查，她们一声咳嗽，蒋百里、邓演达就赶紧回到各自的房间。

邓演达突然失踪几个月，引起了宋庆龄对蒋介石的怀疑，她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要求他释放这位北伐功臣，可蒋介石矢口否认逮捕了邓演达。待宋庆龄刚一离去，蒋介石转身就发出了枪杀邓演达的指令。11月的一天，邓演达突然被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带走，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蒋百里知道这位反蒋斗士遇难了。

此时，蒋百里已被蒋介石关押近20个月之久。

## 五、恶梦醒来

在国民党军阀们沉溺于内战的时候，觊觎中国东北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在制造了一连串挑衅事件后，日本侵略军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

变，开始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得日寇更加猖狂，东北人民沦入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

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面对这样的形势，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派势力口头上都唱出了和解的调子，他们都想借国难当头之际重新进行政治分赃。但他们争吵不休，直到九一八事变一个月后才勉强坐到一张桌子上，在上海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因为害怕蒋介石出尔反尔，危及粤方谈判代表的安全，在汪精卫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同意广东实力派陈铭枢及其十九路军调到上海驻防，由陈铭枢出任沪宁卫戍长官。一时间，陈铭枢在人们心目中似乎成了和平卫士。

早年曾和蒋百里一起共同辅佐吴佩孚的唐天如在1926年和蒋百里见过一面后就一直隐居香港。他与蒋百里、陈铭枢共为密友，虽然和蒋百里再没谋面，但时刻关注着他。当听到蒋百里被下监牢的消息后，他焦急万分，尤其是得知邓演达被枪杀的消息后，他生怕蒋百里亦会踏尘跟去。他便连忙赶到广东，请陈铭枢设法搭救校长出狱。正好陈铭枢调防到了沪宁一带，他也准备设法将自己的老师解救出来。于是，唐天如从香港赶到南京探监，告知了这一消息。看着蒋百里的学生陈铭枢日趋成为党国的大红人，许多见风使舵之人也开始到三元巷探望蒋百里，每当见到这些虚假情谊，蒋百里和左梅啼笑皆非，特别是蒋百里，他觉得此时所悟出来的事理格外多。

在唐天如的敦促下，陈铭枢没有食言，他先发动吴稚晖等一批民国元老在蒋介石那儿进言，希望蒋介石在国难当头之时以怀柔政策为主，释放蒋百里以诚昭信天下人。陈铭枢也亲自向蒋介石坦陈了自己的看法，蒋介石终于同意释放蒋百里，在此以前，陈铭枢把拯救邓演达和蒋百里出狱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下野之后，使事情得到自然解决。他也曾试图把他的密友邓演达解救出来，但

蒋介石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因此，他通过邓演达的死看穿了蒋介石的狭窄胸怀，所以他此时态度强硬地要求释放蒋百里。而此时的蒋介石因为和汪精卫、胡汉民争权夺利忙得焦头烂额，精力已顾不到蒋百里身上了，加之汪精卫坚决要求他辞职下野，估计势在难免（实际上蒋介石采取了以退为进之策），而陈铭枢即将出任代理行政院长，所以他也乐意做个顺水人情。再有一点，若是继续把蒋百里关押在监牢，不审不判，时间长了恐怕会引起众怒。

由于身份关系，陈铭枢一直没有到三元巷监狱去看望老校长，直到得到蒋介石同意释放蒋百里的许可后的第二天，陈铭枢穿戴得整整齐齐到了监狱。蒋百里与陈铭枢交谈了约一刻钟时间后，蒋百里兴冲冲地出了房间，他连连召唤两个女儿：“我明天就要出狱了，谢谢你们的恩人吧！”两个女儿听了喜出望外，她们跑了过来，冲着陈铭枢深深鞠躬，半天不肯直身。此情此景，陈铭枢见了不由得陡增几分伤感。

说来也怪，陈铭枢走后不久，徐志摩就从上海家中来南京探望他，他是从上海家中过来南京的。蒋百里、徐志摩是硃石人的两大骄傲，又是在北京石虎胡同七号的同事和密友。徐志摩从那时开始以写诗闻名于世，也是从那时起，他以诗人所独有的情感和气质，将自己的灵魂置放在浪漫与现实、自由与禁锢、幻想与追求中煎熬，生命、事业与爱情无不如此，他毕其所有精力一直在寻求解脱，也一直在痛苦中挣扎。他们这对好朋友有好几年没有相见了，俩人都有说不完的心里话。徐志摩近些年来心情一直不太好，这主要是由于他的生活和爱情方面的不如意造成的。他把自己的苦闷与烦恼全向百里诉说了，蒋百里也和他推新置腹地谈了老半天。徐志摩临走时还约定待蒋百里出狱后，他来设宴接风。

左梅得知丈夫将获自由的消息简直不敢相信，接到军法处的释放通知后，她不禁失声痛哭。苍天亦有情，一场早雪把个石头

城装扮得晶莹剔透，似乎也在证明蒋百里的清白。身着漂亮西服的蒋华、蒋和蹦蹦跳跳簇拥着容光焕发的蒋百里一路踏雪回到了左梅在三元巷的租房。左梅本要租车接他出狱的，可重获自由的蒋百里说什么也不愿意乘车，他只想直接扑向自由的天空。在左梅的住地，早有一大群贺客在等着他们，忙得左梅向左右邻居借凳子都来不及。陈铭枢也来看望了蒋百里，他那身黄呢军服、黑呢披风格外显目。左梅和女儿们都把他视作恩人。

晚上，蒋百里的三个大女儿蒋昭、蒋雍、蒋英也赶到了南京，一家人在离别两年之后终于团圆了。左梅和五个女儿在屋子里开起了狂欢会，庆贺蒋百里又回到她们中间。蒋百里大口大口地抽烟、大杯大杯地喝酒，笑咪咪地看着孩子们欢快嬉闹，一直到下半夜，谁也没有要睡觉的意思。

痛苦的囚禁生活突然结束，蒋百里一家顿时阴霾驱散，他们甚至有了全家提前旅游南京的机会（由于蒋和年仅五岁，游南京的计划不在此时）。在回上海之前，蒋百里携带全家踏着残雪，泛舟玄武湖。“枝头挂着残雪，寥寂的天空点缀着三五寒鸦，粼粼的湖波漾着无限凄凉。……迎面来一小舟，舟中几个陌生的面孔，彼此下意识地行了个注目礼，那小舟便在晚蔼蒙迷中消逝了。百里一家人觉得这个恬静优美的世界实在不应该有仇恨、妒忌、猜疑的种种暗影存在其间。他回想到两年的狱中生活，像无端地做了一场可怕的怪梦。”<sup>⑬</sup>

1931年11月20日，蒋百里终于回到了他离别两年的上海，回到了国富门路温馨的家中。刚一到家就得到噩耗：他的同乡挚友徐志摩于19日乘飞机北上，由于天气恶劣，飞机在济南一带撞山而不幸遇难。蒋百里怎么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在前一天他还到三元巷监狱去看望过蒋百里的，而且他还准备在蒋百里出狱后设宴接风呢。

当一个人把人生的坦途和陡坎全都经历过后，他定会顿觉大

彻大悟的

注释：

①②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82、709页。台北1958年版。

③唐祖培：《蒋方震》，载《革命人物志》第12集，第443页。

④⑤⑩⑭⑮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97、100~101、114、116、125页。

⑥黄征夫：《怀蒋百里先生》，载黄萍荪、张禾草编《蒋百里抗战论集》，浙江金华，新阵地图书社，1939年4月版。

⑦赵明秀：《蒋百里与保定军校》，《浙江月刊》第7卷第9期，转引自《蒋百里传记资料》（二），台湾，天一出版社，1979年11月。

⑧⑫（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二），第1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

⑨黄萍荪：《与蒋百里先生一席谈》，载黄萍荪、张禾草编《蒋百里抗战论集》，浙江金华，新阵地图书社，1939年4月版。

⑩⑬李吾：《蒋百里先生的生平》（六）、（七），载《春秋》卷13第1期。

⑬张一麟：《追述蒋百里先生》，载黄萍荪编《蒋百里先生文选》，浙江金华，新阵地图书社，1939年10月初版。

## 第八章 国难伊始

### 一、淞沪抗战

回到上海后，蒋百里格外注重向家庭倾注爱心。

多少年来，他一直在这个世界上匆匆来去，苦苦追寻着他的梦想。多数时间，他独行于世，也有不少时候是携妻带女，使得整个家庭都处在不安定状态中。特别是此次入狱，全家整日担忧竟达二年之久。经济断了来源，女儿们失去了父爱，若不是左梅性格坚毅，好端端的一个家恐怕早就毁于动荡之中了。他只觉得对妻子、对孩子愧疚万分。

父亲回来了，国富门路十号蒋宅又充满了欢声笑语。三女蒋英后来追述此时的生活，满怀眷念地回忆父亲，她说：“咱们一家重聚，是多么快乐呀！你每次上街回来，总是大包小包的水果带回来。照例老佣人总会站在楼梯上叫声：‘老爷你回来啦’，我们便打雷打鼓似的从楼上跳下来。这个喊，那个叫的。呀！什么广东荔枝罗、新会桔罗、外国香瓜罗、葡萄罗，说不尽的好东西。十只手，来的快，一会都抢光了，你总是说：‘给妈妈留些啊，给妈妈留些啊！’于是又一齐闹着去找妈妈，妈妈不是在书桌上记帐，就是坐在沙发上结毛线衣。于是一家子便坐在一块儿，有时谈正经的，有时闹着玩。家，真是说不出的香甜呵！”<sup>①</sup>

蒋百里出狱，亲友们无不庆贺，纷纷登门或信电慰问。辛亥名人居正先生特书一幅长联，又是称他学兄，又是呼他同难友。蒋百里在狱中潜心攻读佛学经典和康德哲学，还坚持习练书法，历两年而不辍，竟然收获颇丰。现在对朋友们的祝贺，蒋百里一一以手书佛经回礼。为了感谢陈铭枢的鼎力解救，蒋百里还书写了长幅楷体的“心经”赠给学佛的陈铭枢。经过一番监狱之苦，蒋百里对人生彻悟无余，他整日闭门自思，他想起诸葛孔明先生的一句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并取其意自号“淡宁”。

但是，温馨的家庭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蒋百里的淡泊宁静就被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所打破。

1932年的元旦过后不久，日本人的炮舰就开进了沪宁之间的长江，黑洞洞的炮口直接指向了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南京，上海更是已列入了日本人首先攻占的目标中。如此险恶局面，蒋百里只觉得敌人的枪口抵在了自己的脊梁骨，他再也坐不住了。可此时的国民政府中，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依旧沉溺于权力斗争之中，他们把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抛于脑后，一会儿握手言欢、一会儿到紫金山哭陵、一会儿准备召开中央临时会议，忙得不亦乐乎。江山沦丧，生灵涂炭，似乎全都与他们无关。日本侵略军经过一番策划后，于1月24日向上海大量增兵，由航空母舰“能登号”率领十艘军舰开进黄浦江，战火即将燃起。

在国人强烈呼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声中，蒋介石、汪精卫于1月28日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蒋百里原以为会议会对上海的严重局势作出对策，不料中央政治会议没有一字谈及抗日，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依然是政治分赃。日本人得此信息喜出望外，就在南京方面还在会议室喋喋不休之时，日军陆战队六千人分数路向闸北发起了蓄谋已久的进攻，日军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狂妄地宣传：占领上海只需四个小时。

早在东北沦陷后，上海社会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就开展得轰轰烈烈，十九路军在社会民众的影响和支持下，以军长蔡廷锴为首的各级军官均主张枪口一致对外，坚决抗日。国难当头之时，十九路军没有退缩，他们奋起反击，连续打退日军的进攻，并予以重大杀伤。日军四个小时占领上海的幻想变成泡影，指挥官盐泽被撤职，继任野村又被撤换，同时增兵至十万人，但直到2月29日，日军仍被阻击在沿海狭长地带，不能前进一步，上海抗战演变成拉锯之势。

蒋百里对十九路军奋起抗日兴奋不已，他的众多学生都在此部，并且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战事初起，国富门路十号就常有不速之客登门，他们是十九路军参谋长张襄和淞沪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林建铭，他们都是保定军校出身，有德高望重的老校长在此，战略上的事情自然是听从他的谋划了。鉴于蒋介石此时并没有明确的抗日态度，加之校长刚从监狱出来，为了不连累他，张襄和林建铭每次到国富门路来都是轻车减从，外人谁也不知在这不起眼的小洋楼里，正谋划着如何敲响日本侵略者的丧钟。每当两个学生一到，蒋百里就“兴奋得无以复加，楼上楼下跑个不停，一会儿拿出一张地图，一会儿又拿出米达尺放大镜，在地图上作详细的指示，三人夜半窃窃私语，这也就是他们师生研究抗日战术的秘密会谈。”<sup>②</sup>

战斗是残酷的，十九路军将士在前线浴血抗击日寇的同时，上海各界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支援活动，仅是捐献的现款、金银、药片、日用品等就堆积如山，无法计算。蒋百里每日将自己关在书房内研究战事的进展情况，左梅则率女儿们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她们把自己的东西也捐出去不少。每天市内都有前方的战报传来，胜利的消息不断，祝捷的鞭炮声响个不停。一天，蒋百里忽然听到自家院子里也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忙出书房看个究竟。原来是蒋昭、蒋雍带领妹妹们用吃冰淇淋、看电影的零用

钱买了鞭炮来庆祝胜利。蒋百里激动不已，抚摸着孩子们的头，连声称赞。

上海抗战初期的接连胜利并没有使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猛醒，蒋介石依然执行着不抵抗政策。在战争进行到紧要关头，蒋介石来了个迁都洛阳、临阵脱逃之举，对上海十九路军不补给、不增援，还让宋子文代表他对外界发表讲话说：“各军将士未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动作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讲话如同一副兴奋剂，立即激涨了侵沪日军的情绪，他们迅速增兵，延长战线，造成中国守军在防线上的兵力不足，迫使十九路军撤进上海市内。战火然到了虹口区。

在市内作战，本不是日军的特长，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出现了，虹口区日、美、英等各国租界密集，按中国与租借国的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得进入租界，甚至中国军警追捕逃犯也不准进入租界。如此一来，日军入上海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而十九路军则处处受到限制。蒋百里愤怒不已：“为什么不进攻公共租界？为什么在我国领土上敌人纵横无阻而我们反受限制？”<sup>⑧</sup>他极力主张进入租界作战。当时吴淞要塞司令官翁照垣与蒋百里的意见相同，进攻公共租界有两点可取之处：其一，可出其不意包围进入上海的日军，打他一个冷不防；其二，战火一旦在英美租界燃起，为了他们各自的利益，这些国家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但是，抗日不是蒋介石的目的，为了能和日本彻底妥协，他强令十九路军撤离上海，调赴福建“剿共”，将上海拱手交给了日本人。5月5日，蒋介石政府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本军队永久停驻上海，答应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

蒋百里万万没有想到战争的结局竟然会是如此令人悲哀，作为一个军事家，他觉得无颜面世，对政府也不抱任何希望。他从此闭门课子，不再过问时事。

## 二、位卑更忧国

国难当头，蒋介石的妥协投降政策葬送了上海抗战。蒋百里郁郁不得志，他在痛苦沉闷中不得已把自己与外界隔绝开来。每日除了手不释卷地读书，剩下的时间就是教育女儿和种花养鸟，聊以度日。

这一时期，蒋百里每天的时间表如下：清晨5点起床，浇花松土，一枝一叶皆打扫得干干净净，随后便在庭院练太极拳。之后回书房打坐，然后是捧卷长读，再进行每天必做的工作——抄习《灵飞经》。晚餐后全家人围坐在客厅，谈论世界大事和中国时局，古今中外，无所不包。蒋百里对女儿们所提的问题总是耐心解答，谈到兴头，霍然起立，滔滔不绝并佐以手势，如同大学教授一般。除蒋百里外，他们全家人都是清一色的北京口音，包括佣人都是从北京带过来的，跟了他家十几年了。在这一时期跟随蒋百里学习并兼任秘书的蒋洁曾回忆蒋百里特别爱花，她说：“先生爱栽花，并善调理，尤喜种松、菊、兰。虽庭院不广，而花常满园。”<sup>④</sup>

蒋百里教育子女，特别注重思想品德的教育，讲解任何问题都是和颜悦色，从不动怒，充满爱心。他和藹的面容、渊博的学识、慈爱的胸怀和坚毅的品性使得五个女儿对他无比崇奉，他成了孩子们生活中的精神支柱。三女蒋英后来留学欧洲，她游历德国、意大利，见过无数名人，甚至包括当时顿足震天的希特勒、墨索里尼等。她觉得没见到名人之时向往无比，待见过之后顿觉平庸，与其父相比有天壤之别。在父亲去世后蒋英写下了这样一段怀念他的话：“我意识到了自己永恒的孤单！我失措了，我像一只掉在沙漠里的羔羊。……我绝望了！现在我眼前的只是一片无尽

头的黑暗，我看不见太阳，甚而也没有了星光。我的生活失去了光明！只有黑夜——连续不绝的黑夜呀！我怎么能活下去呢，没有了你的向导，没有了你的鼓励！爸爸，你是我生命的火炬，失了你，让我永远与黑夜接近罢！”<sup>⑧</sup>情真意切，催人落泪。

自从被蒋介石打入监牢至今，蒋百里再次坠入失意之中。作为一般庸俗浅薄之人，遭此打击，其意志恐怕早已被粉碎，理想与追求皆随风散尽。但蒋百里迥然不同，他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民族气节与历史责任感，有着坚硬挺直的脊梁骨。尽管已遇窘困，依旧以维护民族利益为己任，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在蒋百里身上得到了最典型的体现。但蒋百里并不是对时政毫无针砭，他由古而今、由己论政地说：“历代主权阶级说尽了好话，做尽了坏事。人人骂隋炀帝‘无道昏君’，他做坏事就直言坏事，偶然也做了几件好事，不像后来的人专做坏事还要标榜好事之名。近来的情形是发挥中国固有的特质再输入西洋的新手腕，民国成立了二十年，民主的路程迄今还隔得相当的辽远呢！”<sup>⑨</sup>说到激昂愤慨之处，蒋百里能一仰脖子把一瓶啤酒喝个精光，酒没了，他就在房间踱来踱去。看见丈夫怒气难平，左梅总是请些老朋友过来陪蒋百里聊天，缓和他的情绪。这一时期，常与蒋百里一起举行餐会或座论时政的主要有徐新六、张公权、穆藕初、陈仪、陈光甫等人。

1932年，农商银行建立，经徐新六等朋友推荐蒋百里当选为常务理事。出任这个社会职务，一方面改善了寅吃卯粮的家庭经济，另一方面使他得以集中精力研究国防与经济的关系。在这一时期，蒋百里在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诸多方面都有相当深刻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蒋百里的军事思想就在这一时期进入较为重要的一个阶段。

这一年，农商银行出资请蒋百里以私人身份赴日本考察。此时的日本，正在大兴军国主义，极力鼓吹发动侵华战争。以蒋百

里当年士官学校考试第一、曾获日本天皇亲授佩刀的英名，尽管中日之间战火已然，但日本军界表面上对蒋百里仍然十分尊重。蒋百里会晤了他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几个日本同学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真崎等，这些人后来均成为臭名昭著的战犯，他们此时都是日本军界中的实力派，正狂热地要求进攻中国。在和他们面谈时，蒋百里严辞驳斥了侵略者所谓“共荣”的谬论，他说：“你们无论说得怎样漂亮，终不能掩饰侵略者的野心。”真崎等人厚着脸皮答到：“中国东北地广人稀，富源委藏于地，而日本人口多，不能不求一出路。”蒋百里对这种不知羞耻的言论愤慨不已，他怒斥对方：“那么你们强占就是了，讲什么冠冕堂皇的一套理论！”<sup>⑦</sup>

日本皇族闲院宫亲王任参谋总长，他在自己府上宴请了蒋百里，并想通过蒋百里给中国政府代话，要求中国军队停止抗日，坐下来和日本人谈判，他还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去求助英国、美国，指望他们是远水不解近火。蒋百里深深感受到了日本侵略者是欲壑难平，由于他是在野之人，无法答复闲院宫，他也更不可能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代回国内，他只是在暗暗思忖，一旦大战打响，中国应该如何应战。

从日本归国，蒋百里开始全面研究制定抗日国防问题。蒋百里的军事思想恢弘庞大，只言片语无以诠释，本书将另辟章节予以专门介绍。

### 三、长女惜逝

在乱世浮尘之中，蒋百里执着地追寻建设现代国防的发展道路，他从工业、矿业、交通等诸多方面全面研究发展经济的计划，从而推进国防建设以抵御外敌入侵。蒋百里将他呕心沥血研制的

诸多计划全都上报南京国民政府，希冀于国于民有所贡献。这一时期的蒋百里“不停地看，不停地听，不停地想，不停地讲，不停地写，一个极闲的人像一个极忙的人，每天的时间像不够他支配似的。”“他每早带着有关工业及经济的书报及参考材料到银行办公，常常闭目凝思，想出许多的怪题目，再逐一研究解答的方案，遇到疑难的地方便向专家请教，从不畏难中止。”<sup>⑨</sup>蒋百里满怀希望研制的计划有多种，但或因国难当头，政府无暇顾及；或因官僚专权，推诿延迟被搁置一边；还有的仅是纸上蓝图，缺乏实施条件。最终蒋百里的计划付诸实施的极少，多数皆化为泡影，他走实业救国的路显然行不通。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铁蹄一步步紧似一步，蒋百里自己也感觉到了有些问题已非此时所能考虑的了，他曾对朋友说“南京造几条马路，修几座纪念堂，是建筑而非建设，现在不是都市美不美化的问题，我们已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大关头！”

1932年夏，上海酷暑难熬，蒋百里一家到佛门圣地普陀山避暑。<sup>⑩</sup>蒋百里在南京蹲监狱的时候就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佛学，“常常整天探索，有时竟至用脑过度，不能安眠。”他给女儿们讲论佛经之时，总是用最浅显而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来表达，他说“佛法最平等，众生所供奉的烛与香，佛固享受，而烛的光明与香的香味，则普及众人，大家都可同其享受。”<sup>⑪</sup>在普陀山，蒋百里全家住进了庙中的净舍。白天，他们参谒佛祉圣殿，流连山水美景，乐融融地听蒋百里讲述佛门典故。晚上，待夫人和孩子入睡后，蒋百里便手执经卷，挑灯夜读。普陀山这方神圣的净土，远离喧嚣闹市，有如世外桃源一般。很快，他们忘却了纷繁杂乱的上海，忘却了那灯火酒绿的十里洋场，他们只觉得灵与肉在瞬间得到净化和升华。

但欢乐与痛苦总是结伴而行。没过几天，蒋百里因游泳受寒而引起全身关节疼痛卧床不起，随后连饮食都不能正常。在庙宇

之中既没有医生，更无药品，左梅和五个女儿全急坏了。她向僧侣们求救，僧侣们告诉她唯一的办法是在佛前祈祷。于是左梅真的在大殿求菩萨保佑，并且抽了一签，可竟然求得一下下签“大海捞针”，让左梅心中好生紧张。蒋百里卧床六天后病情方才好转。实际上左梅心里明白，自从蒋百里遭受挫折入狱至今，一方面心情郁闷，另一方面生活不能正常，缺乏调养，加之蒋百里长期烟酒过度，所以造成身体素质下降，抵抗力减弱，稍不留意便染疾卧床。

普陀山小住一段时间后，他们一家又回到了上海。不久，蒋百里又染上了肺炎，延医吃药，过了好一阵子才痊愈。这时，大女儿蒋昭学小提琴颇得要领，考入了一支由外国人办的世界乐队，她的照片还登在了外文报刊上。看着女儿有所进步，蒋百里心中非常高兴，他一方面鼓励四个小女儿向姐姐学习，一方面开始注重培养蒋昭的社交礼仪。蒋百里曾在欧洲生活过，他有心想让长女将来到欧洲去继续深造。因此，每逢周六，他们一家人总要去酒店吃一次西餐，以便让孩子们学习西方生活礼仪。

谁知没过几个月，灾难降临到蒋昭这个年仅16岁的花季少女头上。一天，蒋百里突然发现蒋昭脸上泛出潮红，便关切地询问女儿的身体情况，蒋昭也答不出具体哪一方面不适，只觉得四肢软弱，浑身乏力。左梅连忙给她测量体温，一查，38.3℃，学医出身的左梅顿觉事情不妙，赶紧让女儿卧床静养。第二天到医院做了检查，X光透视发现蒋昭的肺部有黑斑，她患了肺结核症。这个结果如同炸雷在蒋百里夫妇耳边想起，要知道，在三四十年代，肺结核几乎是无法医治的！

蒋百里当即说道：“我当裤子也要把你这个病治好。”他立刻带女儿到红十字会医院打针，可不知何时蒋昭感染过脑膜炎，不能注射唯一对肺结核病有点效果的消炎针。从医生紧皱的眉头和失望的表情上，蒋百里和左梅感到了一丝恐惧，他们黯然相觑，急

得不知如何是好。

很快，病魔死死地缠住了蒋昭，她开始卧床不起。蒋英回忆当时父亲和全家人的情景说：“病魔插足到我们那乐园的门槛了，一向多忧的大姊被它侵袭了。一个月两个月，终不见起色。于是一家都慌张起来。最慌张的还是你！什么中国郎中，外国医生都请到了，你急得连客也不会了，门亦不出了，整日闷在屋里看书。”<sup>④</sup>看着爱女一天天消瘦下去，蒋百里的心都要碎了。

整个冬季，蒋府上下都仿佛笼罩在严寒之中。

尽管蒋百里想尽了一切办法，但依然阻止不了死神的脚步。医生们也都劝慰蒋百里，以目前的医术，恐怕难以治好蒋昭的绝症，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尽可能满足孩子的愿望，给她以最大的关怀和爱护。

因为蒋昭出生在北平，童年时代也是在北平度过的，在病痛中的她希望能再回北平，重温儿时的美好时光。蒋百里含泪答应了女儿的请求，他们举家搬到了北平，在颐和园租了房子住下，把蒋昭送进了北平肺病专科医院疗养。医院的医生或许出于安慰的心理告诉蒋百里：蒋昭的病情治愈的把握比较大。蒋百里听了这一答复，高兴得几乎流出眼泪。此时南京当局召请蒋百里，在得到医生充满希望的答复后，他放心地乘火车去了南京。

但蒋昭的病情终究恶化了，她的眼睛几乎已经失明，常常在昏迷中呼喊父亲。左梅见状，连忙发电报给丈夫“昭想父，速来！”接此急电，蒋百里十万火急地赶回北平。左梅估计丈夫会乘座最快的一班列车，便依照列车时刻表到车站去迎接，果然接到了他。

蒋百里立即赶往医院。蒋昭一听见父亲的声音，苍白的脸上顿时泛起笑容，她觉得自己幸福无比。晚上，在父母依偎中的蒋昭睡着了。显然，在睡梦中死神也伸出了它的魔掌，与蒋百里夫妇争夺蒋昭：整整一夜，蒋昭脸上的笑容和泪水始终混杂在一起。天刚泛白，从梦魇中挣扎着醒来的蒋昭看见了守候在两旁的父母

亲，声音低沉忧郁地说：“爸爸和娘疼爱我，我十六岁？……”她说不下去了，伸出手来做了一个割断的手势。蒋百里见了，心如刀绞，左梅也悲痛万分。

由于几天来旅途劳累，刚下火车又在医院守护了一个通宵，蒋百里疲惫不堪。看着医生给蒋昭吃药后，她的情况略微稳定了一些，蒋百里便回到颐和园住所休息了一夜。为了不让四个小女儿感到害怕，他忍住悲痛，强作笑脸安慰了她们一番后，就一头扎进自己的卧房，再也不愿出来。

很快，蒋昭的病情急剧恶化，第二天她进入了浅昏迷状态。左梅请来牧师为蒋昭做了祷告之后，她就一直处于昏迷之中。到晚上，蒋百里拖着沉重的步子赶到蒋昭病床前，蒋昭突然清醒过来，她声音清脆地问几个妹妹好，然后用瘦弱无力的双手拥抱父母并一一吻别，再和女佣们握手告别，随后她面含笑容永远地闭上了她的双眼。

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正在颐和园石舫上等候医院消息的蒋雍、蒋英和两个妹妹远远看见父母和陪伴姐姐的女佣从长廊走过来，顿时明白不幸的事情终究发生了，见父亲脸色铁青，她们谁也不敢哭出声来。午饭没吃几口，蒋百里便心情沉重地搁下筷子，茫茫然出了门。五女蒋和曾在狱中陪伴过父亲，她很能猜测父亲的心情，便跟着父亲后面，不敢远离。蒋百里在光影碎乱的树林里高一脚低一脚地摇摇晃晃走着，蒋和生怕父亲会直接往湖边去，便不停地喊“爸爸！爸爸！”蒋百里脑子里一片空白，听见女儿的呼唤，缓缓转过身来，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悲伤，抱着一棵古柏放声痛哭起来。

往后有好多天，蒋百里不哭不笑，言语极少。左梅怕影响丈夫和女儿们的情绪，更是强忍眼泪，常常是等他们不在的时候才哭出声来。一天，蒋百里带着四个女儿到后山散步，在古柏丛中见一座大树墩，一旁摆着四把小椅子，周围静寂一片，只有小鸟

和知了偶尔倦怠地叫上几声。蒋百里不由得失声笑了出来，几个女儿见状，纷纷围到父亲身边。蒋百里问女儿们：“你们知道仙人怎样过日子？”看着女儿们茫然的神情，他接着说“山又高，树又大，在人迹不到的丛林里，枝干参天，落叶满地，偶然树颠上有无名怪鸟凄鸣一两声，神仙必等到这等境地才现出身来。”女儿们听了这番不着边际的话，皆觉糊涂。蒋百里又告诉她们，神仙吃松子、睡树上，眼前的树墩和小椅子是他们下棋的地方。孩子们仍旧不太明白父亲给她们讲这些事的含义，或许蒋百里是在祝福长女能在另一个世界里得到一个好的归宿吧！

#### 四、闲云野鹤

从送蒋昭到北平，蒋百里全家在颐和园住了三个多月，直到9月初他们举家又回到了上海国富门路十号。因触景生情，左梅本已有所平静的心情又悲伤起来，但她总是暗自抹泪，强忍悲痛。蒋百里亦是如此，他担心左梅这样下去会伤身体，一天，趁孩子们都不在家，他把左梅请进书房，说道：“你痛痛快快地哭一场吧，我也陪着你哭。”说罢便痛哭出声，左梅再也忍不住，夫妇两人号啕大哭起来，直到声嘶力尽才止。

之后的日子里，蒋百里继续在农商银行工作，依旧埋头从事经济与国防建设方面的研究，先后写就《东方文化史及哲学史》、《战斗与生活一致》、《法西斯与民主》、《辅佐阶级与主权阶级》、《以政治控制军事》、《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等论文和著述。

大女儿突然病逝后，蒋百里对家庭倾注了更多的爱，只要有时间他就在家陪着女儿们。他全面分析了四个女儿的特长和能力，着意培养各自的专长，潜心为她们安排今后的人生路。二女蒋雍

沉默寡言，生性好静，但她内心情感丰富，蒋百里在普陀山生病卧床时，她常常衣不解带、夜不闭目地悄悄守护在父亲床前；三女蒋英性格开朗，和大姐一样喜欢音乐，只要有新唱片上市，她总能全家第一个知道；四女蒋华逻辑思维能力强，精于计算和推理，蒋百里在狱中时教她学打桥牌，她一点就通，颇有心计；五女蒋和天真活泼，最喜欢听故事和表演节目，形象思维能力超群。蒋百里总是尽自己最大能力分别对孩子们的特长加以引导，光是给蒋英购买的唱片就存了一大柜子。

夏天又到了，在北方生活多年的左梅和孩子们都不习惯南方炎热的夏季，于是，蒋百里带着全家到青岛避暑。蒋百里每天都教女儿练习骑马，最初在平坦的海边沙滩上慢慢遛达，待她们的骑术有所长进之后便策马上了崎岖的山路。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就练得一手好骑术，在德国军中实习时曾让那些自傲的德国军人大为佩服。他对练骑马有精辟的论述：“初学骑马的人，第一要练胆，胆子不大就不会学得好；第二不怕跌，越跌得多门槛越精；第三要善于应付环境，明乎此便无往而不驰骋自如了。”于是他的女儿们在一声声“救命”声中变得胆量奇大，陡岩峭壁也敢纵马跃下，全都成了马背上的英雄。

四女蒋华身材不高，在马背上总是摇摇晃晃的，谁见了都担心她会摔下来，可她居然成为四姐妹中最会把握重心且从未从马鞍上摔下来的最佳骑手。蒋英活泼好动，胆子特大，什么样的马她都敢骑。一天傍晚马儿归棚时，蒋英突然跳上了父亲的座骑背上，正要入厩的马儿遭到意外的刺激，狂暴地在空地上急转几圈，见没把蒋英甩下，便径直朝马厩里面冲了进去。一旁的人全都惊呆了，蒋英此时根本来不及从马上跳下，眼看狂奔的马儿带着她就要撞向马厩低矮的屋檐，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紧急关头，机智的蒋英蓦然腾身，双手抓住了屋檐，马儿轰地一声闯进了马厩，蒋英也摔倒在地，避免了一场重大危险的发生。见蒋英趴在地下

一动不动，蒋百里吓坏了，生怕女儿出什么意外，他疾步赶上前，仔细地检查了蒋英身上，除了几处皮肉伤外，别无它事。倒是蒋英自己觉得当众摔下马来，很难为情，不好意思地站起来。蒋百里知道她的心情，不禁连拍她的肩膀鼓励道“别害臊，你今天才算毕业了！”

在青岛，学习军事出身且致力于国防建设多年的蒋百里再次受到强烈的刺激。在海边，随时随处可见日本军舰自由进出，如入无人之境，舰上黑洞洞的炮口径直指向大陆本土，而中国的海军却连影子都没见着，整个海防门户洞开。蒋百里想，一旦大战打响，面对日本军舰的进攻和登陆，我们将无法阻止。

青岛是避暑胜地，各方面的条件较之在普陀山的时候好多了。但美好的时光总是很短，肌肤上的舒坦每每总被思想上的痛苦所压抑。不久南京有急电驰来，召蒋百里到国民政府报到。接到电报，蒋百里心情十分激动，倒不是因为得到政府的重新器重，有个人利益可图。蒋百里激动的是他终于等来了报效祖国的机会，几年来，他一直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当外患笼罩在民族之顶、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之时，蒋介石因与唐生智的恩仇而牵连蒋百里，使他空有报国心，徒怀御敌技。尽管如此，蒋百里拳拳赤子之心从未忘记过为国尽忠，所谓位卑更忧国。

在过去的几年里，蒋介石把他的全部精力用在了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役上。当日寇铁蹄践踏东北三省之时、在上海肆意烧杀掠抢之时，蒋介石安坐总统府，一动不动。可为了剿杀中国共产党，他不畏山高路远，飞重庆、赴贵阳、抵昆明、到成都，大搞“先安内而后攘外，要安内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正当蒋介石在西南追剿红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彻底霸占中国的野心，将其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展到华北，他们企图变华北晋、察、冀、绥、鲁五省为“第二个满洲国”。这下蒋介石感觉不妙，他生怕日本人在华北另搞一个与自己对抗的政权出来，他再也无法回

避此事，不得不暂停对红军的继续围剿。实际上红军此时已胜利突破了蒋介石设在川西阿坝和巴西地区的封锁线，都快要会师陕北了。

蒋介石的计划很简单，只要日本军队不马上和他的军队发生正面冲突，怎么谈判都可以。此外他还把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于国际社会的调解，因此他准备派出一个军事代表团出访欧美，一是争取大国的支持，寻求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途径；二是时下欧洲局势风云变幻，中国急需了解、掌握各国的最新动态，以便决定外交方针，不至于开罪盟友。

为此，蒋介石特地召见了陆军大学资深教官史九光，告诉他政府准备派出一个代表团出访欧美国家，考察现代军事。蒋介石请他推荐这样一位人才：第一，精通外语；第二，有军事才华；第三，在国内外皆有一定的名气。史九光不假思索地告诉蒋介石：“条件兼备的只有一个蒋百里。”<sup>①</sup>这句话顿时让蒋介石想起了那个曾经被他尊称为先生，又曾经被他投进监牢的瘦弱身躯的蒋百里。于是，一封电报将蒋百里从青岛召至南京。

蒋百里欣然接受了出国考察的使命，出发时间初步定在1935年冬或1936年春。蒋百里计划请夫人作陪，并同时把三女蒋英和五女蒋和送到欧洲去学习。左梅害怕出门远行，有点犹豫，但架不住蒋百里执意要求，也就同意了。

为出访一事，蒋百里还曾到南京郊外汤山与蒋介石密谈过。

注释：

①⑤⑩蒋英：《哭亡父蒋公百里》，载黄荪萍、张禾草编《蒋百里抗战论集》，浙江金华，新阵地图书社，1939年4月版。

②李吾：《蒋百里先生的生平》（七）。

③⑥⑦⑧⑬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127、131~135页。

④⑩蒋洁：《百里先生言行风度的追怀》，载黄荪萍编选《蒋百里先生文

选》，浙江金华，新阵地图书社，1939年10月版。

⑨关于蒋百里游普陀的具体时间有两种说法，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云“二十三年夏天”，李吾《蒋百里先生的生平》袭承陶说。唯蒋洁在《百里先生言行风度的追怀》称“民二十一年夏，先生游普渡，住在长生庵，依然阅经不释手”。蒋洁此时就学于百里先生，且所著纪念文章成文于百里先生逝世后三个月，应足可信。相反，陶传所书时间在短短几页书稿中即由民国二十一年突跳至民国二十三年，明显出现了时间断层。本书从蒋洁所云。

## 第九章 战争前夜

### 一、浪漫旅途

1935年夏尽秋至之时，蒋百里的出访计划提前进行。南京政府给蒋百里将到的各国大使馆通电之后，蒋百里便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的身份出行了，他此次出访的目的主要是考察欧洲各国的总动员法。

蒋百里偕夫人及蒋英、蒋和两个女儿在上海港登上了意大利邮轮维多利亚号，同船出洋的还有驻法大使顾维均夫妇和新任驻意大使刘文岛。新闻界的陶菊隐专程送至码头，并为他们摄影留念。

维多利亚号邮轮小巧玲珑但设备齐全，蒋英、蒋和一上船就迷上了游泳池，于是蒋百里每天早晚都准时出现在游泳池边，指导女儿们练习游泳。刚出发的几天，太平洋上风急浪高，蒋百里站在池边常常被溅得满身是水，可他依旧耐心地辅导女儿，让顾维均的夫人黄女士羡慕不已，她总是在左梅面前夸赞蒋百里。

此时的顾夫人正陷入感情危机之中。顾维均在民国人物中以风流倜傥而声名远扬，他和黄女士的结合，就是他早年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巴黎和会的风流结晶。不久前，他又在外结有新欢，因而对夫人十分冷淡。为此，顾夫人苦恼万分，她曾向孔祥熙夫人

宋蔼龄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姐妹两求教，可丝毫不得要领。她把自己的苦恼一口气全讲给左梅听了，求她帮忙给出个点子，以挽救她的婚姻危机，她说：“我丈夫近来对我的态度很冷淡。我问过孔夫人和蒋夫人，怎样才能把丈夫的心扳回来，她们教我祈祷上帝。可是这年头，上帝也够忙的，我的话似乎听不进他的耳朵，怎么办？”左梅劝她说：“与其求上帝，不如求你自己的好。”她给顾夫人出了这样一个主意：“你逆来顺受无论他对你怎样冷淡，你却报之以一团热。你多忍耐一次，他的良心便会对你多负疚一次，积下来咎歉的心理深了，他对你的同情心增加，最后便是爱的复活，幸福的钥匙稳握在你手里。”顾夫人听了，满心欢喜地走了。她哪里知道，同在维多利亚号上，他丈夫的新欢爱侣时刻都在含情默默地盯着顾维均。要说这件事还是被一位女士发现的，在一个月明星稀之夜这位女士游泳归来，偶尔听到一对男女在窃窃私语，她不经意地看了一眼，发现那位英俊潇洒的男士竟然是驻法大使。于是，很多人都知道了这个公开的秘密，只是瞒着顾夫人而已。

邮轮每停靠一个码头，蒋百里一行都受到当地政府和官员的热情接待，蒋百里也抓紧时间带着妻子女儿上岸参观游览，并一路给她们讲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在新加坡，英国驻新总督特地邀请蒋百里、顾维均、刘文岛等参观该港的防御工事。面对浩大的工程，蒋百里私下对刘文岛说：“这是防海而不防陆的一个要塞，敌人从海上进攻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从陆地来，岂不白费？”此话不幸被蒋百里言中，后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南亚时，攻占新加坡就是避开了海战，从陆路上进攻的。

蒋百里非常注重对孩子们的教育，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办法施教。在孟买，他带女儿们去参观印度神庙，给她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宗教课。船过苏伊士运河时，蒋和看见苏伊士港内的黑人工人全都是肩挑人扛往船上运煤，不由得惊奇地问父亲：“他们为什么不用起重机呀？”蒋百里告诉女儿说“这就

是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手段，白人眼光中的黑人不过一种面具人形的蠢物，这蠢物的代价比机器更廉。也许白人自命慷慨，给他们工作使他们得到起码的工资，赖以维持起码的生活，不然的话，他们就得饿死。可是这黑色大陆原为黑人所有，无限资源都被帝国主义者榨取去了！”在红海，蒋百里给孩子们讲述古老埃及的文明，讲埃塞俄比亚的风情，到地中海，他又给她们讲古希腊神话。第一次走出国门远游的蒋英、蒋和在父亲广证博引、生动有趣的讲解中学到了不少知识，这些是她们在家里根本不可能学到的。连左梅也常常听入了迷，她由衷地敬佩丈夫渊博的学识。<sup>①</sup>

船到终点意大利那不勒斯港时已是9月，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人员和意大利军部欢迎中国国民党中央高等军事顾问及新任驻意大利大使的代表早已迎候在码头。本来蒋百里已经答应两个女儿，要带她们去游览维苏威火山的壮丽景观的，可意大利方面把行程安排得紧紧的，结果观光之旅只好作罢。

蒋百里一行马不停蹄，乘上意大利军方安排的专车直奔罗马。汽车沿着意大利蜿蜒曲折的海岸向行驶，宁静的小镇、美丽的风光，使得蒋百里仿佛又回到了他早年留学德国时在意大利旅行的快乐时光，他又不停地给夫人和孩子们讲起了他的往事。车到罗马远郊时已临近午餐时分，蒋百里建议在一座半山小镇进餐。谁都没有料到蒋百里竟然对这座小镇是那么的熟悉，他带着大家穿过红绿交映的花圃，漫步于柠檬和橄榄树林中，在林子深处，一座意大利风格的乡间饭庄正升起袅袅炊烟。众人被这极富浪漫情调的乡间饭庄惊呆了，在意大利人的热情迎接下，他们来到露天阳台式的餐厅，没料到这儿更让他们赞叹不已：古朴的木桌椅上铺着浆洗洁净的粗布，一束野花不经意地摆在桌上，无半点人工雕饰的痕迹；凭栏临风，面对如同翡翠般的地中海，座座岛屿恰似珍珠镶嵌其中，人在此处，就象进入了一幅美不胜收的画卷当

中。饭菜很快就送上来了，蒋百里特地给大家推荐这家饭庄的鲜鱼，这是店家自己养在山下海湾里的，客人来了以后才通知山下的人从海湾里捞出送上来，绝对鲜活。蒋百里又带着两个女儿摘来几个柠檬，鲜柠檬汁就上烹调上佳海鱼，味道美极了。蒋百里安排的这顿饭众人吃得津津有味，刘文岛连声称道：“生平未尝此味！”

到达罗马后不久，意大利总统墨索里尼正式接见了从东方远道而来的蒋百里将军，他对这位东方人如此熟悉意大利历史和文化深感惊奇，他邀请蒋百里出席参观即将于9月24日至9月30日举行的秋季军事演习。随后意大利军方就正式邀请蒋百里参观在那不勒斯举行的为期7天的军事演习。从那不勒斯回到罗马，蒋百里又全面详细地考察了意大利的总动员法，并根据外国的经验和中国的实际写出了长篇考察报告，经征求大使馆同仁的意见后发回国内。

## 二、父爱殷殷

蒋百里一家在罗马下榻于中国大使馆。旧地重游，蒋百里心情十分激动，他写到：“我这次重游，旧的怀念与新的怅触，如像三春的花雨缤纷，经过我的心目。这些伟大的古迹不够，还加上些伟大的新迹！如果我是英国人或许五十年后的中国人，我一定微笑点头说：‘倒也不坏！’但我这一回来，身历了创钜痛深的国难，看见一个国家十几年内会整个从弱变强，哪得不感奋，哪得不起野心，哪得不为之赞叹。”<sup>②</sup>

在意大利考察、旅居的两个月中，蒋百里成了全家的导游。他告诉两个女儿游罗马不是叫上一部汽车兜几个圈子就完事的，他说：“我们应该庆祝我们的幸运呵！第一步踏到欧罗巴，就踏到了

世界上一个最旧（最富于历史性）而又是最新（最富于时代性）的地方。唯其旧所以能维新，唯其新所以能保旧。从老根里才会发出嫩芽，所以不可轻视老。有嫩芽才能荣养老根，所以应该珍护新。……罗马是个文化之海，上下人类史，纵横全地球，一切美术、哲学、宗教的巨流都汇集在这里。同时，它又是一座文化之山，一条条长江大川都从山岭上流到人间，灌溉了阡陌，衣食了大众，正好比西谚所谓一条条的路都引到罗马去，同时也从罗马通到了四面八方。”<sup>⑧</sup>他要求两个女儿到罗马来“不仅要看，还要研究，研究不够，更须体会。”切勿做蝴蝶，必须学蜜蜂。

起初，左梅对游览观光的兴趣并不大，她只想清静地呆在房间里，因为她自认为是个门外汉。可是蒋百里带着他参观几处名胜古迹后，她的兴趣大为改变。原来蒋百里并不是走马观花地到此一游而已，他熟知历史，满腹掌故，又极善演讲，每到一处，经他一介绍讲解，左梅和孩子们就如同漫步于历史的长廊之中。渐渐地左梅的游兴激增，每天早饭之后，她总要问丈夫：“你今天没有事吗？咱们一块看古物去！”

蒋英和蒋和在父亲那里受益颇丰，她们两个小精灵把父亲在游览时的谈话记录下来，形成了一篇颇有份量的世界文化史讲座：《现代文化之由来与新人生观之成立》，共分三讲：古迹与新迹、美术与宗教、个人与群众。这篇讲座堪称蒋百里文化史观的精髓，精彩纷呈。蒋百里最后教育两个女儿：“锻炼个性以服务于群众；努力现在以开拓将来。”这两句短训实际上是蒋百里自己的座右铭。

比起妹妹来说，蒋英的罗马之旅就浪漫多了。17岁的她婉约标致，如同鲜花一般，经常跟随父母出入社交场所。在一次社交舞会上，一个有美男子之称的留学生发现了明珠般的蒋英，这个青年的父亲是国内外交界的名宿。于是他极力邀请蒋英参加各种社交舞会。从未接触过这种邀请的蒋英面对来自异性的爱慕，心中既激动又紧张，她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于是请示母亲：“我应不

应该接受他的邀请呢？”曾有过同样感受的左梅非常开明，她对女儿说：“现在不是女儿躲在房门内不见人的时代，偶然外出交际是没有问题的。”

于是，蒋英第一次单独和异性约会了，他们参加了一场交际舞会。正值花季的蒋英在舞会上光彩四射，这个东方少女竟成了舞会明星。情窦初开的蒋英和男友一直跳到半夜12点才回到大使馆。蒋英担心父母会责备她，便让男友把车停在大使馆外，她踮着脚一步一步轻轻地走到大使馆楼前。隔着窗帘她看见二楼的灯光还亮着，心里忐忑不安。上了楼，只见父亲握着书本穿着睡衣在沙发上打着盹，母亲在灯光下剪着指甲。显然，大家都在等待她回家。蒋英脱了鞋，立在门边，像是犯了错误的小孩子不知如何是好。左梅什么都没讲，只是宽容地对女儿说：“夜深了，你快去睡吧！”正好蒋百里也醒了，他见女儿回来了，也就没说什么径直到了卧室去了。

隔了几天，刘文岛大使受托前来向蒋百里夫妇提亲。蒋百里此时可是爱女心切，他认为女儿依偎在父母膝下是她最大的幸福，一旦失去家庭的温暖，她就将面对冷酷和孤独。他一口回绝了刘大使的美意，随即带着蒋英到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去旅游了几天，又到中欧去游览了阿尔卑斯山风景区。

从阿尔卑斯山下来，蒋百里觉得此行已没必要再呆在意大利了，他便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租了一处公寓，把左梅和女儿接到了维也纳。

1936年转眼就来到了，只可惜他们没能赶上著名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但音乐之都的环境对提高蒋英的音乐水平极为有利，蒋百里十分满意。一直恋着蒋英的那个青年竟然也从罗马赶到了维也纳，他求见蒋百里，表白了他对蒋英的爱意，希望能得到同意。蒋百里此前已经了解到这位美男子在罗马风流韵事从没断过，心中对他很反感。他懒懒地说：“这是我女儿自己的事，我们不便过

问。”说罢，转身离去。正好蒋英姗姗走进客厅，陪着他聊起天来。他们一聊就是两个来小时，显然，那个青年非常希望能够得到蒋英的首肯。

蒋百里不放心女儿，尽管前一段时间他一直在给女儿讲述人生与爱情的意义之所在，希望女儿能回绝这场并无根基的恋情，可蒋英毕竟还只有17岁，而爱情这个东西本身又是如此的深奥复杂，他不知道女儿会怎样回答对方。正在想着，蒋百里隔着门缝看见年青人突然掏出手枪，“砰”地一声拍在茶几上，似乎要以死相逼。蒋百里大吃一惊，他刚要冲出去拦住那个鲁莽的年青人时，却听见蒋英面不改色、语气平静地说道：“你是来向我表示善意的，那么以我的心为心。你如果自杀，我便是无端的罪人，而这个罪是你强迫加在我头上的。我们听音乐去吧，今天不必解决这个问题。”随即，她轻轻把手枪往旁边一推，拉起男友款款而去。蒋百里彻底放下了心，他知道女儿成熟了。

夜深了，在等候女儿回来时，蒋百里依旧坐在沙发上看书，左梅的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终于，蒋英迈着轻松的步子回家来了，她朝父母做了个鬼脸，顽皮地说：“放心去睡吧，没有人抢去你的女儿，也不会闹出乱子来。”

把左梅和孩子们安定下来后，蒋百里便开始遍访中欧各国，他先后访问了南斯拉夫、捷克、匈牙利等国，考察诸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前后游历达三个月之久。

根据计划，蒋百里特地到德国去了一趟，一是联系访问考察事宜，一是为两个女儿留学德国作些安排。此时的柏林热闹刚过，8月，第十一届奥运会在柏林开幕，希特勒亲临开幕式发表演说。中国政府派出了以考试院院长戴季陶为团长的奥运会代表团，这是中国首次参加这一盛会。在柏林，蒋百里好友如云，与德国外交部照会之后，他就周旋在老友之间。朋友们建议他让两个女儿进柏林他熟悉的一所学校学习，蒋百里便请他早年在德国时的一

位老师出面介绍，可没想到该校因从未招收过东方学生便以名额已满为借口，将此事推辞了。还是德国国防部长贝伦堡将军帮蒋百里解决了这个难题。贝伦堡将军早年与蒋百里同在兴登堡元帅麾下的第七军供职，蒋百里任见习连长，贝伦堡将军也在同一营任职。老朋友相见，贝伦堡将军设宴招待，蒋百里将女儿入学遇到困难一事告知。贝伦堡将军的女儿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他当即写了一张便条，让蒋百里去找校长。等到了学校，蒋百里才知道这所学校是专为德国贵族后裔开设的，校长就是旧皇朝霍亨索伦家族的成员。校长见了贝伦堡将军的便条，立刻做出安排，准备在新学期到来时接纳来自东方的小姐妹。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柏林奥运会上，中华民国代表队惨遭失败。作为政府高等军事顾问，蒋百里深感脸上无光。数十年来一直处于动荡之中的中国人民根本无法从事体育运动，所以中国体育代表团自然是败得一塌糊涂。特别是蒋百里听说曾在远东运动会上几次大胜日本帝国队的中国篮球队竟然以悬殊的比分负于趾高气扬的日本人，让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都觉得似骨鲠喉。许多中国留学生和华侨言及于此，无不失声痛哭，生性容易激动的蒋百里也深受刺激。国力不坚，时势不济，他为自己的祖国深深泣叹。在随后的日子里，蒋百里听说戴季陶、郭沫若、冯玉祥、李烈钧、邹鲁等名士都在德国考察，他就在柏林继续呆了一些日子，希望能在异乡见到故知。可是大家都过于忙碌，竟一直未能谋面。

在德国外交部的安排下，德国元首希特勒接见了蒋百里，他亲手为蒋百里挂上一枚奥运会纪念章，并设宴与中国客人共同进餐。以地位而言，希特勒是强国之首，但就资历而言，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仅为一小小士兵，可蒋百里早在1907年就在德军中任过见习连长，而且在当时深得前任德国总统兴登堡元帅的赏识。所以希特勒表面上对蒋百里极为尊重，外交礼遇极高。在贝伦堡将军的安排下，蒋百里参观了德军秋季演习。随即，他返

回维也纳，与夫人和女儿们团聚。左梅在维也纳学得了一手烹调手艺，蒋百里在德国时，她曾亲自下厨招待蒋百里的好友、中华民国驻奥地利公使刘崇杰，蒋英姐妹也开始学习德语。

新学年很快就到了，此时蒋英姐妹的德语水平已有很大的提高。蒋百里陪左梅和女儿离开了维也纳到了柏林。蒋百里认为蒋英在音乐方面天赋很高，欧洲是音乐的天堂，如果在这里扎扎实实地学上几年，必定会有收获。他让蒋英毕业后即专攻音乐，他说道：“你将来学音乐到了相当成就的一天，会感到内心的空虚和孤立。那时候你不能灰心放弃，必须一面回想历史的过程，一面向大自然中求解答你的难题。那是人天交战的关头；也就是一生学业成败的关头。”<sup>④</sup>蒋英后来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来到德国，你把我们的一切学校手续安定好了，在进学校的前一天，你还带我们到动物园去玩。那时柏林动物园的狮子刚养了四个小狮子，我们好奇心重，特意一人去抱了一个小狮子，一块儿照了一张像。后来你把照片寄给我们时，还在像片后面附着几个字：‘垂老雄心未歇，将来付与四狮儿’……”<sup>⑤</sup>

在柏林，蒋百里又住了一个多月。一方面，他继续进行外交访问，另一方面他和左梅尽可能多地陪在女儿身边，让蒋英和蒋和早日适应新环境。

### 三、新大陆之旅

1936年的10月，欧洲大陆气候反常，北方早寒。进入中旬，柏林已经开始送暖气了。

蒋百里结束了在柏林的行程，乘火车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参观。在柏林车站的站台上，蒋英姐妹挥泪和父母告别。左梅强忍眼泪，依依不舍地把两个女儿拥在怀中抱了又抱。列车徐徐开动，蒋百

里望着两个爱女消失在视线里，半晌才回头，低叹一声对左梅说道：“以后再见面时，也许她们已不是我们的了！”

在法兰克福，蒋百里拜谒了德国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的诞生地。蒋百里在文学方面“最好歌德的著作，藏有《歌德全集》，研究很深。……在书室中置有歌德著作里的大理石像”。<sup>④</sup>自从踏上欧洲大陆后，蒋百里曾无数次地给两个女儿讲述歌德的一切，讲述他心中这个伟大的偶像。随后，他们经科隆进入法国。

在巴黎，左梅又见到了分别已久的顾维钧大使夫人。顾夫人见了左梅，连连拥抱亲吻，她感激万分地说：“蒋太太，你真是女中诸葛，我听了你的话，现在我的丈夫已在我怀抱中了！”说罢，她张罗着要送香水和衣料给左梅。原来他们夫妻感情有了好转。可惜黄女士只是一时拴住了丈夫，没有毕生拥有爱情。多少年后，顾维钧在古稀之年到底还是与黄女士分手，随即与暗恋近三十年的情人结成新欢。

在巴黎逗留了一个星期后，蒋百里夫妇乘飞机前往伦敦。小住数日，他们搭乘德国邮轮欧罗巴号横渡大西洋，踏上了访问美国的行程。尽管欧罗巴号是五万吨级的大船，左梅仍旧经不住大西洋的风浪，她头昏脑胀，五味齐翻，常常连胆汁都吐出来了，好不容易才挨到纽约。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于俊吉的安排下，蒋百里夫妇在纽约住了一个星期。每天，蒋百里都忙于考察参观，左梅则一直没有从晕船的感觉之中缓过来，领事夫人陪着左梅问寒嘘暖，要带她出去观光，都被左梅谢绝了。直到他们离开了烦嚣纷杂的纽约，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恬静悠闲的景色才使左梅疲劳的身体逐渐恢复过来。蒋百里从未到过美国，但他对这个历史浅短的新兴国度依然了如指掌。在参观华盛顿故居后，蒋百里评价说：这所故居院落大、房子矮、陈设简单是其三个突出的特点，故居中珍藏的华盛顿母亲的结婚戒指则可能是美国唯一的古董了。

在纽约、华盛顿前后共逗留了近二十天，蒋百里夫妇才乘火车西行，中途他们又向北参观了尼亚加拉大瀑布，随后蒋百里夫妇造访了美国第二大城市芝加哥市。在芝加哥，蒋百里还留下一段趣闻。当时该市正在上映根据赛珍珠所著的《大地》改编的影片。美国片商听说有一位中国将军到了芝加哥，而这部影片又是以中国为背景的新片，精明的片商便电邀蒋百里夫妇出席首映式，不失时机地做开了广告。蒋百里夫妇欣然应邀前往，电影公司趁机大造舆论，并且把所有著名的电影明星都请过来陪同中国将军，只有童星秀兰·邓波儿因咽炎发作没有赶到，但她还是请公司代为赠送了签名照片。这种即便是美国人也很难遇见的盛会立刻引起轰动，这部影片的上座率当然也大获成功。

在美国旅行了一个来月，最后来到旧金山，在旅馆遇到了正在美国参加太平洋学会的中国代表胡适博士，他们结伴同游，又呆了几天。这时蒋百里的旅费已所剩无几，于是他在旧金山订了船票，准备回国。可事不凑巧，其时正赶上美国船员工会大罢工，船期遥遥无信，不得已，蒋百里决定转道加拿大首都温哥华乘船回国。等到温哥华后，蒋百里夫妇已无钱住个好一点的宾馆了，他们只得在一家华侨宿舍混上一夜，第二天乘俄罗斯皇后号游轮踏上归国航程。

俄罗斯皇后号是一艘几千吨级的旧船，船龄已久，设备简陋，加上一出航就遇上了恶劣天气，风高浪大，左梅只觉得天翻地覆。看见夫人难受的模样，蒋百里灵机一动，从二等舱请来了三位中国人，陪夫人搓麻将消遣消遣。说来也是有趣，曾被梁启超称为“女将军”的左梅见了麻将立刻就不晕船了，她一骨碌翻身而起，坐到桌旁，不管是多大的风浪，再也没听她说过头晕脑胀和胃疼。

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俄罗斯皇后号上的所有乘客举行了盛大的庆祝舞会，人们完全忘记了风大船斜，如同过狂欢节一般。蒋百里激动而又忧郁地对夫人说道：“和平，和

平，人类所祈求的是和平。可是相隔不到二十年，人类又播下了战争的种子，我看不久的将来，二次世界大战会在东方爆发！”<sup>77</sup>

第二天，俄罗斯皇后号停靠日本横滨港。回到故乡的左梅心中激动不已，蒋百里本想让夫人回家乡探望亲人，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侵略行径，左梅毅然放弃了回乡的打算，她跟随丈夫直接到神户候船。这时，美国船员工会的罢工已得到解决，胡适所乘座的美国邮轮日本皇后号抵达神户，于是，蒋百里夫妇登船，他们一同归国。

为了纪念此次出游海外，蒋百里与胡适下船后即合影留念。

#### 四、亲历西安事变

蒋百里出访欧美之时，正值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11月19日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对外关系之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蒋介石首次提出了“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的对日外交方针。这项方针表明了蒋介石政府对日政策的一些变化，如果日本无止境地进攻，必将导致中国军队的反击。虽然蒋介石的这一方针含混不清，但国人终于第一次听到了政府有关抗日的声音。

实际上，此时中国的局势对蒋介石已经十分不利了。首先，在西北剿共前线，张学良、杨虎城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积极听从蒋介石的指挥去剿共。相反，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工作下，张学良、杨虎城已经和周恩来、李克农、叶剑英等中共高级领导人频繁会晤，并且即将建立由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组成的联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南方，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在准备双双打出“抗日救国军”的旗号，出兵湖南，北上抗日。虽然他们的目标是瞄准南京政府的，但在强烈要求抗日的国人心中，

他们的举动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神州大地抗日的怒吼声给蒋介石以巨大的压力，使得他非常被动。其次，世界局势的新变化正在使英美大国无暇顾及蒋介石了。面对欧洲大陆战争一触即发、世界形势动荡不安的局面，蒋介石不由得忧心忡忡：若把中日战争放在世界范围来看，显然是微不足道的，英美等国的主要精力全都放在处理欧洲事务上，难怪这些国家对日本侵华的态度一直是十分暧昧，从未明确、坚决地反对过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蒋介石过去总是指望通过外交方式来平息日本人的野心，现在这一希望看来终归是个泡影，目前唯一可依靠的就是中国人自己了。于是，就终于有了11月19日蒋介石对日本表现出的非常有限的强硬态度。

此时的蒋百里远在欧洲，他错过了12月9日在北平爆发、继而在全国掀起抗日新高潮的学生爱国运动。进入1936年以后，张学良、杨虎城和陕北红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4月，张学良在延安和周恩来秘密会谈后，中共中央便派叶剑英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改造部队，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相遇后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如仇人相见，他们往往只是象征性地朝天鸣枪。5月5日，中国共产党顾全大局，发出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回师通电，毅然将已经渡过黄河并已取得许多胜利的抗日先锋队撤回，以向天下昭示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决心。这样，中国共产党放弃了过去“反蒋抗日”的方针，采取了“逼蒋抗日”的策略。

但蒋介石依旧只是口头抗日，实际行动则是继续在西北围剿红军，在国内其它地方实施高压政策，镇压抗日民主运动。10月9日，蒋介石的国策顾问、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出访德、奥、意等国归来，蒋介石立刻与他见面，详细地了解欧洲局势。经过一番密谈，蒋介石和戴季陶这位国民党的理论家、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先反对者和极力破坏者对国内时局达成了惊人一致的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一旦战争打响，中日关系问题在世界范围

内就只是很小的一个方面，到时且不谈剿共，就是抗日也只能靠自己救助了。所以应该抓紧大战尚未打响这一间隙，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剿灭共产党，清除卧榻侧忧。至于目前的中日关系，目前最好不要激化矛盾，以免多面对敌。

方针既定，蒋介石立即开始实施他的计划。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度过50大寿后就坐镇洛阳指挥剿共。胡宗南奉命率中央军第一军孤军深入，在山城堡被红军击败。张学良的东北军则对蒋介石的命令表面服从，实则按兵不动。蒋介石的起家部队第一军第一师遭到红军重创，损失近三个旅，其中第一旅被全歼。得此消息，蒋介石大怒不已，电斥张学良，追究责任。张学良率部下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外遭国人唾骂为不抵抗将军，内心愧对父老乡亲，他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左右为难，不禁凄然泪下。

12月3日，张学良飞抵洛阳，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剿共，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但他不仅没能说动蒋介石，反而遭到蒋介石的面斥。次日，他陪同蒋介石飞往西安，蒋介石要在西安亲自督阵剿共。东北军的青年军官闻讯早早聚集到了西安机场，蒋介石刚一下飞机，就遇上了这群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请愿军官。面对这样的一个“欢迎仪式”，蒋介石十分生气，他要求张学良严厉惩处这些军官。张学良见蒋介石对抗日的呼声竟是如此态度，不由得心都凉透了。

蒋百里是12月1日从国外归来，在国富门路自己家中住了刚好一个礼拜就接到了蒋介石的来电，邀请他赴西安面谈访问欧美的情况。9日下午，蒋百里以愉快的心情向妻子和女儿们告别后乘车到南京。10日整整一天，蒋百里没有出门，他在认真准备向蒋介石报告此次出访的所见所闻。11日上午蒋百里从南京乘飞机飞往西安，在机场迎接他的又是他少年时期在上海的同学邵力子，此时的邵力子已是陕西省政府主席。没有多少寒暄，他们直接驱车到西京招待所住下。一批中央军政要员及外国记者早已住进了西

京招待所。

当天下午4点，蒋百里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请他到华清池见面。专车准时来到招待所，接了蒋百里便直奔华清池，一路畅通无阻。很快，两个人见面了，蒋介石依旧尊称“百里先生”，但这尊重之中所流露出的虚情假意已经十分明显了。蒋百里倒真没有考虑过去的恩恩怨怨，他只是认真地向蒋介石报告他的此次欧美之行。自从蒋介石住进华清池后，张学良就一直在劝告蒋介石停止剿共，实施全面抗日，但屡次谏言均遭蒋介石的怒斥。7日，张学良冒死哭谏，但蒋介石毫无所动，反而斥责张学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蛊惑”，并且说“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寇，是共产党……，不主张剿，而主张联，简直是反动。”<sup>⑧</sup>张学良针锋相对地与蒋介石争辩达三个小时之久，蒋介石最后拍案指鼻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sup>⑨</sup>9日是一二·九爱国运动周年纪念日，西安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万余学生向张学良、杨虎城请愿。游行学生自西安步行去蒋介石的驻地临潼，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蒋介石电话命令张学良、杨虎城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为了避免爱国学生惨遭杀害，张学良在灞桥挡住了请愿学生，他激动地对学生群众说：“我和你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答复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sup>⑩</sup>10日，张学良又到临潼，请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涕泣陈词，要求蒋介石采纳，但张学良再一次遭到蒋介石的严词拒绝。张学良、杨虎城开始对蒋介石失去信任了，他们决心丢掉对蒋介石的幻想，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冒生命危险逮捕蒋介石，实行“兵谏”。

11日下午，当蒋百里在蒋介石住处报告访问欧美的情况时，张学良也在临潼，他心事沉沉，焦急不安地在休息室来回踱步。等蒋百里快谈完时，张学良借口当晚他和杨虎城要公宴蒋百里及中央来陕要员，想和蒋百里一道乘车回西安。但是蒋介石不同意，他

把张学良留了下来，让蒋百里单独回西安。很显然，张学良有事要和蒋百里商量。<sup>⑩</sup>或许蒋介石如果让张学良与蒋百里一道乘车回西安，对随后即将发生的“兵谏”会产生另外一种结局。

6点左右，蒋百里回到招待所，他的书桌上放着两份请柬，一份是邵力子邀请众人观赏宋代名画的，一份是杨虎城个人设宴招待来宾的邀请，两件事情都安排在12日。蒋百里略微收拾后便赶到绥靖公署参加张学良、杨虎城的公宴。一同赴宴的有军界高级将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万耀煌、陈继承以及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前驻日大使蒋鼎文等政界要员，蒋百里和陈调元早在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时期关系就十分密切。因为心情不错，蒋百里开怀畅饮，引得众人无不惊叹他的海量。有了蒋百里绘声绘色的海外见闻描述以及陈调元的幽默风趣，整个席间笑语不断，酒也喝得格外有味。

8点左右，张学良从临潼亲自驾车回到西安，直接到了酒桌上，此时蒋百里众人已是酒过数巡。张学良朝各位宾客一拱手道：“我自己当主人，回来的晚一点，该罚酒一杯。”说罢，端起酒杯一仰而尽。由于张学良、杨虎城心事沉重，宴席很快就结束了。众人一起回到西京招待所后，陈诚便到蒋百里的房间聊天，邵力子随后也过来了，因为按计划他们在明天都要随蒋介石离开西安返回南京，所以要谈的话题就格外多。他们一直聊到午夜时分方才离去。

12日清晨，蒋百里早早起来，他扭开电灯，准备起草欧游报告。此时晨曦初露，天色微微泛白，他习惯性地看看表，还不到5点。刚刚提笔没写几行，就听得远远传来一阵枪声，起初还以为军队练习打靶，可枪声越来越密，由远而近，直朝西京招待所这边而来，蒋百里顿时察觉到发生了“兵变”。他留意窗外的动静，只见一个黑影离他房间窗外不远，再听得“砰”地一声枪响，那个黑影应声倒地。

不一会儿，整个西京招待所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围了个水泄不通，昨天晚上还在一起喝酒的军政要员们全都被扣押，后来得知在蒋百里窗外被击毙的是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 五、张学良求教

蒋百里在房间呆了一个来小时，就听到外面有人大声问着：“由上海来的蒋百里先生住在哪一间房？”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就见一个年青营长推开了虚掩的房门，脚步粗重地闯了进来，他身后跟随着两个身健体壮的卫兵。那位营长盯着蒋百里问道：“您是蒋百里先生？”蒋百里镇静地点点头。青年军官客气了一些说：“不打紧，请先生客厅里坐。”瘦小身材的蒋百里被两个彪形卫兵一边一把架了出来。

招待所的会客厅里挤满了人，蒋百里一看，除了邵元冲外，昨天晚上在一起喝酒的军政要员们全都被集中在这里。有的睡眠惺松，有的还拖拉着拖鞋，还有几位要员夫人因没来得及更衣而只穿着睡袍，在严冬寒冷的晨风里冻得全身直抖。陈诚、蒋鼎文、朱绍良、万耀煌四人最后被押进会客厅。荷枪实弹的士兵们警惕地把守在会客厅内外，没有一个人与他们搭腔。众人在会客厅里面面相觑，因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皆惶惶不安。就这样一直关押了整整一个上午。<sup>④</sup>

到下午，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均也被带进了会客厅，见他浑身是血，众人顿时觉得大事不好，因为他是随蒋介石一起住在华清池的。

蒋百里冒昧地问那位青年营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青年营长长叹一气道：“你们有年纪的人哪里知道我们年轻人的苦闷！事

情不会扩大，你们请放心，再过些时你们就可以得着真消息了说罢，他掏出一份名单，把昨天晚宴时的座上客全都点了出来，命士兵把卫兵、随从们押往另外一处关押。

众人显然已经明白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只是不知细节如何，更是不知蒋总统的情况。情绪稍稍稳定后，大家开始东扯西拉地聊天，但都对今天的事情避口不谈。生性风趣的陈调元打趣道：“咱有茄力克香烟，谁想抽每支大洋五毛，此时此地，这价钱不算贵吧！”青年军官见状，忙令他的手下去取香烟来，并且答应大家的要求让士兵们去为他们把眼镜、大衣等随身用品取来。这些士兵们趁机把每个人的房间翻了个遍，后来一清点，蒋百里发现他的一件燕尾服和两个女儿的照片被他们“没收”了。事发到现在，大家早餐没吃，中餐也没人管，肚子饿得咕咕直叫，集体提出了抗议，营长忙令造饭。可传令之后又是久久不见有食物送来，营长派人去一了解，原来士兵们早已饥饿难忍，把做好的饭菜一抢而空。

直到下午4点来钟，大家还是没有吃上饭，倒是外面一片“号外”的叫卖声吸引了大家，营长令下属买了一份回来。只见“张杨兵谏”四个大字赫然入目，下列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sup>⑧</sup>大家所关心的事情真相大白后，就更觉饥肠辘辘了。

就在此时，张学良步履忙乱地走进了会客厅，他连连向众人拱手赔罪：“对不起，各位受惊了！”

众人顾不得许多，直声叫嚷要吃饭。张学良抱歉地一挥手，命令手下火速准备酒菜。不一会儿，饭菜备好，众人入席，没有客套，立刻狼吞虎咽，如风扫残云。陈调元见事态已趋平和，便把

自己带来的火腿和百年陈酿也贡献出来，大家顿生同甘共苦的心态，庆幸劫后余生，把陈酿火腿一扫而光，只有钱大均没有沾酒。

吃完饭后，张学良的副官把众人带上二楼，重新分配住房并且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关锁房门、不得彼此交谈、不得相互串门，每间房门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看守着。西京招待所是一栋人字型的三层楼房，说来也是窝囊，全招待所只有五个开水瓶，谁的房间有开水瓶，就像中了头彩似的。蒋百里倒不在乎是否中彩，他只苦于老花镜被弄丢了无法读书。

7点钟开晚饭，饭菜是每个房间单独送的。蒋百里还没吃完，就见张学良在他房间外心神不定地踱步，他料定张学良有心事要说给他听。果然，张学良推门进来了，他把门虚掩上，与蒋百里无言目对一阵之后口舌嚅嚅地说：“先君很敬重百里先生，您是个无党无派之身，我有疑难的问题想向您求教。”此时张学良脸上的表情和往日一样依旧温雅恭谦，“不过苍白失神的脸透着疲惫和内心的彷徨，像有几种念头盘旋在心中而无主宰似的。”<sup>⑨</sup>

蒋百里一眼就看出临潼那边并没有发生特别严重的事情。听了张学良的话语，他顿时明白了“兵谏”已在张学良心中谋划已久，11日那天下午在临潼，张学良放着自己的专车不坐却要蒋百里一道乘车回西安，一定是想要就此事谋求参考意见。因为在众多军政要员中，只有蒋百里是无党派人士且和蒋介石的关系微妙。对于张学良及东北军，蒋百里心中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他早年在赵尔巽执掌东三省时就十分清楚地了解东北军的底细，加之张学良之父张作霖又曾与他有过一段过结，所以他对张学良的态度不那么友善。蒋百里接过张学良递上的兵谏通话说：“可是我不戴老花眼镜看不清楚呀。”张学良忙令副官去找一副老花镜来。

沉默了一阵子，老花镜找来了，不知是谁的，蒋百里把张学良的通电仔细阅读了一遍，又将通电还给张学良。张学良神情急切地问道：“先生之意云何？”蒋百里未置可否地说“今天是力的

问题。

对蒋百里的话，张学良不太明白究竟，他心想蒋百里肯定对今天的事情有想法，便连连赔礼：“今天动惊了，我真对你们不起。百里先生现在还在生着气。请您正面指示我一下。”

蒋百里话中有话地说：“在西安，你的力很够，尤其在招待所，两条枪足够应付我们。可是西安以外怎样呢？”

张学良显然明白了一些，答道：“西安以外我是鞭长莫及。”

蒋百里不再想说什么了，便道：“那么你自己已有打算，用不着来问我了。”见此情形，张学良知道不好再继续谈下去了，便道：“您的气还大得很。”他让副官给蒋百里添了几盘菜，又投其所好地送来了许多上等烟酒，然后告辞说“我还有别的事，停会儿再来请教。”他依旧是一拱手，转身离去。蒋百里低头一看，嚯！餐桌上摆满了啤酒、白兰地、面包、牛排、火腿、蛋，还有蒋百里最喜欢抽的三五牌香烟。

大约晚上9点以后，张学良又来巡房，他照例与众人寒暄一番，然后拱手道歉，最后，他进了蒋百里的房间，这是他一天之内第二次见蒋百里。

张学良显得比先前情绪安定多了，他与蒋百里聊开了生活状况和子女教育等问题，并且表示有机会一定帮助蒋百里。蒋百里对张学良的善意并不买帐，他淡淡地说道：“假如我做了邵元冲，国家有抚养我家属和子女的责任，省得我朝夕担心。”张学良见话不投机，便道一声晚安告辞而去。

12日一夜，众人在严密的监视下忐忑不安地睡了一宿。

## 六、和平解决的谋士

由于张学良的交通处长蒋斌扣下了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的

通电，“先秘密向南京何应钦告发西安事变的情形。”<sup>⑥</sup>这样，暂握兵权的军政部长亲日派何应钦首先得到西安事变的消息，经与戴季陶、吴稚晖等人私下通气，他们一方面严格新闻检查，切断南京与西安的一切通讯和交通，使西安事变的真相不能公布于世，对可能同情张学良、杨虎城的重要人物冯玉祥、李烈钧、程潜等人封锁消息。另一方面，他们密秘定下了武力讨伐西安的计划。直到12日中午，中政委员、军事委员李烈钧才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他急忙告知冯玉祥，冯玉祥大为震惊，他连忙趋车到立法院院长孙科住宅探听究竟，结果孙科也是方才得知，细节情况一概不晓。到了下午3时许，何应钦传来口信，请各位中央委员前往何府，共商对策。冯玉祥等人大为不满，但因何应钦代蒋介石行使军事大权（行政权由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代行），为了下一步的对策，他们还是趋车前往。

何公馆外停满了黑色卧车，警卫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把个何府围了个水泄不通，叫人一看就知气氛不对。里面的气氛就更是紧张了，这个非正式的谈话会一开就是好几个小时。围绕以和平还是以武力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军政要员们分成了两派，以冯玉祥、李烈钧、孙科等为首主张以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为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另一派则以何应钦、戴季陶、吴稚晖、居正、叶楚伦等人为首坚决主张以武力讨伐西安叛逆。只有少部分人模棱两可。<sup>⑦</sup>正当张学良在西京招待所向蒋百里讨主意的时候，南京的何公馆内主和、主战两派展开了激烈争吵。争吵一直持续到晚上也没有结果。深夜12点，南京政府在中央党部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正式宣布蒋介石西安蒙难，生死未卜。关于下一步的对策，战、和两派又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一直到13日凌晨3时，在何应钦、戴季陶极力坚持下，主战派占了上风，会议最后决定：“张学良撤职查办，军队归何应钦调遣。”

如此一来，蒋百里的分析就一言中的，即西安之外张学良的

力量如何对付南京的武装。

13日一大早，张学良径直来到蒋百里的房间，第三次向蒋百里求教。他刚坐下便道：“昨天您所谈的力的问题，昨晚和今晨我们得知何应钦准备攻西安，黄埔生准备和我们大干，你看何与黄埔生能否一致？”

蒋百里早已心中有数，他没有正面答话，只是说：“你应该比我知道的多。我刚从外国回来。”

张学良自我分析说：“陆军攻西安时间很长，我们的抵抗力也很大。空军又当别论，不过所关不仅我们的安全。”

蒋百里从这句话中敏锐地察觉西安的局势并没有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蒋介石生命安全显然没有危险，而张学良此时却有点方寸不定，急需有人给他参谋参谋。蒋百里语气婉转一些说道：“你问计于我，我一切都睡在鼓里，没有情报怎能下判断，俘虏怎能做军师？”

张学良见蒋百里的态度缓和下来，便连声道歉，他告诉蒋百里已经在杨虎城的公馆为他准备了房间，请他立即移住过去。

蒋百里心中十分明白，张学良、杨虎城此次“兵谏”，事情办好了，可以说是为拯救民族危亡的壮举；事情弄砸了，他们将永远背上叛逆的罪名。就蒋百里个人来说，他一直是希望国防强大，抵御外国侵略者的入侵。现在国难当头，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当然应该奋起抗日。可是蒋百里对此次“兵谏”的情况不知半点细节，尤其是南京方面的对策更将左右时局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蒋百里肯定不会贸然答应张学良，出任其参谋，更不会在众人被囚之时移居杨府，弄得不好，他会被视为同流合污。当年唐生智反蒋不成，蒋百里却被蒋介石丢入大牢，其中的痛苦至今还记忆犹新。

张学良见蒋百里半晌不做声，便问道：“您要哪种情报呢，我们的电文上说得很明白。”蒋百里如发连珠炮般地问道：“委员长

在什么地方？你们向他要挟，他作怎样的表示？国内外对这次非常的事变反应如何？”张学良没有马上回答他的提问，只是说：“您如果肯移居，一切话都好谈。我们现在还是先谈力的问题，假定中央飞机对西安轰炸……”蒋百里以肯定的语气打断他的话说：“委员长在西安，他们必不来轰炸。”得到蒋百里如此肯定的回答，张学良“一连应了两声‘是’，沉滞的脸色陡然地堆上了活动的光彩”。<sup>⑨</sup>显然，张学良最为担心南京方面会派飞机轰炸西安，并且将不顾蒋介石安全与否。在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后，张学良抬腕看看手表，道了一声“明日见”，就匆匆地离开了。

随后的两天里，南京飞来的军用飞机一直在西安上空盘旋，虽没有掠低空飞行，也没有投弹，但显然是在发出威胁。张学良这几天几乎每天都到西京招待所来听取蒋百里对局势的分析。15日，张学良对蒋百里说了西安外的形势，他的脸上明显可看出神色惊慌。他说：“您说得不错，诚然是力的问题，委员长在我们的包围之中，而我们又在中央军包围之中。”他告诉蒋百里，蒋介石的美国顾问端纳从南京飞到西安了，蒋夫人宋美龄也快来了。

端纳在西安、洛阳间穿梭飞行，但显然没有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在这一天，南京传来消息，何应钦将率军进攻西安（这个消息在第二天，也就是16日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第二十三次政治会议上得到证实，会议作出决议：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中央军进攻西安，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杨，同时推于右任为“西北宣慰使”，赴西北进行分化瓦解的活动<sup>⑩</sup>）。下午，张学良又来到蒋百里的房间，他神情凝重地说：“我想请您一件事，不知道您答应不答应，您愿见委员长一谈否？我每次见他他必大动肝火，不让我陈述我的意见。我想请您劝他一劝。”在此以前，张学良曾请邵力子规劝过蒋介石，但无任何作用，蒋介石依旧坚持下去顽固的态度，同时对张学良、杨虎城愤恨不已。现在张学良想请蒋百里出面去劝劝蒋介石，因为蒋百里此次来西安是蒋介石邀

请的，同时蒋百里作为一位社会名流，不同于蒋氏部属，想必他们见面会客气一些，起码不至破口大骂。蒋百里满口答应了张学良的请求。

蒋介石果然同意与蒋百里作一席之谈。16日下午4点，张学良亲自陪同蒋百里到了秘密监守蒋介石的高桂滋公馆。当张学良向蒋介石报告“百里先生来了”的时候，蒋介石理都不理他，躺在床上，铁青的脸上冒出阵阵无名之火。蒋百里走过来，蒋介石笑了笑，他们握握手，蒋百里就在蒋介石卧榻边的沙发落座。张学良向蒋介石立正敬礼后，退出房间，并随手关上房门，蒋介石像没有看见似的，依旧不予理睬。

待张学良离开后，蒋介石与蒋百里深谈开来。自从12日西安事变发生以来，蒋介石就一直以强硬的态度对张学良不予理睬，对他们所提出的八项主张不作任何应答，他们之间陷入僵局，使得张学良、杨虎城对内对外都无法交代。特别是事情拖得越久，对他们就越是不利，尤其是南京方面正在调兵遣将，已对西安形成合围之势，一旦打起内战来，岂不完全违背抗日救国的初衷？因此，张学良心中亦十分苦恼，他希望有人能出面在蒋介石与他以及南京方面进行斡旋。

这两天来，蒋介石对张学良发动兵变的动机和要求已十分清楚，对张学良的品性他也了如指掌，因此他倒不是特别担心西安这边的情况。他更多的是担心南京方面将会采取什么对策，这将直接影响整个事态的变化，尤其是各种传言纷纷飞来，特别是中央军已经将西安包围得水泄不通，即将轰炸西安，这一消息更是叫人心神不定。蒋介石也希望有人能到南京去一趟沟通情况。蒋介石告诉蒋百里：“张汉卿想派一人先往南京商谈，其心目中以你为最适宜，但我未置可否。”刚谈到这里，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张学良推门想进来，蒋介石厉声喝道：“不许动！”张学良又将门轻轻关上了。显然，他急切想知道蒋介石与蒋百里会谈的结果如何。

蒋百里认为派人到南京去通报情况十分必要，只有这样才能打破目前的僵局，否则将会于国事无益。蒋百里建议说，他自己与政府渊源不深，加之刚从国外返回，如果要派人到南京去，最好是派与张学良关系不是十分密切的人去，这样对客观地解决事态要方便一些。他推荐了蒋鼎文担任此项任务，并且主张由他自己向张学良通报此事。蒋介石完全同意蒋百里的分析。就在此时，门又轻轻地开了一点，蒋介石大声地喊道：“进来！”张学良恭恭敬敬地进了房间，蒋介石眼睛盯住天花板说：“送百里先生回去休息。”

在路上张学良告诉蒋百里说：“委员长表示接见您的时候，不许我在旁边窃听你们的谈话，我承诺遵守，他才命我来迎接您。”蒋百里问张学良是否真的有诚意，张学良一口肯定。蒋百里问他为什么想请自己而不请他人去南京，张学良告诉他说他信任蒋百里这个无党派色彩的人。蒋百里将他和蒋介石谈话的主要意思告诉了张学良，并且建议说自己非党国要员，到南京去恐怕于事无济，要想解决问题应派南京方面信任的人去。张学良请蒋百里推荐一位人选，蒋百里问道：“留在西安的军事大员中，你最恨的是谁？”张学良回答说：“我不恨什么人，只有蒋铭三（蒋鼎文）这个人好出坏主意，我就是看他不顺眼。”蒋百里笑道：“那么最好派铭三去。”张学良迷惑地望着蒋百里不语，蒋百里解释说：“派一个最不喜欢的人前去，就可以表示你绝无伤害其他中央大员之意，就可以表示你对和平解决时局抱有极大的诚意，这样，就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sup>④</sup>

听了蒋百里这一番话语，张学良非常高兴，答应立即去请蒋鼎文，并且准备请蒋介石写封亲笔信让他带到南京。但蒋介石并不愿意将信交给张学良，他担心传出去会成为笑柄。张学良也不同意蒋鼎文直接到蒋介石处，他们一私谈起来张学良担心后果难料。于是，蒋百里给他出主意，由他陪同蒋鼎文一齐同见蒋介石，

蒋介石当面把亲笔信交给蒋鼎文后，双双同时退出。同进同出的建议得到了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共同同意。18日蒋鼎文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得到了蒋介石的亲笔信，随后登机飞往南京。这封信就是后来在各大报刊上登载的蒋介石停止轰炸西安三天的“手谕”。

实际上，张学良、杨虎城还有另外一手准备，就在事变发生后的当天晚上，他们就给当时设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致电，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给予指导。中共对这次事变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且特别指出事态的发展将会有两种可能：或者演变成爆发新的内战，使南京政府中的中间派走向亲日，而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亲日分子；或者由于事变而结束内战，使得全国抗日统一阵线得以迅速建立，从而开创全面抗日的新局面。因此，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是“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sup>④</sup>张学良和杨虎城完全赞同中共对时局的分析和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他们派去专机于16日把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中共代表接到了西安。周恩来分别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会谈，从政治上和军事上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于15日和19日以红军高级将领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两次通电南京政府，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学良、杨虎城的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团结全国，一致抗日。

随后形势就基本上朝着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所努力的方向发展了。由于多方的共同努力和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正确引导，事变终得和平解决，达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何应钦的讨逆军在西安城外仅扔了几颗炸弹就被蒋鼎文代为转交的蒋介石的那封手谕所制止，讨逆立刻风走云散。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调子成为主调后，张学良就不再象以往那样心中无底了，一旦心情宽松下来，他对关押在西京招待所的

各位军政要员的态度大为转变，再也不是如临大敌。对蒋百里他一直是恭敬而又宽松的，蒋百里可以发电报、可以写信寄明信片，在西安前后共两个星期，蒋百里给女儿们邮寄了大量的明信片，几乎每天一张。

由于笃信基督教的宋美龄坚持要回南京过圣诞节，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夫妇登机去了南京。第二天，杨虎城在绥靖公署设宴为蒋百里等人饯行。27日，所有在西京招待所度过惊心动魄时刻的人们来到了西安机场，在礼兵标准的持枪礼及悠扬的军乐声中，他们乘坐的飞机平稳升空，离开了西安。

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后来精辟地论述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的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sup>[9]</sup>的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所产生的国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为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促使国民党蒋介石放弃对日退让妥协的方针，中国的政治生活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对于蒋百里个人来说，经历西安事变在他的生活中实在是太偶然了，但这次偶然的经历使蒋介石重新认识了他。应该说蒋百里对事变的态度也是希望能和平解决的，正是由于他的周旋和推荐，才有了蒋鼎文持蒋介石手令飞赴南京，及时制止了亲日派及主战派占上风的南京政府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进攻。而此时何应钦的飞机已经开始在西安城外扔炸弹，显然，局势万分紧急。新的内战导火索的被及时掐灭，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蒋介石对蒋百里在西安时的冷静分析及出谋划策颇为欣赏，后来还专门与蒋百里合影，以示对在西安事变时期患难与共的纪念。此后，蒋百里由过去与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尊而不亲的关系逐步产生了一些变化，蒋介石在随后的一段时期里多次与蒋百里相见。

实际上，蒋介石对蒋百里态度的转变也体现了蒋介石作为政治家所具备的度量。在国难当头，举国军民齐心抗日之际，蒋介石

石更是急需既了解日本人、又胸怀世界、更清楚自己国家的军事家，这样的人才没有谁比蒋百里更符合了。

注释：

①以上均参见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李吾：《蒋百里的生平》等。

②③黄萍荪编选：《蒋百里先生文选》，第293页，1944年1月增订4版。

④⑦⑫⑭⑰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153、158、169~175页。

⑤蒋英：《哭亡父蒋公百里》，载黄萍荪编选《蒋百里先生文选》，1940年1月再版。

⑥蒋洁：《百里先生言行风度的追怀》，载黄萍荪编选《蒋百里先生文选》，1940年1月再版。

⑧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88~89页，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

⑨申伯纯：《回忆双十二》，载《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311页。

⑩张东化：《华清池捉蒋回忆》，载《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17页。

⑪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168页。

⑬《张学良杨虎城等对时局通电》，载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3日。

⑮《西安事变资料》（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

⑯高兴亚：《西安事变时在南京的冯玉祥》，载《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72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⑰1936年12月17日南京《中央日报》。

⑱王成斌等：《民国高级将领传》（三），第492~493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⑳《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六大以来》（上），第793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㉑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载《毛泽东选集》横排合订本第938页。

## 第十章 再访欧洲

### 一、意大利顾问

从西安飞回上海，蒋百里约见了老朋友著名报人陶菊隐，他们在蒋宅把酒畅谈西安事变，让从事新闻工作的陶菊隐对官方封锁严密的西安事变的详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这为他后来著述《蒋百里先生传》关于西安事变一段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左梅听着丈夫用硃石土话绘声绘色地描述，如同听一段精彩的评弹，喜怒哀乐随着蒋百里的故事进程而显现于略带憔悴的脸上，面对丈夫遇险又获生的遭遇，她落泪了。

再过几天，1937年的新年又到了，这年的元旦蒋百里一家过得特别充实，除了全家举杯庆贺蒋百里脱险而归外，还有许许多多军政要人及社会名流登门贺春，与他多年以前被投入监狱时的那个元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早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蒋百里抚今追昔，不由得感慨万千。此时的蒋百里对世事的恩恩怨怨已无牵挂，他只觉得自己所拥有的时间太短太短，而等着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除了对妻子和女儿们尽付爱心外，他将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除了张学良、杨虎城外，西安事变改变了两个人与蒋介石的关系：一个是考试院长戴季陶，他过去与蒋介石亲同手足。西安

事变发生后，戴季陶在南京力主武力讨伐西安，他认为纲常不可乱，决不能与国贼和谈。而西安事变最终的解决恰恰用的是和平方式，蒋介石夫妇后来炮制了《西安事变回忆录》，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文中，宋美龄以妇人之口把戴季陶、何应钦等主战的“中央诸要人”着实讥讽了一顿。为此，戴季陶一气之下旧病复发，卧床几天不起。另外一个关系得到改变的人就是蒋百里，他长期以来在国民政府中处于一种盟友的位置，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许多多高官都尊称他为“先生”，但明眼人都知道蒋百里在蒋介石那里只是尊而不亲。这些年来，蒋介石对蒋百里是一关一放一用，手腕玩得相当漂亮，让人们琢磨不透蒋介石的心事。自从有了西安“同难”之后，他们两人又是合影留念，又是互致新年问候，蒋介石对蒋百里亲近了许多。

元旦过后不久，蒋介石到杭州休养，蒋百里奉召到杭州晋见，在资源委员会任专门委员的薛光前也一同到达。他们此行是来最后决定意大利顾问史丹法尼在华工作日程安排的。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钱大均和蒋介石秘书陈布雷接待了他们。第二天下午，蒋介石接见他们。蒋介石身穿一件棕色夹袍，笑容可掬地进了会客厅。看着他双手扶腰的样子，蒋百里知道这是他不久前在西安事变时为躲避士兵的追捕跳窗爬山时扭伤的，事情都已快过去一个月了，伤痛依旧缠身。握过手后，蒋百里问道：“委员长贵体如何？”蒋介石答道：“很好，只是腰部还没有十分复原，想来没有多大关系。随后，薛光前把蒋百里和他共同拟定的接待方案和工作大纲向蒋介石简单汇报了一遍，得到了蒋介石的许可，并且他准备接见史丹法尼教授。

史丹法尼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出任意大利财政部长，对意大利的经济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为意大利经济复苏立下奇功，享有极高荣誉。之后他出任罗马大学经济学教授，薛光前留学意大利时就在他当主任的政治经济研究所学习，是他的得意

门生。1935年蒋百里出访意大利，为了了解意大利的经济财政情况，在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的安排下，薛光前为他专题讲述了史丹法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实施财政税收改革的各方面情况，引起蒋百里极大的兴趣。他后来将薛光前整理的有关材料上报给南京政府，并且建议邀请史丹法尼教授来华，出任财政顾问。这项建议得到蒋介石的同意。

一个月后，史丹法尼教授携夫人及长子皮埃罗、次子费斯托和女儿嘉娜来到中国，随行的还有他的秘书马格里尼中将（他是史丹法尼教授的学生，后弃文从戎，在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战役中立下战功而迁升）。史丹法尼教授年届六旬，银白头发，精神抖擞，气宇轩昂。蒋百里、薛光前以及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等专程到杨树浦去迎接他们。在迈尔西爱路饭店小住几天后，由蒋百里夫妇等陪同，乘坐上海市政府安排的一节专挂经沪杭铁路到达杭州，下榻于杭州著名的大华饭店。

不久，蒋介石夫妇礼节性地招待了史丹法尼教授全家。在品茗雅谈间，史丹法尼夫妇对中式服饰大加赞美。待他们返回饭店时，委员长侍从室的一位副官带着两名裁缝早已在饭店恭候，他们带来了各式花色的丝绸，令夫人、小姐大开眼界。不到一天工夫，史丹法尼教授的蓝袍黑褂、夫人小姐的绣花旗袍便全都赶制出来，可把一家人乐坏了。

从委员长夫妇开始正式宴请，到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杭州市长周象贤等人一连串的宴请，蒋百里夫妇一直陪同史丹法尼教授全家空余时间，他们陪同客人们把美丽的杭州城游览一遍后。随后返回南京，在卫岗八号蒋介石曾用过的一栋别墅设立了办公处，由薛光前具体负责日常事务。在随后的两个月中，史丹法尼教授走访了南京政府各部，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在财政经济理论方面，史丹法尼教授是绝对的权威，但关于中国国情他不太熟悉，蒋百里就成了史丹法尼教授的顾问，为史丹法尼教授开展工作提

供了重要的帮助。薛光前后来回忆说：“在这方面，我真是沾光不少，受用不尽。因为百里先生不但才思敏捷，而且对于任何复杂的问题，经他一分析、一指点，无不析理精明，洞见原委。中国有句话：‘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因为替史顾问和百里先生通译，不知道听了百里先生多少次的话，也不知道读了几十年的书”<sup>①</sup>。

## 二、西湖论酒

陪同史丹法尼教授开展工作，对蒋百里来说无疑是件轻松愉快的事。尽管这是一个闲职，由于新来的意大利顾问得到了最高领袖的礼遇，且财政经济工作涉及南京政府许多部门，因此蒋百里不费周折就从中得以了解掌握大量国情资料，这是他过去不可能得到的。闲暇之际，蒋百里总喜欢把自己置身于大自然中。4月初，在他即将和史丹法尼教授巡视大江南北前夕，他应好友李烈钧、姚琮之约，又重游西湖赏春。

四月的西子湖，春意盎然，蒋百里把自己融入这无限的春光中，神懿气爽，颇有超脱尘世的感觉。生性乐观豁达的蒋百里对西湖有着特殊的情结，他和夫人及女儿们泛舟碧波荡漾的湖面上，给她们讲述当年他被囚禁在西湖时的故事，纵然讲述的事情是发生在寒冷灰暗的严冬，但他依旧把西湖描述得那么艳美和浪漫。在桃花映衬下，他满面春风。

此次西湖赏春，蒋百里还特地请来了早年留学日本的士官同学、后来代理四川督军而死于川乱的张耀珊的后人黄萍荪来做陪。黄萍荪是个有心人，他专门做文记下了此次蒋百里等人畅游西湖的逸事，使今人得以从另一个视角领略百里先生的风采。

蒋百里的记忆力特别强，他是第一次见到黄萍荪，但他一眼

就认出眼前这个人青年人是他的世交的后代。在南屏汪庄休息时，蒋百里和黄萍荪作了一番长谈，看着两鬓斑白、目光慈祥的蒋百里，黄萍荪拘束全无。蒋百里还是老习惯，香烟不断，一支接一支，谈兴愈浓香烟就抽得愈有劲。谈到青年问题，蒋百里说：“近二十年来，中国的青年人犯一桩毛病，就是人人不打量一下自己的新闻经验，而人人欢喜躁进急就。结果，不独僨事，且连带患了早衰之疾。我常见一般四十左右、学验正富、正当大有作为之时的人，偏多消极，说是要想逃世隐居，效渊明‘归去来辞’中的故事。这倒是比较超拔的一种。最不行的是怨天尤人，僨懣自苦，对任何工作都打迭不起精神去干，究其原因，病在早熟；故早衰成为自然之趋势。但这是很危险的，不特影响其个人，且兼及民族国家。唐人诗‘同学少年多及第，五陵裘马自轻微’，眼望他人少年得志，自己青衫依旧，心下不免自艾，以为论本领，我何尝拙于人家，为什么人家没有几年，就青云直上，显达一时？这样一想，难怪要‘命也夫’，难怪要‘求星问卜’，难怪有些‘大不同’‘普天求’之类的人要盖洋楼，置姬妾，徜徉于金玉之中了。……老弟，一个人，抱负是不可少的，有抱负而后可以立志，不然，庸俗一世，岂不可惜。但是你必须记着山谷所谓‘心如铁石要长久，气吞云梦略从容’这两句诗。这两句诗的解释很广泛，要自去领悟，现在转赠给你，作为父执和你初见时的一点小小礼品，莫嫌他少。……”

对于蒋百里切中时弊的殷殷教导，黄萍荪连连点头认同，他真佩服这位老头子锐利的眼光。其时，黄萍荪正从事文化报人的工作，他很想请蒋百里为他新创刊不久的《越风》杂志撰写几篇文章，以充实和提高他的杂志的知名度，没想到蒋百里谦逊地谢绝了，他说道：“理论文章不合你的体裁，历史小品又多见于前人笔记，现代之史料掌故，大都还不能据为定论。至闲谈人事，又怕惹人之恼，我是不喜欢在笔下开罪于人的。除此，实无可记的

资料……若写自己，在目下虽似风行一时，但总难蹈自炫之耻。其实我一生的经过，可记的也有不少，但我总希望，自己的事要别人来写，一定会比自己执笔生色。”见蒋百里谈到了个人经历问题，黄萍荪以新闻人的直率问了一个在旁人看来是十分唐突的问题，他说：“百里先生，人家都说你这一生很少得志的时候，这到底是是怎么回事？”

黄萍荪的问题确实问得有些唐突，但蒋百里是个从不因人荣辱而哀哀戚戚的人，或许是他今天的兴致特别好的缘故，他干脆就着黄萍荪的心理畅谈起来：“老弟，你真厉害，会窘我。不，我知道了，你是想打开我的话匣子？好，我说点给你听吧：我之不得志，无待人言，自己也明白了，不但一时，恐将终身。然而，你得知道，与其谓蒋百里不得志，毋宁谓用蒋百里者不得时。所谓‘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但我为什么不能得人之用呢？夸大些儿，亦如子贡所云‘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盖老朽所遇，每有‘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容……’。所以颜回说得好：‘……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之丑也，不容何病。’但我并不如仲尼一样，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停顿片刻，蒋百里深吸一口香烟，缓缓而谈：“我虽不得志，不因此而颓唐。你想，韩非为李斯所害，在縲继中尚能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难等五十五篇，时至今日，学者犹诵其文而忆其人；可见‘志’，不一定在‘得’，要紧的还是‘传’。况我今日所处，优于韩子者奚止十倍。你瞧我谈笑自如，有半点不如意的地方透露人前吗？但是，能说‘蒋百里一生不得志’这句话的人，多少总是我的知己。我愿和此人订交，你说是不是？”

蒋百里一番精彩的谈论，引经据典，抒发了自己坦荡的襟怀，把黄萍荪听入了迷，他有幸受到了一次人生观的教育。

他们一老一少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还是李烈钧进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声音洪亮地告诉黄萍荪：“百里先生的健谈是著名的，新闻记者遇着他，顶有趣味，然而也顶苦，因为来不及记。他的肚子里包含着四馆两院：四馆为博物、图书、史料、科学；两院为文学、军学，外加各式讲座，还有随意小酌。回头到杏花村喝起酒来，你们就可畅聆他的随意小酌，其中有春明掌故，海外轶闻，大家更要不亦乐乎呢……”随后，几个人同乘一舟，泛游西湖。

对西湖蒋百里是再熟悉不过了，还是在光绪年间，他就数次邀约求是书院的同窗游览西湖，指点江山。如今重游，往事历历在目，游船行至涌金门外藕香居、三雅园时，蒋百里回忆往事对黄萍荪说：“光宣之际，我和钱均甫、张闾声并令亲张耀珊昆仲，常假此小叙。……均夫今研释典，闾声整理古籍，对于晚年的兴趣，可说都得其道。独余如粤谚所谓‘吊日郎当’，还在风尘中奔走；虽无所事，可静下来，让你安心动一动笔的时间，不知怎样，总是分抽不出。……”看着蒋百里泛起了伤感之情，李烈钧先生宽慰道：“不然，你的奔走风尘，无一处不有收获，不论是自然界，以及社会上的一人一事一物，在在都是充实你智囊的资料。至形之于笔，仅仅是时间问题，不得谓之枉费。唯我，既不能诗，又不能文，白白地混了一世，才真是笑话！”

谈着笑着，小舟仙聊，不嫌桨缓。当他们船抵杏花村时已经是红日衔山、暮烟袅袅。黄萍荪没料到，今天杏花村的聚会来了这么多的名流贤达：著名诗人柳亚子、书画艺人张大千、著名作家郁达夫、身任中央委员的名士经子渊和身任监察委员的刘季平等，真可称得上是满堂生辉。美味佳肴摆上桌后，众酒仙顿时雅兴勃发，猜拳行令、填词赋诗，逸情遣飞。

这天晚上，酒仙们豪饮绍兴花雕 42 斤，除张大千、黄萍荪点滴不沾外，蒋百里、经子渊膺荣桂冠，他们的酒量令众人折服。亚

军则被刘季平、柳亚子、郁达夫、李烈钧夺去，唯有姚琮酒力稍弱。<sup>②</sup>

桃花春酒醉西子，一代名士竞风流。

### 三、巡视全国

按计划，蒋百里、薛光前于4月中旬陪同史丹法尼教授赴各地考察，同行的有马格里尼将军、史丹法尼教授的长子皮埃罗等共六人。史丹法尼教授重点考察各地的财政经济状况，蒋百里则把重点放在巡视各地的军事防务上。考察组从北到南，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基本上沿津沪、平汉、粤汉铁路一线行进，先后到了济南、青岛、周村、泰山、北平、太原，经娘子关到石家庄、郑州、汉口。蒋百里在长沙吊念亡友蔡锷后，他们又南下衡阳、广州抵达香港，随后到达八闽首府福州。<sup>③</sup>由于薛光前以前在铁道部供职，沿途交通问题全由他负责，挂专车特别方便。

此次考察是由军事委员会安排，出访前办公厅主任以蒋委员长的名义通知各地搞好接待，所以考察组一路上受到了热烈欢迎，加之蒋百里的保定弟子遍布各地，热情之中还有一份特别的尊重。有时他们所乘坐的火车经过一个并不停靠的车站，当列车缓缓驶过时，站台上也挤满欢迎的人群，军乐一直伴送列车，直到消失为止。每到一地，考察组都要当地军政长官共商经济军事大计，蒋百里对各地的防务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他还多次发表演说鼓舞军中士气，德高望重的他受到了各地的热烈欢迎。蒋百里沿途还拜访了许多社会贤达和名流。

在山东邹平县，蒋百里拜会了长期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运动并已取得较大成果的梁漱溟先生。梁先生是民国硕儒，他“以儒家思想为前提自觉反对西方化倾向”，设计了“一种纯粹民族主义

的儒学改良方案”<sup>①</sup>。他简居薄衣，克制饮食，长斋不荤，全身心地致力于地方组织改革和乡村教育。1931年梁漱溟在邹平县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研究院指导全省约70余个县进行了乡村建设实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在全国赫赫有名。蒋百里和梁漱溟素不相识，但相互仰慕英名。可惜的是当蒋百里到达邹平后，正值梁先生夫人处于病重弥留之时，他们无暇深谈。蒋百里全面参观了邹平县的各项活动，他最为欣赏的是梁先生创办的乡农学校，这种学校是梁先生仿北宋吕大均兄弟制订蓝田乡约的组织，把乡村的“领袖”、“学众”及知识分子组合起来执行行政、教育、练武三者合一的综合机构。蒋百里认为中国地广人众但国力较弱，抵御外来侵略依靠民兵制度和游击战争将是战争致胜的法宝之一。

之后不久，他们在青岛相遇，蒋百里与梁漱溟作了一番深谈，蒋百里告诉了他为何对梁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感兴趣，他说：“吾知中日之战，势不能免，胜败之分，一在械，一在人，论械则我不如敌，论人则我多于敌七八倍，然今日军事在民众总动员，而将士不过什之三。我国系农业社会，凡农民欲以民族主义动之，不易明了，惟欲破坏其所据之乡村，则彼以生命相搏，故欲君子教育中注重乡村自卫，——此吾所以专访邹平，欲告君之理由也。”<sup>②</sup>

在济南，考察组会见了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韩主席性格怪癖，他约定清早6点钟接见蒋百里一行，令蒋百里哭笑不得。史丹法尼教授、蒋百里、薛光前三人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径直到了省政府。韩主席果真已在书房等候，他一身灰军装，绑腿一缠倒也显出几分精神。一番寒暄之后，韩复榘大发宏论，他对南京政府几年来的工作极为不满。他认为，南京的一切设施只能称为建筑，谈不上建设，修修马路，造造陵墓，说不上什么政绩。韩复榘的这个观点，蒋百里在许多年以前就已有过，而且几乎惊人的

相同。韩复榘显然是针对蒋委员长有感而发，他从来在蒋介石面前桀骜不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之时，韩复榘远在山东通电表示支持，所以蒋介石也从来没给过他一次好脸色看。对韩主席的一番宏论，蒋百里虽有同感，但是若在史丹法尼教授面前再附议论就显得不太合适了，所以他们间的谈话很快陷入僵局，稍坐片刻，他们就告辞了。<sup>④</sup>之后不久，日军几支小部队进攻山东，韩复榘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不战而退，让日军轻松地占领济南、泰安、济宁。蒋介石一怒之下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之名将韩复榘枪毙在武汉。

当蒋百里一行到达北平时，北平的空气已相当紧张，日军在北平城外驻扎了大量军队，城内密探也不少。为了不引起日军的注意，考察组没有公开活动。在与北平市长秦德纯、华北军政长官萧振瀛、张自忠等秘谈时，蒋百里对中日关系问题以及即将爆发的中日之战进行了全面分析，希望各位军政要员时刻准备奋起抗战。随后他们就分散活动，薛光前陪同史丹法尼教授到东安市场购买古玩，蒋百里则与马格里尼将军便服考察了一些军事要地。

考察组在山西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早年在袁世凯的公府里蒋百里、蔡锷、阎锡山等人就交往甚密。蒋百里一行到太原时，阎锡山正住在晋祠，由赵戴文、贾景德安排，全省各级军政要员齐聚太原，共同设宴为蒋百里一行洗尘。席间，蒋百里发表了富有激情的演说，在他的鼓动下，史丹法尼教授也慷慨激昂地畅论了一番。他认为，一旦中国被迫同日本交战，中国必将最终取得胜利，他足足演讲了一个半小时，激起全体来宾阵阵热烈的掌声。次日，阎锡山又在晋祠盛宴招待了他们。

在长沙岳麓山，蒋百里拜谒了亡友蔡锷的陵墓后，他们径直上了南岳衡山，住在磨剑台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的公馆。衡山峻美的风光并没有使蒋百里沉醉，他更多地在思考他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一旦战争爆发，沿海一带首当其冲。因

而从战备角度考虑，国家应该将支柱工业建设在军事地理条件较好的地方，比如以衡山地区为中心、从株州到郴州一线即是。后来蒋百里在长沙与湖南的军政官员们好几次开会研究此事，制订方案。可惜由于战火骤起，蒋百里的种种计划和设想皆成泡影。

在福州，蒋百里和离别有年的老友、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陈仪相逢。久不谋面，两位好友有说不尽的心里话。陈仪知道蒋百里的爱好，特地备下了上好酒菜及三五牌香烟。酒过数巡，他们的话题转到了中日问题，两人见地一致地认为战争已不可避免，一旦全面开战，绝非短期内能够解决问题。目前日军在东北及华北势力猖獗，将来战线必将西移。除了中国人自己要准备打大仗、打持久战外，还应把中国战争放眼于世界范围内去考虑，要力争世界各国对中国的支持。即使是德意同盟国，虽然他们不会援助中国，亦应采取必要的政策分化他们，达到在国际社会孤立日本的目的。陈仪建议蒋百里再出国一趟，从外交方面争取国际援助。蒋百里对此深有同感。

考察组行程近半个中国，历时一月有余，他们返回南京时已是初夏了。此次巡视各地防务，使蒋百里对现有的国防状况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也为他对即将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在军事上的对策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在杭州时，蒋百里的世交钱均甫曾特地到饭店看望他，在谈话中蒋百里对国际国内形势作了精辟的论述。钱均甫问到中日两国的关系问题，蒋百里认为“除了打别无出路”，至于开打的时间，则是“今年明年可就说不定，但至多不出一年。”钱均甫特别关心抗日战争中国是否能够取得胜利，蒋百里抽着香烟，喝着铁观音，看着袅袅上升的烟雾，缓缓而又充满信心地说道：“感谢我们的祖先，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事合流，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钱均甫对蒋百里的分析颇为折服。

因为钱均甫的公子钱学森此时正在美国留学，所以他也特别关心世界局势。蒋百里从历史到现实，详细剖析德国军国主义的发展，他断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不可避免，德国人将会首先挑起战火，预计德国人不会东西两面作战，他们必将在东面和苏联建立友好关系，然后全力进攻法国、英国。因为俾斯麦临终前曾说过“德国万不可东西两面作战”。目前法国人以为有了马其诺防线的险要和坚固便高枕无忧，对战争即将爆发不以为然，人们只是贪图个人享受，实在令人担心。至于美国，蒋百里曾拜见过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上将，马歇尔上将也直率地承认美国将不可能躲避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旦形势剧变，他们将大刀阔斧参加作战。俾斯麦当年曾言“俄国是个谜”，蒋百里认为美国也是个谜，他们都将对世界局势的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如此看来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不会有什么好结局。<sup>⑦</sup>

蒋百里对战争的预言应该说是惊人的正确，他以军事家的战略眼光断言战争的结局将是正义战胜邪恶，同时也指出中日战争将会是一场持久战。今天看来，历史已经证明了蒋百里的正确。蒋百里唯一没有预料到的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间竟然来得那么快。在此后不久的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从而将中国全面推向了战争之中。另外一点就是希特勒最终没有遵循俾斯麦有关“德国万不可东西两面作战”的遗训，在1939年9月发动闪电战进攻占领波兰，于是东西出击，先后攻占北欧、西欧，并于1940年6月占领法国。随后，利令智昏的希特勒撕毁了他在战前与苏联签定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发动了苏德战争。这一点为蒋百里所未料到。希特勒的军队最终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惨遭重创，由苏联人民扭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到美国宣布参战后，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了。

鉴于中日战争即将爆发，蒋介石在庐山开办了暑期训练团，全国高级将领被轮流抽调上庐山接受短期军事训练。这就是有名的

庐山训练团。庐山训练团是从1933年7月开办的，上山避暑的蒋介石在山上对各地的高级干部进行轮训，从思想上、军事上加强对他们的训导，效果明显。比如第一届庐山训练团的结果就是“全国各部队的重要军官，对中央安内攘外的决策，均心领神会，毫无怀疑”<sup>⑧</sup>。人们所熟知的国民党官兵一听到“总裁”二字就立刻立正的习惯就是从训练团开始的。此后，年年都办训练团。由于这届训练团是在大战临近时举办的，因而格外引人注目。蒋介石亲任团长，陈诚为教育长，各省主席、各军指挥全集中到山上，他们均为团副。调集上山受训的是部队中上级军官和文职人员，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县长、专员以及中学校长等。训练团聘请社会名流、知名学者、大学校长和教授讲课，蒋百里被聘为军事和国防方面的教官。

蒋百里在训练团讲课的内容是关于国防建设方面的，课题为《义务征兵制说明》。蒋百里的设想是“国民兵役，分为第一国民军，第二国民军。第一国民军，凡满后备役及补充役者充之，曾受军事教育者也，余者为第二国民军，未受军事教育者也。国家当危急存亡之际，兵力不敷，则召集之。”<sup>⑨</sup>围绕这一设想，蒋百里设计了一整套义务征兵的征募、培训、管理等实施办法。“百里有敏妙的口才、锐利的眼光和丰富的学识，他的课堂最能吸引受训者的注意力，有时候蒋委员长也坐着山轿来巡视。”<sup>⑩</sup>

庐山秀丽的风光和凉爽的气候并没能使蒋介石和各路将领们心情宽松片刻。7月7日，芦沟桥一声炮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顿时结束了蒋介石苟且偷安的迷梦，各路将领们立即星夜奔返防线，此届庐山训练团风散云流。

## 四、战火燃起

7月8日蒋介石接到北平市长秦德纯的急电，得知芦沟桥事件的情况。他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只表现出有限的强硬态度，9日蒋介石电令平津前线：“具备必死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狡狴之惯伎，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sup>①</sup>由此可见，蒋介石更多地抱着一丝侥幸心理。而中国共产党于8日向全国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中则态度坚决地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sup>②</sup>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等党和红军领导人分别于8日、9日致电庐山，敦促蒋介石实行全国总动员，奋起抗日。

蒋介石停办了训练团，把各省省长、各军总指挥及社会名流学者和大学校长们留了下来，又电邀全国军政要人到庐山，于7月16日举行围绕抗日为题的谈话会。中国共产党也被邀请，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为代表参加了庐山谈话会，蒋百里也参加了庐山谈话会。在会上，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的抗日决心，感受到了全国各界民众抗日救亡的高昂斗志和激情。蒋百里心潮激荡，他在谈话会上慷慨激昂地呼吁全民团结一致抗日。他从历史、现实等各方面全面论述了抗战必胜之理，总结出了曾鼓舞全国军民抗日斗志的两句名言：“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他讲和！”庐山谈话会上，来自全国各界的爱国人士还商讨了成立国民参政会的事宜，会上初步选出了三十几位国防参政会议员，蒋百里和周恩来、胡适、梁漱溟、于斌等皆当选。<sup>③</sup>

谈话会上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抗日情绪影响了蒋介石，第二天，蒋介石对芦沟桥事件发表了较为强硬的讲话，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sup>⑧</sup>蒋介石这次在庐山的讲演，于7月19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这就是他那篇著名的题为“最后关头”的演讲。

从庐山下来回到上海后，蒋百里就积极投身于各种抗日活动之中，他的住处也不断有军人进出。每当有将士们登门求教时，蒋百里总是设宴款待这些在前线抛头颅洒热血的军人们，用他极富感染力的演说鼓舞他们的斗志。有一次，几位军官聚集在蒋百里家，他们借助酒兴纵论抗日战事，谈到激动之处，一位名叫孙元良的年青军官一把将酒杯摔在地上高喊道：“我们决心拼命打，战至最后之一人！”看着军人们的爱国决心，蒋百里老泪纵横地说：“你们年轻人要活着看咱们中国翻身的日子呀，我这老命却拼在这一天。”

此时的日本侵略者制造了芦沟桥事件后，迅速增兵华北，于7月底攻陷北平、天津。随即，日寇开始水陆并进，于8月13日直逼东方金融贸易中心上海，开始了南北夹击进攻中国内陆的进程。在南京的指挥下，国民党第九、十五、十九集团军的精锐部队在淞沪战场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把扬言要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日本侵略军死死地堵在了上海。

蒋百里全家都投入到了支援前线的战地服务之中，左梅变卖了她的首饰，买来药棉、纱布，带着女儿们赶做急救包、衣服等前线必需品，并全部无偿地送到军营。她还发动学生父母及仆人们一同参与支援前线的工作。左梅虽为日本人，但她是个极富正义感的女性，早在她决定嫁给蒋百里的时候，她就曾跪告祖先说：“左藤已经死去，其本人现为一中国妇人，因仰慕蒋将军及热爱中国而嫁至蒋氏。”女儿蒋华回忆说：“吾等姊妹自幼至中学时代均

受中国教育，少年时代不知家母为日人。而家母从未施予日式教育，灌输日本历史文化思想及生活习惯，也从不带吾等姊妹到日本游玩，故吾等姊妹均不懂日本话，也无日式生活习惯。”<sup>⑤</sup>“七七事变”后，左梅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边，她总是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看着战火燃至家门口，蒋百里心急如焚。就在此时，蒋百里奉召前往南京襄赞戎机，他顾不了家人的安危，急匆匆地奉命前往。由于沪宁铁路被阻，他让司机趋车星夜赶赴南京。一到南京，他就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把自己的私车和司机全都捐献给了政府。蒋百里认为，战争是全方位的，除了正面战场外，情报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他建议南京政府组建一个国际问题研究所。后来他的建议得到采纳，中英两国在香港组建了情报联络处，专门负责战时情报收集工作。蒋百里在南京还和他的学生唐生智密谈多次，谈话内容主要是关于上海会战之后的南京防卫问题。受蒋百里的影响，唐生智在后来连续召开的守卫南京问题的高级幕僚会议上独树一帜，坚决主张固守南京并出任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鉴于上海保卫战进行得极端悲烈，左梅和女儿们若久滞上海恐怕凶多吉少，蒋百里给左梅挂了个长途电话，他吩咐左梅安置好家中一切事务，随时准备带领女儿们迁往内地。左梅问丈夫具体迁往何处，蒋百里未置可否地挂断了电话。实际上，南京政府此时已经给蒋百里安排了一项新的任务，凡是涉及到国家大事，蒋百里从来都不随意告诉他人的。8月底，蒋百里等人到达武汉。

9月6日，左梅带领两个女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从上海到杭州短短的路程，她们几次遇到日机的轰炸，幸好涂满泥土插着树枝稻草伪装的汽车骗过了敌机，才没有出事。在杭州住了三天，她们挤上了破旧不堪的浙赣列车，离开了人心浮动的杭州，一路颠簸到了南昌。南昌的气氛比杭州要安定多了，休整两

天后，左梅带领女儿转乘汽车到达长沙。9月13日，蒋百里经汉口也到了长沙，与左梅和女儿们团聚了。

实际上，蒋百里此行是准备经汉口南下广州，转道香港出访意大利和德国的。尽管蒋介石在庐山上就宣布全面动员，实行抗战，但他始终抱着幻想，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出面调停，对日本侵略者求和妥协。7月17日他在庐山发表的演讲中，虽然表现出了较为强硬的态度，但他仍“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芦事的解决”<sup>⑤</sup>。在此之前，南京政府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说：“以外交之方式，谋和平之解决”。不久，蒋介石的这一指导思想就传到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耳中。7月21日，陶德曼给德国政府的报告中说，据南京政府中的德国军事顾问秘密通报，蒋介石仍致力于“和平解决”。六天后，蒋介石会见陶德曼，陶德曼探询蒋介石对中日战争的态度说：他曾和南京政府外交部长会谈，给他的印象是中国急希望有第三国出面调停。蒋介石立即表示希望德国能出面调停，并恳请陶德曼大使将中国的这个意思转达给德国政府。淞沪抗战打响后，蒋介石更是希望能通过外交方式来议和，于是他分别派蒋百里赴德国和意大利、胡适赴英国、张静江赴美国进行穿梭外交，一方面是谋取英美等国的援助，更多的是寄希望日本的同盟国德国和意大利能出面调解“争端”。

蒋百里认为，德、意、日三国即将签订防共协定，表面上虽然一致，但他们相互之间各怀野心，其内在矛盾尤其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还是相当大的。意大利一直希望能涉足远东市场，对日本在中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多少会有异议。德国是希望日本全力以赴地对付社会主义苏联，不要把力量消耗在中国广阔的战场上。有鉴于此，确有必要赴德意两国做一些分化瓦解方面的外交工作。此外，蒋百里对现代化的德意军事工业也十分了解，他还想通过外交手段去购买一些抗战急需的武器和机械。蒋百里早年留学德国，不久前也出访过这两国，在德意均有不少朋友，所以此次出

访非他莫属了。蒋百里在国难当头之时，受命出访德意这两个日本的同盟国，可谓任重而艰难。但哪怕是有一线希望，蒋百里也在所不辞，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漂洋过海的征程。

临行前，蒋百里到铁道部再次借调了薛光前，又和他一起专程到南京中央军校晋见了蒋介石，商讨此次出访的一些问题，蒋介石还给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写了一封信。临别时，他们分别得到了一张蒋介石亲笔签名的照片。稍事准备后，蒋百里、胡适、张静江等一批出访人员从南京乘船逆江而上到了汉口，随即南下广州，到达香港。

在香港，蒋百里把左梅和女儿们安置妥当后，与前期到达的意大利顾问史丹法尼教授会合（史丹法尼教授来华工作的合同期限为六个月，截止于1937年7月，后又延期一个月），于9月18日乘座康梯罗素号邮轮直奔意大利而去，随行的有秘书薛光前和侄子蒋复璁（他是个德国通）等共七人。此时，德国和意大利为了不得罪日本，纷纷召回他们在华的服务人员，一时间，南京政府陆军方面的德国顾问和空军方面的意大利顾问全都走空了。蒋百里见了，不由得心寒，他对送行的人说道：“不论法国或苏联的军事顾问都是很有才干的，英美人士可做它山之助，再退一步说，中国是应当自力更生的！”

## 五、在战争狂人间周旋

1937年10月10日，康梯罗素号邮轮抵达意大利那波里港。在船上，蒋百里组织全体赴意、英学习和工作的中国同胞举行了国庆纪念集会。蒋百里在纪念会上发表了铿锵有力的演说：“人生三十而立，我们的中华民国，还年轻得不到三十。国家的成长，和个人不同。国家需要更多的年代，更多的培养。我们的中华民国，

只是在哺乳时代，这次日本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侵华，我军民奋起抗战，却给我中华婴孩滋养强大的机会。因为他所得的滋养，不是普通的乳饮，而是军民所牺牲的血肉。你们看：淞沪浴血抗战，在战场上一团一团的殉难，一旅一旅的成仁，我们在襁褓中的中华民国，就在这血肉中壮大起来了。我们一定要坚持信心，抗战到底，才能对得起我们苦心孤旨哺喂我中华婴孩，使之壮大长成的保姆——我们的领袖，才能对得起为抗战而舍身报国的一班军民！”<sup>97</sup>讲完这番极其鼓舞人心的话后，蒋百里踏上了意大利的土地。

到罗马后，蒋百里下榻于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他的学生、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早为恩师准备好了一切。随即，刘文岛通报意大利外交部：蒋介石总统特使蒋百里将军已到达罗马开始正式访问，希望能得到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接见。蒋百里已是数次访问这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一路顺风地到达，使他的心情格外好，回想前年访意时，意大利军部曾给予盛大的欢迎和极大的便利，他也因多次访问这个国家结交了许多朋友。因此，他对此次出访充满信心。

但是，风云突变。此时的日本已和意大利签订了《日意经济协定》，同时在蒋百里访意之前就派出了经济代表团到意大利访问，团长由日本大财阀大仓之子担任。他们在意大利四处活动，以金钱铺路，百般讨好，已经购得意大利生产的军用飞机九十余架。对于蒋百里的访意，日本人也予以密切注视，一家日本通讯社还就此编发了消息，攻击中国代表团是专程到欧洲采购武器的，此行必将加剧远东局势的动荡。对蒋百里的来访，墨索里尼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热情，他只是让自己的女儿、外交部长齐亚诺的夫人设晚宴招待中国客人，齐亚诺亦没有出席。<sup>98</sup>这显然是因为日本人隔在中间的缘故。经刘文岛大使的多方努力，且借助齐亚诺夫人的口角春风，两天之后的10月12日，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

才正式会见蒋百里。

齐亚诺和蒋百里互相都十分熟悉，齐亚诺在30年代初任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正是由齐亚诺出面调停，蒋介石最后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的。当时齐亚诺对日本公使重光葵曾施加了不小的压力，齐亚诺自认为他对中国为功不小。正因如此，使他在如下所述的一件事情中使他对中国一直耿耿于怀：1935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英国在国际联盟大会上提出了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的议案。后经意大利私下活动，英国答应只要有一个国家提出不予支持，英国就不再坚持议案，对意大利的侵略行为予以默认。当时德国已退出国联，美国尚未加入，苏联则对此事漠不关心，意大利代表就动员中国代表提出取消制裁的议案，并许诺一旦事成，意大利将首先在华取消租界。这是在齐亚诺就任外交部长之后的首件大事，齐亚诺自认为当年在上海有功于中国，加上如此优厚的条件，中国方面绝对不会拒绝。而且，他就任外交部长后拜访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就是中国驻意大使馆。可事情最后完全出乎齐亚诺的预料，中国不但没有提出反对议案，反而投了赞成票。齐亚诺认为，当年中国国际地位低下，所有驻外使节升格为大使，还是从意大利最先开始的，若不是意大利，中国在国际上肯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

齐亚诺和蒋百里一见面，他就大摆当年的功绩，连声埋怨中国不够朋友。一连串的埋怨之后，齐亚诺就再也没什么话题了，还不容蒋百里多谈几句，会谈就告结束。蒋百里顿时明白，世界形势急剧变化，这次访问再也不可能象前年那样顺畅容易，看来得花费相当的气力才有可能打开局面。

随后几天，有关墨索里尼接见代表团的事宜一点消息都没有，好在蒋百里已有心理准备，他和刘文岛商量一番后，决定突出奇策。10月20日，中国驻意使馆为欢迎史丹法尼教授归国和蒋百里

将军访意，在大使馆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邀请意大利政要及全体阁员出席。以史丹法尼教授的威望和蒋百里曾数次访意广交朋友的诚信，中方希望邀请的意大利高级官员全部出席，齐亚诺外长出于外交礼节也出席了晚会。

晚会进行得非常顺利，席间，蒋百里发表了热情洋溢、充满文化蕴味的演说。担当翻译的薛光前在许多年后都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他在《六十自述工作回忆》中详尽地记述了蒋百里的演讲。蒋百里说：“我这次到罗马，有一通讯社说，我是来买军火的。是的，我是来买军火的！”此言一出，全场愕然。蒋百里话锋一转说“可是，我要的军火，是看不见的，不是物资的，是精神的！”全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蒋百里接着说道：“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在中国古代通用，在二十世纪也可以通用。罗马一词，在中国《后汉书》，称为大秦。向慕之心，由来已久。罗马是西方精神遗产的结晶，一如中国是东方文化传统的中心。东西交应，大道流行，只有代表东西精神文明的中意两国，才能负担得起责任，才能达得到目的！”全场又是一片掌声。蒋百里在结尾时指出：“国际间友敌无常，唯中意关系，自有史以来，只有友好，从无敌意。愿一同起立，尽此一觞，为国际外交政治中罕有珍贵的中意友好关系，继续共同努力！”在蒋百里的提议下，全体一齐举杯畅饮，晚会气氛达到高潮。<sup>④</sup>

第二天上午，齐亚诺就派外交部一个高级职员到中国大使馆，索取昨晚蒋百里的演讲稿，由于蒋百里是即兴演讲，并没有底稿，还是薛光前凭记忆临时整理出意大利文稿交给了齐亚诺。第三天，在齐亚诺的疏通下，蒋百里终于接到了墨索里尼的请柬，定于25日下午接见中国代表团。

25日下午6时，蒋百里身着将军服，在薛光前的陪同下前往首相官邸威尼斯宫。首相的办公室宽敞豪华，墨索里尼端坐在办公桌前，目光炯炯。齐亚诺站立一旁，见蒋百里走了过来，齐

亚诺连迎上前来握手致意之后，一同走近墨索里尼。墨索里尼的桌前只有一把椅子，蒋百里和墨索里尼隔桌对坐，齐亚诺、薛光前站立两旁。蒋百里首先呈交了蒋介石总统写给墨索里尼的亲笔信，然后开始了他们的谈话。蒋百里首先说：“我是一个军人，代表中国蒋委员长及在中国战场上为抗日而死伤的五十万将士，向阁下致意。因为他们已深深地知道了、也实行了怎样为国家民族的最高利益，尽了他们最大的牺牲！”

墨索里尼点头称赞说：“这和我们的法西斯主义也可暗合。”

蒋百里接着说道：“日本侵华，为正义所不容。日以反共为名，缔结日德防共协定，实为偷天换日。在远东反共的，是中国而非日本。中国蒋委员长戮力剿共，如无日本从中捣乱，早已大功告成。”

蒋百里提到的日德防共协定是指德国和日本于1936年11月在柏林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墨索里尼此时正积极向德国靠拢，准备加入这个协定，有关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现在蒋百里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让墨索里尼还真不好怎样回答，他瞪着大眼睛望着蒋百里，久久无语。见此情状，蒋百里单刀直入地说：“近来意国加入日德防共协定之说，甚嚣尘上。中国人民及蒋委员长深表忧虑。日本侵华，蒋委员长必定抗战到底，中国亦必定获得最后的胜利。蒋委员长顾念中意传统友谊，殊不愿目睹意国陷于日本军阀之骗局。日本反共，盗名欺世，愿阁下郑重考虑。作英智的抉择，以勿加入日德防共协定为是。”蒋百里从中意两国友好关系的角度出发，直接了当地对意大利加入日德协定表示了不安，规劝墨索里尼慎重行事。

墨索里尼沉默一会，没有直接回答蒋百里，而是站起身来，走近薛光前，拍拍他的肩，说：“请你善为蒋将军说，我的参加防共协定，完全是政治作用。请蒋将军报告蒋委员长，我的参加日德轴心，并非反对中国。因为我为西班牙问题，困于英法，利害一

致，我不能不联合日德。假使中国亦反对英法，我必与中国加强一切关系。”墨索里尼可以说是对蒋百里讲了真心话，显然，意大利加入日德协定已是势在必行。若不是蒋百里出其不意的谈话方式，恐怕墨索里尼也不会这么坦陈心腹，不过这也算是墨索里尼对蒋介石没有隐瞒，因为他毕竟是在意大利正式加入日德协定之前十天告诉中国人的。

蒋百里知道木已成舟，再也没什么好谈的了，便起身告辞。临走时，蒋百里礼节性地赠送给墨索里尼一部精装《四库全书》缩印本，郑重地说：“这是代表中国文化的宝库，也是中国最后战胜敌人的保证。只有拥有悠久文明的罗马古国，才懂得这份薄礼所蕴藏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墨索里尼连连点头称是，接过书来，细细看了起来，大概他对东方文化实在是懂得太少，看了好一会儿，书竟然是拿倒了。蒋百里和薛光前都不好意思去纠正他，齐亚诺的脸上也露出了尴尬之色。<sup>⑤</sup>

尽管和墨索里尼的会谈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成果，蒋百里并不气馁，他广泛参加各项活动，极力宣传中国和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27日，他出席了东方文化协会举办的欢迎会。在欢迎会上，蒋百里对意中友好人士发表了即席演说，他对正在进行的中国抗战充满信心地说：“中国的文化宛如苍松古柏，根深蒂固，经得起风吹雨打。日本的文化，宛如桃李樱花，鲜艳夺目，但经不起微风细雨。今天中国国难重重，但深信雨过天青，否极泰来。松柏常青，定有参天拔地之一日。日本好像春风得意，可惜美景不长，昙花一现而已。罗马文明悠久，与中国相伯仲，当能知所取舍，择善为友。”他又道：“中国人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意志。敌人可侵占我城市，可屈服我政府，但决不能屈服一国的文化，更不能屈服一个民族的意志。日本假口防共，想拿二百万兵来屈服中国人的意志，中国誓必抗战到底。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sup>⑥</sup>

28日为意大利法西斯党进军罗马纪念日，齐亚诺在百忙之中会见了蒋百里。此次会谈的主要内容是围绕即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而展开的，蒋百里希望意大利在会议上多为中国说话。

九国公约会议是蒋介石在外交上解决中日战争的最后一个希望。所谓九国公约，是1922年2月美、英、法、日、意、比、荷、德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条约规定：“维护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之门户开放”的原则。这个条约是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主权粗暴侵犯的产物。现在日本正在进行独占中国的侵略战争，蒋介石幻想当其他国家在中国的“机会均等”受到损害时，他们必定会出面制止日本的侵略战争。因此，他派出了蒋百里、胡适等特别使节分别出访这些国家，希望游说他们能在九国公约会议上制裁日本，拉中国一把。

齐亚诺对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根本就不感兴趣，他干脆地回答道：“九国会议的前途很渺茫。此项会议间接由国联产生，国联就从未做过一件有利人民的好事。我今天不妨以朋友的身份告诉你，我们对这个会议是很冷淡的。”

蒋百里继续争取说：“既然有这个机会，应该尽最善的努力，由此产生一种善果来。”

齐亚诺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道：“我正告将军，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帮助中国的。国联早已离弃了中国，中国留恋它干嘛？中国唯一生存的条件就是五年前我亲在闸北及北站所目睹的忠勇抗战的中国将士！近来中日战事我不知其详。作战固以精神为最要，物质的条件也不容忽视。日本挟其海陆空的优势物质，中国以精神和血肉之躯恐终难持久。”随即，齐亚诺劝蒋百里，希望中国不要继续抵抗下去，做无谓的牺牲，如果中国能站到意德这边来，事态将会迎刃而解。他还暗示，斡旋中日关系的中心在柏林。

蒋百里打断了齐亚诺的话，义正辞严地说：“你谈话的动机是可感的。中日之战，是日本侵略中国，而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一天不停止，抵抗也就一天不能停止。”<sup>④</sup>

会谈不欢而散，但齐亚诺有一句话不能不说是发人深省，那就是：“中国唯一的生存条件就是五年前我亲在闸北及北站所目睹的忠勇抗战的中国将士！”

蒋百里在意大利继续活动了几天，他先后参观了意军机械化部队及军工厂等，并且同意方商定了易货形式的采购计划。在蒋百里的采购单上，有机械、飞机、装甲车、高射炮、弹药等，在未来的三年内达到价值国币一亿元的交易额。尽管这笔交易对意大利人诱惑极大，但此时意大利已经准备与德、日结为盟友，日本人此时也派出了阵容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代表团访问意大利，同蒋百里展开了外交战。最终，蒋百里的采购计划没能得到很好的实施。

在意大利已没有久呆的必要了，蒋百里便安排薛光前继续留在罗马，在九国公约会议召开之前保持和齐亚诺的联系，他于11月1日在侄子蒋复璁的陪同下赴德国访问。临行前，他致信齐亚诺外长，再次希望他以中意友谊为重，不要参加日德防共协定。

在驻德大使程天放的安排下，蒋百里一行下榻于以接待外国宾客为主的柏林雅特隆饭店。刚刚安定下来，他的两个女儿蒋英、蒋和就蹦蹦跳跳地来到了饭店。蒋百里一年多没有见到女儿们，看见两个长大了许多、洋气十足的女儿，他愣了一会儿才敢认，两个女儿则咯咯地笑了好半天。当晚，蒋英、蒋和与父亲挤在一张床上，他们有说不尽的心里话，整夜未眠。

稍作休息后，蒋百里抓紧时间开展了外交活动，他分别会见了他的老友、德国国防部长贝伦堡将军以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兴登堡元帅比肩驰名的麦冈森上将，向他们详细地了解了德国的现状。根据外交安排，盖世太保首领、空军部长戈林元帅夫妇

及李宾特洛甫等德国军政要员也分别同蒋百里会谈。与德国官员简短接触后，蒋百里敏锐地观察到德、意、日三国轴心已经形成，无法阻止。他把意大利政府的态度、日本在罗马活动的情况和德国下一步的动态全都详细记录下来，报告国内。他认为：“德国与日本已缔结防共协定，意亦加入。轴心已成，势难分化。我国唯有加强拉拢英美，联络苏联，促成英、美、俄合作，方能致日本于死命。”<sup>⑧</sup>蒋百里的这个结论充分反映出他正确的大局观和对世界局势精确的分析。11月6日，意大利最终在《反共产国际协定》上签了字。次日，齐亚诺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称意大利签订这一条约，没有反对任何一国的意思。这个声明既是外交辞令，又算是给蒋介石一点点面子。

为了节省经费，蒋百里从雅特隆饭店搬了出来，他在柏林郊外租了两间小屋，带着两个女儿住在一起。蒋百里白天参加各种外交活动，晚上则呵护在两个女儿身边，尽可能多地给她们父爱，温暖她们独处异乡的孤寂的心。一天，蒋百里和女儿们看完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归来后，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从“悲剧”二字入手，写出了他宣传鼓动抗日的名著《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在文章开头，他写到“世界上没有像我那样同情于日本人的！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Hamlet更悲的悲剧；在旁观者哪得不替这悲剧的主人翁，下一点同情之泪呢。古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命运所注定的；现代的悲剧，是主人公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这个大悲剧，却是两者兼而有之。……如今我像哥德批评Hamlet一般，来考察目前这个悲剧的来源”。<sup>⑨</sup>这本书于次年在国内登载，轰动一时。

在11月前二十天的时间里，蒋百里一直在柏林、罗马进行穿梭外交，中途还有数天赶赴布鲁塞尔协助中国代表在九国公约会议上的工作。九国公约会议的结局让蒋百里深感失望，但他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结果，失望最大的应该说是蒋介石，本应该遭到制

裁的日本在会前突然声明不参加会议，声称中日两国纷争他国没有干涉的权利，他的法西斯同伙德国一唱一和地也宣布不参加会议。意大利则在会议上极力主张中日两国直接交涉，和日本人里应外和。蒋介石寄希望最大的英、美两国竟然采取了中立和不介入战争的态度。于是，九国公约会议最终变成了纵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大合唱。

17日，蒋百里再次抵达柏林，他先礼节性地拜访了德国外交部长纽赖特，这是一个摆设官员，他一点实权都没有，会谈中连话都不敢多说。几天后，蒋百里在驻德大使程天放、参赞谭伯羽等人陪同下，在德军空军总部再次会见了空军部长戈林元帅。蒋百里和戈林相识已久，他们的谈话也就相当直率。

握手之后，不等落座，戈林便直接了当地说：“中日不幸失和，我心里头抱着无限的惋惜，而我又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双方都是我们的好朋友，我既不能作左右袒，又无法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甚至为在交際上也不便向一方多所来往，深望诸君有以原谅。我觉得打下去对双方都是有害无益的，我不知道贵国当局有没有接受良友劝告的动机？”

戈林的问话是有原由的。此时中国国内的战况是日本军队即将进攻南京，蒋介石已于11月20日宣布迁都重庆。在日军飞机的空袭中所有中央机关各部门都已纷纷迁往武汉，只有少数人还留在南京，其中就有蒋介石和汪精卫。他们留在南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此时正在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谈判”。所谓的“谈判”，实际上就是陶德曼代表日本和德国在诱逼蒋介石投向他们的怀抱。现在蒋百里作为蒋介石的特使来访，戈林急切地想知道蒋介石最后的表态。

蒋百里坐下后严词以对：“中日之战乃日本发动攻势，中国非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既已奋然抗战，除非侵略者退出中国，决不中途妥协。”

蒋百里这一态度显然与陶德曼大使传回的信息相左，大大出乎戈林的意料，他规劝道：“我们德国有一句俗语：‘一个人吃了苦头，就会找到魔鬼。’中国一天天的接近共产党怎么办？我看日本防共的意思是真的，日联国防上对立，历史上有仇恨，无疑地苏联是她的假想敌。中国如肯接受友人的忠告，不为魔鬼作嫁，我们愿作最善的努力，这是有关世界文化的问题，而德国负有挽救世界文化的责任。”

蒋百里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所谓的防共完全是借口，其目的就是要侵占中国，他回绝了戈林的“善意”，说道：“敝国军人的勇敢牺牲，乃基于国民自卫心之发展，不受国际阴谋的影响。”

戈林目光狡诈，他思索一会，继续诱劝蒋百里说：“中国军人的英勇抗战，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不过我看你们的力量到底还是不够呀，早点收场你们也有光辉，值得自傲，岂不是很好的事情！”

蒋百里依旧不为戈林的话所动，他回答说：“我们自力更生，不求任何人的援助。”看着戈林眼睛瞪得圆圆的神情，蒋百里不失时机地说道：“我们物质条件较落后，所以对贵国经济互助与科学指导抱有很大的希望。”

戈林是个明白人，他立刻接过了蒋百里抛出的这个彩球，他牛气十足地说道：“你只要有外汇，我们有什么东西那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我们自己也在扩充军备，自用不足的东西不能割爱。老实说，日本人常跑来麻烦我们，不要供给你们军火，我老实告诉他们，我们现在需要外汇，你们如果有现钱，照样地卖给你们，不过赊欠是不行的。”

在他们一问一答之间，戈林完全是大口大气，毫无顾忌。一则是希特勒德国此时已是欧洲最强的国家，他们征服世界的野心早已昭然天下，因此戈林想争取蒋介石的特使，让中国也成为其盟友。其次，蒋百里在德国军界朋友众多，戈林自认为他和蒋百

里也有相当深厚的交往，故而谈话十分坦率。但蒋百里此时是代表一个民族和国家从事外交活动，在他的心中始终是把国家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在原则立场方面，蒋百里与戈林针锋相对，但在谋求援助方面，蒋百里则紧紧抓住了德国人急需获取外汇扩充军备的心理，采取务实的手法，与戈林进行周旋。谈话间，戈林将其盟友日本人的情况和他们自己的心态全都告诉了蒋百里。

按外交礼节，希特勒应该接见中国代表团的，何况希特勒与蒋百里也是熟知。上一次蒋百里访德，希特勒亲自接见，设宴招待，还赠给蒋百里一枚正在德国进行的奥运会纪念章。可此次的情形则和往日大不相同，德、日、意三国轴心连成一体后，凡属涉及中日关系问题，希特勒都是为日本人讲话，九国公约会议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蒋百里此次访德，进出德国已经好几回了，一直得不到与希特勒会谈的消息。

11月24日，九国公约会议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会议的结局不言而喻，蒋介石再一次遭到他的“朋友”们的抛弃。英国表示要恪守“中立”，美国则宣称“不介入战争”，法国代表不停地嘟囔“我们实在无能为力”。中国代表顾维钧对于这些国家纵容侵略的行为愤慨无比，他再也压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愤然即席提出抗议。但他的抗议没起到任何作用，各国代表全都以沉默相待。九国公约会议上正义被邪恶压倒的局面极大地助长了日本侵略者侵华的嚣张气焰。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初，不能不考虑列强各国的在华利益，因此在两次进犯上海的战役中，日军始终注意在租界内尽量不与租界列强各国发生冲突，以免树敌过多将战火扩大。现在看来，英、美、法没有一个愿伸手拉中国一把，这样的结果使得日本人喜出望外，他们迅速完成了对中国首都南京的合围，无任何顾忌了。还是在蒋百里赴比利时的时候，蒋百里接到了德国总理府的函告，告知德国最高统帅希特勒将在近日内接见蒋介石总统的特使，至于具体时间、地点一概没定。蒋百里一

眼就看出希特勒根本就不想与中国接触，他已经是死死地和日本捆绑在一驾战车上了，这封函告只不过是玩外交游戏而已。

蒋百里再回到柏林时，他已经不准备再同德国方面接触了，至于希特勒既没有必要见，蒋百里也不想见，他只是照知德国外交部后，便去陪他的两个女儿去了。12月初，国内传来消息：南京形势紧张，日军已兵临城下。蒋百里觉得此行外交任务已基本完成，再也没有必要久留海外。他命蒋复璁先期回国，递交此次出访的专门报告，他自己则将一些收尾工作完成后就返回国内。

蒋复璁于12月15日达到罗马，随即便得知南京沦陷的消息。意大利整个侨界全都震惊了，凡是中国人无不心情沉重。倒是史丹法尼教授奋然振笔，写下了《中国处处有南京！》的评论文章，他以高昂的激情写到：“南京是中国国都，国都沦陷，虽非同小可，但中国人民总体抗战，全国一条心，处处都是国都，处处都有南京。日本决不能占据中国每一城市，中国也决不会失去每一城市。南京之失，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中国的胜利！”<sup>20</sup> 这篇文章的风格显然有蒋百里的文风，还是在国内巡视的时候，蒋百里就为史丹法尼教授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抗战的材料，对他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帮助颇大。蒋百里在《抗战的基本观念》一文中对这个论点讲得更为透彻：“我们今天退出上海，但我们自信是胜利的，我们今天退出南京，我们也自认是胜利的。这种说法并不抽象，也不空洞，我有正式的科学根据。须知我们是农业国家，并非工业国家，后者全部国力集中几点，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坂可抵半个日本。中国因为是农业国家，国力中心不在都会。敌人封锁了内地隔绝的上海，只是一个死港，点缀着几所新式房子的南京，只是几所房子而已。它们与中国的抵抗力量，完全没有影响。你们把南京比纽约、伦敦、巴黎、柏林，这就错了。史丹法尼他倒是懂此心理，他说现在中国人人心头有一个南京，日本空军炸毁了几所新式建筑，并不算一会事。”<sup>21</sup>

《中国处处有南京!》一文在南京陷落后的第二天在《都灵时报》头版上登载，文章如同一枚重磅炸弹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在意大利的中国人的志气，以至于日本大使馆专门就这篇文章向意大利外交部提出了抗议。

蒋复璁于1938年元旦抵达香港，随即赶到汉口，向蒋介石递交了蒋百里就此次出访写的专题报告，并向他汇报了蒋百里此行的有关情况。此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也于元旦赶到武汉，为威逼蒋介石接受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做最后的努力。蒋百里的报告详细地指出了德国和意大利对中日战争的态度，强调中国唯一的出路是联合苏联及英美，坚决持久抗战才能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实际上历史的发展与蒋百里的分析惊人地一致）。面临选择的蒋介石终于明白了陶德曼的“调停”的含义，他以含糊的态度拒绝了日本人提出的条件，于是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在1月16日发表声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另建“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至此，蒋介石终于下决心与日本断交。蒋百里出色的外交活动受到了蒋介石的肯定。

## 六、滞留欧洲

蒋百里对欧洲大陆战云密布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他不忍心让两个女儿在即将开战的战火中沦为难民，因此他准备将两个女儿带回国内。可此时蒋英在德国学习音乐颇现天赋，她的老师皆希望蒋英不要中断学业，蒋百里亦觉得功亏一篑甚为可惜，于是他决定把蒋和带回国内，蒋英留在德国继续学习。看着蒋英因有父亲在身旁幸福的模样，蒋百里又计划在德国多住一段时间，更多地给女儿以父爱。

蒋百里住在柏林郊外，常去的就是欧斯特先生的住处。欧斯

特先生仙居郊外的一个湖畔的丛林中，他红颜鹤发，身强体健，一点不象年迈之人。欧斯特先生在日俄战时曾任德军远东舰队的舰长，驻防中国青岛。后来日本为了抢夺青岛德国基地，向远东舰队发动了进攻，欧斯特先生不幸被俘，在东京关押了三年。在这三年中，他潜心研究日本的历史、政治、经济和军事，竟然成了一位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蒋百里几次访德都与他有交往。现在，蒋百里和他住的地方相距不远，两个人就时常聚在一起，共同研究目前正在进行的中日战争。蒋百里在他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书中以色彩浪漫的笔调记述了他们的交往。“我在柏林近郊‘绿林’中散步，心里胡思乱想，……忘记了柏林冬天的早黑——结果迷失了道路，走了两点多钟，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点心慌。但见远远地望见了一个灯，好好地向着那灯光走找人家问路，那知灯光却在一小湖对面，又沿湖绕了个大圈，才到目的地，黑夜敲门（实在不过八点半）居然出来一位老者，他的须发如银之白，他的两颊如婴之红，简直像仙人一般。……一进客厅就看见他许多中国、日本的陈设，我同他就谈起地方事情来，哪知这位红颜白发的仙人他的东方知识比我更来得高明，凡我所知道的，他没有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我却不能像他那样深刻。比方说‘日本人不知道中国文化’，他还有日本古事记研究一稿，我看了竟是茫无头绪。……我临走的时候，他送我行，而且郑重地告诉我：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sup>②</sup>

严冬过后，蒋百里抓紧时机考察了德国的汉堡、慕尼黑等地，随后又赴比利时、英国对欧洲局势作全方位的了解。这时，他接到国内来电，命他赴法国访问考察后启程回国。于是，蒋百里准备把女儿们带到法国一游后和蒋英分手归国。

蒋百里对孩子们非常民主，也很尊重她们的意愿，临行前，蒋百里关心地询问蒋和在德国还有没有未了之心愿。蒋和告诉父亲说：“我交了一个很好的女同学。她因我是中国人，对中国战事极

表关心。我假期内都住在她家，她的父母看待我像看待自己的女儿一样。为我们购了两匹马为游山行猎时之用，冬天带我们爬山滑雪。我向她说过，有一天我约她在我的家小住，她表示无限的欣悦。”蒋百里很为孩子们天真无邪的友谊而感动，他实在不忍让蒋和和她的小伙伴爱尔克失望，可中国在遥远的东方且眼下是战火纷飞，将她们全都带回国内显然是不现实的。为了不让女儿失信于朋友，蒋百里决定邀请蒋和的小伙伴到法国去住上一段时间。蒋百里给爱尔克的父母写了一封信，一是感谢他们对蒋和的关心和照顾，二是邀请爱尔克到法国去小住一阵。很快，他们成行了。

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和蒋百里是老朋友了，他们的友情一直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巴黎和会时期，当时顾维钧是中国会议代表，蒋百里则正好随梁启超先生访欧，在巴黎和会召开时充当中国代表的智囊。顾维钧在巴黎为蒋百里专门租了一所房子，蒋百里为了让孩子们生活得好一些，特地聘请了一位法国女厨师来照料她们的生活。

一切安置妥当后，蒋百里立即开展了外交活动。他先后会见了法国总统及总理达拉第、国防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甘默林等军政高级官员。在和顾维钧交换意见时，蒋百里深为法国担忧，因为在他眼中所见到的法国人，无论上至总统还是下至平民，人人皆对如同虎狼一般的强邻毫无防备，他们浪漫依旧，日夜沉浸在灯红酒绿之中，全然不知战争的乌云已经开始向他们的头上笼罩过来。

爱尔克从未离开过家门，蒋英姐妹也是好久没到过法国了。在德国，希特勒全力推行法西斯主义，穷兵黩武，对国内人民实施高压政策，人们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中生活，连爱尔克和蒋英、蒋和这些小孩们都有强烈的感受。此次她们来到歌舞升平的花花之都巴黎，一切都令她们觉得好奇和惊讶，尤其是法国人坐在街边阳伞下悠闲地品味咖啡的情景，让人见了甚至可以将自身的烦恼

全都抛诸脑后。蒋百里如同一个老巴黎，带着孩子们游遍了巴黎城。在百年老店吃只有提前预约才能吃着的编了号的鸭子；在高大雄伟的凯旋门前和宽阔笔直的香舍丽榭大道上，蒋百里绘声绘色地给她们讲述1870年普鲁士人攻占巴黎后举行盛大的阅兵庆典的雄壮场景；在艺术殿堂卢浮宫，蒋百里把一幅幅世界名画介绍给孩子们，给她们讲述名画背后的故事，陶冶她们的情操，给她们以美的享受；在塞纳河畔，蒋百里把孩子们带到了曾经叱咤欧洲大陆的拿破仑的陵墓前，面对庄严肃穆的朱红色大理石棺墓，蒋百里询问她们拿破仑的陵墓有何特殊之处，几个孩子沉思半晌，均摇头不语。蒋百里把手指向塞纳河说：“你们看，死人的眼睛正盯着这道河流呢！”他告诉孩子们这句话是拿破仑的遗言，而塞纳河则是法兰西民族永恒的灵魂。

战争使人们的心灵失去了往日的平衡，仇恨的种子深埋在心田。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来，蒋百里全家都投身于反侵略的正义事业之中，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时刻受到来自父母的爱国主义教育。蒋英、蒋和虽然远在德国学习，但她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减弱。一天，蒋百里带着两个女儿来到公园划船，远远地只见一个东方人也带着女儿在租船，那个东方人看见蒋百里后，遥遥鞠躬致意，蒋百里也略微举帽作答。蒋英问父亲，对方是何许人士，父亲告诉她们那人是日本驻法大使和他的女儿。蒋英、蒋和听了顿时怒目圆瞪，拳头立刻攥了起来。在湖面上，两条游船如同冤家般地有聚在了一起，蒋氏姐妹奋力摇桨，小船儿一寸一寸地超过了日本大使和女儿划的船，直到划得满头大汗，手臂酸痛，把东洋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看到两个女儿从小就有为国人争气的志向，蒋百里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到1938年4月，蒋百里完成了在法国的考察工作，他把蒋英和爱尔克送回柏林后，带着蒋和从法国马赛乘坐法轮菲利克斯·罗塞尔号踏上归国之路。途中，传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战役中重

创日军，打死打伤日军一万余人的捷报。罗塞尔号轰动了，全船人奔走相告，法国船长特地拿出香槟，举杯向蒋百里及全船中国乘客表示祝贺。身着将军服的蒋百里双眼湿润了，作为军事家的他明白，台儿庄大捷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昭示着中国人民抗战必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从法国船长那双真诚的眼中，从全船人（除了日本人）高举酒杯欢庆的手臂，他联想到了此次出访意大利、德国的境遇，齐亚诺的那句忠告如同刀刻般印在他的心上：“中国唯一的生存条件就是五年前我亲在闸北及北站所目睹的忠勇抗战的中国将士！”他深深感到中国人太需要这场胜利了，他也深深遗憾这场胜利来得太晚太晚。他对女儿感慨不已地说：“你来看，国际礼貌是一斤一两不容忽视的，我表现一分力量，她们就给我一分颜色，你们年轻人应该牢牢记着呀！”<sup>④</sup>

#### 注释：

①薛光前：《蒋百里先生的晚年》，载《传记文学》第14卷第4期。

②以上均见黄萍荪著《与蒋百里先生一席谈》，载黄萍荪、张禾草编《蒋百里抗战论集》。唯黄萍荪先生记述此次西湖赏春是在“民国二十五年仲春”，显然属于笔误，因为蒋百里自1935年底出访欧洲直至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前夕方才归国。

③⑦⑩⑬⑭⑮⑯⑰⑱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188、182~184、184、190、195~196、198~200、80~90、208页。

④（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第3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初版。

⑤张一麟：《追述蒋百里先生》，载黄萍荪、张禾草编《蒋百里抗战论集》。

⑥⑬⑰⑱⑳㉑薛光前：《蒋百里先生的晚年》（二），载《传记文学》第14卷第5期。

⑧刘健群：《窥测西安事变的前因后果》，载台湾《革命文献》第94期，1983年3月，第271页。

⑨蒋方震：《国防论》第87页，上海，大公报代办部，1937年版。

⑩⑪林家有主编：《国共合作史》第222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⑫《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载《解放》第10期，1937年7月。

⑬（日）古屋奎二编著：《蒋总统秘录》第11册，第24页，台湾，中央日报社，1977年8月版。

⑭蒋华：《先父蒋公百里暴逝的声明》，载台湾《传记文学》第17卷第2期，1976年8月1日出版。

⑮薛光前：《蒋百里先生的晚年（续完）》，载《传记文学》第14卷第6期。

⑯⑰《蒋百里抗战论集》第60~61页。

⑱黄萍荪编选《蒋百里先生文选》第252页，福建永安，新阵地图书社，1944年1月增订4版。

## 第十一章 笔挟风雷震神州

### 一、委员长顾问

自从在4月中旬获悉国内台儿庄大捷的喜讯后，蒋百里再也没能听到更多的捷报。相反，日寇的侵略气焰越来越嚣张，中国的抗战进入了异常艰苦的时期。蒋百里身滞异乡，不知有多少次在梦中插翅飞回了祖国。每次梦醒，看见自己仍旧呆在慢慢吞吞的邮轮上，不由得心急如焚。当罗塞尔号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域后，蒋百里立刻兴奋起来，他仿佛已经听见了战斗的号角，闻到了战场的硝烟。蒋百里不再像往日那样为蒋和讲解沿途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典故，而是在思索着回国后如何报效祖国，为抗战做贡献。

在罗塞尔号上，蒋百里凭栏浴风，心潮随着海波云翻浪卷。碧波万顷的海面上鸥燕飞翔，在朝阳或是夕晖的映照下闪露出金色的辉煌。在这宽广的大洋上，蒋百里把天地人看了个透，把世事琢磨了个明明白白。联想到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他非常贴切地把中国广袤的国土视作无边无垠的太平洋，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激情比作汹涌澎湃的狂涛，这可不是谁能够随意征服的。尽管目前日本人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这恰如那在朝阳或是夕晖映照下的海鸟，它们身上的辉煌注定将是短暂的。蒋百里觉得目前最

最要紧的事情就是要让国人明白日本帝国主义迟早会湮没在太平洋的滔天大浪之中，我们一定要坚定血战到底的决心！

1938年5月初，菲利克斯·罗塞尔号邮轮抵达香港，蒋百里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在香港，蒋百里住在九龙饭店；他本想认真写几篇文章，可没住几天，蒋介石在临时首都汉口电召蒋百里北上，并且已经安排他乘坐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专机从香港直飞武汉。于是，蒋百里到了武汉。

1938年的中国，战争进行得异常艰苦，但中国各党、各派和各族人民亦是空前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方针指导下，国共合作进行得较为顺利。为了给今后的抗战定下方向，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了党务及施政方针等问题。会议最为积极的是制定并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这是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来较为进步的一份决议。会议还通过了一个让蒋介石展示他的“民主”的决议案：结束国民参议会，成立国民参政会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实际上，《抗战建国纲领》是蒋介石为他在抗战时期推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所做的铺垫，但这份纲领终归还是国民党政府抗战方针的集中体现，尽管它具有极大的两面性。中国共产党曾指示党内各位同志，要对这份纲领表示欢迎，因为它的“基本精神同我党的主张是一致的”，要“发展其中一切进步的东西”，“反驳一切对于我们之攻击”的地方。<sup>①</sup>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一结束，蒋介石就开始玩起民主来。4月上旬，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制定并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第一条称“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sup>②</sup>4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政府推荐参政员人选，以供国防最高会议提出参政员候选人参考。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蒋百里来到武汉，他已被列入参政员候选人名单中。在武汉，蒋百里才真正体验到了中国人民高涨

的抗日情绪。6月16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八十一次会议召开，决定了200名参政员名单，蒋百里也被列入。这份名单还包括毛泽东、董必武等7名共产党领导人。经过紧张筹备后，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于7月6日在汉口召开，这天正是芦沟桥事变纪念日。蒋百里精神焕发地出席了国民参政会，并在会议上详细地介绍了他出访欧洲的情况以及他关于抗战的主张。尽管国民参政会是蒋介石的一块假民主招牌，但在抗战这一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的设立，对于增强全国抗日力量的团结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新华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这一战时相当代表民意机关的产生，的确是政治上的一个进步的现象。”<sup>⑧</sup>

也就是在这几天，蒋百里再次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念。在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共产党人郭沫若在国民政府政治部三厅负责抗日宣传工作，经他富有激情的工作，武汉的抗战宣传搞得有声有色。在芦沟桥事变纪念日到来时，郭沫若主持组织了武汉三镇七七纪念大会，会期三天，数十万人参加了纪念活动。三天时间里，每天都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在武汉三镇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声援抗战浪潮。随后，三厅又组织了规模宏大的“献金”活动，一连续持续了五天，武汉各界人民纷纷慷慨解囊，踊跃为抗战捐献钱财，献金的人多达百万，场面蔚为壮观。蒋百里久在国外，国际社会对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的麻木不仁、对中国军民英勇抗战的不屑一顾，他早已感到窒息和愤慨。回到武汉短短的时间里，他深深地为民族不屈的精神所感到，倍受鼓舞的他积极踊跃地投身到了这股洪流中。在广播中多次听到了郭沫若激动人心的演讲后，蒋百里的视野中开始注意这位四川人。

蒋介石在他的秘密住处俄租界内的中央银行几次会见了蒋百里，详细听取了蒋百里关于出访欧洲的情况汇报，实际上是蒋百里在给他做有关世界局势和国际关系问题的专题讲座。因为关于

出访德、意的情况，薛光前在4月份归国后就向蒋介石作了全面的报告并且得到了他的肯定。

蒋百里不失时机地向蒋介石谈了他个人对军事方面的见解，作为一个博古通今、明晓中外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对战争形势准确的分析及所提出的切实可行的对策，使得蒋介石深为折服，他开始更加深刻全面地认识这位老朋友了。从随后不久蒋介石委任蒋百里为中央陆军大学校长并且晋衔二星中就将就可知他是多么看重蒋百里。要知道，中央陆军大学的校长从来都是由蒋介石亲自担任的。这一时期，蒋百里在汉口所做的主要工作是为蒋介石在外交和军事上出谋划策，按陶菊隐先生的说法就是“他在汉口的主要任务是备当局对外交及军事上不时之咨询”。<sup>④</sup>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蒋百里更多地是用他那如刀似剑的一支笔夜以继日地伏案疾书，积极宣传鼓动国人的抗战激情，讲述抗战必胜之理，恰如一支不息的号角。

## 二、不息的号角

熟悉蒋百里的人士都知道仅用“军事理论家”来概况他的学问是远远不够的；民国要人陈立夫这样评价他的学问：“先生学兼中外，著述等身，考察所至，殆遍全球；不惟军事优娴，韬铃独富，文、史、哲学，造诣俱深。综其治学之要归在于‘察往以知来，规人以律己’，于纷纭繁变之中，得探赜钩玄之道。新知培养，不以故步自封，旧学商量，不肯妄自菲薄。是其治学之方，择善而从，又足资取法者也”。<sup>⑤</sup>以今人的治学观而言，纵观蒋百里一生的著述、演讲，陈立夫先生的评价可谓全面且准确。

蒋百里一生有三次著述高峰：一是早年留学东京创办《浙江潮》时期，一是与梁启超、张君勱等主编《改造》杂志时期，再

就是此时在武汉的几个月。就其著述所产生的社会价值而言，三个时期无疑都是各有千秋，很难妄下定论。以其民国军事理论家的身份来说，他在武汉时期从军事、经济、国际关系等诸多方面所写就的有关抗战的文章，应该说较为集中地体现出了他的睿智，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一笔重彩。在他病逝之后，黄炎培先生曾敬书挽联以示哀悼，其上联云：“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武汉成为临时首都后，这座城市就成了中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当蒋百里到武汉之时，武汉的形势也处于非常危急的境地了。1938年五六月间，日本政府决定对华“增兵约四十万人和新编兵团二十四万人”，准备进攻武汉和广东，以期摧毁国民党政权的中枢和切断民国政府的主要补给线。日本政府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只要控制中原，实质上即能支配中国”。<sup>⑥</sup>于是，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冒险的军事赌博，并且很快完成了军事结集，随后，日军开始进行外围作战。到7月25日，江南日军攻占了九江，江北日军则一直打到了黄梅一带，武汉已在日军的合围之中。面对日军的战略企图，蒋介石亲自坐阵，指挥一百多个师的兵力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武汉保卫战。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始，中国人民就不畏牺牲、奋起抗日。战争之初，有不少人缺乏思想准备，认为战争将会以中国速胜而告终；也有许多人被来势汹汹的日本人吓破了胆，民族败类汪精卫就持抗战必将亡国的谬论。种种思潮影响着国民的情绪，各种论调不时在报刊、电台出现。上海、南京沦陷后，太原、徐州又相继被日军占领，现在武汉又被日军合围，使得许多悲观论者哀声不断。蒋百里一直以清醒的头脑注视着中日战争，他对抗战必胜有着坚定的信念。在武汉时期，他把自己对战争研究的结果以富有激情的文笔写出了一篇篇鼓舞人心的文章，发表于

各种报刊上，如同高昂的号角，震聋发聩。

当时应蒋百里的邀请，专程从上海转道香港到达武汉的陶菊隐先生后来在他的《蒋百里先生传》中记录了当时蒋百里繁忙的活动。他写道：“那时候武汉各报都辟有星期论文一栏，延致名人执笔，百里是最受欢迎之一人。他除与当局及中枢要人研讨外交及军事方针外，每天差不多都有各报记者上门来，东一处请他写文，西一处约他演讲，他累得每天很少有休息和睡眠的时间，甚至该进餐的时候有客人来了，他空着肚皮高谈阔论和客人谈上一个半钟头，别人都是怕见新闻记者的，独他不论生张熟魏都当作自己的老友一样，所以新闻圈子里都赞他是‘有求必应的年青老头子’。”<sup>①</sup>蒋百里在武汉时期下榻于汉口德明饭店，由于有蒋百里在此，德明饭店成了高级军事将领和新闻记者常去的地方，蒋百里白天与诸位将领畅谈军国大计，晚上则伏案振笔。新闻界人士黄萍荪说：“民国以来，蒋百里的名字似乎有过三个时期最为新闻记者所熟书、读者们所熟知：一为任吴佩孚之参谋长，一为任孙传芳之参谋长，一即抗战军兴，聘问欧洲各国，并运他那支纵横不羁，犀利精刻，富于文学、哲学、军事、政治情调的妙笔，衡断敌我之得失，以坚强国人抗战的志念；因为拿得出真凭实据，不说一句空话，故每篇一出，遐迩传诵，万人钦仰。于是蒋百里三个字，渐从稍稍留意中国政治舞台上人物的中年人心目中，深入于青年社会之群了。”<sup>②</sup>

首先，蒋百里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一篇极具感染力的《抗战的基本观念》，这是他在欧洲时向外国人宣传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时所写的，为了鼓舞国人的士气，特地重新发表。蒋百里在文章中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抗战必胜的道理，他写到：

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有两个基本点为西洋人所不易了解。

第一点，是我们的乐观态度，这乐观并非眼前的一时享

乐，而是悠长的永久的希望。我们对于历史，终于五千年一回溯，三千年一综括。……因为时代经过既久，社会变迁自多，所以他的历史观是强者未必永久强，弱者未必永久弱。汉、唐、宋、明，曾经几度的败亡，但未来复兴的一个模糊的希望始终涌现于国民潜意识里。……假如说，我们机器武力不如人，所以不能取胜，那么历史上复国英雄与革命志士起事的时候，弱国对抗强权的时候，武力与机器总是不如人，但终久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是什么原因？……‘只有自认打了败仗的人，才是真正打了败仗’。

我们今天退出上海，但我们自信是胜利的；我们今天退出南京，我们也自认是胜利的。这种说法并不抽象，也不空洞，我有正式的科学根据。须知我们是农业国家，并非工业国家，后者全部国力集中几点，一个纽约可抵半个美国，一个大坂，可抵半个日本。中国因为是农业国家，国力中心不在都会。敌人封锁了内地隔绝的上海，只是一个死港，点缀着几所新式房子的南京，只是几所房子而已。它们与中国的抵抗力量，完全没有影响。你们把南京比纽约、伦敦、巴黎、柏林，这就错了。

第二点，便是我们有决心，是直觉的，不是计算的。毛奇将军有一句名言：“先要算，后要断。”……从世界的眼光看来，敌人的飞机有多少，武器有多少，我们只有多少，我们当然不能和日本打仗。但我们的国民，我们的领袖已经在计算中经过了六年，现在不能计算，只能断。……战略家异口同声说，战争的目的在于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他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他改变政策，这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就中日战争来说，抗战乃我们民族决心的表现。蒋介石将军的意志，便是我们民

族意志的象征。若论日本能屈服中国民族的意志，这是没有历史的常识……

我举外国人一句话，英国泰晤士报说：“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sup>⑨</sup>

蒋百里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成了所有持抗战必胜观点的人们的最好的辩论词，同时也对存在悲观思想的人们以警醒。

在7月3日和31日，蒋百里接连发表了《外交烟幕与宣传者自己中毒》、《从国际上观察各国外交之风格》等有关国际形势的评论文章。在第二篇文章中，蒋百里从历史和现实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英、德、意、法的外交政策，把最新的国际形势介绍给了国内，使国人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了一个较为深刻的了解。蒋百里写到：

就广义之国际言，则军事为其核心，其前哨线则外交也，其根据地则经济也。即有此经济组织，而后有此国防设备，而后有此外交政策。三者如影之随形，如水之就范。无论如何强国，三者一度脱节，即遭大祸。无论如何弱国，三者联系若佳，即能保持其光荣。……

（一）英：张伯伦虽号称实际家，其实实际应付非英之所长也。英国之所长，在其远略。……但长于远略者，即短于实际应付。盖自非先知，孰能举未来之变而一一预定之？故每下一策，必留一余地以应付，而形成一不彻底之局面。

英之国防要点何在耶？曰：英人无畏海战，善于空战，而独畏陆战。今若举欧洲大陆国防线之长度比例，以例大英帝国，则举三岛之全人口以服兵役，犹苦不足，故由德日等国陆军参谋官眼光视之，不独非洲犬牙相错之殖民地，即新加坡、印度、澳洲、加拿大，真取之如拾芥耳。英人亦自知之，故集中精力于战略要点，而放弃其余；而外交方策，亦

本此战略，而形成一特别风格，即所谓‘吃小亏大便宜’；而处处退让……

(二) 德：……有以陆军称著之德国，则长于实际应付，而短于远略是也。不论欧战以前，威廉二世东占便宜，西得势力，结果从两面受敌，闹成四方楚歌。革命之后希特勒亦是从德意志民族性格中发现出他的天才与缺点。

但长于实际应付者，同时即短于远略。只贪眼下便宜，不顾将来危险。最初高揭反共大旗，明明是对俄国，所以对法再三声言：‘不侵犯西境’，‘不收回亚尔萨斯洛林’，……以安法国之心。但结果是利欲所诱惑，帮助意大利参加西班牙内战，覬覦非洲殖民地（恐怕将来要从此出乱子），将历年之亲英政策取消，斗得西方的英法坐立不安，而俄人反在旁观微笑……则德人已走在小便宜大吃亏之外交路上，是明证也。如果方针不变，一定又闹成欧战前局面。

(三) 意：意之国防，海不能望英，陆不能敌法，故墨索里尼执政，首先注意空军。彼能于举世高唱和平之日，矻矻焉为人所不为，故能于短时间崭露头角，此即‘乘隙’战术与‘威吓’作用之应用也。故其外交态度，以‘善变’为其特征。……此种乘隙战术，有时可以得奇效，然苦于不能持久。就此点言，则意之国防与外交，亦正与英相针对。

(四) 法：近五十年来，法于外交不若从前之煊赫，时时以随从软弱外交闻。……盖法人本性轻噪而好名誉，自拿破仑为对内欲得民心之故，轻举对普，而酿成一八七零年之大辱……使拿破仑时代好大喜功之国民习惯，一变而为沉着忍耐，此五十年之苦功，盖真能举自身之弱点而补救之（而非英德利用己长而扩充之），其事之难可知也。<sup>⑩</sup>

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蒋百里专门写了一篇杂文，畅快淋漓地讥讽一顿，这篇文章被无数痛恨日本侵略者的中国人所传诵，这

就是《欧洲大陆英雄之覆辙》。蒋百里文笔犀利地说：

或许是生物学上一定的原则吧？急了就跳，——有如中国古谚所谓‘人急跳梁’，最近欧洲大陆上一位英雄，从柏林旅行回来，一跳就跳到东京，再跳又到了长春。你们不要怪他跳，要知道他是发急。

一个小学生，满以为老师皮夹里有许多宝贝，可是偷到手时，打开一看却是空的，急不急呢？一会儿又趁老师打盹的功夫，出去玩耍，但回来时，老师已醒，戒尺在手，急不急呢？最近又来一个英德接近，法德调和的运动，一个等边三角形中插入一枝金针，急不急呢？急了就跳。

最奇怪的是，比如一个陷人坑，第一位英雄走上那条路，掉了下去；第二位英雄自作聪明，绕来绕去，但仍走上了那条路，一样陷了进去。最奇怪的，他实际上竟是亦步亦趋，循着前人足迹，丝毫不爽的走入那个陷阱中间。这真是命注定的吗？

假如大陆英雄不愿自欺自骗，真心对付英国，还得学俾斯麦。我倒要做个建议，堂堂正正请他们取消那种假的反共招牌，归宗到一个俄德意迭克多的同盟，或许还能说得上对英。至于国内迭克多也未成立的日本，竟也混在一起，高谈反共反英，恐怕还够不上掉在陷阱的中央，只能掉在陷阱的角落里去。

因此我奉告国内同胞，他们急，我们不急，英雄跳，我们笑！

我们从容地含笑前进，最后胜利已经逼近！<sup>①</sup>

蒋百里在武汉期间，在各大报刊发表了许多宣传抗战必胜的文章，上述所引的文章除外，还有几篇重要的如《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为国联开会敬告英伦人士》等等，都是震撼一时的大手笔，以至各家报馆争相向

蒋百里约稿，皆以能发蒋百里的文章为荣幸，而只要是登有蒋百里的文章的报纸，则就必定好卖。

冯玉祥回忆说：“……在武汉，常从报上读到百里先生的文章，总有很多卓越的意见，说明抗战必终于胜利之理，让我读了，更加增强胜利信心，并从而晓得很多争取胜利的方法。许多朋友，都这样说，他们最喜欢读百里先生的评论。”<sup>12</sup>

薛光前曾高度评价蒋百里的文章说：“抗战以来百里先生发表的文章，每每使国人于苦闷中求得安慰，于失望中得到鼓励。他那深渊的思想，好像一道光，于黑暗中，益显得光芒万丈，遍射到各个心灵深处。他那高超的见解，又好像一种波，在汪洋中激荡得万马奔腾，影响到全体精神的去向。所以假使国家是一架机器的话，那么百里先生绝不是个轮子，或是一颗螺丝钉。他是国家生命的电力，全体民族的脑筋！”<sup>13</sup>

### 三、繁忙的社会活动

在武汉的日子里，蒋百里每天都是超负荷地运转，写文章、演讲、接待来访等等，很少有空闲的时候。当时蒋百里少年时期的好朋友张宗祥适供职武汉，蒋百里去年转道武汉赴香港时，还是张宗祥为他送行。为了让侄子能够获得真才实学，张宗祥特地让侄子张禾草跟随蒋百里，担任他的文字秘书。张禾草曾在日记中记录下了蒋百里每天繁忙的工作。

已经发表的日记第一篇是8月25日。

这天早上刚到7点，张禾草准时来到汉口法租界内的德明饭店。蒋百里住在2楼6号房间，门虚掩着，只见他正在伏案疾书，张禾草知道先生正在为《大公报》赶写那篇著名的文章《抗战一年的前因与后果》。随后，蒋百里用他特别喜爱的一个紫砂壶泡上

了铁观音，立刻，暗香盈盈，这是他开始谈话前的例事。沏上两杯铁观音，他们谈论起了于8月24日早晨在广东中山上空，日寇击落一架中华航空公司的民航客机的暴行。在这架客机上有中美乘客13人及机组人员，其中遇难的还有蒋百里的老朋友经济专家徐新六以及行政院长孙科的随员。蒋百里深为老朋友横遭惨祸而痛惜不已，他在上海的住所当年还是徐新六帮他操办的。

十分钟后，蒋百里开始口述《欧洲会不会打仗》的文章，由张禾草记录。不一会儿，军方一位姓李的师长来访，蒋百里拿出一本法国著名的军事著作翻译给李师长听，第一句就是“军队士气的颓丧是产生于没有作战的时候”。谈话间，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又登门造访。

张主席一是想听取蒋百里对昨天飞机被击落的见解，二是想从蒋百里这儿了解一些前方战事动态。蒋百里认为日军击落中国民航客机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日本情报人员可能得知中国政府行政院长将在近日内乘飞机赴汉；二是可能与日本海军陆军争夺军费预算有关。关于长江前线日军的情况，蒋百里了解到现在日军士气低落，厌战情绪正在蔓延，据从前线回来的人员介绍，许多日本士兵为了逃避战场，不惜吞食苍蝇、故意让蚊虫叮咬以期拉痢疾生虐疾，有的士兵甚至开枪自伤，从而得到回国治病的机会。

众人谈得十分投入，香茗数换，香烟不断。蒋百里依旧是老习惯，大口大口地抽烟，一支接一支。由于战时条件所限，他爱抽的三五牌时常缺货，干脆就改换三炮台牌了。正谈着，蒋百里的高足、粤汉运输司令官周彝武派来专车，要接蒋百里到司令部去，有要事相商。蒋百里一时走不开身，便和来人商量一番。紧接着，万耀煌副总司令来访，同蒋百里探讨起修筑军事工程的事宜。由于蒋百里把左梅安置在香港，他只身来到武汉，所以他一直是万耀煌副总司令府中的座上客。

万耀煌此时身任武汉卫戍副总司令兼十五军团军团长，他正

指挥着十几个师的兵力在武汉外围构筑防御工事，蒋百里曾几度亲临工地视察，为万副司令谋划设计。他还请万耀煌仔细研究太平天国时期湘军攻占武昌城的战例，从历史中寻找参考和借鉴。现在万副司令研究这段历史后，专门绘制了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武昌作战的路线图，前来就教于百里先生。他们谈得非常投机，万副司令官觉得获益非浅，告辞后又特地令属下送来两筐水果。

房间静下来后，蒋百里又开动起他那永不疲倦的大脑，他请张禾草准备一下，明天帮他记录一篇文章，腹稿已经有了。随后，他们又谈起南京失守的情形。蒋百里认为：南京撤退原定的计划是很好的，失陷前三天还开过一次重要会议，部署谁突围、谁冲、谁退，可到临场一切都乱了，先前决定退的反而冲了起来，决定冲的突围的反而撤退了，于是挤在一块退，全涌到通往下关的一条路上。惨剧的造成，是由于各部队高级指挥官不统一、不合作，使得南京城防司令唐生智进退两难而无法收拾残局。

谈话间，又有军方李惟果和一位姚将军前来商讨军事上的有关问题。在谈话前，蒋百里命张禾草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一部十三经、《古文辞类纂》和《礼记》回来，他急着要用。为了抓紧时间，张禾草乘周司令的专车出门。

待张禾草买好书返回德明饭店时，已到午饭时刻，蒋百里和李、姚二位将军的谈话刚刚结束。这就是蒋百里在1938年8月25日上午的活动，他一刻休息的时间都没有。<sup>⑥</sup>

除了写文章，蒋百里还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其中发表演讲是他较为乐意的事情。刚到武汉时，蒋百里听了国民政府政治部三厅郭沫若所作的许多鼓动抗战的演讲，心情激动不已，那激荡人心的声音总在耳边回响。蒋百里本是个极具口才的人；每逢有机会，他都非常高兴地为众人分析讲解世界形势和中国抗战的前途等公众关心的问题。慢慢地，能够亲耳聆听蒋百里先生的演讲成了武汉社会各界人士所期待的幸事了。

9月1日是记者节第四周纪念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特地在普海春举行座谈会，学会特邀了蒋百里、郭沫若、沈钧儒、王芸生等知名人士参加。

蒋百里正在为《大公报》撰写星期论文《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文章已写到“后果”部分，为了抓紧时间完稿，蒋百里口述、张禾草记录，从早上一直写到下午1点半才去吃中午饭。吃饭也只是简单地扒了几口，蒋百里又去会见一位朋友。2点过5分，记者学会来电话催促蒋百里先生到会。3点钟，蒋百里如约来到会场。

张禾草在日记中记述说：“百里叔叔还没有进会场之前，全场的目光像雷电似的射了出来，真是平凡中的一个不平凡似的降临，凡人中的一位圣人似的降临，神圣抗战中一盏明灯照耀着前途似的一个慰藉，不要说群情面容上透露着喜悦的意绪，不要说连外国记者静肃敬意表示的神情，不要说日本反法西斯作家鹿垣氏现出对我们中国民族伟大表现的敬意，就是会场里的一股空气也像有了无数细胞迎上的欢跃。”

在座谈会上中外记者畅所欲言，各自发表了自己对战争时期新闻工作者职责的见解，王芸生的意见得到了与会记者们的一致赞同，他认为：“新闻记者，平时的任务与战时都是应该一样的。其实，新闻从业者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大家只有一个中国，政府抗战，中国人应该抗战，军人抗战，新闻记者也是中国人，也要抗战，新闻记者这个名词并不含着做了新闻记者不必抗战的意思，所以新闻记者在平时、在战时，应该是一样的。”

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蒋百里摇着蒲扇站了起来，众人都急切地希望听到蒋百里先生的演讲。郭沫若因为听力有点儿不太好，特地把座位换到了蒋百里的身后。<sup>⑤</sup>蒋百里演讲的题目是《世界军情的现势》。《扫荡报》的记者程晓华回忆说：“他深刻的观察，崭新的见解，使全场呼吸都屏息在他锐利的谈锋之下，因为那些学

问都是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非常可惜的是，我们今天无法知道蒋百里演讲的具体内容了，当时担任记录的是程晓华和另外一名记者徐盈，他们把记录稿详细整理，经蒋百里审阅后送交《新闻记者》月刊发表，但因随后日军疯狂进攻武汉，演讲稿在武汉撤退中散失。<sup>⑥</sup>

演讲完了后，中外记者纷纷上前为蒋百里拍照，随后一一向他鞠躬致意。张禾草早些时候在日本时就和郭沫若熟识，他曾多次向郭沫若介绍蒋百里。去年淞沪抗战之前，他和郭沫若回到上海，本来他有心安排郭沫若和蒋百里见面的，可惜上海战事相当紧张，而蒋百里又离开上海到南京去了，所以他们一直没有见面。没料到这一耽误就是一年多。今天这两位同样抱着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的宣传者终于相见了，张禾草不失时机地向蒋百里介绍道：“这位是郭沫若先生”，早已通过媒体相识相慕的蒋百里和郭沫若相对一笑，如同老朋友一般，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张禾草在日记中记到：“今天！是一个喜缘，也正是沿江瑞昌告捷喜讯传来的时分；大家脸上现着笑，笑那胜利，笑那团叙，笑那为抗战奔散而萍踪相逢的喜因缘，真有点他乡逢故主的不可言喻的开心……”<sup>⑦</sup>

临走时，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新闻组的一位代表以团部的名义邀请蒋百里先生到他们那儿去演讲。蒋百里满口答应，并且提议说：“最好你们提出几个目下切要的问题来问我，我想得到的益处一定会比讲演好。”

郭沫若第二天一大早即专车来到德明饭店拜访蒋百里，他进入六号房间时蒋百里正好在浴室里。听说郭沫若先生到访，蒋百里立刻命张禾草泡上铁观音招待贵宾。郭沫若在武汉时期主持三厅工作的最大贡献是广泛团结了大批爱国文化人士，发展和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他的努力工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蒋百里对郭沫若杰出的工作是非常欣赏的，他

们两人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铁观音斟满茶杯，香烟袅袅升起，两位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并坐在沙发上，开怀畅谈起来。他们两人都有留学日本的经验，对那个樱花之国都有着深入的了解，都可称得上是中国当时的日本通，郭沫若的研究偏重于日本的历史、文化方面，而蒋百里更是对日本的政治、军事了如指掌。他们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围绕中日关系和日本国内的社会状况而展开的。

蒋百里认为：3月间，田中奏折抛出来后，日本加强了它在国际上的宣传工作。一方面，它向英美等国胡说什么：“中国是个不守秩序的国家，是一个不守条约的国家，是一个人多地多力大的国家，捣乱起来不得了，不如让有文化的我们来管他。”另一方面，它在德意等国面前极力夸耀自己的实力：海军如何如何的充实，陆军如何如何的神气。使得做惯了侵略梦的德意觉得日本这小子值得联合。总之，“日本在国际间的宣传，相当活跃。”蒋百里向郭沫若建议说：“我们至少要在巴黎或柏林设一复印像片的地方，像巴黎的非街推洛就有各国的新闻片天天印发。”

谈到日本国内的情况，蒋百里说：“这次，战事没有起来之前，日本苦的是农民，战争起来之后这苦痛移到中产阶级身上去了，……我想，将来真正的少壮派要起来的，他们，以前是反对财阀的，到现在，看到自己的农村凋蔽了，势必要移转对外。……将来，伤兵是一个极大不易解决的问题，只要看日俄战争的结果，日本的伤兵，弄到如今，到处可以看到的，还没有好的办法处置。现在伤兵这么多，可推想——更不得了了……”

两个人一直谈到中午时分，蒋百里又在四川菜馆宴请了郭沫若，黄琪翔、张禾草作陪<sup>⑧</sup>。

9月3日吃过午饭，蒋百里小睡一会儿后，饭店茶房就送上来了青年团接他演讲的片子，于是，蒋百里被接到青年团中央团部。据说青年团中央团部的房子不久前还是日本三井洋行的所在地，

沿螺旋楼梯上楼，蒋百里一行来到二楼会议所。会议所房间不大，满满地坐了十几人，除了青年团中央团部的工作人员外，还有不少青年人是刚从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毕业的。《扫荡报》的记者程晓华闻讯也赶到了。

蒋百里落座后，首先开言说：“我是不赞成‘注入式教育’的，何况演讲，还带着一点敷衍意味，个人认为座谈比讲演好，由大家提出了问题，使我的脑子得到刺激后，就会知道各位所需要的是什么。”蒋百里这一开场白，顿时打消了许多青年人的紧张心情，会场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一位名叫吴学毅的女青年操着北方口音首先站起来提问，她问的问题是广大中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武汉是不是能够保卫？假使万一失守，我们的失败会到什么程度？”

保卫大武汉在此时已成为压倒一切的大局，武汉究竟能不能保得住？这个问题，曾有不少人问过蒋百里，对此，蒋百里有着独特的见解。他颇为详细地为青年们做了解答，他说：“谁也不能断言敌人来攻的地方一定能够保守，连毛奇将军也没有这样的把握，不过保卫武汉，我们看也有可能。有的人说武汉失守，会影响国际的观听，在我看来，武汉即令失守，只要我们的国力仍然存在，我们在国际上的威望比武汉未失守前还要大，比如南京失守，法西斯国家心理上发生动摇，但许多民主国家则对于中国仍抱有希望。原因就是上海战役，我们防守能力之坚强，实已大出人意。再徐州失守是在台儿庄胜利之后，所以徐州虽失，而国际上同情我们的国家仍不失望。

有人把武汉比马德里，假使仅比了一半而不能比到全部，那还是不比的好。西叛军不攻马德里还可攻别的地方，而武汉这个地方敌人有点非攻不可，所以这是武汉与马德里的不同。”

蒋百里喝口水，点着一支香烟，接着说道：“还有人觉得武汉失守就割断了华南西北的交通线，认定这在中国经济上是一大危

机，同时员兵之补充也会感到困难，其实这种认识就有些错误，因为这在军事上并不是没有办法的，如武汉失守，在战略上就应有改变，这样，我们会处于绝对有利地位。敌人就算占领了武汉，而它也是不易保守的，我们的军队可以从四面进攻，使其首尾不能相应。如太平天国时，武汉就三得三失，由此足见武汉容易面面受敌。不过，目前敌人向我进攻的路线，我还没有受到四面受敌的危险，故保卫武汉的可能性仍然还大。”

大家对蒋百里的分析由衷称道。张禾草的同学何忠名又提了一个问题：“现世界上最大的问题，莫如远东与捷克问题，尤以捷克问题是不是会引起世界大战，大战时苏俄会不会分点力量援助中国？大战与中国有利还是有害？请蒋先生指示我们”。

蒋百里放下茶杯，毫不思索地回答道：“捷克问题，据我看最近不会出乱子。捷整军经武多年，民族强悍，如德来侵略，必定起来拼命，而且，英法苏连带关系很大，德目前尚无此能力攫取捷克。自然，捷克是战争的要塞，德既然无法得到战争的‘要塞’，也就谈不上打仗，总之，事前闹得凶，一定是密云不雨，但在将来，一定可能地要引起世界大战的。……”

“总之现在欧洲各国打则大家打，不打则大家不打，决不会偷偷摸摸的。至于说到苏联，参战是无疑的，但他仍会把注意力放在远东，中国问题既为世界一环，美与苏既为求世界之整个解决，决不会敷衍来欺骗自己，自然对于中国就只有处于帮助一途。

蒋百里认为：“大战爆发，中国还可占点便宜，因美国军火工业会扩大生产，美国的军火最充实。从前他曾与美国的参谋次长谈话，认为美与别国若一旦开战，只要有三个月，把废铜烂铁卖掉就可胜算，他所指的废铜烂铁，就是他们平日用的军械，战争爆发，美政府会下令统制军火工厂，在三个月里就可以另外制造出一批新军器，三月以前用的就成了所谓“废铜烂铁”。中国就可趁此时买些便宜东西，充实自己的力量。“说到大战，在明年大约

会爆发。为了中国占便宜，我是希望欧洲爆发战争的。”

讲到这时，有一个青年人站起来问道：“美愿意助我，固然是事实，假使日本封锁太平洋，军火不能运输到中国，怎么办？”

对于这个问题，蒋百里十分肯定地答复说：“现在关于军火的运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成问题的是钱，只要有钱，军火商的本领会大得使你吃惊。”<sup>⑨</sup>

应一位少女团员提出的经济问题，蒋百里又谈到了节约与今年的丰收。他认为：节约应以外货为目标，国货大可不必节约，尤其是农产品，中国以农立国，可以尽量的助乡人经济的活动增加，尤其是像今年的丰收，政府亟应从速筹划统制收买，使乡人不至于呆滞于经济的活动。<sup>⑩</sup>

整个下午，蒋百里有问必答，凡答必定精彩。程晓华在《蒋百里先生印象记》中写到：“青年人特别好问，国际的、军事的、经济的，都大部的提了出来，但他一点也不觉厌倦，如瓶泄水，滔滔不绝。当你听完了一个问题，他的解释、引证，都非常精彩。从午后二时起，一直到黄昏，他还是精神奕奕，毫不厌倦。”<sup>⑪</sup>

这场和青年人的座谈会，也给蒋百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告诉张禾草说：他对现在青年的印象，觉得青年的思想大有进步，都趋于实际方面，在以往是看不到、听不到的，尤其是女人，像今天的两位少女，提出的问题，都很有价值，在未抗战以前，我在留学生中间也听不到这样的话，确实是国运亨通的现象。<sup>⑫</sup>

之后不久，蒋百里在他的著名文章《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中，以浓笔重彩谈了他对当前中国青年的感想。他写到：“自我去国中间才一年，而青年进步之可惊，乃出意外，约而言之，乃有三点：一，观察深刻了……第二，是感情深厚了……第三，态度严肃了。我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座谈席上，最先是一位青年女同志她直接痛快的问：‘武汉保得住么？万一武汉失守了又怎么样？’最后又有一位青年女同志问‘中国解决力到底如何支持

……他们这种率直的态度，都确实令人感动，因为他们现在是实际生活，不是旁观的批评家了。”蒋百里号召青年们：“第一是应当向伟大的方向走去……，第二是应当向实际方面再进一步。眼光精密是接近实际的第一步，就是观察到了。感情深厚，态度严肃，是接近实际的第二步，就是体验着了……。特别的，武汉的青年们！我同诸位暂时告别。我可从远处望你们发芽！你们现在站在中国的中心，受着最紧要最严格最公平的试验，考题是‘保卫大武汉’。我祝你们大成功，做中国全部的模范。”<sup>⑧</sup>他还在报上发表文章说：“现在不是青年安心读书的时候，前方战地是你们最好的课堂。从战地得来的学问，比在课堂里得来的更可宝贵。父母放子弟到前方服务是懂得怎样爱儿女的方法。”<sup>⑨</sup>

蒋百里是这样要求青年们，实际上他自己早就是这样做的。之后不久，他就到长沙把二女蒋雍接到武汉，为了让女儿跟上时代青年的思想节拍，他特地命张禾草去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部把吴学毅请来，介绍给蒋雍认识，只可惜吴学毅因急事要赴西安，没能和蒋百里及蒋雍见面<sup>⑩</sup>。蒋百里也并没有让女儿留在大武汉，而是送她到前线做战地服务去了。

#### 四、兴邦之言

蒋百里在武汉时期发表的最重要、影响最广的一篇文章是在《大公报》上连载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大公报》的记者与之交谊素笃，索其文亦至亟，每成，常不待他签名就拿去发排，如《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稿。”<sup>⑪</sup>

蒋百里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中全方位剖析了日本民族的特性，一一剔出其民族弱点，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解剖。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行了高度精确的概括，得出了日本

帝国主义贸然发动侵略战争必然导致全盘失败的结论。蒋百里的思绪如在蓝天自由翱翔的小鸟般活跃，文笔如珍珠泻玉盘般流畅，轻盈的文字佐以准确的描述，使得整篇文章文彩飞逸，把本是干巴生硬的政论文章写得如同散文、如同故事，十分耐看，刚一刊出，立刻深深地吸引住了广大读者。

蒋百里在文章的绪言中写到：

世界上没有像我那样同情于日本人的！

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 Hamlet 更悲的悲剧；在旁观者哪得不替这悲剧的主人翁，下一点同情之泪呢。

古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命运所注定的，现代的悲剧，是主人公性格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这个大悲剧，却是两者兼而有之。

日本陆军的强，是世界少有的，海军之强，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两个强，加在一起，却等于弱；这可以说是不知公式，也可以说是性格的反映。

孔子作易于“未济”，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中国文化，日本人根本不懂，他却要自称东方主人翁？

如今我像哥德批评 Hamlet 一般，来考察目前这个悲剧的来源。

蒋百里在文章开始就分析了日本的民族性格，他写到：从日本人的生活习惯诸如洗澡、衣服、饮食、居住来看，他们属于南方“情热的人种”，但受国土地理环境的影响，“诱导他成了性急的，矫激的，容易入于悲观的性格。地震、火山喷火，这些不可知的自然变动，也给予日本人一种阴影”。“日本古代拿鲤鱼来比武士，因为只有鲤鱼受了刀伤乃至临死也不会动。恐怕切腹这个风俗，与吃鱼有关系吧。……所以他们的残忍性，还保有岛人吃人肉的遗传。”日本的音乐“你总能得到高亢激烈，与长声哀怨的

音色”。日本的国花是樱花、民族精神是武士道，所谓“花是樱花人是武士”！多么美呵！“但它的意义却是印度悲观主义的‘无常’。因为樱花当它最美的时候，正是立刻就要凋谢的象征。好像武士当他最荣誉的时候，就是他效命疆场的一刹那间。（勇敢是可赞美的，但太悲观了啊）。所以日本人在制造文字的时代，节取中国文字，来做他的字母，就有了一首诗。开首是‘色香俱散’，结束是‘人事无常’”。

接着，蒋百里又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造成的影响来分析现今日本人的心态：

欧战给予日本的第一影响就是烦闷。

欧战给予日本的第二影响就是诱惑。一九一五年派了亲王到了俄国，用百五十万支步枪，及许多作战资源，才得到内外蒙互相承认的协定。后来俄国革命了，德国屈服了，英国疲惫了，日本可以自由进展到西伯利亚。英国的印度洋要仗日本海军保守。日本又攫取了青岛，可向中国北方南方自由活动。整个亚细亚是他的了。……欧美有钱，日本人也有钱，欧美人有机器，日本人也有机器，所以称雄世界的诱惑，就日见其不可抵御了。

整个民族动摇了在历史上看来无论哪一个民族哪一个时代，从没有像日本在欧战时代的激进变迁。一个原来缺少内省能力缺少临时应用能力的急性民族，一方遭遇了社会的莫大的矛盾（不安于烦闷），一方当着千载难逢的机会（诱惑与希望）。这一只船，遇到了台风，一高高到天上，可以征服亚洲，即可以征服世界——西方自杀的文明没落了——一低低到了地狱。贫富不均，生活困难，革命共产。虚无主义，暗杀手段。不仅把舵的失却了罗盘针，全民族也就导入了一种疯狂状态。

战争！革命！

对日本国内的政治构架与军队的矛盾，蒋百里分析得十分透彻：

在烦闷与诱惑的大浪中我们要研究他政治的固有形态。假使自己组织坚实，指导者自能渡过难关，渐渐得到风平浪静；但日本原来的政治组织已有两个裂痕。

第一是政治家与军事家在政治上的对立

在内阁组织法定的时候，确定了陆海军大臣必须从现役将官中任命的原则。在当时原是消极的防止民权论自由主义侵入军队中间，以致军人的思想不健全。但是这个条例，后来竟使军人得以操纵内阁。……军人操纵政治，成了日本政治的传统习惯。欧战以前只是几个最高级的军人留心政治，欧战以后就影响到了下级军官。

第二是海军与陆军在财政上的对立

各部争取预算，本是普通习惯。但世界上无论何国，无论何时代国防上或海陆终有偏重。但试查日本五十年来的预算假如陆军预算一万万，海军预算决不会在九千万以下。……民政党财阀时代的陆军大臣宇垣，曾经一度缩减陆军人数的定额，而将剩余款项添补新兵器（预算不因而减少）结果招了陆军切齿的怨恨。所以海军既想学英美从第三位要到第一位，不仅封锁亚洲海岸还要超过太平洋，陆军又要做德法保持他世界唯一的荣誉，首先他的大陆政策，滨海省中国印度菲律宾都是他的目标。假如两者有一些偏袒，就被对方指为卖国贼！

在列举了日本政坛的阴谋、煽动、贿赂、威吓以及暗杀等种种丑闻之后，蒋百里得出一个精辟的结论：日本的政治家可以说天天在火山上跳舞！

关于日本的人力资源，蒋百里列举了一组非常有说服力的数据，以证明日本自从上个世纪末开始穷兵黩武以来造成的国民素

质每况愈下的恶果。蒋百里一直认为在战争中人是第一重要的因素，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之所在，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中，蒋百里着墨的重点就是通过对日本民族的解剖来论证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注定要失败的结论。他在文章中写到：

许多大政治家、大军人，脑筋里装着无数物质的数字，油多少？煤多少？铁多少？乃至船多少吨炮多少门而却忘记了一件根本大事！

他研究日本人的健康状况得出：

1925年，壮丁役不及格的百分比为25%；1932年，壮丁役不及格的百分比为35%；1935年，壮丁役不及格的百分比为40%；1938年，壮丁役不及格的百分比为48%。（注：1936年已将兵役之身长限度减低）

夸称日本文明者当然说他教育制度如何完备，国民学校如何发达。可是这教育势力下所养成的学生其兵役不及格的程度，占个职业中之最高度。一九三五年全国受验壮丁622882人中，不合格的百分率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且不论乡村都会工业区与农业区，一律的不行。（下面蒋百里又列了一组日本全国各地壮丁不合格的百分比）

更显著者，学生体格之不良，随着教育程度而递增。不及格者大学生最多，其次为高等学校专门学校毕业生，再次则中小学，但国民小学毕业生比高等小学者不及格之比率更大，一九二五年来此种现象更为明显。

缺乏内省能力的日本国民呵！身长是增加了，体重是仍旧，这是一件怎样严重的象征！向外展超越了自然的限度，必定要栽一大筋斗！

蒋百里还以犀利的笔调描述了日本人精神上的空虚与矛盾以及他们的野心，并且郑重向世人宣告日本的“黄金时代过去了”：

日本国民原是崇拜外国人的，这种几千年的遗传，一时不易改革过来。——本来假如从日本文明中除去了欧美输入的机器与科学，中国印度输入的文字与思想以外，还剩下些什么？——现在它却妄自尊大夸示他独有的能力。它的宣传愈是扩大，它的内容愈是空虚。……许多激进分子提倡的国难，所谓的国难，所谓非常时期，在提倡者自己知道，也不过一种煽动，但无形中更加重了国民的悲观色彩。

更进一步说，它在良心上已经发生一种矛盾，它天天以文化自豪，实则无一不是模仿西方。学了拿破仑创造莱茵同盟的故智来制造“满洲国”。学了英国的故智，企图中国分成几个小国，互相对立，本来一个很可乐观的国际环境，偏要模仿历史上已成失败的不幸例子。环境诱惑它得了朝鲜不够还想南满，得了南满不够，更想满蒙全部，更想中国北部，如今又扩大到全中国，要以有限的力量来满足无限的欲望。

明治末年确是日本内政的黄金时代。但欧战一起，军人政治家就将国军无目的的滥用。……现在日本想向举国一致的方向走，但缺少了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国民不能了解敌人到底是谁。这可分三种说（一）陆军对俄，海军对英，现在为什么对中国。（二）日本军人向来夸称中国不够做它目标，只须一出兵就可以占领中国的，但现在的事实却正相反。（三）对中国尚且如此困难，将来如何对俄对英美。

因为日本有这种无限制的野心，引起了世界的疑惧。俄国在远东本无兵力，但在满洲事变后已经增加了几十万的常备军。美国得了五、五、三的比率后，本未建造足额，现在却三度扩充海军。英国新加坡军港，本只是纸上计划，现在却正式完成。日本在极小一块空地中常能布置出十全的庭园山石，这个想象力很大的日本民族，悲剧性的，自造了一个国难，以为悲壮的享乐本来是一个理想的阴影，现在竟变成

了事实的魔鬼日本的恶运……

蒋百里在文章的最后，响亮地提出一个一言兴邦的口号：“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这个震撼全国人民心灵的口号一时间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了中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一句座右铭。<sup>②</sup>

由于连载《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大公报》的销量陡增，每期要加印一万多份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因为是分期连载，使得读者们总是急切地想读到后面的文章，于是，一些性急的读者竟然不等天亮就鸽立在《大公报》报馆发行部等待购买当日报纸。蒋百里给读者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他故意在《大公报》上不署上作者姓名，“读者都蒙在鼓里，猜不出是哪个做的。有人疑心郭沫若，有人说是陈布雷和郭沫若在日本多年，固熟谙其国情，但作风不若；陈氏之笔，虽以流畅婉转著称，然于三岛风光，似又无此亲切，遂有以为出自外人者。然就文法上观，则又绝对不类译笔。直到登至最末一章的最后一行，才露出‘蒋方震于汉口’六字，于是熟人就说：‘百里先生你真会开玩笑’，不熟的自语道：‘果然名不虚传’。”8月27日，《大公报》的连载一完，德明饭店的会客厅里就挤满了各界人士，他们都是慕名前来看望蒋百里的。蒋百里“高兴极了，被围在这些虽不素识，却是心仰他已久的人们中间，滔滔不绝地谈着，使来访的每一个人，于其文章之暇，还领略了作者的言论风采。”<sup>③</sup>

《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在《大公报》发表后，各家报纸竞相转载，很快又有单行本发行立销十余万册，轰动国内外。一天，蒋百里准备到湖南衡山去一趟，武汉的几位好友徐培根、张季鸾等人在蜀珍楼设宴为他送行。席间，蒋百里再展酒仙风姿，他和徐培根连干六杯啤酒，临散席时，又喊茶房再来一瓶，与徐培根一碰杯，又干了。

放下酒杯，蒋百里突然对张季鸾非常严肃地说道：“明日有三

千日本人到重庆，你们知道吗？”众人听了，不由得呆住了。看着大家面面相觑，蒋百里笑了起来：“我的《日本人》已从香港运到，三千册可运重庆，我们做一点广告术好吗？”大家一下子全放松了，张季鸾问：“怎么办呢？”蒋百里把手一挥：“出卖日本人，三毛钱一个。”

众人齐声赞道“好呀！”无不开怀大笑，笑声中充满对抗战必胜的信念。<sup>②</sup>

#### 注释：

①《中央关于对国民党临时大会宣言与纲领立场的指示》，载《六大以来》（上），第942页。

②《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载《国民参政会资料》，第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国民参政会的产生》，载《新华日报》，1938年6月17日。

④⑦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215、211页。

⑤见黄萍荪编选《蒋百里先生文选》，第4页，福建永安，新阵地图书社，1944年1月，第4版。

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2卷第1分册，第90、11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⑧⑳黄萍荪：《与蒋百里先生一席谈》，载《蒋百里抗战论集》附录，第43页，浙江金华，新阵地图书社，1939年4月版。

⑨蒋百里：《抗战的基本观念》，载《蒋百里抗战论集》。

⑩蒋百里：《从国际上观察各国外交之风格》，载《蒋百里抗战论集》。

⑪蒋百里：《欧洲大陆英雄之覆辙》，载《蒋百里抗战论集》。

⑫见《蒋百里先生文选》冯玉祥序。

⑬薛光前：《敬悼蒋百里》，载《中央日报》，1938年11月11日长沙版。

⑭⑮⑰⑱⑳㉑张丕草：《蒋百里随员日记》，载《蒋百里抗战论集》。

⑯⑰程晓华：《蒋百里先生印象记》，载《蒋百里抗战论集》。

⑲程晓华记录：《从保卫武汉谈到世界军情》，载《蒋百里抗战论集》。

㉒黄萍荪：《蒋百里先生文选》，第275～277页。

- ⑭⑮ 薛光前：《蒋百里先生的晚年》（续完）。
- ⑯ 张禾草：《蒋百里先生的一点小事》，载《蒋百里抗战论集》。
- ⑰ 黄萍荪：《与蒋百里先生一席谈》。
- ⑱ 以上引文均见蒋百里著《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

## 第十二章 英年早逝

### 一、国际问题专家

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行径已到肆无忌惮的地步，但主宰世界格局的大国如英、美、法等国皆只是对日本表示了道义上的谴责，而德国和意大利却是坚决地站在了支持日本的那一边。这在去年的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上可以看出，会议最终只是提出要在国际社会孤立日本，支持中国。至于具体如何孤立、如何支持，则无下文。正如齐亚诺所言，中国只有、实际也确实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通过一年来对日本侵略者所进行的英勇不屈的惨烈的抵抗，赢得了国际地位。

作为在这个关键时期，代表中国政府在德国、意大利进行过穿梭外交的蒋百里对英美等大国所奉行的绥靖主义再明白不过了，他总记得希特勒曾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国联是一根草，中国人却想抓住这根草渡河。”蒋百里从欧洲回国后不久，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大国所奉行的绥靖政策实际上是在鼓励侵略。在这篇名为《外交烟幕与宣传者自己中毒》的文章中，蒋百里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各国当局朝野身经欧战之痛苦，因此力主和平。谁敢破坏和平，便是罪大恶极。主张和平当然反对侵略。但若有

一国正式用武力侵略他国，而其余爱好和平的国民，欲以和平手腕来制止侵略，试问有何用处？我们可以说，像他们这样主张和平，等于鼓励侵略。有了口头为善的伪君子，就有勇于作恶的真小人。”<sup>①</sup>

蒋百里关于“伪君子”和“真小人”的预言不幸言中。在1938年的欧洲大陆上，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坦克车径直开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德国人对全世界说：捷克的350万日耳曼人正在遭受虐待，德国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希特勒手握战争火炬在欧洲大陆四处点火了。到8月底，有消息传来，国际联盟——也就是英法美等大国把玩世界的工具——将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会议的重点议题就是解决中日冲突问题。各种关于太平洋国际会议的消息不断地从英国的《泰晤士报》等新闻媒体散布出来，一时间，国内许多人士似乎觉得中日战争解决的前景曙光大现。

对此，蒋介石觉得中国政府应该表示一个明确的态度，敦促世界大国为保卫世界和平拿出切实可行的政策，他实际上也是把中日战争的解决寄望于国际社会。可心明眼亮的蒋百里则对太平洋国际会议有着冷静的分析：随着近十年来日本政府加速军备，陆海空三军飞速发展，现在已成为世界军事强国，特别是它的海军发展迅猛，已在远东地区独霸一隅，几乎能封锁东南亚所有的海岸线。而老牌殖民大国英法等国此时由于欧洲战争日益迫近，它们已完全无力顾及远东，为了保护自己在中国和远东的利益，向日本妥协就成了英法等国所能做到也是最容易做的了，就像它们牺牲捷克来换取德国意大利向苏联进攻一样，英法也有可能在东亚出卖中国来拉拢日本。出于这种忧虑，也对即将召开的国联大会发出个人的看法，蒋百里竭精殚虑写出了题为《为国联开会敬告英伦人士》的文章。文章杀青的时间是在9月4日左右。

9月5日上午9点，蒋百里和张禾草正誊写着《为国联开会敬告英伦人士》的文章，饭店茶房送进一张名片来，一看是陈布雷

先生的大名，蒋百里忙道“有请！有请！”把陈先生让进了房间。陈布雷容貌清癯，身材瘦小，态度谦和温恭，一见到蒋百里便连连打躬致意。此君谁都不敢小看，他既是一个博学多才之人，又在当今总统身边担当捉刀人，不知有多少重要文章出自他之手。蒋百里到武汉后，两人已多次相见，早些时候陶菊隐从上海到武汉，蒋百里和陈布雷因陶菊隐研究国际关系颇有成就，便向蒋委员长面荐。之后，陶菊隐不愿在政府就职而返回上海，蒋百里特地留下了联系电台，让他在上海日寇占领区留意国际动态，命其凡有新发现，立即电告蒋百里和陈布雷，为了保密起见，蒋百里还特意请他的电务员编写了一份简易密码，他们三人各存一份，随时保持联系。

每当陈布雷到德明饭店登门拜访蒋百里时，就必定是蒋总统有事召见蒋百里。照例，沏好一壶铁观音，蒋百里和陈布雷聊开了。这两位都是饱经世故而又思绪活跃的人，因此，他们聊的内容非常广泛，话题转换是跳跃着进行，以致于在一旁记录的张禾草无法跟得上他们的思绪，只是断断续续地记了一些。从记录来看，他们的谈话涉及到了青年、文学、国际关系等等诸多方面。国际关系方面则着重谈到了英国，显然，陈布雷对蒋百里所谈的世界局势分析相当感兴趣。他告诉蒋百里，蒋委员长欲请他就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将代表中国政府的态度。蒋百里听了慨然应允，因为他正好手头上已写就《为国联开会敬告英伦人士》一文，正对主题。

临到辞行，陈布雷恭敬地对蒋百里说道：“委员长今晚8点钟请先生吃饭。”

从陈先生走后，蒋百里整整一天没出门，直忙到晚上8点，他才动身前往蒋委员长府邸赴宴，随身带着刚刚抄写完毕的那篇《为国联开会敬告英伦人士》。<sup>②</sup>

蒋介石吃饭依然是很简单，特别是在国难时期。因为蒋百里

的到来，饭菜丰盛了一些，蒋介石依然尊称蒋百里为“先生”。在席间，蒋介石和蒋百里全面探讨了中日战争的前途和目前面对困难局面应采取的对策，对蒋百里这一段时期为抗战奔走呼号，给国民坚持抗战以巨大的信心和力量深为赞叹。作为国家元首，自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来，蒋介石苦日短夜，没有一天安宁过，本来就很单瘦的身躯更显消瘦。现在武汉外围的形势日趋吃紧，而蒋介石手中可用的军队几乎已经全都投进去了，此时，如果没有外力的援助，仗再往下打，结局不敢想象，看来从武汉撤退仅只是时间问题了。蒋百里认为，抗战肯定是一场持久战，中国地大物博，并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关键是不能丧失了信心。

谈到持久战，蒋介石就忧心忡忡，目前中国的情况实在太不容乐观：从北到南，海岸出口全部被占领和封锁，作为区域工商业中心的十余个大城市落入日寇手中，东部经济相对发达的富庶省份全部成为沦陷区。抗战仅进行一年多的时间，中国在人力、物力上耗损巨大，而有关重要武器和战略物资本身就得从国外购买，长此下去，持久战从何谈起？显然，蒋总统心头已生悲观和失败主义的愁绪，他认为，若无英美大国强有力的援助，中国的抗战恐怕难以继。不过，即将由英国人主持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倒是给中国带来新的希望。

于是，他们很自然地把话题转到了即将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蒋百里详细分析了中、日、英三者远东的关系，并且把他对英国的忧虑全盘讲了出来。他认为，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备情况以及目前的动态来看，把战火燃烧到南洋已是其蓄谋已久之事，这将直接威胁到英国在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的利益，那么，中国目前所进行的华中、华南的抗战则就是保护英国远东利益的前哨战了。因此，我们一定要利用这次太平洋国际会议的机会，动员英国对中国战场多施关心，若有可能，与他们结成抗战同盟体，共同抗日。在会议尚未召开之前，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

就是通过各种方法打消英国人向日本妥协的可能性。

蒋百里把刚刚誊写好的《为国联开会敬告英伦人士》文稿递给了蒋总统。

蒋介石认真地把文章读了一遍，很显然，文中所写的与他所想的是不谋而合，他把陈布雷请了过来，将文稿交给他，吩咐道：“在香港、重庆、武汉三地《大公报》同时发。”

待陈布雷离去后，蒋介石又关切地问起了蒋百里目前的生活状况。蒋百里告诉他自已准备到西北去做一些工作，因为他认为战争再往下打，武汉失守后，中日双方会进入一个相对僵持阶段，西南、西北就成为抗战的重要大后方，而西北又恰恰是蒋百里所未到过的，所以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想到西北去工作。

蒋介石摇摇头，告诉蒋百里，他准备给蒋百里委以重任。蒋介石没有讲明，蒋百里也就没再问。于是，一场气氛非常好的谈话结束了。

9月7日，《为国联开会敬告英伦人士》见报。

这篇文章同时在三地见报，立刻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熟悉政治的人一看就知道这篇文章是代表中国政府的立场。整篇文章语气强硬，措辞准确，特别是精确地分析了中、日、英三国关系在远东尤其是在南洋下一步的发展变化，严正指出英国应该抛弃以妥协退让换和平的幻想，立即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中，真正为远东地区的安定、为世界和平作出与大英帝国地位相称的贡献。由于这是多少年来蒋介石政府第一次对英国人表现出如此强硬的态度，加之文章又出自蒋百里之手，人们还在津津乐道地谈论《日本人》时，现在又出了对英国人的“敬告”，因此，三地出现了抢购《大公报》之热潮，《大公报》一时洛阳纸贵。

蒋百里用战争狂人希特勒的一句演讲词作为文章的开头：“国联是一根草，中国人却想抓住这根草渡河。”然后蒋百里又借助一位法国记者的口讲了一段政治寓言，寓言中隐喻了英国首相张伯

伦的妥协退让政策。蒋百里接着写到

恶意的骂詈也罢，冷酷的讥刺也罢，质直责备也罢，如今世界上打仗尚且要团体，不敢单独从事，何况要和平，何况要世界和平？二十世纪的国家，不能不有团体生活，这是国联的意义，所以不管各国代表在日内瓦干些什么？我们却十分对国联的真意表示敬意与诚心。

在我心目中，觉得英伦人士之对于国联，有一种也罢的热心与希望，其态度却与我们的传统思想相似。尤其使我动心的，这种态度都是纯洁的，高尚的，没有一时利用的野心，也没有片面利害的计算，所以我对于这一回国联开会，不向别人说废话，而对于英伦人士要下一个忠告。

.....

第一，是英国的特殊地位。英国不是欧洲一个单纯国家，而是现在二十世纪的一个唯一的世界帝国，所以我以为英伦人士，应顾虑到自己两种任务：第一是国家的义务，第二是世界帝国的义务。现在世界上无论某一个小地方出一件事，没有不与英国有关系的。别国可以把世界忘记，英国不能把世界一时一刻离开。换言之，世界的事情，就是英国的事情。我不说英伦应当抛弃了国家来管世界，但我以为英伦对于世界问题，不能将传统的单纯的国家观念应用。

第二，是日本的特殊情形，虽则大陆主义现在在日本疯狂地跳梁着，但南进政策在日本有脑力的人还以为合理，国际间真的战斗，不是武力，而是经济，穷乏的日本不寻经济出路，是没有办法的。这种事实与研究远东最深刻的英伦人士，当然知道，不用细说。

蒋百里在文章前半部分十分恳切地指出了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一针见血地把日本人下一步即将采取的战略目的昭示于读者面前：为了寻求最

大限度地攫取经济利益，日本肯定会将战争推向富庶的南洋区域。如此一来，英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毫无疑问地会受到日本人的侵略，英日两国在远东地区的矛盾已经不可避免。有鉴于此，蒋百里把中国战场放大观察，将其置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战斗中来分析，他得出如下的结论：

那么，中国现在的抗战也有两种意义：一种是单纯的国家的意义。（民族争自由独立的战争。在这种地位，我希望来几位诗人，如同拜伦一样的，就心满意足，纵使没有拜伦，我们对于英伦还十二万分感谢。）可是从世界帝国的环境上看，即是从世界的意义上看，我要请英伦人士替我们判断一下。

.....

在世界帝国的立场者，那么在黄河以北是哨兵战，在扬子江沿线是正式的前卫战。我们不敢自夸，说目下的抗战是替英国掩护着香港、新加坡、印度，不过在小学校地理教科书上，如果画一条日本防共政策的动态线，而这条线的方向针，都没有向北指着，而一步步的向南方下来。这究竟表示何种意义？富有常识的绅士先生们，我大胆而说：我们这一次抗战认为是在替英国世界帝国挡着最前线，同时是在替国联的和平政策守护着最后的堡垒。

至少限度，我以军人资格断定地理上的形势，迫着我们。替苏联尽力的机会少，替大英世界帝国尽力的机会多。

有鉴于此，蒋百里认为英国人应该对远东事务切实负起责任来，面对日本人的挑衅和侵略野心，既要从道义上予以谴责，更要坚决予以武力上的回击。最起码来说，在即将召开的国际联盟大会上，英国应该给世界、给在保卫香港、新加坡前卫战中浴血奋战的中国政府和人民一个明确的答复，而且这个答复应该是负责任的、抛弃任何幻想的答复。蒋百里写到：

张伯伦先生说：“英国有三种场合，不惜一战——第一，

如果有人侵犯英国的领土及殖民地。第二，为履行对于同盟国条约起见。第三，二者以外，如果‘英国认为’必须一战才能解决，那也义不容辞。”实际家的张先生，当然不是说空话，凭理想，“或许”等名词用不着，我不知道现在远东战事，“英国认为”如何？

哈里发克斯先生说：“除非疯子会主战”。我也不是疯子，不过要问，这一回的集体安全——到底怎样保证？<sup>69</sup>与其说蒋百里是在“敬告”英国人，不如说是在“警告”英国人。历史已经证明，蒋百里对日本的南洋政策判断的准确无误。

## 二、重任负肩

《为国联开会敬告英伦人士》一文引起的轰动不亚于《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蒋百里的文章几乎替代了行政院新闻局的声音，武汉各界人士在空袭警报声中兴奋地谈论着蒋百里，他的文章使人们看到了中国的命运和前途。

从香港传来的消息，蒋百里的文章在海外也同样引起了震动，东南亚许多国家对蒋百里的观点颇为赞同。蒋介石很是高兴，7日晚上，他再次约见了蒋百里。蒋百里把他白日完成的一个关于国际宣传的方案呈报给了蒋总统。蒋介石详细地把武汉保卫战的进展情况告知这位军事专家，他心情较为沉重，进攻武汉的日军现已攻到了湖北的东大门广济，由于黄梅、英山等地的过早失陷，使原计划利用大别山及长江天险同日军周旋的方案难以继续，广济已被日军从正面猛攻两日了，看来无法守住。这样一来，武汉保卫战就得重新部署了。蒋百里认为武汉撤退不足可惜，何时撤退要观战局发展而论，要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而定。

谈到撤退，蒋百里把存在心中的撤退方案也讲了出来，他认

为，疏散一座城市的人口，不是像眼下报纸上登登文章、发发通知就可以了的事情。公安局应该挨家挨户进行调查，把男女老幼底细摸清，了解他们的意愿，愿走不愿走的、愿拚不愿拚的、可干活不可干活的等等，政府可以全面统计一次，由此可以决定迁移的地点和人员疏散的程序以及需要投入的车船和经费，这样组织撤退才不会打乱仗。

他们一直谈到了晚上9点多钟才告结束。临结束时，蒋介石似乎有意请蒋百里出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一职。他请蒋百里考虑一下，并且约定第二天下午在中央银行继续面谈。

这天晚上蒋百里睡得不是很好，他的心情很零乱。

9月8日一早起来，蒋百里就告诉张禾草“昨晚睡得不好”，上午他接待了几位来访的朋友，并没有再做什么事儿。吃过午饭后，按往日惯例，他应该到德明饭店楼下的会客厅去接待来访的宾客。自从蒋百里住到德明饭店后，这间会客厅几乎被蒋百里包下了，特别是《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刊登完后，德明饭店的会客厅每天都挤满了社会各界人士，他们都是专门来拜望蒋百里，亲耳聆听他讲演的。今天蒋百里不太想到会客厅去，他吩咐张禾草代他去接见来宾，他想一个人清静一会儿。

但情报员的到来让蒋百里根本无法清静：广济失守！日军开始顺江向上进攻田家镇，步步逼近武汉外围，武汉市民已经纷纷开始逃离。日本人气焰嚣张，国家遭难，蒋百里心中着急，他只觉得有劲使不上。想起昨天晚上和蒋总统的谈话，他对出任中央陆军大学校长一职颇觉为难，因为这个职务历来都是总统先生亲自出任。但有此报国良机也一直是他梦寐以求之事，比起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空衔无法同日而语，对于矢志报国的蒋百里来说，年届57岁，即将步入花甲之年，能干实事的时间越来越少，他确实是进退两难。

下午5时30分，蒋百里如约来到俄租界的中央银行蒋介石的

住处，和总统共进晚餐。席间，蒋介石再次询问了蒋百里对出任中央陆军大学校长的意见，蒋百里依旧犹豫不定。蒋介石告诉他，自抗战开始以来，全国战事日趋紧张，作为最高统帅，实在无暇顾及陆大的事务，但陆大是培养军事人才的最高学府，绝对不可荒废，目前急需一位资历、声望、学识、经验和德行方方面面都为军界和社会所景仰的老前辈来出掌军校大局。为此蒋介石曾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众人无不推举德高望重的蒋百里。

蒋百里还是拿不定是否就职，他没有立即回复蒋介石，他要求再给点时间让他考虑考虑。

接下去的几天时间里，蒋百里全都陷入社会活动之中：从张禾草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百里有多么繁忙：9月9日，“今天有很多人来，因为房间里挤满了很多人连通姓名都不方便”，9月10日，“反侵略周刊社的徐先生来拜访他”，9月11日，“又来了很多客”。蒋百里每天都同来宾谈论抗战、谈论世界军事，忙得他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12日一早，张禾草到郭沫若办公室去了一趟，商谈由政治部第三厅承印一批《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的事宜。郭沫若对蒋百里的这篇文章是大为欣赏，他准备以政治部的名义将其翻印成单行本，在军中发行。

张禾草与郭沫若颇有私交，他们以前在旅日期间关系甚为密切。郭沫若旅日十年，仅在快离开日本时才照了一张合家欢，当时也没能取到相片，还是张禾草将相片从日本带回。郭沫若看了相片，悲喜交加，要知道此时他还有日本籍夫人和孩子留在日本，由于郭沫若毅然回国投身抗战之中，使他在日本的家庭时时受到日本当局的迫害。看见郭沫若情绪过于激动，张禾草连连安慰他。平静后的郭沫若问起蒋百里的情况并且要请蒋百里先生吃午饭。

当下，郭沫若、张禾草驱车来到德明饭店。刚一进到房间，还没坐定，只见郭沫若拍着口袋几乎跳了起来：“我的钱包没有带来，

我的钱包忘记了……你去替我打个电话……你不打我自己去打……”一屋子人都被他逗乐了，蒋百里坐在沙发里笑道：“这有书生气，我今天高兴，我一定多吃一点，我一定多喝几杯。”还是旁边的来宾把请客之事应承下来。于是，众人决定到一间名为“又一村”的宁波餐馆。

因为有蒋百里和郭沫若二人，中午饭大家吃得十分高兴，几个见多识广的人专们讲吃的事情，东洋的西洋的讲了不少。<sup>④</sup>

这天晚上，蒋百里应银行界励进会邀请，为他们发表有关军事外交方面的演讲。8点1刻，蒋百里的身影出现在汉口总商会大礼堂，有数千名听众早已殷切地等候在那里。《扫荡报》记者程晓华记录下了这场盛会：“天气虽然是新秋，电扇哗喇哗喇地，人太多了，内外的温度显然不同，空气有些使人发闷。一阵很热烈的掌声，蒋百里先生出现在演讲台。”

蒋百里演讲的题目是《外交军事经济》，“还没有演讲之先，他用粉笔在黑板上随手画了三个圈子，圈子像是两脚规牵成的，一个与一个衔接，他把外交、军事、经济，分别写在圈子中间，他说：外交、军事、经济是有分不开的关系，现代打仗时，军事是前提，可是在军事之前还有外交，外交是军事的先锋。至于军事，拿破仑说：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可见军事还是离不开经济做基础。”蒋百里认为“打败仗的国家，才有出名的外交家，强国有的是强大的军力，根本不需要什么外交家。因为外交失败，才继之以军事。不过，经济没有准备是一定会打败仗。……所以现在一个国家，必须三线联通，才可以打胜仗。”

歇口气，喝口茶，蒋百里摇着蒲扇继续讲演。下面讲的是国际关系的问题：

“今天路透电说，欧洲和战关键，就在今天，就是希特勒要在今天发表演说，才决定打与不打。我希望打，我们打了一年，他们也应出来打打，诸位可以放心，不要以为大家打，军火成问题，

其实是有办法的。同时，我们应该自信，撑持欧局要靠我们，现在日本因我们打了十四个月，泥脚已拔不出来，意大利在军事上又没有办法，如果英法趁此机会不放过希特勒，施以压力，一定可以成功的。把全局一看，保卫武汉，不仅是为了我们，而且也是为了世界。因为希特勒的牛皮就要被揭穿了。”

蒋百里的演讲深深吸引住了听众，大家聚精会神，一会儿屏息静听，一会儿报以热烈的掌声。整个会场效果奇好。最后，蒋百里希望金融界的同仁要确实做到以经济为军事的基础，要多替国家生产打算。

演讲结束后，蒋百里还没来得及休息片刻，银行界励进会的代表又来请求蒋百里再为他们主持一个座谈会，蒋百里不顾疲劳，慨然应允。在座谈会上，蒋百里又回答了人们十分关注的几个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他答复的每一个答案，都使人感到很大的兴味，散会后，在路上还可以听到听众三三两两在重复谈到蒋百里先生刚才演说时的神态。”<sup>⑤</sup>

再见蒋介石时，蒋百里基本同意出掌陆军大学，但他有个要求，出于对蒋总统的尊敬，他不能做“校长”。陆军大学的“校长”一词已属蒋总统专美，蒋百里只愿做“代理校长”。对此，蒋介石自然是满口应允。<sup>⑥</sup>

### 三、执掌陆军大学

1938年9月中旬，蒋百里就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一职，军衔由少将晋升为二星中将。

从早年出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到今天陆军大学代理校长，其间已整整过去25年时间。回顾这25年岁月，可以说蒋百里全都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唯有这两次出掌军校是由政府最高

领导赋予他的实职。熟知蒋百里的人皆称其不得志，黄萍荪曾在1935年陪蒋百里游西湖时讨论过这个问题，蒋百里当时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说法，其中最为绝妙的一句话是“与其谓蒋百里不得志，毋宁谓用蒋百里者不得时”。黄萍荪后来给蒋百里算了一卦，断定他的人生道路是“十全大破”，“是偃蹇一生，不为世用；也可说是怀才不遇，遇则不终。”所以他“南北流离，如酬应品似的戴了好多年‘参议’‘顾问’的帽子，不但终其身未能一握军符，即连什么总长部长次长乃至厅长一类的位子，都没有他的份儿。”<sup>⑥</sup>蒋百里出任陆军大学校长的任命书发布后，不管是否认识他的人，皆庆国家得人！

任命书一发布，蒋百里自己也觉得格外精神，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薛光前回忆说：“有一天傍晚，百里先生突然来到了兰陵路（薛光前的住处）。他全副军装，披风佩剑，精气非凡。平时他穿长袍马褂，手里还拿了一根手杖，虽年方五十余岁，走起路来，背有些弯，不免有些老态。这次身穿军装，胸膛笔挺，腰也顶直，显得十分年轻，十分矫健。”他如同孩童般笑嘻嘻对薛光前说：“这次我真够体面了！虽还只是两颗星（说时他指指领圈上的两颗金星，系中将阶级），但徐次元（永昌）部长传谕委员长派我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委员长这样看重我，真使我高兴，我要好好的干一番！”之后，蒋百里赠给薛光前一张身着二星将军服的半身照片，照片背面有他亲笔题写的《汉上留念》五言言志诗，笔锋遒劲。诗言：

犹有书生气，空拳张国威；  
高歌天未白，长啸日应回。  
旧学深沧海，新潮动怒雷；  
老来逢我子，心愿未应灰。<sup>⑦</sup>

那时，陆军大学设在湖南风景秀丽的桃源县，蒋百里并没有马上赴任，他继续在武汉呆了一段时间，与各方人士广泛接触，听

取他们对陆大的建议和要求。还是和以往一样，每天的中餐，他总是到万耀煌府上去解决，同时了解前方的战况。到了深夜得空后，他总是一个人来到薛光前的住处，与薛光前聊天。“所聊的，都是他接掌陆大的计划。他要为国家、为领袖，培养一批高级将才，不但富于学术思想，且具备实际经验。学以致用。他知道中国的需要，他更了然于西方先进的军事科学。他要实行，他更求革新。”<sup>⑩</sup>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蒋百里于10月初启程赴任。临行前，他到蒋委员长处接受指示，谈到关于陆军大学在战争时期的教育方向问题，蒋介石提出培养学生“用不着高深的学理，而需要一种态度严肃、精神饱满的军人”，要特别注重“精神之修养”与“武德之锻炼”。<sup>⑪</sup>蒋介石在写给陆军大学的手谕中说道：“有了这样一位名师来指导你们，我很放心很高兴，你们服从他的训示，如同服从我的一样。”<sup>⑫</sup>

陪同蒋百里一起往湖南去的是陶菊隐，他准备经湘省返回上海，蒋百里则计划到湖南后把一直留在香港的夫人接到身边。此时武汉保卫战战事已十分吃紧，日军在华南也是节节推进，广州时刻面临沦陷。根据军部指示，陆军大学在近期亦将内迁到遵义，急需校长到任。由于沿途日军飞机轰炸，火车时断时开，蒋百里等人便乘小车赶往长沙。在敌机不停的轰炸中，蒋百里一行直到下午4点后才抵达鄂南边城通城县，为了赶路，他们连吃饭都不下车，只是简单地吃了点大饼油条。车到长沙时已是万家灯火，刚到事先预订好了的中国银行住下，茶房就告知蒋百里：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留有口信，请百里先生到达后即电话与他联系。蒋百里遵嘱立即去了电话，原来是蒋委员长从汉口打来电报，请张治中主席把蒋百里留在长沙小住一段时间。具体为了什么，张主席也说不清楚。无奈，他们只得住下。

说来也巧，左梅好像知道丈夫近日要来和她团聚似的，她也

到了长沙。在蒋百里到后的第二天，这对患难夫妻在战火纷飞中再次相聚了，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在长沙住了几天，蒋百里天天到张治中处去了解汉口方面的情况，他们都不清楚蒋委员长为何要让蒋百里在长沙驻留。陶菊隐则为蒋百里整理出了几篇训话文稿。

汉口方面的电报终于等到了，原来是蒋委员长向蒋百里咨询外交方针。此时的欧洲局势已发生了新的变化：9月30日，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大行绥靖政策，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签署了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第二天，张伯伦又与希特勒签订了“英德声明”，宣称两国决心以协商解决一切争端，彼此不再进行战争。到了10月6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发表演说称“只有德国同英国达成谅解，欧洲和全世界才能有真正的和平”。面对这种新形势，蒋介石对英国的外交政策有点摸不透了，他急需得到蒋百里等国际问题专家的见解。

蒋百里点着香烟，深吸一口，把蒋介石的电报递给陶菊隐并征求他的意见。陶菊隐认为：“我们现在犯了一个错误，外交进行以英国为最大对象，实则英国已非复世界执牛耳之国，美国和苏联才是最后命运之决定者。……中国与苏联接壤，与美国又有传统的友谊，如果能够自居桥梁的地位，把两个主义不同的国家联系起来，那么民主阵线必能形成，欧战必提早爆发，东西战局必可合流，而轴心国最后之惨败也是命中注定了的。如果仅以英国为重心，忽视美苏两国对世界局势的决定性，希望那个自救不暇的老大帝国揶揄挥拳打了德国又打日本，那是盲人驭瞎马的外交，不但无现实之可能，而且中英两国必被轴心国各个击破。”蒋百里是个极善于听取他人正确意见的人，对陶菊隐的这番分析深表赞成，实际上他对联美联苏早就有考虑。尽管可以说是蒋百里一直在提携陶菊隐这位后学，但他依旧十分客气地对陶菊隐说道：“好，照你的意见写回电。”<sup>②</sup>

在1939年双十节前夕，蒋百里赶到了桃源，正式执掌陆军大学。

陆军大学的办学体制因时而改，根据战时对各种军事人才的需要，在西北和西南设立两个陆大参谋班，分别在西安和桂林举办，这样可以较好地为南北军队输送军事参谋人才。西南班的主任由何成璞担任，西北班的主任由金典戎担任。名义上称为陆大参谋班，实际上就是两所分校，两地的人事、行政和经费等基本上是独立的。根据各战区对军事人才的不同需要，办班的内容也灵活多样，各不相同，比如有属于军令部第三厅的“战斗参谋训练班”、第二厅的“情报参谋训练班”、抽调军校优秀毕业生的“特种参谋训练班”以及从各军中抽调现职参谋进行培训的“参谋训练班第某期”等等。

在陆大第十五期及特三期参谋旅行指导和毕业典礼会上，蒋百里分别作了《参谋官之品格问题》和《“知”与“能”》的训话。在两次训话中，蒋百里广证博引，从姜太公、张良、诸葛亮一直讲到曾国藩、李鸿章。对“参谋”之由来以及参谋官的精神修养、武德锻炼进行了全面论述。他讲到，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参谋官，首先要具备优良的品格，所谓“品”是“不想升官发财，不肯到处钻门子”；所谓“格”是“牺牲自己，以为他人”；参谋人员的地位“全靠高尚的人格去争取，如果只是去找人，以弄钱混饭吃为目的，人们怎样能够重你！我们莫怪人家不尊敬我们，首先要自己尊敬自己。假如你们当司令，看见一个人既有才干，对你又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你们怎能不‘三顾茅庐’去请他，请他出来后，又怎能不信任他尊敬他——所以委员长手谕中所说‘精神的修养’，就是提高品性之‘品’；所说‘武德之锻炼’，就是牺牲自己以为他人的‘格’。”<sup>⑨</sup>关于如何求得学问，蒋百里讲到“品格，就是气骨，气要高，骨要硬，”这是“做人的先决问题”。但谈到做学问，则“心要虚，要平，要低下，脑要柔，要

软。”做学问的基础是“知”和“能”的问题，“不知者不能”。

“知”可分为三个步骤，即从“闻”到“了解”最后发展为“发明”，就是得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能”则是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不要把事情看得太易，一遇到抵抗力就意志颓丧。”“世界上没有难，也没有易，要看抵抗力大不大，自己的‘能’够不够，”

最要的是持续不断”，如同俗语说的“做到老学不了”。<sup>④</sup>训话之后，蒋百里做了个小试验，他让学员们把自己手上的表交给他，一检查，十块表中居然时间相差30分钟。蒋百里语重心长地告诫学员们：30分钟，德国的空军可以毁灭整个捷克！

蒋校长的训话深深印在了每一个学员的脑海中。

在特三期参谋班毕业典礼上，还来了几个特殊“学员”，他们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以及张之江、孙良诚将军等。蒋百里先一天派学员代表去请冯玉祥参加并主持毕业典礼，可冯玉祥说什么也不答应主持毕业典礼，他只愿意以一个学员的身份参加典礼。原来他曾在南京时随陆大跟班听课，后由于“八·一三”淞沪抗战而中断。在毕业典礼上，蒋百里数请冯玉祥上台主持典礼，但“冯玉祥仍然站在学员行列，无论如何也不肯出来，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学员，不能主持大典。百里先生不得已只好请他以同学资格出来报告“带兵、练兵、用兵的经验”，冯玉祥这才上台做了一番演说。<sup>⑤</sup>

一个月后，冯玉祥写文章回忆说：“当天晚上，同学们聚餐，我和百里先生同很少的几个人在一桌，他于是大声喊着，请最年轻的同学过来三位，席间同学们敬他的酒，他都一杯杯地喝下去，我当时就很担心会影响到他的健康，这些事今都历历在目前，谁知道不到一个月，他已离开这世界了。”<sup>⑥</sup>

#### 四、出师未捷身先死

进入10月中旬，武汉、广州均处于日军的炮口之下，岌岌可危，已是孤城难守。特别是日军于10月12日在广东大亚湾强行登陆后，粤汉线已随时都有可能成为日军长驱直入的通道了。蒋介石不得已重新调整了战略，他准备放弃武汉，同时下令各机关一律内迁。

陆军大学接到命令，立即迁往贵州省的遵义一带。蒋百里将迁校任务交给了副手教育长周亚卫负责，他自己则到湖南东安去看望唐生智后，沿湘桂公路南行，一路颠簸。湖南省的公路建设在全国一直都是模范，可现在路面损坏严重，特别是湘桂一段，虽然是战时赶修的，但投入过于节俭而影响到公路质量，现已凹凸不平，几乎快到报废的程度，欲求节约反遭更大的损失。沿途，蒋百里还注意到许多怪现象，如很多汽车满载破旧沙发和家具，不知从哪儿来，也不知要到何方去，其运输所耗的汽油等费用早已远远超过破旧家什的价值。战时物资匮乏，一滴汽油等于一滴血，蒋百里对这种无谓的浪费痛心疾首。

到了桂林，与先期到达的夫人和三个女儿团聚。

此时，广州、武汉均已落入日军手中。桂林是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撤退开始后，这座城市已是人满为患。蒋百里达到时，省政府实在没法安排出较为高档的住所接待，还是一位朋友把他桂林群乐社的两间旅舍让了出来，蒋百里一家勉强住下。群乐社是省政府开办的较为高档的旅馆。

在桂林，蒋百里没有把时间用于参加公共活动，他主要是和旧友新知把茗畅谈。抽空出来，他们全家还游览了桂林山水。只是在10月27日应广西省政府的邀请作了一次公开演讲，演讲的

题目是《半年计划与十年计划》。

蒋百里在演讲中对广西省的工作提出了两条建议：第一，应该针对时间的需要，不必高谈阔论。第二，应该切合本省的环境，不可盲目效仿。他提出的半年计划，是希望广西政要不可做本省财力所达不到的事，诸如“购买六千架飞机”这一类的废话应少说，那些瞎吹一气和好高骛远的空话只能扰乱人意，毫无实际意义。他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进攻比利时首都时，比利时的老百姓纷纷把自己家里的空酒瓶垒到德军要经过的通道上，有效地阻碍了德军的进攻，为本国军队赢得了时间。他说，如果某种工具短时期内可以大量收集或大批制造并且运用得当，就可以发挥相当大效能，这就是他所提出的“半年计划”的含义之所在。有关“十年计划”，蒋百里是希望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应该在科学上有所发明创造，以发展科学为立国之本。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可独立生存，有了科学基础，就不怕没有复兴的机会了。针对国人之中存在的武器落后的悲观论，蒋百里发表了鼓舞士气的演讲，他说：“我们不要悔恨武器不及人家，不能打胜仗。我们从抗战资料中、从敌兵笔记上，均可证明我们的炮程远且准确，除了数量不如人家外，武器方面并不见得比敌人差，所以我觉得还是看运用工具的能力如何？……假若对现有的机关枪、迫击炮、坦克车等物，能够充分利用，对任何原有事物，只要想得出于抗战前途有关，都尽量研究，这于民族复兴的神圣任务上，必大有裨益。”<sup>⑦</sup>

在群乐社，蒋百里又一次和冯玉祥见面了。蒋百里结合他沿途的见闻，对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工作提了许多建议，他说：“广州武汉虽然沦陷了，并不能阻止我们坚持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不过现在对爱惜物力，还做得很不够，譬如在收割稻麦，打稻麦的时候，很多的稻麦粒留在地上。公路凸凹不平，根据车辆，应该花钱修路，让老百姓得点工资，不应该等轮胎坏了，让外国人赚

我们的钱。至于军事方面，不爱惜物力的事情，就更多了，顺便的时候，把这个意见，请你给委员长和各省军政长官多说说。”冯玉祥答道：“你的意思很好，我一定照着办。”<sup>⑨</sup>

在桂林的一个多星期时间里，蒋百里几乎每天都有应酬，每次总是超量烟酒，虽然情绪不错，但时常感到精神疲惫。为此，左梅强劝丈夫到医院去做了一次身体检查，检查结果并没什么大问题，实际上他此时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于是，生性豪放的蒋百里在烟酒方面更加难以节制了，左梅总是要求他少喝酒，最好是戒酒。蒋百里也觉得夫人说的有道理，可一到与人共餐时，若是夫人不在旁边，就无法控制了，特别是他在朋友之中早就留下了善饮的美名，所以难免不过量。有一天，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设宴，蒋百里应邀前往，满座均为故交，于是，又是一番开怀畅饮。宴席散后，蒋百里脸色苍白回到了群乐社，一头倒在床上半天不能动弹。左梅见状，便劝蒋百里在桂林多住些时日，谢绝一切应酬，好好调养。蒋百里着急地说：“我到桂林已经一个多星期了，学员们现在已到达遵义，我一天不到校，心中一天不安，我们还是赶到遵义再说罢！”

第二天，蒋百里坚持上路了，临离开桂林时，蒋百里还应桂林市政筹备处处长庄仲文之请作了关于国事的演讲。针对目前的抗战，蒋百里发表了十点意见：

“（一）兵力当求集合使用，而训练新兵，可仍袭曾文正公办法，以营为单位为较当。军政部只物色适当之师长人才，……每营必集中训练，单位不大，隐蔽亦易，有三个月之训练，自能成强固之个体，易于进退自如。各营训练成功后，集合成师，则全师亦能有坚强之战斗力。孙子所谓‘治众如治寡’也。

（二）目前各省公路，因车辆经过太多，大都崎岖颠簸，致车辆之汽油消耗增加，机件损坏较剧。而汽油机件均为舶来品，应竭力求其经济使用。故各省应增强修路队，即雇佣民工，亦属值

得，以民工所费，仍在国内流通也。

(三) 军事期中，通信频繁，故电报积压，不易疏通，往往数日方能到达。然某人新任或调任，各方仍例致贺电，不但虚靡物力，亦复阻害正当通信，应予以切实取缔。

(四) ……现在车辆不敷，往往有等候数日或一二月，而未能成行者，故各地应尽量利用公路，留以其它交通工具如马车、骡车、人力等分站任运输之责，即组织挑夫队，每五十里为一站，以搬运行李疏散人口亦可。

(五) 有各种新工具、新武器，然发明者不能随时随处指示其使用者，而全恃使用者虚心研求以得之，现在我国部队，对新式武器尚未能使用尽善，而并非武器完全不如敌之锐利。故使用武器之重要，尤甚于有好武器，新工具亦然，此点必要国人彻底明白。

(六) 抗战中不必好高骛远，要若干飞机，若干大炮，若干坦克，方能致胜云云。是则以不能办到之事为言，亟应脚踏实地，将现有物力运用到抗战途上。譬如欧战时，比军曾利用酒瓶以阻碍德骑兵之迅速前进，即是一例。

(七) 有一种科学之发明或特殊成就，较之各门同时并举，而因陋就简者为佳。故建国而提倡科学，应集中人力物力于一门。虽十年二十年而成，仍是经济合算。将来可以吾之特长，以交换他人之特长，……

(八) 湘军每营有夫百六十名，故部队行止自如而迅速，不必扰民。其后承平，而有营官吃夫额之弊，王士珍见其弊，而取消夫额，然北方徭役并重，各县有办徭之机构，尚无问题，南方则向来‘一条鞭’，有赋无徭。故北洋军队到南方必拉夫，致为民诟。而军无辎重，即使攻地而能克，则士兵们之弹药已尽，必不能再事追击，而收战果。

(九) 我国近年建设，因无统盘计划，顾全各方面，故往往因

局部之利而成全局之害，……故各项建设之始，必先研究历史与地理，方免恶果。

（十）抗战以来，名都大邑如北平、南京、广州等处，以为必可坚守者，往往不崇朝而失，而台儿庄、广济、德安等不甚著名之地，反获胜仗。故将来之最大胜利，或将于无意中得之。惟所要有‘战志’，‘战志’即立，再想‘办法’。袁世凯练兵，未尝使兵有战志（对外作战），造成二十余年之内战；国民革命军有战志，而时代潮流与环境未能尽适其意，致有今日之吃亏。今后抗战中，固甚求战志之坚定，而异日议和之后，更当确定军队战志，以备未来的国患。”<sup>⑨</sup>

蒋百里全家一路风尘赶到了柳州。原本想在柳州只休息一天，因蒋和患感冒发烧，就在柳州多住了一天，蒋百里命蒋雍、蒋华和几个随员押行李先走一天。此时，蒋百里的身体已经非常差了，时时怕冷，夜间又冒冷汗。从柳州上路继续向西北，在途中蒋百里突然一阵胸口绞痛，大汗不止，他知道自己病情严重，便吩咐司机，前面遇站即停。左梅紧张坏了，她忙让丈夫平躺在后座上，自己蹲跪在座椅边为他做按摩。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宜山县城，经警察指引他们到了由省政府办的群乐社宜山分社，这是这个山区小县唯一有点规模的旅馆。

往贵州撤退的人流都经过宜山，群乐社内早就人满为患。幸好蒋百里有个学生也住在里面，他把自己的房间让了出来，把老师安置住下。左梅急匆匆请来了县政府的医生为蒋百里注射了一针吗啡镇痛，他便昏然入睡。左梅为丈夫更衣，发现他的羊毛衫都湿透了。

得知蒋百里卧病宜山的消息，每天前来探望的人们络绎不绝，特别是从广州疏散到此的军校第八分校和从浙江内迁来的浙江大学师生，更是轮流前来。蒋百里从前是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书院的高材生，现在又是陆军大学的校长，他们都对蒋百里有着一

殊的感情。蒋百里胸口疼痛好转一点后，双肩及背部痛得厉害，浙江大学的校医周大夫建议为蒋百里注射麻黄素，因为他的一个好友也是肩部疼痛，经过注射麻黄素后痊愈了。麻黄素是治疗风湿疼痛的，蒋百里的疼痛实际上是心脏病的反射，左梅在慌乱中接受了这一建议。注射这种药物后病人应该发汗，可蒋百里注射后却没有出汗。

到11月4日，蒋百里已在宜山住了五天。他的病情渐渐好转起来，便又急于赶往遵义。左梅苦苦相劝，请他在宜山多住些时日，好好休养。可蒋百里一想着远方的学员们就心急如焚，执意要走。上午8点，他让所有滞留在宜山的陆大学员在群乐社集合，专门为他们训话。蒋百里一开场就兴奋起来，他越讲越激动，一直讲到中午12点方才止住。午饭后，蒋百里对爱女蒋和说：“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出外散步消遣。”蒋和连日来为了帮助母亲照料父亲，几乎是衣带不宽，昼夜守护在病榻前，见父亲兴致颇高，就陪同他出门散步。他们在县城街头漫步，蒋百里指着两旁的店铺对女儿说：“你莫看不起这些小店家，他们就是‘中国之魂’，堆砌起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们卖的都是老百姓的必需品。”正说着，迎面遇见了浙江大学的周大夫，蒋百里向他表示了谢意，并请他引路到浙江大学去拜访。在浙江大学，蒋百里和竺可桢校长谈了一个多小时。

从浙江大学回来已快下午2点钟了，稍稍休息后，浙江大学的教育长又登门拜访，蒋百里和他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还是左梅担心蒋百里的身体吃不消，以要开餐为由，中止了他们的谈话。晚餐是鸡蛋面条，蒋百里似乎胃口很好，他吃了一大碗。吃罢晚餐，蒋百里浴后上床，他对左梅说道：“我今天一切都舒适！”

刚睡下不久，就有人敲门，原来是陆军大学教育长周亚卫，他是刚到宜山，听说蒋校长下榻群乐社，便连忙赶过来汇报学校近况。蒋百里想起床下地，左梅连连阻拦，让他就坐在床上谈话。周

亚卫汇报情况后告诉蒋百里，沿途有土匪放冷枪。左梅一听便借口路上不安定，要等几天再动身。蒋百里漫不经心但口气坚决地说：“不见得土匪就向我们开枪，我想决定明天走，不要随时变更，就是有危险，明天也得走。”不到8点，周亚卫告辞，因为第二天要赶路，他们一家便早早睡下，临就寝，左梅还为丈夫做了一会儿按摩。

晚上9点50分，左梅一觉醒来，就听得蒋百里痰声咯咯，便喊了几声，却不见有回应。左梅大惊，翻身起来就猛摇他的胳膊，但蒋百里毫无反应。左梅高声叫道：“小五，快拿手电筒来，看你的爸爸怎样了！”蒋和过来后，左梅翻开蒋百里的眼皮一照，只见瞳孔已经扩大，她知道已经无可救药了！

蒋和大声呼喊“爸爸！爸爸！”但毫无反应，她立即冲出门去请浙江大学的周大夫。周大夫和蒋和两人在黑夜里跌跌撞撞赶到群乐社时，已是晚上11点50分了。他为蒋百里注射了一针强心针，希望能有奇迹出现，但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周大夫声音低沉地告诉左梅说：“蒋先生已经走了，他患的是心脏麻痹症，我早来了也救不了他。”<sup>②</sup>

1938年11月4日，年仅57岁的蒋百里那颗火热的爱国之心永远地停止了跳动。

蒋委员长于5日发出唁电，《中央日报》、《申报》、《文汇报》等各大报纸都刊登了蒋百里病逝的消息并编发了蒋百里的生平。蒋百里病逝宜山的噩耗迅速传遍全国，举国上下一片悲泣。国民政府迅速派员赶至宜山举办蒋百里的丧葬事宜，陆军大学方面由办公厅主任赵墨浓负责具体事务。

战时的宜山什么都缺乏，县政府的官员四处搜寻也难找到一口像样的棺木，还是蒋百里的一位宜山籍的学生把为老母亲预备的一口棺木让了出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宜山县党部大礼堂停灵期间，驻宜山的各界均前往吊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派

黄琪翔将军为代表于14日赶至宜山，出席追悼会。15日，俭朴而又隆重的追悼会后，蒋百里被下葬在宜山鹤岭。除了蒋英远在欧洲无法赶到，左梅携蒋雍、蒋华、蒋和以及蒋百里的侄子蒋复璁等亲人为蒋百里最后送行。1948年冬，蒋百里的生前好友竺可桢、陈仪及蒋复璁等将蒋百里的灵柩从广西迁回杭州，由浙江省政府公葬于杭州万松岭。解放后，经取得左梅的同意，改葬于杭州南山公墓，一代英魂终归故里。

蒋百里去世之后，亲朋好友纷纷撰文赋诗纪念他。其中蒋百里的弱冠同学高子白写有《哭蒋百里同学》七律四首，第三首诗云：

松坡早谢韵松亡，  
黯黯同侪欲息芒；  
驱狄方期峰井伯，  
挥戈忽丧鲁灵光。

才闻汉节旋殊域，  
遽报箕星邸鬼方；  
寂寞宜州山下月，  
只应黄九与参行。<sup>51</sup>

被国人吟诵的最多的悼诗是张闻声作的七律《哭百里诗》。诗云：

白头离乱聚南荒，  
三日分襟各慨慷；  
磨蹶半生悲往命，  
黄花晚节盼青香。

霄深急病难求药。

地僻医迟未处方  
如此人才如此死  
旅魂凄绝鹤山傍

1939年3月23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国民政府褒扬蒋方震令》，追授蒋百里为陆军上将，令称：“军事委员会顾问兼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蒋方震，精研兵法，著述宏富。比年人参戎幕，诃谟肇划，多所匡扶。方冀培育英才，用纾国难，不幸积劳病逝，轸悼良深。应予特令褒扬，追赠陆军上将，发给治丧费用五千元，交军事委员会依例议恤，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政府眷念耆贤之至意。此令。”<sup>⑤</sup>

蒋百里的不幸病逝，使蒋介石十分震惊，在此以前他从未得到过蒋百里身体有病的消息。在武汉时期，他们俩几乎天天都要见面，每次见面蒋百里总是精神百倍，根本不像是已有沉疾缠身的人，可没想到离开武汉仅一个来月，这位壮志冲天的将军就长辞人世。回想近二十年来的交往，蒋介石激动不已，他振笔写下了高度评价蒋百里的祭文：

秋杜怀贤	鼓鞞思将	中道折衡	安危孰仗
先生于学	独运匠心	大川孤航	空绝依傍
兵甲罗维	罔测涯量	千载孙吴	颜行儆抗
巨霆震聩	厉砭时尚	谗言起废	懦夫克壮
惠其绪余	犹为世饷	国有先生	实伊天颀
世运方棘	横流待障	念我良执	交期直谅
曩共艰危	在险弥亮	兹参维幄	诃谟晓畅
萃萃群英	陶钧是量	如何征路	遽婴痲痺
军国拳拳	逮于属纆	呜呼哀哉	云山凄怆
江流潏潏	追念平生	云胡可忘	金铁有摧
名德岂丧	化身千亿	尚克予相	申词荐悲
临风快怅	呜呼哀哉	尚飨 <sup>⑥</sup>	

## 五、和美家庭

蒋百里的家庭生活是十分幸福美满的，尽管他膝下无子，但蒋百里在这个问题上早已摆脱了中国的封建传统观念，这与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和德国有很大的关系。若不是长女早夭，那将是更加完美。

左梅并不是蒋百里的原配。蒋百里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封建时代的产物。在他8岁那年，蒋百里在别人的私塾伴读，被查芸生先生看中，登门提亲，把次女许配蒋百里，做了一门子娃娃亲。蒋百里留学日本后，母亲孤灯残烛，不知儿子何时可归，便托人告诉查家：查家女子年岁渐长，而百里不知归期，请查家不必固守旧约。可查小姐力持从一之议，不愿毁约。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蒋百里从日本学成归国，回到硃石镇后，蒋百里按父母媒约与并没有多少接触和了解的查小姐成婚。婚后，查夫人久无生育。蒋百里后来与左梅结成美满姻缘后，一连生了两个女儿，望孙心切的蒋母又命蒋百里将她的义女王若梅纳为妾室，但王氏亦无生育。<sup>67</sup>

实际上并不是查氏、王氏没有生育能力，关键是蒋百里对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的反感，年轻而又孝敬母亲的他当时也无所适从，所以他完婚后不久就赴东北而去，留下了不愿离开家乡的查夫人独守空房。这种婚姻对蒋百里来说是一种不幸，对查夫人和王氏女子来说更是一种悲哀。这不是蒋百里个人的责任，而是封建时代常见的一种现象。

和左梅的浪漫结合才是蒋百里人生最为得意的选择，他们的爱情故事已成为民国史上的一段佳话。

左梅是个极重情感而又极具正义感的人，当初，她毅然离开

父母、远离祖国日本来到中国，与一个异国男子结合，这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才能做到的。但她是个独立性极强的女子，从她年纪轻轻即跨海来到中国、承担日本驻华公使馆所有人员及220名驻军的医护工作，就可看出其独立与坚强的一面。她与蒋百里结合共同走过了24年的风风雨雨，这24年间，大富大贵从没有过，岁岁载载含辛茹苦，坚强的左梅挺过了无数个难关。到蒋百里被委任为陆军大学的代理校长、人们刚开始为他们夫妇庆贺时，可没料到苍天无眼，让蒋百里在动荡之中魂绝宜山。

自从嫁到中国，左梅就深深爱上了这块满是伤痕的土地，尽管还有种种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她始终相信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坚强不屈的民族性格定能使这个古老的国度焕发青春，她的这种感受大多来自她那位具有强烈爱国心的丈夫身上。历史的演变，无情地把她推到了民族矛盾中去。作为蒋百里夫人，她曾无数次受到礼遇；作为日本人，她也曾无数次被猜疑、受冷落，但左梅以她的正义和真诚最终还是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左梅义愤填膺地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她把自己的首饰等私人物品全都捐献出来支援抗战，她带头并且发动身边及周围的人为前线制作战时必需品，她以全身心的爱支持丈夫从事抗战活动。总之，左梅的正义之举早已抛弃了日本人当时所表现出的狭隘民族主义，让国人理解了她宽阔的胸怀。

左梅从不过问丈夫的公务，特别是涉及政治敏感之处，总是尽可能地回避，即便偶尔了解一些情况，也绝对是守口如瓶。当年蔡锷在日本治病时，左梅和蒋百里在左右服侍，不知有多少日本记者欲从她口中了解情况，但他们全都吃了闭门羹。蒋百里访欧回到武汉后，左梅一直留居香港，他曾多次电请夫人赴武汉团聚，但左梅就是不肯，她担心因为她的日本籍身份会给丈夫带来负面影响。蒋百里甚至写信说：“哪个不知道我有东洋太太，你来了何害于我？”但左梅终究没有到武汉。

左梅住在香港时，日本间谍和新闻记者千方百计要和她见面，其目的就是刺探蒋百里的消息，套取中国抗战的军事情报；还有不少悲观厌战派想拉拢左梅，让她参与共同发出中日和谈的喧嚣。左梅不可能与各色人等针锋相对，她采取了不与接触的办法，“每天闭门家居，不敢出外散步，怕在半路上撞见了日本人引起无端的麻烦。”但她从来都是立场坚定，“自七七后她的心境比任何人为苦。她的父亲早已谢世，在故国还有母亲和妹妹几个亲人。她离开上海时写最后一封信给她的母亲，叫她以后不要写信来，八年战争她一直不知道她母妹的存亡消息，直到战后重回上海，她才间接听得说她母亲已在乱离中逝世，但她至今仍未与乃妹通信，她说她要等日本和约签订后才能写信到日本”。<sup>④</sup>

宜山葬夫之后，左梅忍着巨大的悲哀带着几个尚未成年的女儿，冒着敌机的轰炸，克服旅途劳累，经贵阳抵达昆明，在青云街暂时定居。失去蒋百里后的左梅既要教养女儿，又得想方设法谋取生活，一家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她节衣缩食，让蒋雍进了西南联大、蒋华进了云南大学学习。

没有了蒋百里的庇护，左梅和女儿们如同当年蒋百里被丢进监狱时一样，时常窘困到举步维艰的境况。生活上的困苦倒是可以用意志上的坚强战胜，但意志开始被他人所怀疑，这种痛苦则就是无法言喻的了。在昆明，左梅一家特别是左梅总是受到人们的歧视，许多并不了解左梅的中国百姓对凡是有着日本印记的人和事都十分憎恨，对日本籍的左梅自然是冷酷、厌恶，女儿们也常常遭到伙伴们的孤立和排斥。

在联大和云南大学学习了两年后，蒋雍、蒋华姐妹先后在学校肄业，随即在蒋百里的生前好友原南京总主教于斌博士及毛振羽神父的帮助下争取到了留美奖学金，保送到美国学习。于斌总主教曾于1937年在意大利帮助蒋百里开展外交，两人朝夕相处，相交甚密。毛振羽神父则于1947年在上海为左梅进行了皈依基督

教的洗礼。蒋英依然在德国专攻音乐。教育部长陈立夫十分推崇蒋百里的学识，他曾撰文对蒋百里的去世深表哀惋，见左梅生活艰辛，他主动以教育部的名义承担了蒋英在德国学习的费用，使蒋英得以继续完成她的学业。

1941年，左梅送走蒋雍、蒋华后，携蒋和从昆明迁居到重庆郊区，盖了座茅屋，聊蔽风雨。由于国民军事委员会发了一笔抚恤金，左梅得以维持生活并供给几个女儿的读书经费，蒋和也进了中央大学学习。薛光前当时在交通部出任简任秘书兼川湘、川陕水陆运输管理处处长，为了帮助左梅夫人，他在其下属的嘉陵江运输处为左梅挂了个名。这样一来，左梅每月就可领取一份固定的薪金，钱虽然不多，但可以配给平价米、煤、布等，有了这些，日子好过了许多。

蒋百里逝世后的两个多月里，陆军大学一直没有校长。到1939年初，国民军事委员会任命万耀煌到遵义接掌陆军大学教务。其时，蒋百里代校长的英名早已在社会上为人们所传颂，万耀煌非常谦逊地把自己的职务定命为“教育长”。万教育长到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陆大迁至首都重庆，经过一年的努力，1940年陆大正则班第十七期开始在重庆校舍招生。为了纪念蒋百里，左梅决定把蒋百里生前藏书捐献给陆军大学，这些书以德文书籍居多，内容包括政治、军事、文学、哲学、等等各个方面，由陆大派员从贵阳运回。随即，万耀煌教育长在陆大设立了“百里图书室”。之后不久，图书室经扩充藏书后更名为“百里图书馆”，开馆仪式特将左梅请至启钥。

蒋百里两任军校校长，培养出许多军事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同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他的关心和支持还造就出了一位后来在世界军事发展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核武器专家：他就是举世闻名的军事科学家钱学森，1946年他与蒋英结为夫妇，成为蒋百里的女婿。蒋百里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甫在18岁时成为好朋友，

多年来一直交往密切。钱学森于1931年前后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系，随即公费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航空工程学并获得硕士学位。1936年，他准备到加州大学深造航空理论学。从应用工程改习基础理论，由此引发了钱氏父子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

钱老先生强烈反对儿子的选择，他写信训斥钱学森：“重理论而轻实际，多议论而乏行动，是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国家已到了祸燃眉睫的最后关头了，你不好好儿在航空工程上继续研究，却要改头换面而走上理论的途径，你见识太浅，而且太见异思迁了。”对于如此这般指责，钱学森自然不会接受，他远隔重洋与父亲展开了笔战。

当他们父子展开笔战时，蒋百里正在横渡大西洋前往访美的途中。蒋百里抵达美国后，钱学森专程赴纽约拜见了蒋伯伯，向他报告了自己在美国学习的情况以及他所作的新的选择，并请他回国后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蒋百里对钱学森的选择表示了赞许。他从美国回来后，钱均甫立即去拜访了老朋友，一是向他探询儿子在美国的情况，二是征求他对钱学森改习航空理论的意见。蒋百里对老朋友作了一番开导：“你儿子改习航空理论是对的，因为美国和德国的航空理论的新趋势是工程与理论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而且美国是一个富强的国家，中国是一个贫弱的国家，美国造一架飞机，如果有新的理论发现，可以马上拆下来加以改造，中国就没有这样大的气魄，因此中国人学习航空工程就更应该在理论上下功夫。”钱均甫历来就佩服蒋百里的学问，经他这么一解释，顿时恍然大悟，他立即复信大洋彼岸，同意了儿子的选择。<sup>54</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一直在德国学习音乐的蒋英开始了她最为艰苦的生活，由于德国承认了南京伪政权，中国宣布与德国断交，蒋英便转到瑞士继续她的学业。直到战后，她才得以离开欧洲，转道英国赴美。此时钱学森在美国的事业已取得相

当大的成就，他先在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41年被加州大学聘为副教授，蒋英赴美时，他已返回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授。在美国，钱学森和蒋英这对地造天成的一双很快坠入人情网。1946年，他们在上海共结百年之好。左梅对这对新人极为满意，唯一堪惜的是蒋百里在1937年以后就没能再见到爱女蒋英，更没能看到加州大学的高材生成为自己的女婿。

新婚不久，蒋英夫妇告别了住在富国门路的母亲和小妹，返回美国。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毅然回归祖国大陆，在国内外引起轰动。这对教授夫妇，在新中国的科学领域和音乐艺术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他们正好实现了蒋百里未尽的宿愿。

1949年，蒋介石政权覆灭后，左梅和蒋和留在了大陆，之后她一直随三女蒋英、五女蒋和居住在北京。蒋雍在美国与广西籍留美工程师黄力富组成家庭，定居美国。蒋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与外交界名士湖北人魏宸组之子魏需卜结婚，不久便旅居比利时。1978年，左梅仙逝于北京，享年88岁。

蒋百里逝世后，一直团聚和睦的家庭也各处四方，竟然数十年不得相聚，真可谓人世沧桑，天地难测。

#### 注释：

①蒋百里：《外交烟幕与宣传者自己中毒》，载《蒋百里抗战论集》。

②④张禾草：《蒋百里随员日记》。

③蒋百里：《为国联开会敬告英伦人士》，载《蒋百里抗战论集》。

⑤程晓华：《外交军事经济》，载《蒋百里抗战论集》。关于蒋百里先生此次演讲，程晓华曾专门著有《外交军事经济》一文，后又在《蒋百里先生印象记》文章中再次论及。前者记述演讲时间是“二十六年九月一日的八时一刻，汉口总商会大礼堂”。而后者及张禾草的日记中所记述的演讲时间均是在1938年9月，且日记的准确时间是9月12日，显然《外交军事经济》一文在时间记述上属于笔误或是印刷错误。

⑩蒋百里病逝后，万耀煌接任，他更是不敢掠美称“代理校长”，而改称“教育长”，“代理校长”则成了蒋百里的尊称。

⑪黄萍荪：《与蒋百里一席谈》。

⑫⑬薛光前：《蒋百里先生的晚年》（续完）。

⑭李永久：《记兵学大师蒋百里》。

⑮甘介侯：《悼蒋百里先生》，载《蒋百里抗战论集》。

⑯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237~238页。

⑰⑱蒋百里：《参谋官之品格问题》、《“知”与“能”》，载黄萍荪编选《蒋百里先生文选》，浙江金华，新阵地图书社，1939年10月版。

⑲金典戎：《军学泰斗蒋百里外传》。

⑳㉑冯玉祥：《我与蒋百里先生》，载《蒋百里先生文选》。

㉒蒋百里：《半年计划与十年计划》，载《蒋百里先生文选》。

㉓庄仲文：《蒋百里先生的最后意见》，载重庆《大公报》1938年12月10日。

㉔以上参见李吾：《蒋百里先生的生平》（十四）、金典戎：《军学泰斗蒋百里外传》、蒋复璁：《先百里叔逝世追记》等。

㉕子白：《哭蒋百里同学七律四首》，载《蒋百里抗战论集》。

㉖张闾声：《哭百里诗》，载《革命人物志》第12集，第476页。

㉗唐祖培：《蒋方震》，载《革命人物志》第12集，第458页。

㉘载黄萍荪、张丕卓合编《蒋百里抗战论集》，1939年4月版。

㉙张宗祥：《述蒋君百里》，载《蒋百里抗战论集》。

㉚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220页。

㉛万耀煌：《关于蒋百里先生逝世前后之补述》，台湾《传记文学》第17卷第4期，转引自《蒋百里传记资料》（二）。

㉜王康：《蒋百里有婿不肖》，台湾《中外杂志》第5卷第3期。

## 第十三章 军事思想

蒋百里的一生，命运多劫，以他的学识和能力，他本应该成为近代中国军事史上最为杰出的军事学家。但从清朝道光以来，一直到蒋百里去世，外患不已、内难不止，坎坷多灾的时代没有给他、也没有给任何一个胸怀雄才伟略的中国人自由施展抱负的机会和环境。对于蒋百里个人来说，政治上的单纯（或者说，是他个人性格上的天真）又往往使他和稍纵即逝的机遇失之交臂。从袁世凯、段祺瑞到吴佩孚、孙传芳，再到蒋介石，数十年的时间里，政治枭雄们的奸诈阴毒，使蒋百里徒有报国心，空怀屠龙技。

尽管如此，蒋百里仍然不改痴心，矢志报国。几十年来，他尽可能地把他在国外留学所学到的军事知识以及他殚思竭虑之所得奉献给祖国，为民族的强大、抵御外侮做出了他可能做到的贡献。纵观蒋百里的一生，他的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集中反映在两个时期：第一段时期是在辛亥革命前后到北伐战争结束；第二段时期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直至1938年去世。蒋百里一生勤奋写作，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著作和文章，在众多论著中，尤以军事方面的论著斐声中外。他先后撰写了《孙子新释》、《孙子浅释》、《军事常识》、《裁兵计划书》、《国防论》、《从中国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之基本原则》、《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中国之新生命》、《战斗与生活一致》、《总动员纲领》、《以政治控制军事》、《中国五十年军事变迁史》等著作和文章，在这些论著中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他各个时期的军事思想。

## 一、辛亥革命前后到北伐战争

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蒋百里投身到了东北国防建设第一线，他满怀壮志和希望欲大展宏图，但为张作霖、张勋等旧式军人所害，以致无功而返。从德国留学回国后，他的视野更加开阔，学习世界军事强国的军事理论和思想所获更丰，他继续回到东北再行实施建设国防及建立新式军队的计划。但由于国内政局骤变，辛亥革命的爆发、清王朝的覆灭给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带来了一线曙光，蒋百里的工作却暂时中止。

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取，蒋百里、蔡锷等一批胸怀真才实学的军事干才成了袁世凯装点门面的摆饰，蒋百里执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为他自1906从日本归国以来前后六年间最为实在的一次军事实践。可惜的是这次颇见成效的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实践只维持了短短的半年时间，就在北洋军阀党派斗争当中以蒋百里自戕而告终。在随后的时间里，蒋百里落入迷茫困惑之境，特别是他的好友蔡锷英年早逝之后，他在政治思想、学术研究方面与既是师长又是盟友的梁启超联系紧密。受梁启超的影响，蒋百里一度脱离了军界，转而研究学术，进而在思想学术界留下了一笔重彩，这是许多人所未料及之事。

同时也得感谢梁启超，他负责组织的欧洲考察团给了蒋百里这个军事学家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使他得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不久就能全方位地考察欧洲战场，让他及时地了解和掌握世界军事的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仅这一点，就足可让蒋百里在国内军事思想和理论方面站在先进者的行列。尽管一度脱离了军界，但蒋百里极富洞察力的眼睛始终盯着军事领域，因而，他仍旧有优秀的军事论著问世。

军阀混战时期，蒋百里满怀希望和热情曾帮助过吴佩孚和孙传芳，作为吴、孙聘请的参谋官，蒋百里的确是尽心尽职。他以对时事的准确判断和对未来形势的精确分析，为两位刚愎自用的军阀巨头设计了非常光明的前景，指出了唯一正确的出路：联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共同对付北方奉系军阀，自觉地把原来占地为王的军队投向革命的洪流。但军阀之所以是军阀，就是由其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恶劣特点所决定的，所以蒋百里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天真之所在。政治上的分歧、军事上的不可同谋，使蒋百里主动离开了他们，他剩下来所能做的就是亲眼目睹两位骑着瞎马的盲人一步一步走向悬崖，然后轰然掉进历史的深渊。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蒋百里失掉了展现他的军事才华的最好时机。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席卷大江南北，但代表中国时代进步潮流的这场政治、军事运动中我们没有看到蒋百里的身影，这不能不说是蒋百里人生中的一大憾事！

在这一阶段，蒋百里的军事思想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在辛亥革命以前，蒋百里曾两次到东北，在东北三省总督赵尔巽的幕府肩负训练新军、建设国防的重任。关于国防建设，蒋百里根据近数十年来东北地区饱受俄、日等列强侵略的现状，提出东北的国防建设应以俄国和日本为假想敌，有关工作要围绕如何抵御可能发生的俄、日入侵来开展。他认为东北应有一批知己知彼的军事人才，为此，他还准备安排李华英到俄国去考察国情军情。总之，蒋百里为制定东北国防建设计划做了许多基础工作。对训练军队，蒋百里十分反感由绿林招抚过来的旧式军队。他认为他们缺乏现代军事理论，纪律散漫，根本不具备担任东北国防任务的能力。蒋百里决定在东北培养出一支按现代军事思想组建、训练的新式军队，使之切实担负起保卫国防第一线的重任。在编练新军的时候，蒋百里基本上是原样照搬了他在日本、德国所见到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当时在东北军中有许多日本留学归来

的士官生如蓝天蔚、张孝准、宁调元等皆支持蒋百里的练军工作，但蒋百里遭到了以张勋、张作霖等为首的旧式军人的反对和仇视。在矛盾重重之中，蒋百里训练军队的工作基本没取得什么成果。

(二) 离开保定后，蒋百里又回到了北京，闲淡度日之时，他于1913年撰写了《孙子浅释》一书，逐期在《庸言》杂志上发表，这是蒋百里首次尝试把中西军事思想结合介绍给国内。蒋百里留学日本、德国期间，遍读中西军事论著，特别是在德国，他曾读到过德文本的《孙子》一书。他认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源远流宏大，即使拿破仑、毛奇等西方军事家的著作也不能超出。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当将祖先遗传的瑰宝加以发扬光大，蒋百里结合近代西方优秀的军事理论如《战略论》、《大战学理》等对《孙子》进行了注释。

《孙子浅释》全部用德国近代资产阶级军事学家的名著进行逐句逐段的解释，如克劳塞维茨的《大战学理》、毛奇将军的《普法战史》、伯庐麦将军的《战略论》等，同时还加以蒋百里个人的一些论述。这本书实际上是蒋百里在向国人介绍德国近代军事思想。全书共分五段：“第一段述战争之定义，第二段述建军之原则，第三段述开战前之准备，第四段述战略战术之要纲，第五段结论胜负之故”。<sup>①</sup>

蒋百里自己对此书的评价颇高，在1937年他结集各时期的论著出版的《国防论》中，称《孙子浅释》是“中国国防论之始祖”。

(三)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清朝末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事集团在编练新军、引进东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教育方式的基础上创办的，这所大型的正规化军事学校既有浓郁的旧军色彩，又受着辛亥革命新思潮的冲击。比如，军事教育沿袭了清末学堂式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但军校同时又聘请留学归来的士官生进行新式教学，把日本等军事强国的先进军事思想送进了课堂。蒋百

里担任校长之时，军校的教学已基本停止，教官懒于教，学生怠于学。因而，他对军校各个方面的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在视事前后半年的时间里，他主要依照德国、日本两国军校的教学成规，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实施西式教育。从学生的服饰饮食到教学内容、师资力量直至军人修养、武德教育，蒋百里都亲自过问。首先，他提出要借军事教育发扬尚武精神，主张改变过去小站练兵的办法，采用德国的军事教育方法，不用日本的教育方法；其次，改革学校编制和课程设置，编制上多仿德国军校的制度，在课程设置上则比照德、日两国的设置进行编排；第三，在师资力量方面重视资历、学识和能力，原有教官和队长中资历不足、学识浅薄、能力较差者全都撤换，聘请了一批接受过先进军事技术训练和理论教育的德、日留学生出任教官和队长；第四，精神教育与学术教育并重，强调学员首先应该具备一个军人起码的修养，借鉴日本之武士道精神，刻意追求在思想意识上对学生灌输“中国之武士道”精神。尽管蒋百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阻碍，但他还是坚持完整地实施了近半年时间，并且使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为该学校的教育跟上时代的步伐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保定的军事活动，蒋百里主要是模仿德、日军制，介绍西方军事思想。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蒋百里远远不可能达到有选择地吸收西方先进军事思想、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自由王国，因而其军事举措多有生搬硬套之感。

（四）作为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先进分子，蒋百里在离开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的一段时期里，与蔡锷在一起大量地宣传介绍德国、日本等军事强国的军事理论。他有感于当时中国的军事理论动辄论以“曾胡治兵”，十分落后，便在蔡锷的帮助下，经过对国家军事方面的系统研究，著成《军事常识》一书。蒋百里在这本书中详细论述了战争的基本理论、武器与兵力的关系、兵

役制度、军队编制、教育与训练、管理等基本军事问题，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改革民国军队、加强国防建设的主张和设想。《军事常识》成为民国初年兵书中的一部杰作，流传甚广，社会影响深远。它是蒋百里先后两次留学又经过在国内一系列实践后，对个人军事思想的一次总结。

这一时期，蒋百里的军事思想和主张重点为：建设国防，“必须先设想一个预想敌”，“先求敌而后练兵者，其兵强；先练兵而后求敌者，其兵弱。”认为战争是“政略冲突之结果”；主张学习西方的义务兵役制，征兵工作要做到五点“一曰征之能来，二曰来之能教，三曰教之能归，四曰归之能安，五曰临战焉，一令之下，应声而即至。”这样才能达到“既欲其精，又欲其多”的目的；在军事教育方面，认为“人也，器也，军也，国也，各有其个体，其形式上之一致，则编制之责也，其精神上之一致，则教育之责也。”据此，应大力提倡进行军事国民教育，应体现人与器合、兵与兵合、军与军合、军与国合等原则。<sup>④</sup>他的这些主张给清末民初的军事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对中西军事思想的融合，作了初步尝试。

（五）五四运动前夕，蒋百里随梁启超远赴欧洲，较为全面地考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进一步接触到了世界军事发展的新动向。这次考察给他的思想带来了一个转折，在随后的几年间，他比较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现阶段军国主义和军阀的走势，提出了一套完整的裁兵计划和国家军队建设的方案。

首先，蒋百里从过去崇尚军国主义转而反对军阀和军国主义。他于1920年至1922年间，在《改造》杂志上先后发表了《军国主义之衰亡与中国》、《中国之新生命》、《代军阀而兴者谁》、《裁兵计划书》等一系列反映他的军事主张的文章。他在《德国战败之诸因》一文中明确指出：“兵之为物也，有极端性，未有不求战而其兵可强者，亦未有兵既强而不求战者。”“军阀之为政，以刚

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sup>④</sup>蒋百里在一系列文章中多次提出了要打倒军阀，他甚至为军阀设计了灭亡的三个步骤：“军阀之末路，亦有可以预言者焉：中央无钱，军队之不得地盘者，即不能存在。是为第一步，是曰掘根。得地盘矣，各有其利害，各不相谋，各尽力于自保，抑或因而相攻焉。是为第二步，是曰分枝。根去而枝分，于是各地方人自为战，则其势乃如振落，是为第三步。”<sup>④</sup>

第二，鉴于连年内战，国人困苦不堪，在国内“废督裁兵”的呼声中，蒋百里推出了他的《裁兵计划书》，这本书全面论述了裁兵的各个方面，恰中广大民众的心坎，令广大读者拍手称快。

在导言中，蒋百里论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裁兵与长官（兵祸之症结何在？）、裁兵与兵卒（裁兵之要旨何在？）、裁兵与国防（裁兵后如何自卫？）、裁兵与国民（谁为裁兵者？）。这四个问题的提出和展开，反映了蒋百里的深思熟虑，也切中了赞成和反对裁兵的两派所共同关心的问题。随后，蒋百里从军队军官职位编制、士兵退伍计划、军费开支、武器整理以及裁兵后国家军事机构组织等方面全面论述了裁兵计划，并且提出了一个新的国家军事机构组织编制方案，这个方案强调了控制高级军官人数、机构简练而精干、运转高效等。

在裁兵与国防中，蒋百里提出裁兵要具备三个条件：“一、使国内永久不发生或真或伪之军阀。二、军费依现在财政状态，至大限不能过预算三分之一。三、于一定时期中得于一定作战区域内集合曾受教育而较优势之军队。”<sup>⑤</sup>蒋百里认为，要达到这三个条件，就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义务兵役制。他的观点是：国家在平时并不需要养庞大的军队，只要能够警戒边疆、正常训练、保护海上商业就足够了，国内治安由警察负责，不应由军队担任。这样，国防费用用于维持军队的开支就会大大减少，把节省下来的资金投入其它建设，国家经济将会得到改善。

蒋百里指出，现在世界各国的兵役制度大部分都采用义务兵役制，可分为征兵制和民兵制。他提出中国应该学习瑞士的民兵制，把军事与民事融为一体，战时为军，和平时则为民，兵民合一。蒋百里制定了国家的军队建设纲领：“一建制之主义，以自卫为根本原则。绝对排斥侵略主义。二建制之原则，建设区域之单位宜多，而各单位内之兵力（平时）宜少。三建设之顺序，以京汉铁路以西为总根据，逐渐东进以求设备完全。”

他提出了国家军队的组建和编制方案：军队由三种组成，第一是“干队”，“以十八万乃至二十万为最大限”。其任务“（一）为战时军队编成之骨干。（二）为平时国民军事教育之机关”。“全国设百二十个军事区，为国防之据点。每区以步兵千二百人为干而准，酌地势附以特种兵”。第二是“正规军或曰国民军”，“以战时得员百五十万人度。用义务制。……凡在军事范围以内之人民，负有兵役义务”，“兵役义务为十二年，自二十几岁起至三十二岁止”，“服役义务为两年，每年三个月，共六个月”，“此项正规兵，以十年间完成，每年应征集十六万人。第二年终之在营最大给养额为三十二万人。服役时期中，仍给月饷，月约三元。被服粮食由公给”。第三“义勇兵”，“人数不定，即凡中学校毕业曾受军事教育者，战时得自以志愿呈请本区司令部，服特种勤务。”<sup>⑧</sup>

在这一段时期，蒋百里的军事思想从介绍、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开始，到逐步将这些理论用于军事实践之中，然后不断总结、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作为一个军事学家，蒋百里自觉地把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用于为政治、为国家服务之中。但他不是献媚于少数封建专制主义者，为他们坐稳权位服务，而是以满腔爱国热忱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强盛而尽自己微薄的力量。他的许多主张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主流、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呼声，这一点也正是他能够成为社会所公认的军事理论家的重要因素。

## 二、全面抗战时期

由于唐生智愤然起兵掀起了反对蒋介石的大旗，连带蒋百里被投进监狱。当他回到上海温暖的家中后不久，日本侵略者的隆隆炮声震惊了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也把蒋百里从心灰意冷的淡泊梦中催醒。他开始更加勤奋地研究军事，并从纯粹的理论研究转向符合国情的具有可实施性的应用研究中来。一·二八抗战之后，他对国防经济建设工作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规划，提出了许多经济建设方案，这些建设方案的出发点就是增强国防实力，应付日本人对中国的全面入侵。到1938年蒋百里去世前的短短几年中，蒋百里写了大量建设论著，一方面向国人介绍军事知识，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外族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

蒋百里在第二段时期的军事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其具体形成过程是产生于蒋百里的三次出国访问，这三次出访时间是1934年、1935年和1937年。

1932年以后的几年，蒋百里在国家的政治军事舞台上并没有充任什么角色，经朋友推荐，他担任了农商银行的常务董事。在银行工作时期，除了日常事务外，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国防与经济的关系方面。1934年，农商银行出于业务的要求，出资请蒋百里以私人身份出访日本进行考察。此时的日本军国主义狂热已经达到顶点，战争狂人们正在极力鼓吹发动侵华战争。蒋百里在日本会晤了一些早年同在一校学习的日籍士官生同学，其中就有臭名昭著的战犯荒木贞夫、小矶国昭等人。从他们趾高气扬、毫无遮掩的战争狂言中，蒋百里知道中日战争已不可避免。回国后，蒋百里潜心研究加强国防建设的方法和步骤问题，他认为当今的中

国唯一能做的就是扎牢篱笆，拒豺狼于国门之外。

蒋百里分析，如果中日战争一旦打起来，对于敌我双方来说都绝对不是速战速决的战争，必定会形成持久战。对比中日双方的军事实力，他料定津浦路、京汉路及东部沿海大片国土将不可能守住，中国的国防将以洛阳、襄阳、衡阳“三阳”为防守线。中国战时大本营应设在湖南芷江、洪江一带，两江一带森林、矿产和河流密布，是天然的防守地带。从这一战略来考虑，蒋百里认为中国国防工业布局应以湖南南岳为中心，分布于株州至郴州之间。为此，蒋百里向南京政府实业部提交了一份意见书，希冀对实业部的煤钢计划有所影响。他在计划书中写到：“设厂地点，其初步小型工厂可设于安徽之马鞍山，大冶的铁和淮南的煤，运起来都很便利。一旦对外作战，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大型工厂宜设于株州以南、郴州以北，而萍乡的煤，宁乡、醴陵、永兴的铁，其质量都是可用的”。<sup>①</sup>蒋百里的意见得到了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赞同但却遭到了实业部的反对，因而并没能得到实施。

关于能源建设，蒋百里非常希望中国能与美国合作，当时的美国柴油生产过剩，其市场价格仅比自来水贵，蒋百里认为柴油经过不同次数的提炼可分别供汽车、飞机使用。他以私人身份与美国煤油公司驻上海代理人进行了接洽，美方代理人非常乐意供给中国柴油，蒋百里甚至与他拟定了一份三年的供应计划。据此，蒋百里制定了一整套柴油供给计划以及所需设备、技术等统计表。在他的计划中，第一储油池在庐山，第二储油池在衡山，第三储油池在川湘边境的武陵山一带，所有油池均设在山洞内。蒋百里还希望能借助美国的技术开发中国西部的石油。蒋百里的这一部计划上报实业部后，被实业部采纳，并上交了行政院会议。

此外，蒋百里还有研究战时交通的整套计划，包括公路、河流和铁路。还有设立汽车制造厂、飞机制造厂的计划。可惜他不遗余力的许多设想并没有得到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采用，因而

变为一纸空文。

1935年夏秋之交，蒋介石委以蒋百里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的头衔，派其赴欧洲考察总动员法。蒋百里于9月末到达意大利，随后遍访欧洲大陆，先后到了意大利、奥地利、南斯拉夫、捷克、匈牙利、德国、法国、英国。他应邀参观了意大利等国的军事演习，分别会见了墨索里尼、希特勒等法西斯头目。欧洲考察结束后，蒋百里又横渡大西洋，赴美国、加拿大参观考察。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蒋百里全面考察了当今世界上几个最强大的军事大国，最大限度地接触到了世界最先进的军事。这使得他的军事思想能够把握住世界的脉搏，跟得上世界军事飞速发展的步伐。

这次考察之后，蒋百里的军事思想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针对世界政局的变化、军备竞赛的激化，他知道一场世界大战已不可避免。那么，中国军事如何应付这场不由我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战争呢？这就是蒋百里主要思考的问题，具体说，他的军事思想是在为落后的中国军事设计面对世界战争的应用指南。蒋百里先后提出了在目前形势下，国防建设应优先考虑发展空军，他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以空军为主力，发展空军也是眼下中国能较快实现与世界军事强国缩小差距的办法之一；他提出战斗应与生活一致，要向德国、意大利等国学习，国防建设以军民兼容、平战结合为原则；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战争本身也发生了变化，蒋百里认为，过去的战争是平面战争，今后将演变为立体战。

蒋百里还是在考察尚未结束时就向南京政府呈交了他的考察报告，向军事委员会详尽报告了当今世界军事发展的动态，对世界局势进行了准确的预测，分析了中国可能面对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了应对办法。由于这次蒋百里是应蒋介石之请代表南京政府出访，所以蒋百里的报告引起了南京政府各方的重视，再也不象前几年，他许多苦思冥想的国防建设方案常常被当局搁置一边，或被打入冷宫。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作为蒋委员长的国防建设顾问，蒋百里这一年格外忙碌。三四月份，蒋百里风尘仆仆地视察了山东、北平、天津、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地的国防建设和经济状况。夏季，他在庐山暑期训练班上为各省高级将领讲课。到9月，蒋百里奉命第二次出访欧洲开展外交活动，希望能通过外交活动对意大利、德国等日本的盟友施加影响，对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合作进行干扰甚至破坏。至少是通过外交手段，说服意大利、德国两国在国际关系问题中，能给予中国一定的支持，或者是他们在对日关系问题上不涉及中国问题，对日本实施孤立。蒋百里的出访任务艰巨异常，此时的德、意、日已经勾搭在一起，他们正在加紧发动全球战争的步伐，而英、美等大国对中日战争采取了隔山观战的态度。绥靖政策使得德国、日本、意大利的一系列侵略行径更加猖狂。蒋百里深知此番出访前途险恶，但他怀着一颗炽热的爱国心，不顾在战难中颠沛流离的家人，坚定地踏上了与魔鬼斗智斗勇的坎坷征途。

蒋百里首访意大利，墨索里尼、齐亚诺等皆避而不见，富有丰富外交经验的蒋百里施展机智，争取到了与墨索里尼面对交锋的机会。面对既对中国市场垂涎又不愿放弃与日本人勾结的意大利法西斯分子，蒋百里有理有节，义正辞严地宣告“中日之战乃是日本侵略中国，而中国进行抵抗。侵略一天不停止，抵抗也就一天不会停止。”他告诫墨索里尼，中国对意大利参加德、日防共协定表示担忧，因为日本侵略者的本意根本不在于对付北方的苏联，而是以侵占中国为目的。他希望意大利不要与日本一样被世界上热爱和平的人民所唾弃。针对墨索里尼的心态，蒋百里结合国内抗战的需要，还与齐亚诺商谈了中意物质互换的问题，双方也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只可惜由于日本人从中梗阻，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迅速爆发，使得蒋百里的计划没能得到实施。

在德国，狂妄的希特勒根本不愿接见中国特使，他此时已和

日本人紧密地联结成了破坏世界和平的魔鬼同盟，在国际交往中德国处处为日本人说话，支持其发动的侵略战争。由于国内战场上国民党军队在京沪线上节节败退，国都岌岌可危，造成中国军队在国际上的声誉急衰，日本人更是趾高气扬。险恶的环境让蒋百里根本无从开展正常的外交，但由于蒋百里在德国军界有着非常高的声望，德国人对他的来访也不敢轻视。蒋百里先后会见了德国外交部长等政府官员，与德国法西斯第二号人物、空军部长戈林进行了长谈。蒋百里态度坚定地拒绝了戈林对中国的诱降，并正气凛然地说中国“既已奋然抗战，除非侵略者退出中国，决不会中途妥协。”还揭露了德国、日本以所谓的“防共”为幌子，大行侵略的行径，中国决“不受国际阴谋的影响”。

蒋百里在欧洲前后滞留了近半年之久，所见所闻无不充满战争气味。为了及时把在欧洲了解到的情报送回国内，蒋百里先后数次向国内寄回了考察报告。1938年元旦一过，他即派随员踏上归国的旅程，将代表团此行的情况向蒋委员长详细汇报。蒋百里自己则抓紧一切时间考察并剖析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几个侵略者的习性，探寻侵略者的致命弱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必胜之由。回国后，蒋百里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宣传中国必胜、侵略者必败的道理。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书中，蒋百里用他那支犀利的铁笔把日本侵略者的丑恶嘴脸彻底暴露于世，他发出了“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的格言，号召国人抗战到底。在《抗战一年之前因与后果》一文中，蒋百里指出战争可以剔析出我们民族的败类，检阅国人的努力程度。在《为国联开会敬告英伦人士》一文中，蒋百里警告英国政府不要对远东局势实施绥靖政策，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必将使其铁蹄踏向东南亚，英国在远东的势力范围和利益很快就会受到侵犯。目前中国的抗战实际上是在替英国打前哨战。在《抗战的基本观念》一文中，蒋百里提出侵略者“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

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他向全中国人发出呼喊

“中国民族主义终必胜利！”蒋百里不停地写，不停地讲，直到他在广西去世的前几天，他还为广西各界人士做了一次演讲，对桂林市政府的官员讲述他对目前抗战工作的十点建议。在这些著作、文章和演讲中，无不闪现出他卓越的军事才华。

从1934年到1938年，蒋百里几次出访日本和欧洲，使他最为直接地接触到了主导世界军事潮流的各个国家，掌握了军事理论和技术发展变化的第一手材料，使他的军事思想能紧贴时代的脉搏；同时又符合中国国情。因而，蒋百里的一系列关于军事、国防、外交方面的主张和建议成了蒋介石决策的主要参考依据。1938年9月，蒋百里就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这使他得到了一次一展军事才华的好机会，只可惜受命伊始，蒋百里却因病猝逝，真可谓“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蒋百里逝世于国家危难之际，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损失。

蒋百里这一时期的军事思想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 （一）抗战军事思想的几个主要内容

坚定的民族主义必胜的信念，成为蒋百里在抗战时期军事思想的主体观点。这个观点号召、鼓舞了全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战救亡的洪流中，有力地驳斥了悲观主义思潮。在《国防论》和《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中，蒋百里有两句抗战名言：“万语千言，只是告诉大家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这两句名言激励鼓舞着无数爱国勇士前赴后继，以鲜血和生命抗击日寇的入侵。在《抗战的基本观念》一文中，蒋百里指出，中日战争的胜负不是由一两座城市的得失所能决定的，中国国力中心不在都市，南京、上海之失，并没有给中国抗战能力以毁灭性的打击。中国最大的武器就是坚强不屈的民族意志，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战胜的。他指出：“战争的目的，在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之放

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之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sup>④</sup>

在对抗战的前途充满信心的同时，蒋百里也清醒地认识到中日战争是不可盲目乐观的，速胜与速败的论调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他主张对日作战的总方针应实行持久战。在七七事变之前，蒋百里在杭州与老朋友钱均甫探讨中日战争问题时曾说：“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事合流，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sup>⑤</sup>他分析日本的国情后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从其战略上来看以速战为主。武力中心部署在第一线。所以中国“对付日本的唯一方法，就是在军事上反其道而行之”，“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惫；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则置之第二线，使其有力无用处”。<sup>⑥</sup>

蒋百里始终把中国战场置于世界战场中去分析研究问题。首先，蒋百里察觉，日本国内暂时虽然是大陆主义者占上风，但主张进一步扩充发展海上力量、最终南下入侵东南亚是可以断定之事。这样，在中国的局部战争就与欧洲大陆的战争相呼应，形成世界大战。其次，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战，实际上是国际社会保卫香港和南洋诸国的前哨战，是在替国际联盟的和平政策守护着最后的堡垒。蒋百里断言，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最终都将落入陷阱而自亡。那么从世界战争的形势来看，日本侵略者比之于德国、意大利，就更显得象一个跳梁小丑，或许在其落入陷阱之时，还不够格落在中央，只能掉到一个角落边。

蒋百里认为，在中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以其武器上的优势，会迅速占领中国京汉铁路以东的领土。随着战线的拉长，日军无力兼顾，中国西部就成为战时的大本营，洛阳、襄阳、衡阳一线将是中日军队拉锯作战的前线。战争也就此转入相持阶段，故国防建设应以此一线作长远考虑。

在中国军事相当落后的情况下,根据世界军事发展的新趋势,以中国目前的能力,大力发展空军是缩短与世界差距、增强战斗力行之有效的应急手段。在《意国空军建设之顺序与意见》一文中,蒋百里提出:“中国建设国防,无论从政治、外交、经济、工业、军事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已万万赶不及了,此时唯一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发展空军,加速航空人才的培训。”空军的打击能力有三种:战略空军飞往敌国投弹,战术空军破坏敌军的交通线和补给线,空军与地面陆军配合,炸毁敌人桥梁及炮位等。<sup>[6]</sup>他在考察各国的空军后得出结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海军为主导,我预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以空军为主力。”在预测战争的新变化时,他指出:“制空权的新发展使未来战争争取一种新的形式,……交通线、车站、桥梁、工业区域、通讯枢纽、粮食分布地区,在战争爆发之初,立刻会遭到敌人破坏”。<sup>[7]</sup>也就是说,蒋百里已经认识到了未来战争不再是平面作战,而是立体化的战争。

蒋百里还主张学习瑞士的民兵制,发动全民参战,这样可以达到全民皆兵,进行全面防御。他认为“国防空虚及武器落后的中国,只有鼓励农村抵抗,进行广大而散漫的游击,乃为补救之不二法门”。<sup>[8]</sup>

(二)在研究世界古代军事发展史,研究国防与经济的关系时,蒋百里得出一个结论:“我于民族之兴衰,自世界有史以迄今日,发现一根本原则,曰‘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他说:“生活与战斗本是一件东西从两个方面看,但依经济及战斗的状态之演进,时时有分离之趋势。具有伟大的文化而卒至衰亡的总原因,就是生活工具与战斗工具的不一致。”<sup>[9]</sup>

蒋百里发现历史上的蒙古人平时以马匹为生活工具,随水草而迁徙,在游牧生活中编练成强大的骑兵部队,称霸一时。希腊人地处海边,造船、航海、经商为其日常生活,但同时也造就了一支强大的希腊海军,曾征服地中海和中东地区。在中国古代为

防治黄河水患而修筑的围堤、水坝，到战时往往能发挥巨大的军事作用。这些都是生活与战斗一致的例证。所以，蒋百里认为，一个民族应有将生活所用的工具和技术转化为战斗所用的工具和技术的能力，尤其是在精神方面的奋斗精神与团结精神一致，才能冲破难关，获得成功。他提倡建设一种生产、生活和作战相结合的国防体制，他把这种国防体制称为“生产国防”。

（三）在考察了欧洲各国的总动员法后，蒋百里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总动员方针。他认为今后的战争，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战争，包括战斗与经济的因素，是人、物和人与物的组织。他指出：“今世界军备之要素，不外乎三，曰人，曰物，曰组织。吾中国于此三者中，已得其二，所阙者独此最后之一项组织力是也。而组织能力之最大表现，即为国民总动员，……信能将民族之组织力发展，则国防之树如反掌耳。”“现在打仗不是靠两种军队一时的拼命，是两个国民永久的赛跑，因为要有长时间的赛跑，所以才要这总动员。”

为了加速实施总动员计划，促进军备，蒋百里对人、物、组织这三种要素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关于“人”，应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数量，二是统一的意志，三是健康。关于“物”，也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原料，二是动力，三是运用此种原料动力的工具即人类的“能”。关于“组织”，蒋百里认为这是中国目前最为缺乏的，他说：“中国不患无建设家、无发明家，患的是没有管理家。”“外国所苦心的，是原料不足的问题；中国应当苦心的，是组织不健全的问题。”<sup>[15]</sup>

蒋百里把世界各国在军备三要素方面的情况进行了一个排队，他认为三种要素全都具备的只有美国，英、法、德、意、日及欧洲国家均属于物质缺乏的第二组国家，第三组是有人、有物而组织尚未健全者。他特别指出：“盖今日之中国亦处于有‘人’有‘物’而组织不健全之第三组，而中国之生死存亡之关键，完

全在此‘组织’一事。”<sup>196</sup>

蒋百里向南京政府提交的《总动员纲要》，制定了中国实施总动员的具体措施，涉及机关组织、中央及地方机关组织的分别与联络、经济与国防、作战部队的辘重组织以及有关注意事项等各个方面，他是在研究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总动员工作走在世界前列的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制定此纲要的。

（四）关于军队建设，强调对军官的素质教育。对军官的素质教育一直贯穿于蒋百里的军事思想中，这恐怕与他早年在东北从事军队改造；后又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直至去世前又出掌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有很大的关系。

他主张把学校的军官与部队的军官进行交流，这样可以使拥有理论知识者获得实践经验，使只有实践经验而缺乏理论知识者获得理论上的提高。蒋百里指出：“中国近来衰弱的原因，是由于知识与行为分离。读书的人一味空谈理想，不适事实；负责做事的人，一味凭其直觉盲动，毫无理想。因此将我们祖先的真实本领（即经济生活与战斗生活之一致）丧失了。……不到十年前，一字不识的人可以做大元帅，做督军。他们自然也有一种统御的才能，但一点常识也没有，在现在时代里怎能担任国家的职务呢？反之，在今日南京各军事学校当教官的，职之七八还是终身当教官，没有直接办事的经验。”<sup>197</sup>

蒋百里提出对军官提拔任用要重才能而不应该只重军功。他建议“勇者受勋，能者在位。”他说，民国成立以来，无论哪一派当权，都是重军功而不重人才。一个粗狂的武夫，立了一点功，当局不管其懂不懂得军事和经济，就提拔做个独当一面的大员，以致误国误民。所以对军官应以荣誉酬军功，而不应以位置酬平庸。

军官素质教育还必须使其具备责任感和守法精神。关于这一点，蒋百里在各个时期的军事论著中都有详尽的论述，他的总体思想是只有具备责任感和有守法精神的军队才能完成保卫国

家的重任，否则就会成为祸国害民的野马。在这其中，军官的素质又格外重要。

蒋百里还要求军官必须有“识”，就是一名优先的军官应该掌握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民族等各类常识，这是一名高级军官处理国防事务所必须具备的。那么如何掌握这些知识，这就需要每一位军官虚心学习，要有大海一般的心胸，能吸收世界上的一切河流。脑子要“软”，软的象水，盛于方则方，盛于圆则圆，大路走不通就走小路，小路走不通就走地下的路。如果一个人的脑子硬化，就不能接受新的事物，就没有求学的资格。<sup>⑥</sup>

在这一段时期，蒋百里的军事思想日趋成熟和完善，逐渐形成一整套的理论体系。其最大的特点有三个方面：其一，高涨的爱国热情始终贯穿于其军事思想中，体现出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其二，军事思想牢牢把握住了时代发展进步的脉搏，跟上了世界军事理论和技术日新月异的形式；第三，立足中国本国实际，切中中国的国情军情，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力入侵、振兴民族的精神动力。

总而言之，蒋百里的军事思想不仅使中国古代军事理论重现光辉，而且为建设现代国防奠定了理论基础，更为处于外患之中的中国人民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蒋百里是一个真正懂得自己民族，同时又真正了解世界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贯通古今，融会东西文化，处处闪耀着中华民族的智慧。

#### 注释：

①黄萍荪编选《蒋百里先生文选》第82页，浙江金华，新阵地图书社，1940年1月再版。

②③④⑤⑥蒋方震：《国防论》第四篇《二十年前之国防论》，上海《大公报》代办部。

③⑨⑩陶菊隐：《蒋百里先生传》，第74、184、164页。

①⑤⑥蒋方震：《裁兵计划书》第三编第96、第一编第28、38~39页。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月初版。

⑦⑩⑬王成斌等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486~487、501、491页。

⑧蒋百里：《抗战的基本观念》，载黄萍荪编选《蒋百里先生文选》。

⑫蒋百里：《现代空军力之基础》，载黄萍荪编选《蒋百里先生文选》。

⑭蒋百里：《从历史上解释国防经济学之基本原则》，载黄萍荪编选《蒋百里先生文选》。

⑮蒋百里：《总动员纲要》，载黄萍荪编选《蒋百里先生文选》。

⑯蒋百里：《知与能》，载黄萍荪编选《蒋百里先生文选》。